胜利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

周杰荣 (Jeremy Brown) • 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编
姚昱 等译

《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

周杰荣 (Jeremy Brown)、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编
姚昱 等译

© 香港中文大学 2011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ISBN）：978-962-996-470-2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学
图文传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电子邮递：cup@cuhk.edu.hk
网　　址：www.chineseupress.com

封面图片：
Sam Tata 摄“高跷上的游行者”(*Parade Participants on Stilts*)
加拿大国家美术馆藏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nese)
Edited by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Translated by Yao Yu, with Chen Zhihong, Guo Youxin, Yang Jingxia, Sun Xiaoping, Wan Yuancho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470-2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Cover Image: *Parade Participants on Stilts*
Artist: Sam Tata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rom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

周杰荣 (Jeremy Brown)、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编

姚昱 等译

纪念魏斐德

我们的同事、导师和朋友

致谢

对我们这些在北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让广大中国读者看到我们的研究成果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本书中文版的诞生得益于杨奎松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我们对杨奎松教授、韩钢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史研究班的全体师生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支持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我们与中文大学出版社合作的整个过程非常愉快和顺利。为此，我们要特别感谢甘琦社长、吴永熹编辑以及林颖编辑。我们还要对姚昱等人细致的翻译工作，林一苹细心的译校工作和刘宪阁仔细的校对工作表示感谢。此外，我们要感谢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s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Fund）对翻译和校对费用的财政支持。

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岁月：重新回顾 1949–1953 年的转变时期”这一学术会议的产物。该次会议于 2004 年 6 月 20–30 日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召开。我们要感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下列机构对此次会议所提供的财政支持：负责学术事务的资深副校长办公室，人文科学中心，徐氏中国研究基金，中国研究项目，东亚研究委员会与历史系。

除了本论文集的作者们之外，还有一些杰出的学者们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要感谢洪堡州立大学（Humboldt State University）的罗伯特·克里沃（Robert Cliver）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徐兰君，他们不仅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研究发现，在会上还扮演了极具洞见的讨论者的角色。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几位博士研究生在会议期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援。莫捷明（Jeremy Murray）是会议的记录员，何必（Brent Haas）、黄爱伦（Ellen Huang），何大鹏 (Dahpon David Ho)，蒋迈（Matthew Johnson），

张珺（Elya J. Zhang），郑小威（Xiaowei Zheng）对会议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后勤支持。加州大学中国研究项目的两位职员贝蒂·冈德森（Betty Gunderson）与朱莉娅·关（Julia Kwan）对会议的日程安排、信息交流与文稿准备也贡献良多。

我们也希望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凯瑟琳·麦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为此书英文版所做的出色的工作，以及苏珊·巴杰（Susan Badger）这位能力出众的责任编辑的工作。我们还特别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的匿名评审人为本书提出的诸多有用的评价与建议。

我们的老同事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启迪了许多人。他为人热情慷慨，是本次会议的主导者之一，魏斐德的文章也为本书其他部分确定了基调。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我们将《胜利的困境》敬献给魏斐德，这位伟大的学者与令人尊敬的朋友。

目 录

致 谢 ix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引 论 1
   周杰荣 (Jeremy Brown)、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一、城市接管 21

2. “清理整顿”：上海的新秩序 23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3. 国家的主人？人民共和国早期的上海工人 63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4. 新民主主义与上海私人慈善的终结 83
   温奈良 (Nara Dillon)

二、占领外围 107

5. 从反共到抗美：1950–1951 年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 109
   周杰荣 (Jeremy Brown)

6. 西藏的“解放”——发生于 1949–1951 年的一段历史 137
   陈兼 (Chen Jian)

7. 老大哥在盯着：1945–1955 年中苏地方关系与新大连的建设 165
   何凯思 (Christian A. Hess)

8. 绿洲的召唤：1949–1953 年的新疆“和平解放” 191
   高峥 (James Z. Gao)

三、适应环境变迁的文化.....215
9. 鳄鱼岛：1950 年代初期的相声.....217
林培瑞 (Perry Link)
10. “第一堂课”：1950 年代初期中国人类进化的教学.....243
舒喜乐 (Sigrid Schmalzer)
11. 像革命者一样演戏：1949–1952 年间的石挥、文华影业公司和私营电影制片厂.....271
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12. 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新式正规大学”：1949–1950 年.....303
李滨 (Douglas A. Stiffler)

四、家族策略.....325
13. 叶氏兄弟在新中国.....327
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14. 接生的故事：1950 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婆.....351
贺萧 (Gail Hershatter)
15. 选择共产党中国的资本家：1948–1956 年的上海刘氏家族.....375
高家龙 (Sherman Cochran)

撰稿人简介.....401
索引.....405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引论

周杰荣（Jeremy Brow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

自从 1953 年以来，即当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毛泽东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的试验，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之后，中国 1950 年代初期这一阶段，就从人们的观察视野中消失了。出现这一情况不足为奇。随着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解释中国一系列新的戏剧性事件，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谁还会对紧接着 1949 年共产党接管大陆之后的这个时期感兴趣？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只是一个过渡，它与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剧变之间的关联，还鲜为人所知。

中国官员与学者中的许多人都在 1953 年以后的各种运动中受到了打击。他们对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的讨论要比西方同行做得早。在官方的历史著作中，1950 年代初期被展示成一个“黄金时期”：政治稳定、经济恢复、社会和谐。[1] 增进团结的确是 1950 年代初期党的官方政策。毛的新民主主义原则承诺过，要把与革命的“工农联盟”并不那么协调的资本家和其他中国人也包括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在毛时代之后的改革时期，各种出版物都开始宣扬对 1950 年代初期的正面记忆，这一点并非巧合，因为这两个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1949 年 10 月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私人工厂与大型国有企业并存，非政府组织和教会组织几乎与中共领导的组织一样起作用，而资本家与其他党外人士则支持当局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些情形，在 1970 年代下半期毛泽东去世之后再次出现。

然而亲身经历过这两个时期的人都知道，2001 年远非 1951 年。1950 年代初，中国正在从一个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内战与自然灾害中获得新生。管理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多变、支离破碎又贫穷不堪的国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对于一个此前二十年一直活动在内地的政党来说更是如此。掌权之后，共产党马上又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到 1950 年末，人民共和国不仅对外在朝鲜对美国作战，而且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武装反抗时有发生，很多地区只是在名义上为共产党所控制。但是，人民共和国初期的这个阶段，也是一段充满希望与热情的时刻。大量的新制度建立起来了，中共试图将社会各阶层包括进来。在城市，资产阶级成员既被期待改造自己并为国家的更高福祉牺牲自身的利益，也被邀请为建设一个新社会而贡献力量。然而在农村，地主作为的空间很小，特别是从 1950 年末温和的土改政策让位于更加暴力的阶级斗争以后。[2]

1950 年代初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代西方学者向我们暗示了当时的挑战、疑虑、希望与恐惧。到了 1953 年，大多数西方记者、留学生与神职人员都已经离开中国。但是就在四年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目睹了中共接管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场面。他们对新中国的看法不尽一致，从同情中共到极端反共的都有。但所有人都关心这一问题：共产党是否已经彻底地赢得了内战，抑或 1949 年的胜利者仅仅是填补了国民党人垮台后所留下的政治真空？

当时第一手的记述证实，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已经为改变做好了准备。知识分子、学生与其他人虽不一定倾向于支持共产主义，但对 1948 与 1949 年开进中国东部城市的这支纪律严明的农民军队都表示热情欢迎。[3] 不过在这些最初的报道中，对中共的潜在担心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点尤其体现在那些有关新政权在 1950 年与 1951 年致力于通过知识分子改造和镇压“反革命”的方式来清理与重塑社会的文章里。[4]

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是苏联导演的一场国际大阴谋中的马前卒这一点，也莫衷一是。这个党虽然已经统治了中国北方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长达十多年，但是外部世界对此知之甚少。而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

“红色恐慌”（Red Scare）使它倾向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服从莫斯科的指令的。中国的确在1950年代与苏联合作过，但它也是在走自己的民族主义道路。对毛来说，苏联的支持也许帮助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国人民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才“站起来”的。不过关于中国公民与苏联专家之间的关系与互动的情况，其细节到现在人们还知之甚少。

对于那些倾向于谴责新中国是一个与苏联一模一样的“集权”社会的人来说，中共政权使用暴力与强制手段，为他们提供了口实。最早关于1950年代初期中国的学术研究多半以情报和中国报纸译文为原始资料，它们将中国描述成一个用鞭子令其公民臣服的全能国家。这些著作断定，大多数中国人正过着一种“恐惧而麻木的生活”，而国家恐怖已经“把中国人可能有过的抵抗意志消磨殆尽”。[5]

虽然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决策研究延续着这种“认识敌人”的意图，但是就中国领导人是否盲目执行苏联命令这一问题仍有分歧。例如艾伦·怀廷（Allen Whiting）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介入朝鲜战争，是它面对自身的国家安全真正受到威胁而做出的反应，而不是苏联阴谋的一部分。[6]即使在冷战背景下，一些学者也尝试从中国本身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但是由于资料的局限与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所限，朝鲜战争对中国国内的重要影响，仍然没有被披露出来。

其他以个人经历或对香港的大陆流亡者的采访为基础写成的著作认为，中国新的领导人的兴趣不仅限于国家安全、政治控制与经济现代化。革命看起来也发生在个人的、心理的、甚至是精神的层面。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的《思想改造与集权主义的心理学》（*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与李克（Allyn Rickett）和李又安（Adele Rickett）的《解放的囚徒》（*Prisoners of Liberation*）（此书为两个在中国监狱里经历过思想改造并转而支持中共政权的美国人的回忆录）显示，中国采取的并不是那种不加区别地杀戮潜在敌人的制度，而是通过承诺给予灵魂拯救来换取一些人对新政权的完全服从。[7]

总的来说，1950年代完成的回忆录与学术著作都指出，中国的统治者利用民众要求改变的热情，再加上恐怖和灌输，已经稳固了权力。但是只靠对逃亡者的采访和报纸的报导，也在研究中留下了许多无法回答

的问题。必然地，这些探讨基本上都聚焦在新政权力量集中的大城市，多半高估了党对社会的控制，无法说清 1950 年 80% 以上还是农村的地区所发生的各种事件。[8] 中国各地在同一时期经历了同一过程吗？ 1950 年代初期的种种变化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村民与市民、男人与女人、汉族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吗？人们对家庭、乡土和职业的忠诚全都消失了吗？

到 1960 和 1970 年代，经过新一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毕业生与年轻学者的努力，这些问题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了。新的著作注意到人民共和国初期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旧（传统中国文化）和新（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平衡。在第二波研究 1950 年代初期中国的学术成果中，出现了这样几个趋势：第一，资料的限制意味着学者们仍不得不更多关注政党—国家层次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而不是地方社会的运作；第二，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尝试解释中共的政策是如何被执行的，而不是这些政策是怎样为人们所感受的；第三，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学者们对中国内部在整个 1950 年代一直存在的各种冲突与隔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9]

在文化大革命动摇了中国是由一个统一的党领导的团结社会这一印象之前，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详细介绍了中共通过列宁主义式的组织与制度管理中国社会的情况。[10] 舒尔曼认为，党—国在 1950 年代已经消灭了传统的权威网络，并取而代之。但是，当其他社会科学家继续密切观察单个的省份或城市时却发现，旧的模式与隔阂并未消失。即使对共产党干部来说，1950 年代初期他们与家庭和家乡的纽带，也是与对国家和党的忠诚并存的。傅高义（Ezra Vogel）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揭示了当地人与外地人在广东省的摩擦。多年来一直做共产党地下工作的本地干部，十分不愿执行 1949 年大批进入该省的北方人所发布的命令。当外来干部批评并取消了广东省当地温和的土改措施时，这一关系就更加恶化了。[11] 傅高义发现，即使同在广东省，这些干部们在语言上以及观点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使得 1950 年代初期的中共党组织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画面。

文化大革命为中共党组织及中国整个社会内部存在着各种隔阂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学者们发现，基本政策的分歧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政治学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研究天津时，就注意到毛泽东采取的是群众动员的管理模式，而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支持的则是党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12]1949年春，刘少奇访问天津并发表讲话，反对进行激进革命和敌视城市社会上层。在刘少奇访问之后的三年内，天津的干部采取了一种相对温和与宽容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与宣传并未触动太多的城市居民，只有个别目标群体，如“反革命分子”和宗教秘密会社的成员，感受到了党的统治的铁腕。李侃如揭示出，是朝鲜战争与1952、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最终使中共收紧了对城市的控制，并引发了“第二次革命”。因此，这些转折点的意义甚至比1949年的接管还要重要。不过，个人在1950年代初期的这些运动中究竟有怎样的经历和感受，我们仍所知甚少。

在中国大陆不向外国的研究者开放的情况下，只靠报纸的报导与流亡者的证词，自然限制了有关1950年代初期这段历史的研究范围。这一局面在毛死后有了改变。新资料的获得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毛时代的看法。从1970年代末开始，尽管经常会有政府的监督人员在现场，但外国学者的确可以在中国大陆进行采访了。再到后来，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与个人谈论其过去不仅已成为可能，而且是越来越普遍了。虽然中国各地的档案利用与收藏情况有很大差别，但是总的来说，相比以后的那些时期，中国档案馆一直更愿意提供1950年代初期的档案与报告。例如，县一级的档案馆已经允许学者利用显示诸如农村妇女如何靠1950年的婚姻法来实现自己目的的资料了。[13]而市级档案馆的档案则能提供共产党接管城市机构、重建城市社会秩序情况的更多细节。[14]

近来官方出版物也提供了关于1950年代初期政治领域，特别是精英层面的丰富细节。许多这类著作仍然致力于宣传“解放”之后的“黄金时代”，但也常常会提供许多有关消灭“反革命分子”与反共“匪徒”的细节资料。[15]新的材料也为认识毛泽东外交政策的革命性与民族主义特点，包括他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带来突破性的进展。[16]

随着资料基础的改变，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也发生了变化。毛死后阶级斗争被摒弃，许多学者不再从革命的角度来分析人民共和国了。将革命放在次要的位置，转而从国家建设与现代化的渐进性过程这一角度来思考二十世纪的中国，使得学者们开始探究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之间的延续性。从这一视角出发，1949 年不再是一个僵硬的分界线。柯伟林（William Kirby）关于中国技术官僚的开拓性研究，推动许多新的著作开始探讨家庭组织与工作场所在 1949 年之前和之后这两个时期的相似性。[17] 研究者发现当共产党人开始治理大陆时，出于必要性与策略的考虑，会允许 1949 年前的组织制度、个人关系与社会模式继续在新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书各章都建立在跨越 1949 年这一历史分界线的研究构想之上，并努力试图深化相关的认识。在诸如城市政策、公共安全、工业发展、教育问题、劳工关系、少数民族、农村医疗等领域，中国共产党人在 1950 年代的行动与国民党人在 1930 和 1940 年代的行动非常相似。和国民党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也决心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即便这种加速了的国家建设削弱了一些社会群体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也在所不惜。因此，即使中共自称是城市无产阶级的政党，但 1949 年春天之后，它还是立刻对劳工运动采取了严格的国家控制。这和国民党当年的举动几乎一模一样。不过无论在风格、手段还是结果上，中共与国民党都有着相当的不同。正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第二章注意到的："当面临动员问题时，国民党人的方式是进行规劝、向下传达命令、驱策被动的群众，而中共的特性则是直接深入到基层或草根层面并在那里进行组织，号召'群众'积极参与。"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 1950 年代初期中共深入到草根阶层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谁是中共动员的对象"群众"？这些群众如何面对因中共胜利而带来的这一困境？甚至，谁又是"中国共产党人"？毫不奇怪，答案是复杂的。本书研究的并非精英政治，而是要探讨不同背景的人在与革命性的政党—国家的中低层代表进行互动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与邓小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在接下来的十四章中也会偶尔出现，但更常见的是像副市长、大学校长、部队连长与妇联

代表这样的人物。换言之，读者将要熟悉的是许多负责在基层执行毛泽东命令的无名人士。在1950年代初期，这些中低层官员对于农村妇女、富裕商人、电影明星、科学家、一家之主、喜剧演员和战犯等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其重要性远比毛泽东更甚。他们这些普通人，将是本书的主角。

本论文集主要打算描述个人、家庭与社会群体究竟怎样经历了1949到1953年这个时期，特别是这种经历异乎寻常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必须承认，要将1950年代初期的中国进行一般的归纳和概括是不太明智的。以前的研究为这一时期提供了有用的勾勒：1949年是相对迅速的军事接管，中共起初对城市各社会群体采取了包容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政策收紧并进行严厉镇压，接着是中共巩固城乡控制的土地改革与三反五反等运动，最后是1953年开始的转向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重新评估，揭示了相对于上述概括模式，存在着诸多令人吃惊的变异与例外。一个人在1950年代早期会有怎样的经历，既取决于他所处的地域环境和社会地位，也有赖于他所面临的时代与机遇。例如，对贵州的军事接管并不顺利，直到1951年才最终完成。三反五反运动对上海的慈善领袖和声名显赫的资本家来说，的确是震动巨大、足以改变其生命轨迹的事件；但对陕西的农村妇女来说却毫无意义，对她们影响最大的是接生术的变化。

1950年代初期到底是一段相对和平的“蜜月期”，还是一场灾难来临前的征兆，抑或是一个言而无信、希望破灭的时代？上述多样性使这一问题不太可能有确定的答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们，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许多不同的事情。在沈阳，对一个飞速发展的省级高干家庭来说，这的确是一段黄金时期。而在1951年，驻守新疆的士兵们则享受着名符其实的蜜月，当时部队正安排毫无疑心的湖南女孩来给他们做妻子。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正如林培瑞（Perry Link）在第九章所披露的，一些电影影星、相声演员与慈善家热切地希望与新政权合作，但对“即将遭受的突然打击毫无思想准备”。我们将会看到，当取得一系列成功的中共打算清除潜在的敌人、取消难以接受的讽刺作品以及肃清意识形态上不正确的科学观点时，对这些群体的沉重打击突然接踵而来。

为完成特定任务而调动各种资源并集中全力行动，此时中共往往是很有效率的。1950 年代初期，新政权的各种举措令人眼花缭乱，忽而令人敬畏，忽而又令人感到滑稽可笑。中共自己决定了哪些事具有优先重要性，哪些事则不那么急需处理。占领像上海这样的关键城市，恢复东北的工业生产，说服富有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钱）留在中国大陆，确保西藏成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些都是亟待处理、最具优先意义的任务。为保证上述事业的成功，中共领导层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共产党看起来的确像一股组织良好的革命力量。相反，对一些不那么紧迫的任务，中共则表现得拖拖拉拉、视若无睹，甚至笨拙不堪。例如，在占领贵州、整顿上海劳工积极分子的历史问题、允许发行好莱坞电影与创世论小册子这些问题上，新政权的马虎甚至是无能，令人惊讶。1951 年以前，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在 1949 年和 1950 年“国家”与“社会”的复杂互动中，社会经常占了上风。

与以往有关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研究不同，本书的考察不仅局限于中国沿海城市地区，也探讨了中共对非汉族地区的接管。正如本文集中研究贵州、西藏与新疆的各章所展现的，1949 年以前中共是愿意考虑让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的。然而一旦胜利在望，中共领导人对于“中国”的定义就变得僵化强硬起来，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华民国的——有意思的是还有大清帝国时期的—疆界。在强硬的军事手腕与灵活的外交策略的交互作用下，人民解放军于 1951 年底占领了西藏。而控制新疆则是一个更为混乱的过程，不仅斯大林介入其中，毛泽东还必须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在每个案例中，中共高层领导人都认为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开化程度较低。他们与这些少数民族打交道时或许谨慎小心，但毫无敬意。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人看起来与他们之前的国民党人非常相似。

尽管人们对斯大林在把新疆归还给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的角色已有所认识，但毛泽东与这位苏联独裁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人熟知。本论文集并不囿于中苏之间的高层联系和“模仿苏联模式”的简单概括，而是从新的角度探究了 1950 年代的中苏合作与冲突。[18] 在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被苏联占领的港口城市大连，以及在进化论

的科学世界中，中国人每天都与苏联的官僚、技术人员与思想观念发生互动。因此，中苏关系与其说是由毛泽东与斯大林共同锻造而成的，不如说是由像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菲利波夫（Filippov）、担任苏军驻大连司令官的克兹洛夫（Kozlov）这样的苏联官员和与他们朝夕共事的中国官员一起创造的。这些彼此打交道的人，既非完全互相依赖，也不是长期彼此敌视。中国方面的中层干部知道，苏联的帮助对发展中国城市工业与建立高等教育制度十分关键。不过，中苏双方都心存猜疑。来自苏联方面的侮辱与蔑视令中国干部愤怒不已，他们对爱国主义的坚持丝毫不逊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中国人很纳闷：苏联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会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帝国主义的呢？

中共打算改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革命与反革命分子的世界观和思想意识。而经验丰富却又颇为自负的苏联顾问们则对此嗤之以鼻。不过，1950 年代中共在商业、教育、学术与艺术领域发动的各种运动，的确是城市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许多本来不革命的分子看起来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真正的信仰者”。但是这些转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深刻的、真诚的？本论文集的个案研究表明，对个人职业与家族发展的复杂考虑在市民个人的“思想转变”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些个人的考虑在过去是（现在也是）很少被人承认的。许多人的信仰都是伪装出来的。还有不少人是机会主义者。共产党在共和国初期对此心知肚明却不甚关心。比起人们实际所想的或是在家里所说的，他们在公共场合的表态更为重要。从今天的角度来看，1950 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只是在表面上解决了问题，而未能产生长远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恐惧的气氛在人们的思想中越来越根深蒂固。中共虽然未能成功地令许多人真正“改造他们的意识”，但它至少成功地制造了恐惧并让人们彼此互相背叛，以防止他们团结起来表达集体利益，从而避免这些集体行动对国家权力构成潜在的威胁。毫无疑问，慈善家、劳工领袖、商人和艺术家并不愿意彼此揭发。不过当只能选择是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还是被当作打击目标时，许多人都明智地看到了成为积极分子的好处。

恐惧和充满希望的理想主义一起孕育出某种可被称为“适应环境变迁的文化”（culture of accommodation）。许多没有明显党派倾向的人物并未选择反抗中共或是逃离中国，而是决定牺牲自己的利益来竭尽全力地配合新政权。资本家们交出了自己的钱财，社会福利组织的领袖们放弃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演员与科学家们也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与学术自由。他们希望通过与新政权合作，最好能获得政治上与物质上的回报，至少也能使自己与家庭免于不必要的暴力与动荡。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一策略的确发挥了作用：与中共合作的商人们获得了官职，即使他们已不再富有，但是仍被承诺可以继续舒适的生活。到 1953 年，许多人熬过了之前的各种运动。他们也许被迫低头，但是并未被彻底打垮。而在 1957 年，又或者 1966 或 1976 年，还有多少人可以这么说？偏执多疑的狂热氛围在 1953 年以前就开始逐渐酝酿并日益严重，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后来在毛泽东时代出现的各种悲剧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可是灾难的种子的确已经种下。

我们对人民共和国初期岁月的探索，可以从有关中共接管大型工业城市特别是上海的研究说起。这正是文集第一部分各章的内容。国民党在上海并不受欢迎，1949 年 5 月更是一仗未打就逃离此地。因此中共对上海的接管可谓出人意料的迅速。不过，这种轻松的胜利只是表面上的。在第二章中，魏斐德细致地考察了在中共接管上海的前夜，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是如何与上海街道上的底层人物进行互动的。从警察、干部、士兵到间谍和邻居监视委员会，从投机商人、无业游民到小偷、武装匪徒和破坏分子，这些普通小人物形形色色的生存策略被有力地呈现出来。魏斐德发现，这些上海人一直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和行动，以适应时局的变化。从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到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占领上海，再到 1940 年代末期国共内战，莫不如此。任何人，甚至是同一家庭的个别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叛徒或间谍。魏斐德揭示出，正是这些背叛与欺骗的历史遗产孕育了前面刚提到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偏执多疑的文化；反过来，这种文化又刺激了人们在随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去追查和消灭那些被想象出来的“叛徒”与“反革命分子”。

上海的许多产业工人与中共的劳工组织者都认为，他们将是新中国的“主人”。毕竟无产阶级在中共夺取政权前后为支持革命可谓贡献良多。但是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第三章指出的，1949 年春以后，为了促进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中共开始日益遏止劳工的激进主义。裴宜理的研究表明，中共对劳工的态度其实与国民党非常相似——党与国家必须控制工会和工厂纠察队。事实上，在国共两党互相模仿与彼此渗透了三十年之后，已很难清楚地区分劳工运动中究竟哪些是国民党的，哪些是共产党的。和国民党一样，中共从一开始就欢迎那些愿意将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置于中共国家建设规划之下的劳工领袖们，而排斥那些将工人阶级的利益置于最高地位的劳工积极分子。许多工人与劳工领袖都感到自己的利益被出卖了。在劳工运动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复杂的背景。因此，在“解放”后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中，许多劳工领袖都愿意，也能够将昔日的同志妖魔化。

在上海颇具影响的慈善团体的命运，更清晰地表明了 1950 年代初期中国城市社会的复杂性。温奈良（Nara Dillon）在第四章对此有所考察。1940 年代末期，上海的慈善事业与国民党控制下的国家机器和工业资本家们都有联系。但是在 1949 与 1950 年，它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并为社会和新政权服务。实际上，1949 年以后上海的慈善组织甚至有所增加。但是随着 1951 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进行，中共开始缓慢但却坚决地着手消除慈善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有不少被认定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敌人有着各种联系。为了削弱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中共向一些自愿慈善组织强加莫须有的贪污罪名。温奈良注意到，运动策略也使资产阶级领袖们陷入绝境，彼此敌对。一些慈善团体的著名成员的经济来源被剥夺，也被迫割断了与本来可以维系自己权力的组织纽带的关系。1952 年，许多产业工人试图向资产阶级发动一场公开的阶级战争，不过新政权还没准备好这么做。但中共在其他领域对资产阶级发动的系统打击却是非常有效的。搞慈善的资产阶级没能抵抗这一事业走向灭亡的命运，事实上在此过程中他们还进行了合作。这些资产阶级慈善家采取各种私人策略来证明个人的政治忠诚，改变个人的阶级地位，并以其他身份重新融入中共政权的社会基础。

第二部分的各章说明了占领边远地区与接管像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是非常不同的。对贵州省和西南其他地区的占领，因为当地几乎没有党组织存在，因而很少预先准备和适当计划。在当地人的眼里，这一接管不过是被外来敌对力量占领罢了。周杰荣（Jeremy Brown）在第五章披露道，1949 年底人民解放军迅速穿过贵州，并未做好进行统治的准备。匆匆而过的军队没收了粮食，饥饿的农民和地方机构落入前国民党人、地方豪强，甚至是土匪的手中。当地不久就爆发了叛乱。周杰荣发现，党最终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名义下，靠实施恐怖手段才得以控制住这一地区的。在此过程中，上千人被处决，尸体被示众以为警告；上万人被招募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场成为炮灰。他们中许多人很快就被送上火车，却并不清楚最后的目的地。毫不奇怪地，在众多或死在朝鲜，或做了逃兵、或成了联合国军俘虏、或在停战后叛逃到台湾去的中国人当中、这些来自西南地区的解放军士兵比例甚高。

从 1949 年春到 1951 年秋，中国共产党与西藏政治精英之间的远距离互动，代表了另一类型的紧张关系。陈兼在第六章对此进行了分析。1949 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为反对国民党在西藏的政策，而坚持认为藏族人有权利从中国分离出去。但是国民党人刚被击败，共产党人就开始采纳国民党此前对西藏的政策，将其当作自己的意见，转而强调西藏是新中国的一部分。中共一面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一面也强调愿意进行灵活的谈判。尽管也有人愿意与中共合作，但大部分藏族精英仍然采取拖延态度，甚至诉诸抵抗。1950 年 10 月，中共动用军事力量，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装备极差的藏族驻昌都军队。即使在这个时候，藏族人仍然犹豫不前。不过，最终由于美国、英国和联合国对藏族人近于绝望的请求几乎无所作为，藏族人别无选择，只能在 1951 年春与中共进行谈判，并签署协议。他们被迫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陈兼发现，在藏族人的印象里，中共接管西藏是汉族人对西藏的接管，这损害了藏汉关系。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认为汉族相对具有优越性的看法，更为当地藏人所深恶痛绝。

中共对今天靠近朝鲜的辽宁省大连市的接管，因为另一种性质迥异的族群紧张而变得非常复杂。确实，正如何凯思（Christian A. Hess）在

第七章所述，大连地区不是由中共在1949年“解放”的，而是由苏联在1945年接管的。在这个颇具战略意义的港口城市，苏联的行政管理一直延续到1950年，而驻军则持续到1955年。从1945到1950年，苏联与中共的紧密互动，在大连比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中苏在大连的关系远非和谐，而是问题重重，这也预示了1950年后的十年间中苏关系将会出现更大的紧张。一些中国干部容忍了苏联在大连的管理，但还是有许多中国干部对苏联人的行为感到愤怒。因为苏联人在大连的举止看起来更像是旧式的帝国主义者，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另一方面，苏联人赞成社会与政治的稳定。他们对中国的阶级斗争运动感到震惊。何凯思披露说，总体看来，苏联人使1949年后中共的城市政策变得更为温和。1950年，中苏签订了新的条约，两国关系因此得到了改善。中苏友好协会与青年夏令营看起来正蓬勃兴起，飞速发展。不过，中共当局还是不得不尽力遮掩1940年代末期中苏之间的冲突，并大力开展在今天看来显然有误导之嫌的宣传，好让人们相信苏联对这一地区的社会主义转变“做出了贡献”。

新疆是本书研究中共如何接管边疆地区的最后一个案例。这里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的聚居地，他们对汉族人的猜忌很深。中共在新疆既没有什么组织基础，也没有任何军事力量。事实上，苏联在新疆要比中共更有影响。高峥（James Z. Gao）在第八章里对此进行了考察。起初，苏联打算将人民解放军排除在新疆之外，希望建立一个非汉族的、服从于苏联的国家。但是由于担心出现一个独立、不友好甚至反苏的新疆，斯大林改变了方针并向毛泽东提供帮助以加快汉族对新疆的接管。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帮助。被打败的国民党政府在新疆的汉族代表很快就宣布效忠于中共。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席卷了新疆，彻底摧毁了穆斯林造反者的抵抗。高峥发现，中共十分重视斯大林的建议，很快就建立了由现役汉族士兵垦殖的封闭性绿洲农场，以此在新疆实行殖民。随后，共产党还向新疆引进了不少汉族妇女，其中包括许多来自甘肃、湖南与四川的“阶级敌人”的女儿们。共产党以提供就业机会来误导这些妇女并把她们分配到各个军垦单位，让她们与汉族战士结婚，鼓励她们生很多孩子。

在第三部分，我们将返回汉族核心地区，探讨文化教育领域中那些知名人物是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秩序的。林培瑞在第九章中以相声艺术家为例进行了考察。当时不少人都热情响应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图景，相声艺术家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群体。他们打算把相声这种深受人们喜爱却有些低级趣味的地方艺术形式，改造成“进步”的民族艺术。不过相声应当怎样来描绘正在出现的“新”社会？这些艺术家们并不清楚。1950 年即已强势出场的文化官员希望相声能够赞扬新社会。但是问题在于，单纯的赞扬看起来很难做到有趣和逗乐。在本质上，相声要求毫不留情地进行讽刺。如果相声讽刺了“封建”遗毒，中共官员会很高兴；但是如果对革命阵营内部的人员也进行忠实而善意的讽刺，这些官员显然不乐意看到这些。尤其是当毫无幽默感的官员发现，一些讽刺中共的段子是由像相声大师何迟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表演时，他们就更加感到难堪了。

在让科学家们去研究充满政治激励的“人类起源”问题这一点上，中共相对更为成功。例如，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条件？人从哪里来？在第十章，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发现，虽然直到 1951 年中国的天主教徒仍在传播上帝造人的创世论观点，但中国的科学家们在苏联方面的引导下，以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若干文本为武器，立刻对创世论发起了进攻。这些科学家认为，人类是从猿进化来的，而“劳动”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新政权因此接受了一个兼具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与唯物主义性质的理论准则，赞扬了劳动人民的历史贡献。不过舒喜乐也注意到，在这些显然具有国际主义特色的信条的表象下，隐藏着一些非同寻常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偏见。到 1952 年，中国学者们坚决反对外国学者的这一理论——1920 年代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只不过是人类进化活动中一个灭绝了的分支的证据。中国科学家们坚持认为，北京猿人是中华民族（包括少数民族）所有人——也许还是所有亚洲人——的祖先。

在第十一章，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考察了浮华的电影世界对革命的回应。堪称 1940 年代私人电影业领头羊的文华电影制片厂，与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明星之一石挥的苦难经历是其关注的焦点。大众媒体的

影响力让中共印象深刻，但其在这一领域中经验极少，因此非常需要私人电影制作者与深受女影迷喜欢的男影星的帮助。尽管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的背景，但像石挥这样的电影明星们还是表达了支持革命的热情，甚至是浪漫的决心。他们在 1949 年与 1950 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竭尽所能地“扮演革命者”。但是甚至在 1950 年末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并在 1951 年初发动对艺术领域的毁灭性打击之前，国家就已经加强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并且制造了一种政治恐怖与自我审查的气氛。毕克伟发现，为了保护自己并使自己的事业更进一步，昔日的老朋友们越来越互相背叛。魏斐德曾经讨论过的偏执多疑的文化症候，在当时产生了严重后果。石挥是一位极具才华的演员，但无论他怎样做，都难以达到党的要求。到 1953 年，私人电影制片厂被关闭，许多电影人自己做出了调整。而石挥则被边缘化并遭到斥责。他在舞台上的最后一次表演——也可以说是一次强有力的抗争——是一场经过精心安排、深具仪式意味的自杀。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像石挥这样的“旧式”知识分子的依赖，新政权希望训练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正如李滨（Douglas A. Stiffler）在第十二章所暗示的，1950 年 10 月在北京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是朝着这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中共与苏联顾问密切合作，并热切希望这样能够生产出技术上过硬、政治上可靠的学生。但是从一开始，苏联专家与人民大学的领导就在招生问题上出现了摩擦。在此个案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是实用主义者，坚持应当从社会各个阶层招收学生，而不仅仅是从革命阶级中招收。这种看法承认了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主要来自农村地区的老干部，其教育水平非常低。人民大学的领导不打算拒收受过更好教育，往往具有资产阶级、商人、国民党人、天主教徒、富农与地主背景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苏联人则扮演了左派的角色。他们抱怨说知识分子是机会主义者，并且会污染革命。中国人则回答说，城市青年在思想观念或者意识形态上可以进行改造。李滨还指出，与苏联顾问与中国领导之间的这种紧张相对应的是，新招收学生中的这两大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本论文集的最后一部分即第四部分，考察了家庭在中国革命胜利中的经历以及所做出的调整。自从 19 世纪以来，中国沿海和城市地区的家

庭体系就一直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着“现代化”。中共的接管加速了这一过程。但是无论如何，家庭这一基本结构仍然稳固地存在着。为探究这些变化，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在第十三章细腻地考察了一个由城市职业人士构成的大家庭的复杂生活。于1930年逝世的叶崇质在晚清时担任过警察官员，到了民国初期则转变成商人，但是他的孩子们在1940和1950年代则成为科学家、艺术家、编辑与记者。一些人在非共产党的政治空间非常活跃，一些人则是共产党员。叶家的后代们希望在政府机构中任职可以保护家族的各个分支，并让他们从中获益。周锡瑞发现，1949年以后，叶氏后代各个家庭因为其服务角色的不同而结构迥异。例如，作为中共官员的叶氏后代的家庭，住在警卫林立的深宅大院，他们的孩子则经常生活在精英寄宿学校。而作为科学家、学者与其他职业者的叶氏后代的家庭则生活比较简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联系也更为深厚。不过，叶家所有的人都不愿在“新社会”引起不必要的政治关注，并为此想方设法。

对于长久以来冒险在家分娩的农村妇女和她们的家庭来说，国家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农村里的妇女联合会与官方资助的接生婆们。中共辞令总是强调“封建”迷信对接生中国的新公民有害，但正如贺萧（Gail Hershatter）在第十四章所揭示的，对遍布中国农村的成千上万的旧式接生婆，中共其实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这实在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虽然数不清的妇女与婴儿过去因为旧式接生婆的不当护理而遭遇了不必要的痛苦乃至意外死亡，但是革命者不得不承认，许多接生婆技术高超。因此中共虽然谴责不卫生的接生活动，但地方妇女组织在1950年代初仍耐心地训练新式助产士并重新培训旧式接生婆。尽管接受了科学改革，但许多旧式接生婆不只是在一种文化领域中发挥作用。一些接生婆被新政权树立为无私的、现代的、科学的、具有社会主义献身精神的样板。不过，在神通广大的鬼神力量所盘踞的文化领域，接生婆们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是现代国家不能看到或至少不愿在官方报告中提到的。

在《胜利的困境》这本论文集的结尾部分，我们再次返回工业化的上海，并追问为什么1949年以后绝大多数资本家家族——许多都与国民

党联系紧密——会决定留在中国大陆。中共领导人一直宣称，这是因为这些商业家族是“爱国”的。在第十五章，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细致地考察了著名实业家刘鸿生和他的儿子们的故事，并对上述看法提出了挑战。1949 年春，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向刘鸿生不断示好。架不住这种攻势，刘无奈地逃亡香港。11 月，刘鸿生不但自己返回中国大陆，还想尽办法让所有的儿子也都回来。他甚至不惜采取欺骗手段，为此还伤了一个儿子的心。刘鸿生这个资本家后来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并被承诺不会触动其资产与生活方式；他还被称为“民族资本家”。对此，刘鸿生不免有些怀疑：毕竟，他曾在一家英国公司做过买办，也曾是蒋介石时期一家国有工业企业的官僚资本家。周恩来对他的疑惑感到好笑，解释道中国共产党说谁是民族资本家，谁就是民族资本家。刘鸿生为中共政权努力工作，并在中共十分需要他的技能时一度获得不少个人好处。但是刘鸿生与其他资本家家族都在 1952 年初的五反运动中遭到了残酷的羞辱，更在 1953 年开始的国有化运动中丧失了所有企业。而 1953 年这一年，正是本书所关注的转变时期终结的日子。

注释

1 例如《天津经济概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9 页。

2 Frederick C. Teiwes,“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1949–1957,”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86–87.

3 Derk Bodde, *Peking Diary: A Year of Revolution* (New York: Schuman, 1950); and A. Doak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New York: Praeger, 1963). 后来的著作也记录了国民党政府是如何疏离知识分子和商人的。见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9 [1978]); 及 Lloyd E. Easter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4 见 Maria Yen with Richard M. McCarthy, *The Umbrella Garden: A Picture of Student Life in Red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54)。

5 分别见 W. W. Rostow,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54), 171; 及 Richard L. Walker,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215。

6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7 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61); and Allyn Rickette and Adele Rickette, *Prisoners of Liberation* (New York: Cameron Associations, 1957). 还见 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1955* (New York: Praeger, 1964) 的最后几章。

8 一个例外是杨庆堃对广东农村的系列研究，见 C. K. Yang：*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59), 及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59)。此后对 1940 年代末与 1950 年代中国农村的研究，则有 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Vivienne Shu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1949–19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9 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in 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11 Ezra E.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98–105. 后来的研究证实，地区认同与家族效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仍然保持了影响。见 Dorothy J. Solinger,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1949–1954: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及 William L. Parish and Martin King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12 Kenneth 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3 Neil J. Diamant, *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 Politics, Love and 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1949–19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4 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Eddy U, "The Making of Zhishifenzi: The Critical Impact of the Registration of Unemployed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PRC," *China Quarterly* 173 (2003): 100–121.

15 关于中央的政策与毛泽东的作用，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以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以下。关于地方军事报告，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年）各卷。

16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and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17 William C. 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1990): 121–141. 最近突破了以 1949 年为分界线的著作有 Susan L. Glosser, *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 1915–195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Lü Xiaobo and Elizabeth Perry, eds.,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7); 以及 Mark W. 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 "Emulating the Soviet Model, 1949–1957" 是 MacFarquhar 的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 中一个部分的小标题。

—

城市接管
(Urban Takeover)

第二章

“清理整顿”：上海的新秩序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三年来，由于上海人民不断的努力，上海已由一个依赖帝国主义经济而生存的城市，改变为不依赖帝国主义经济而独立发展的城市；已由一个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服务的城市，变成为人民、为生产服务的城市了。上海已大大清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遗留下来的污毒，开始走上正常而健康的发展道路。

市长陈毅，上海，1952 年 5 月 28 日[1]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宣布了要将其战略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计划。中共的六届七中全会号召将抗日战争的重点转向城市。“在历史重要性上，自 1927 年革命失败之后我党十分困难地将工作中心转向了农村之后，这将是我党一个新的转变。”[2] 随着在国共内战中取胜的前景日益明朗，毛泽东越来越关心如何统治中国城市与农村的问题。1947 年春天胡宗南对延安发动了进攻，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化名李德生逃跑。但到了当年 8 月，毛泽东的部队就在沙家店进行了反击并歼灭了胡宗南突进的两个旅，7 个月后又在宜川战役中歼灭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剩下的 2.8 万名士兵。这为毛泽东越过黄河、将革命传向全中国打开了道路。[3]

一、中共的新城市政策

甚至在这次胜利之前，毛泽东就已经收到了薄一波的一个报告，该报告汇报了中共在攻占了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后所出现的过火行为——人民解放军鼓励城市里的暴徒攻击私人住所并处死城市精英。毛在这份报告的空白处写道："（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4] 1948 年 2 月，毛泽东继续宣告，党在新解放城市的政策应当是全力"增加生产、便利推销……劳资两利。"[5]

毛泽东渡过黄河后前往山西省繁峙县伯强村，在那里他的通讯员告诉他，人民解放军经过激烈战斗已夺取了洛阳。1948 年 4 月 8 日，毛泽东草拟了下面这封给洛阳前线领导人的电报：

> 一、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二、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三、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四、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五、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七、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八、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6]

这封电报成为中共干部为准备夺取中国城市而必须学习的两份重要文件之一（另一份是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命令）。

二、训练解放干部

中共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要训练干部来接收华中、华南地区的城市。1948 年 5 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告诉东北局，必须建立"大党校、大军校"以及一个大学来训练从事城市工作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1948 年 9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西柏坡（中共临时的农村总部）政治局扩大会

议批准了一项决议，要求为新解放区训练三万到四万名干部。两个月之后的11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了“从济南、潍县及徐州职员工人中抽调大批比较进步的人员进行短期政治训练，准备将来接收”南京、上海、杭州与其他城市。[7]中共华东局已经为这一任务做好了准备，一个原因是该局想要从希望升职的二十多万名老干部中提拔一部分人上来，另一个原因是该局已经招收了许多已经急切盼望南下的产业工人与青年知识分子。

到1948年秋，中共中央认识到接管城市所需的干部在数量上仍然不够。毛泽东自己向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发了一封电报，命令其司令员停止一切事务，“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8]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的决议》。这些干部中的一万五千名将由华东局训练并在1949年3月之前集合。华东局随后于12月25日决定，将从山东的三个地区招收所有这些干部。鲁中南区负责挑选和准备4,430名干部来接收上海、浙江与福建。

中共中央在1949年新年时宣布，挺进江南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随后将会立即进行干部挑选工作并进行预演攻击。挑选山东解放区干部的主要标准是“为南方挑选强壮的干部，让身体虚弱的干部留在家”。“南下干部”很快就成为“老革命”的同义词。南下干部并不愿意进入江南地区。许多山东人过去在上海做过苦力。他们返回家乡时都抱怨江南地区气候潮湿、方言奇怪、当地人既精明又瞧不起农村人、食物糟糕、扬子江三角洲还有许多毒蛇。

1949年2月7日，鲁中南区党委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县都召开为期两天的动员大会，并上交了一份南下干部的最终名单。一周后这些南下干部在台儿庄集合，学习了解他们将被分配去的地方的情况。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杨帆率领六十多名干部（包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到淮阴搜集情报并在上海进行“策反”。除了向准备进入上海的中共干部发放印刷资料，淮阴工作队还组织了一队干部来分析由上海地下党送回的军事和民事情报，随后准备了介绍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情况的详细材料，

并印刷分发给“解放干部”。有关上海的材料题为《上海调查材料》，共有二十六卷，在1949年4月末完成。[9]

同时，中共华东局社会部也在济南开设了一所警官学校，招收了一千多名青年学生。这些学生的任务是接收上海警察局并组建人民公安机关。3月中旬陈毅向这些青年干部发表了演讲，特别强调了入城纪律的重要性，不允许将他们“野”的游击队习气表现出来。陈毅说，粗野将会损害胜利，他的青年听众们都点头同意。[10]

当时这支警察受训队伍驻扎在丹阳，名单已经准备好，一旦中共接收上海他们会立即被分配到上海警察局各处、分局、科甚至是专门的辖区。陈赓这位中共安全问题专家由于从事过地下工作，对上海十分了解，因此被任命为上海公安局局长。这支接收队伍得到了彻底的信息通报(上海警察局里的中共成员被秘密带往丹阳，表面上是回家探亲，实际上是向这些现已被任命为警察的南下干部提供自己部门的详细情况)，每个干部对自己所要工作的警察岗位都十分熟悉。

三、收紧套索

就在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之前，中共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与会者再次重复了“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农村转向了城市。”[11]当23日早晨毛泽东动身前往首都北京之时——那里中共正在与南京政权举行最后时刻的和平谈判——告诉周恩来：“我们今天要进京‘赶考’。”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笑着说：“不。我们不是李自成。”[12]

1949年4月18日，中共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谈判将于4月20日星期三结束。[13]因此国民党代理主席李宗仁仅有两天时间对中共渡过长江并在长江南岸建立10个桥头堡的要求作出让步。[14]4月19日李宗仁与国民党高级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与会者都拒绝有条件的投降。在同一天，中共宣布由陈毅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已经完成了渡江准备。[15]

毛泽东的战略既英明又大胆，体现了他利用部队快速运动、夜间强行军和战场灵活性来从侧面攻敌的长期战略思想。毛泽东拒绝了他的参

谋们提出的以集中兵力只攻击南京、靖江、江阴的建议，他决定将其总人数超过一百万的四个野战军部队在四百英里的战线上全部投入战斗，在从南京到上海的二百英里、从南京（长江向南转弯）到安庆的二百英里两条战线上对敌人进行全面打击。虽然汤恩伯准备在江阴抵抗中共渡江以防御江南地区，但毛泽东的西线集团军却渡过安庆与铜陵段长江，随后越过苏南封锁包围了太湖周围的诸多城市，并在上海南面与陈毅的东线军队汇合。[16]

4 月 20 日，上海市区的人们从下午 5 点起就开始听到了中共部队的炮火声，而且炮声变得越来越密集，这一开火比中共规定的和谈最后结束时间提前了七个小时。[17] 当中共部队于 4 月 20 日开始渡江时，负责防御南京的江阴要塞国民党将领却命令他的部队停火。一名忠于蒋介石的青年军官从背后射伤了这位将领，但此时已为时已晚：人民解放军已在长江南岸登陆。中共军队现在面对的是国民党 22 个军共 35 万人的军队。其中 14 个军布置在南京到上海之间的地带，“这种布置很明显地表明，汤恩伯的主要意图是要逃跑。”[18] 当中共东线集团军的 35 万名士兵占领了从靖江到上海之间这一地区时，在浙江到安庆地区一带为数 30 万人的中共部队则越过了八十英里长的长江战线向腹地推进，同时另有 24 万人的解放军部队穿过了安庆到芜湖二十五英里的地带，兵锋直指青阳。[19] 4 月 23 日夜与到 24 日凌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到 4 月 25 日，针对已经退入上海到杭州之间江浙口袋地区的汤恩伯 30 万国民党部队，中共的部队已经“迅速闭合了陷阱”。当时陈毅的部队故意绕过了上海，转而夺取了距离上海西南只有 53 英里的嘉兴。这使得沪杭铁路与苏嘉铁路都落入了中共手中，切断了正在撤退的国民党军队最后一条南下铁路线。[20] 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上海警备司令钱大钧坚持要誓死保卫上海。[21]

四、上海“陷入消沉的恍惚”[22]

> 恐怖、死灰、寂静的日子；火焰焚烧的夜晚（和着不断的枪声）。死亡逼近。女人们在尖叫，没有领到薪水的士兵强行闯入受惊的平民的住宅，

> 黑夜弄堂里上演着喊叫、强奸和凶杀。为了得到从农村走私来的米，饿得半死的市民冒险爬行穿越围城的铁丝网。[23] 首饰、毒品和金条被缝入尸体好运送到藏匿之处……天亮之前，邪恶持续上升。[24]

来自农村的难民塞满了通向城市的道路，直到这些道路不能通行为止。一些人自己带着小袋的大米；其他人则抢夺他们可以找到的所有东西："一辆装着某位小市民储藏的五袋大米的轻型卡车，被塞在了外滩一头的外白渡大桥上。在汽车能够开动之前，一拥而上的乞丐刺破了每个袋子，并用帽子、口袋，甚至用手盛走了他的大米。"[25]4 月 23 日上海进行了军管，并从晚上 10 点开始进行宵禁。装甲车守卫着主要桥梁。汽车司机几乎在每个拐弯处都被带着刺刀的士兵停车盘问。

第二天上海的城市居民就发现，英国和美国的海军舰只从黄埔码头起锚，顺长江直下开往公海。美国公民正在登上威尔逊总统号客轮，而美国的外交官则搭乘飞机前往广州。

> 到虹桥机场的道路是如此拥挤，以致于那里的航空公司说已经不能从城市到达机场。航空公司被迫将乘客与机组人员从龙华机场用飞机运到虹桥机场。到龙华的道路也被塞满。许多居住在上海城郊豪宅中的外国商人回家时发现他们的仆人都已经跑了。而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周边建造的碉堡与坦克场给他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26]

就在星期一，毛泽东和朱德广播了一条声明，号召上海政府所有各级官员——特别是警察随时待命，以防止发生工业破坏与抢劫。[27]

五、警察的颠覆

在上海警察部队内部，中共地下干部已经开始为接收做准备。尽管当时国民党严密监视警察的"督察处"的特别系统已经逮捕了五十多名的警官，其中至少有三名是非常重要的中共地下党成员，但在总数超过二万人的上海警察中共有十九个中共党小组。[28]

从 1930 年代末开始，中共就已经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上海市警察局与上海市的上海警察局中建立了有组织的小组。在重重伪装下，这些

坚定的共产党人坚持“三勤”原则：“勤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其他整风材料；“勤业”以便利用职位掩护党的工作；“勤交友”来建立支持者与未来同盟者的网络。[29] 抗日战争为中共党组织的扩张提供了机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上海警察部队中共有大约四十名中共地下党。[30]

1942 年到 1945 年，中共江苏省委转移到了淮安根据地，在那里由华中局负责领导上海的地下工作。像邵健、刘峰这样在上海警察部队中工作的资深中共干部，都一个接一个地——有时候与他们的家属一起——回到根据地，在华中局党校接受学习和训练之后再返回上海，并接管了上海警察部队内部十个中共党组织中的一个。在当时的上海警察部队中，有大约一百名地下工作者听从中共地下警察党委的指挥，这一警察党委又听从以万人为代表的中共地下上海市委的指挥。[31]

万人最初负责的是中法校友联谊会，该协会中有一小部分共产党人在法租界警察局当警察和翻译。会员招收程序是严格的，完全基于个人关系。候选人必须在进行了一定的宣传工作之后，才会被当成积极分子看待，并被要求建立一个前线组织，并在组织名称中加上“中法校友联谊会”的关键字样，这一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共产党的新四军。

尽管中共的地下工作非常机警，但是占领上海的日本宪兵十分怀疑与之合作的伪警是否可靠，他们误以为伪警们仍然忠实于曾领导过上海市警察局的西方人。于是日本人经常要求他们“铲除英美思想”。到了 1944 年，有两千多名警察从伪警中被清洗出去。被清洗的警察中有一些是共产党人，这些人离开警察队伍之后就离开上海加入到新四军或是八路军队伍中。但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在上海警察部队中的一个前线组织仍然有二百名成员。[32]

中共不仅招收新的党员，还与上海警察部队中党外的中共同情者或同路人保持密切联系。当时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处督察长陆大公就是这样一个人。陆大公既不是国民党党员、也未参加帮派活动，更没有什么“靠山”。这种背景令陆大公在上海警界领导人的更迭中地位十分脆弱。当 1947 年俞叔平成为警察局长后将陆大公明升暗降为警察局员警消费合作社主席时，陆大公却找不到任何援手。这一点令陆大公非常愤怒，特别

是当他发现许多国民党官员在物价飞腾时大肆受贿、而内战的主动权看似已经转到了共产党的一边之时。前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一直与中共地下党员保持联系，他领导的兴中学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共前线组织。陆大公后来也成为该组织的一员，这使他与肖大成这位中共特工发生了联系，后者说服他接受了中共的领导并“站在人民的一边”。[33]

内战期间在国民党警察内部从事地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需要十分细心和特别注意保密。陆大公总是害怕会被暴露，1948 年 12 月国民党秘密特工头子毛森当上海警察局长后，他的这一担心变得愈加严重。杨虎与中共的联系很快就被暴露，杨虎不得不藏匿起来。陆大公一直十分担心会遭到惩罚，尤其是毛森的秘书告诉他：“如果谁和共产党有联系，在[被发现之前]一分钟以前自己交代，免予处理；一分钟之后被发觉出来，不仅本人枪决，全家都要处死。”陆大公虽然表面镇静，但实际上如坐针毡。[34]

根据邵健与中共警察局党委的指示，上海警察中的五百名共产党员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任务：与全上海各区党委联系、并准备在共产党人到达上海后动员超过两千名的“外围积极分子”以支持上海警力。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不让正在撤离的国民党人破坏工业设施和杀害政治犯。[35]

到了 1949 年 4 月，上海警察中的共产党人已经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群众性的保护委员会。每四位警官形成一个组，每十位则为一队，他们负责在国民党政权覆灭之前保护档案与保管军火武器。同时，他们还调查了秘密特工组织的地点，并就警官和特务的罪行完成了详细的报告。这一记录后来被交给了人民解放军。[36]

在毛泽东与朱德于 4 月 25 日发布《约法八章》（这后来成为上海市新政府的章程）后，中共上海警察局党委在邵健的指挥下立刻投入工作，印刷了大量《约法八章》并寄到国民党警察与特务的家里。[37] 许多国民党警官为了躲过中共的监视已经搬家，所以他们在收到这些说明他们未来命运的信件后十分不安，在随后的日子里上海警察中出现了极大的骚乱与恐慌。[38]

上海警察局政治调查部中的死硬秘密警察分子——许多都是毛森的追随者——决定在上海城陷落之前尽可能多地围捕共产党疑犯。但是中

共已经在政治调查部中部署了四个地下工作者，这些人可以接触到从全市各个特务机构上报给警察总部的报告。他们一了解到逮捕计划的详细内容后，就立刻通知疑犯离开。许多人都因此幸存下来。

陆大公仍然遭到怀疑。曾与陆大公在上海警察局共过事的江苏省警保处处长张达突告诉他，毛森认为他是一个叛徒。为了洗脱他的名声，张达突带着陆大公去见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带着他的保镖接见了他们，并要陆大公写一份“自传”。令陆大公吃惊的是，他意识到国民党秘密警察头子毛人凤正准备招募他在上海陷落之后从事地下工作。一天之后，陆大公获得了一笔银元用于间谍活动，以及一个邮箱号码以便在国民党撤出之后使用。[39]

六、尖桩篱笆(The Picket Fence)

1949 年 5 月中旬，国民党防守当局以一种可悲的挑衅姿态动员上海人民建立了一道防御性的篱笆。

> 当枪炮在西边骤然升起，当地防守政府在上海西南与北部树立了一道奇怪的木篱笆，以此标志他们“战斗至死”的庄严承诺。共产党嫌疑犯在上海街道上被处死，当地的经济结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瓦解。很明显，没有人对国民党的能力还有丝毫信心。[40]

此时陈毅的部队已经夺取了杭州，中共的军队已经沿沪宁、沪杭公路一线展开。上海市长吴国桢已经逃离上海，他让他的秘书陈良将军负责局面。陈良反过来又将市长的官印交给了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赵祖康，后者当时是上海工务局的负责人。出于强烈的公众责任感，没有任何政党关系的赵祖康勉强同意担任代理市长。

虽然当时军队负责维持社会秩序，但是国民党的军队已经溃不成军。蒋介石在乘坐他的私人 C-47 飞机（据说上面带有价值 2 亿美金的美国黄金储备）飞往台湾时曾在上海中停，轻率地将上海的防御托付给总理何应钦与汤恩伯将军。但到了 5 月 24 日，上海的新闻报道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提到了何应钦关于防守上海市的决定，因为总理已经乘坐飞机前往广

州。[41] 虽然汤恩伯将军在这天早上举行了一次胜利集会，并检阅了各种声称“我们将奋战到只剩下最后一滴血、上海将是共产党人的坟墓”的大海报，但是到了下午人们就已经看不到他的踪影了。[42]

七、最后阶段

随着最后阶段的临近，“儒将”陈毅命令他的第三野战军要遵守三条保证：遵守所有人民政府与军管会颁布的法规法律；遵守城市政策、保护城市繁荣；保持作为革命传统的艰苦工作与简单生活。陈毅更进一步命令他的部队——其中许多士兵都是十几岁的青年——要注意十点：

1、没有允许任何人不许开枪。

2、不许住在市民拥有的商店或房子内，不许参观戏院或者娱乐场所。

3、没有允许不许到城镇里去。

4、不许在街道上横冲直撞的驾驶马车或骑马。

5、不许在街道上吃东西，不许在街道上走路时搭肩搂背；不许在人群中推挤。

6、公平交易。

7、保持军营整洁，只能在厕所大小便。

8、不许到算命摊算命，不许赌博，不许逛妓院。

9、不许参予封建迷信活动。

10、不许在墙上乱写乱画。[43]

到了5月24日中午，陈毅麾下的年轻士兵们已经抵达了上海西郊和市中心之间用木头做成的马其诺防线——外国人将其戏称为“尖桩篱笆”或“上海长城”(Great Wall of Shanghai)。[44] 国民党军队排成长长的纵队、开始沿着大路向法租界撤退。各个警察局前都停满了卡车，大批警察及其家属大包小裹地爬上卡车、急急忙忙前往停在吴淞的撤退船只。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人撤退时，上海家家户户都挂出了国民党的旗帜，因为根据某条法令，这一天是“胜利庆祝日”。“人们在街上行走时会有这样的印象——一座大坝坍塌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坐上了

已经预备好的公共汽车。市民被从人力车上赶下来，以便为剩下的士兵提供快捷的运输。”[45]

国民党警察局长毛森似乎决定要留下来直到最后时刻。由于一直怀疑陆大公，毛森将军在这天早上早些时候与手下秘密死硬干部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他提议杀掉陆大公，因为陆对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活动了解太多。毛森的副官不同意，认为应当让陆大公活着，并让他作与即将到来的中共进行交接的中间人。[46] 毛森对此勉强同意，并解散了他的高级特务们。毛森随后命令陆大公到他的办公室报到。当陆出现后，毛森告诉陆大公援军未能从台湾赶到，领导人不得不准备撤退。他要求陆大公以副警察局长的身份继续工作以“维持地方治安”，因为已经有军队逃兵和当地“流氓”在几个地区打着“中共地下军”的旗号，试图接管警察分局及其军火库。[47] 随后毛森向所有警察分局局长下达命令，要他们服从陆大公的指挥。[48]

陆大公一找到脱身的机会就立刻离开警察局，向中共地下党指挥部汇报了与毛森的会面。中共情报干部肖大成告诉陆大公，党已经批准了他担任临时警察局长。在福州路，紧张气氛明显升温。下午 3 点毛森的助手打电话给陆大公家里，告诉他现在正式作为警察局长接手各项工作。陆与假扮成一名普通上海巡警的肖大成一起返回警察局。陆大公希望毛森立刻放弃他的职位。但是毛森赖着不愿离开。毛森命令销毁警察局户口登记处的登记材料（这一命令被陆大公秘密否决）之后，仍然盘踞着他的办公室直到傍晚 7 点。这时陆告诉毛森，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已经抵达了兆丰公园（今上海中山公园），毛森惊惶失措，命令陆大公从警察局机动车队中调派几辆装甲车来保护他撤走。但此时机动车队已经被中共策反，最后毛森和他的保镖们不得不乘坐两辆普通轿车逃往码头乘最早一班船前往台湾。[49]

全面掌权之后，陆大公与代理市长赵祖康通了电话，后者建议他尽其所能维持上海的秩序。陆大公立刻宣布宵禁。他的第二个行动是派遣警备科官员与肖大成一起到机动车队确保这个准军事机构处在中共控制之下。一些中共特工在夜里进入警察总局来协调接收工作。中共建立的管理委员会也在每个警察分局开始运作，他们降下了国民党党旗并准备

挂上投降的白旗。[50] 陆大公还向各分局局长发布命令，在接待前来接收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时要高举双手、大喊“投降”。

八、越过上海“长城”

到当天午夜，在戒严的掩盖下，中共的侦察部队悄悄进入城市。几个小时之后，陈毅部队中装备着汤姆逊冲锋枪与勃朗宁自动步枪的大批先导部队，突破了木篱笆，从南面与西南面同时向上海进发，沿着爱多亚路前进。[51] 他们在每个十字路口都作短暂停留，派出小股部队去副街进行巡查。当他们只发现了无人防守的路障之后，这些以急行军跨过了整个江苏省的年轻士兵们已然精疲力尽，有一些就地入睡了。在他们之后，辅助队伍架设了野战电话线并用白色箭头标出了主要十字路口，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机枪阵地。[52] 5 月 25 日午夜刚过五分，副警察局长陆大公被电话告知人民解放军已到达常熟（路）警察分局，后者已经投降。这一天凌晨警察局各个分局都打来了类似的电话，陆大公也已经做好准备来迎接随后到来的解放军干部。到早上 8 点，当三野的主力部队沿着两边有树的贝当大道（今衡山路）进入法租界时，陈毅的前锋队伍已经到达了外滩，但当时外滩两头都由国民党机枪堡垒防守着。两个小时以后，战斗结束。这一城市的中心区落入了解放军的手中。[53]

> 第一批进入的是令人惊奇的“人民解放军”，他们穿着毡底或胶底的军鞋，秩序井然：这些装备很差的农民行动举止颇有教养，步兵们身穿草绿色军装，驻扎下来的时候没有骚扰或抢劫市民。第二批进入的是各种中共干部队伍，这些平民身穿制服但未戴机构徽章，绝大多数都不报姓名却和蔼可亲，近乎隐型人。他们进入到各个政府机构时也没有干扰任何人，但立刻宣告了一个狂热工作并力拒腐败的政权的开始。的确如一些敏锐的观察者所说的那样，这就是“火星人在上海”*的一个例证。[54]

---

* 意为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时的表现对上海民众来说是十分新奇的。—译者注

征服者是一支由青少年人组成的部队。那一天，当时才12岁的小女孩索菲娅·所罗君（Sophie Souroujon）被她的白俄父亲警告说，当部队经过时不要从窗户向外看，因为这些可怕的共产党人也许会出于敌意或好玩向她开枪。但是家住莫里哀路（今上海香山路）的她忍不住好奇，轻轻撩开了她家的窗帘向外偷看。令她吃惊的是，她看见的是一群穿着草鞋、武装不齐的孩子，他们表情严肃地沿着她家门前的大路前进。[55]

菲律宾驻上海总领事马里亚诺·埃斯佩拉塔（Mariano Ezpeleta）也有类似的反应：

> 我原来预计要看到凶神恶煞、饱经风霜、气势汹汹的士兵，他们十分蛮横，态度上粗暴、刻薄而好斗。我还预想他们会吹毛求疵，至少会象土匪一样——斜戴着钢盔，腋下夹着冲锋枪，腰间挎着手枪，口袋里的手雷晃来晃去，身上挂着一排排子弹，嘴里叼着刀子。但是我错了。他们就在那儿，那些共产党士兵绝大多数都是十几岁、一见人脸就红的年轻人，体形与男孩子差不多，步态犹豫；另一些是来自农村的乡下人，正在尝试沉稳地一步一步前进。他们在大路的十字路口上，随意端着卡宾枪，睁大眼睛四处张望，很明显对这座城市华丽而宏伟的建筑十分好奇。人们很容易把他们错当成来自农村地区的、好奇的军校学生，正在学习进行警戒的基本知识。[56]

这些士兵看起来根本不可能从事抢劫或强奸，也不会索取食物，他们甚至不从居民那里接受一杯水——这种自律让上海人民印象十分深刻。[57]

的确，“上海是一下子、而不是逐步地投入了共产党阵营。”5月26日，在明媚的阳光下、在拥挤的行人好奇的注视下，共产党士兵在马路上排成长排酣然入睡，而此时每家每户都挂上了红旗，而学生们则在墙上、电车上、板报上与窗户上贴上了欢迎标语。[58]

> 共产党人在狂欢庆祝。大世界这个地处法租界的上海最大的娱乐场也挂上了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很明显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星期。每个建筑物上都挂着红旗，这些迎风招展的红旗就像二十二年前热情欢迎国民党的旗子一样。发现自己还没有共产党旗帜的亲共派们，只能赶

> 快将国民党旗子中的青天白日部分撕掉，只留下红色部分。欢天喜地的易被打动的学生们在马路上跳着秧歌，用上一代人欢迎蒋介石部队时的热情来欢迎毛泽东的部队。这就宛如一个毛泽东式的好莱坞翻版电影。[59]

正如一位法国通讯记者所写的，“在上海，……革命转为歌唱声。”[60]当载满红旗的卡车拉着学生——其中许多是身穿白色衬衣与中长棉布裤的年轻妇女——驶过街道时，营地里传来士兵们的合唱声，城市公园里的高音喇叭也在大声广播着。

城市郊区的战斗仍在继续。外滩美国领事馆前以及沿苏州河一线仍在交火，因为这是掩护国民党军队向东北方撤入吴淞的防线。[61]这天晚上，江湾飞机场的汽油仓库发生爆炸燃起熊熊大火，北方的天空被染成了红色。[62]直到5月27日下午3点，在控制着美资上海电厂的国民党军队投降后，中共才得以全面控制上海。[63]这天晚上，上海的无线电广播宣布，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刘昌义在苏州河这条最后防线崩溃后率领四万人投降，人民解放军占领了黄浦江两岸，国民党逃向黄浦江的最后道路被切断。外国人谈到了国民党在吴淞口进行了一场“敦克尔克”式的大撤退：

> 很明显，国民党既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装载，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带走他们并排停列等着上船的装甲车、重炮与卡车。有一英里长的地方被点燃焚烧，被点燃的军火发生爆炸，火灾波及附近的郊区。城市公共汽车沿着马路狼狈的停放着，一些汽车上布满弹孔。还有许多出租车、水陆两用车辆、推土机与其他推土设备。……好几个地方的路面上到处都是海军的救生衣。许多器件上仍然有“美国陆军”的标识。[64]

根据中共当局的说法，在上海战役中有超过十万人的国民党士兵被俘或者起义。[65]随着旧政权的失败，有许多东西需要清理整顿。

九、接管

尽管人民解放军干部在公众面前似乎表现笨拙，他们却十分灵活地接收了各种组织。5月25日上午10点，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

上海警察总局。陆大公身着便服站在警局外面。他上前迎接解放军并自报家门："本人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特来迎接解放军进驻市局，并恭听指挥。"人民解放军指挥员立刻命令他撤走警局门岗，由一名解放军接管执勤。这一点让陆大公十分感动，因为这一转变意味着政权从"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手中转到了人民政府手中。[66]

中共干部们的行动十分迅速。5月25日到26日，在丹阳汇集的"影子警察"们被火车运到上海，随后与上海旧警察队伍中的中共地下党委员会的成员们并肩工作。随后"接管专员"们就任各自在警察总局与各区警察局的职位。[67]他们再次重复了《约法八章》，命令警察局每一个人都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并执行人民政府的命令，同时等待对个别人的"处理"。[68]"处理"这个词暗含着轻微的不祥之兆，但随后许多警官放了心，因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召开了一次科股长以上人员会议，他说道："你们过去为反动统治服务，做了一些坏事。但是这一次你们能以实际行动，响应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的号召，不顽抗，不破坏，并把地方秩序维持好，迎接解放，这是你们的觉悟，你们这件事做得很好，做对了。"[69]6月8日早晨，在天蟾舞台举行的为时三个小时的会议上，陈毅将军向上海2,800名警察发表讲话，只要求他们对比共产党解放者与国民党投机者的行为并自己得出结论。新市长陈毅看起来就像一个带着深色贝雷帽的法国农民，他嘴里叼着一支未点燃的、左右晃动的烟卷说到："勤勉旧警员转变旧的思想，认清当前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拥护人民政府，一面改造自己，一面安心工作。"陈毅还答应，如果一个警察能够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那么他就将会得到继续从事这一事业的鼓励。[70]

事情的真相是，当时统治上海的共产党人别无选择，只能尝试将这些前国民党人与傀儡警察再教育成尽职的公安干部，就像《共同纲领》第十条所说的那样——"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71]在整个中国，1949到1950年间只有八千名警察，因此除了东北的一些城市，国民党政权中男女警察中大约60%都在接受了"教育改造"之后被保留下来。[72]这一政策被称为"拆屋重建"，也就是打破旧的警察机构，但是在调查与重新调职之后保留警

察人员。[73] 在上海，这意味着“每天早上 7 点到 8 点，各个警察局的旧人员……被再教育并被教导新民主主义原则，以便将每个人都训练成为一个服务人民的好警察。”[74]

再教育的前景还不能让许多“留用人员”完全放心。例如，公务局的成员们在当年深秋被告知要进入“离职人员学习班”，这些人认为中共在保留他们的职位方面出尔反尔，并因此十分不安。只有在副市长潘汉年进行了解释之后他们才放下心来：

> 公务局在移交时比较完整，人员基本上留下来了，说明你们是靠拢党的。你们中不少人有一技之长，可以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好，一定要懂得党的政策，改造旧思想，才能适应新形式，这是参加学习的目的。要你们学习，不是抛弃你们，而是培养你们好好为人民服务。[75]

这些留用的国民党警察所要仿效的中共干部模范通常是一个山东人，被上海人称为“三八式”干部，因为这些人往往于 1949 年（民国三十八年）到达上海，还扛过三八式长枪。正如罗伯特·吉兰（Robert Guillain）所描述的：

> 该政权的典型官僚都穿着像战士一样的蓝色或卡其布制服，戴着一顶布帽子，即使在办公室里也是如此，看上去与其说是一个中国官员，不如说是一个苏联政委。他的午餐很糟糕，吃食堂提供的三种标准餐——“高中低”——中的一种（根据他的官阶），其中最好的一种也不比其它人斯巴达式的清淡饭菜好到哪里去，只有大米、一些蔬菜、面条，很少有肉。他是一个穷人，由党提供衣、食、住。他的烟草与肥皂根据官方标准发放，一个月所挣的钱还不够买一双次品凉鞋。在征用的欧洲式住宅里，他睡在地板上而拒绝使用柔软的床垫，因为后者会让他难以入睡。他与陌生人保持距离，除了那几个被任命处理“对外关系”的干部之外，这种干部一般很难接触。[76] 他坚持要求其他中国人用北京话跟他讲话而不许人们用上海方言或其他地方方言，因为相比以前现在北京话更是整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很少见到他与妇女在一起，要有也是某个穿着军装或党员制服的壮实村姑，她的脸蛋泛着天真的红色，她的卡其帽下是笔直的黑色短发。[77]

在革命政权的亲切友好与中共干部的尽职尽责、勇于顽强奉献的背后，是中共正在建立的一个新的、且更加强有力的城市安全体系。5月28日，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李士英与杨帆正式掌管了警察局，并在5月31日将警察局更名为公安局。[78]1949年6月15日，这一新的单位被重新组织为以下各个部门，各个部门的领导都为中共干部：秘书处，行政部门（运输、治安、婚姻检查、商业管理），刑事部门（司法、指纹、弹道、政治、调查），社会事务部门，消防部门，后勤部门。[79]

在杨帆被任命为警察局局长的同时，潘汉年也正好完成了他在香港的安全工作并返回了上海。这位相貌堂堂的前共产国际代表现在已经四十六岁，回国后他在1949年与1950年初担任了许多职务，其中包括上海人民政府副市长与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人，并陪同他的老朋友和诗友陈毅在5月28日登上了礼台——陈毅作为市长接过了上海的钥匙。潘汉年的声望让上海的资本家们十分放心，这些资本家认为潘汉年“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得体、风度翩翩。他没有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狡黠与威胁性的气质。”[80]潘汉年精通上海话，态度诚恳随和，与商人金融家（其中许多人是他身为广东银行家的岳父的朋友）相处融洽，这些都使得他看起来是领导上海统一战线与安全工作的最好人选；而且许多人认为他可以很容易地成为市长。相较长着一双“凶眼”、外表冷酷、看起来象一个强壮匪徒的陈毅，许多上海资本家都认为潘汉年更为可亲。[81]

作为上海统一战线的领导人，潘汉年发布命令让城市的工厂与商业恢复“正常”营业。在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后一周，潘汉年邀请上海最著名的资本家们参加由市长陈毅主持的一个会议，陈毅在会上庆祝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同时也警告说敌人就在身旁。《解放日报》一方面高兴地宣布：“我们当着大上海解放的日子，站在这中国历史转变关头。我们应该庆祝，应该快乐，应该扬眉吐气。看吧！一个被侵略被损害的古旧中国的历史已经完结，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新中国的历史已经开端。”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严肃地警告说：

> 因为敌人的政治军事势力是被打败了，但敌人是狡猾的。他们作反革命是很有经验的。他们懂得伪装民主的面孔，懂得作秘密破坏工作。懂得利用左倾词句或造谣说谎来愚弄革命阵营中觉悟程度不高的人。他们更懂得寻找革命阵营中的弱点，乘隙进攻来作各种破坏。[82]

新政权赋予了自己三个巨大的任务——消灭国民党残余分子、保卫自由与民主、恢复经济生产。人们都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维持秩序。[83] 这一任务——这也是 1927 年国民党警察局接管上海华界时的首要任务——由一个专门的安全委员会承担。

维持秩序的首要责任落在了公安局的身上。通过一个军队—警察—人民（政府）联合办公室，公安局与军事、民政部门紧密合作。在其内容庞杂的条例中，公安局确立了这样的工作优先次序：建立社会秩序、镇压强盗和抢劫活动、清除敌特分子。[84]

十、社会秩序

中共认为社会无秩序的典型代表就是上海混乱而吵闹的交通——1927、1945 年国民党接收上海的时候也出现了同样的混乱。马路因为小摊贩的货摊而拥挤不堪，水路也被各种船只堵塞，因此中共不得不强制执行交通秩序。[85] 在公安局、警备区、海关等部门的领导下，各个专门的交通管制站强制执行了新的水陆运输规定与条例。与国民党的警察接管工作相反，共产党十分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宣传；第二，将摊贩组织成各区马路联合会。7 月 11 日，在天蝉舞厅召开了整个上海市的马路摊贩联合会会议。经过全体投票，该次大会决定登记所有摊贩，向他们颁发许可证在指定地方营业，并组织各种卖主小组来定期巡视情况。同时还将摊贩的总体数量削减了将近一半，只剩下约 8.4 万人，此外还制定了各种计划来规范和减少人行道上非法货亭的数量。[86]

所有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都不会诧异于国共之间的这一关键性区别：当开始进行动员的时候，国民党人会首先提出忠告，再将命令层层下发，最后进行驱赶；而中共的本能则是先深入到最基层并在这一层次

进行动员，号召“群众”积极参加。[87] 这一点是 1949 年 5 月底到 6 月初上海举行的一系列各种“圈子”会议的根本重要性所在。这些会议所提出的目标是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将所有阶级都团结起来，以此为基础来研究与促进“新中国”的各种建设活动。

但是在组织层面上，国共两个政权就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利用了日据上海时期通过户口制度将连坐责任与家庭登记体系联系起来的做法。[88] 日据时期上海的伪政府的另一做法是发放“良民证”。上海解放后，新政府批判了二战后国民党的警察系统发放“身份证”的做法。作为对个人身份证的替代，中共政权向每个户主发出了“居民证”。[89] 但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共的公安局体系原封未动地继承了国民党的城市保甲体系——在警察监督下实行的户口登记体系，只不过又加了两个新的重要部分：食物分配卡和群众参与。简单地说，新的公安局体系将食品供应与群众动员联系在一起。

起初军管委员会和公安局担心能否迅速得到各自的记录资料，这意味着能否保证将国民党民政局的统计报告保存下来。他们一接管民政局，就发现所有记录都保存完好，尽管国民党曾在最后时刻想要将这些统计记录全部销毁。[90] 根据这些记录，中共政权重新整理了户籍簿，通常有一页纸会登记一户的所有成员（这也可以用于各种集体生活单位，例如一个公司的集体宿舍、一所公寓或一家医院）。这一页纸有姓名、出生日期、职业、工作地址、家庭出身、个人成份、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祖籍地等各种条目。只要这些内容发生变化，户主就必须要修改其户籍登记，并向所在地公安局报告。[91]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控制系统，因此中共自己不推行身份证制度。相反，个人都被登记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论是他们是住在一个普通居所、一间公共宿舍、一艘船上、或是一座寺庙里。作为户主的家庭首脑、工厂负责人、船长或方丈，担负着报告其所掌管的“家庭内部”的构成变化的责任。但是，这并未让居民个人免于被每个公安分局户籍科的“统计警察”所监视。[92]

登记体系导致了让人束手无策的大量文案工作。在尝试维持户口登记体系的同时，每个公安分局的户籍科还不得不每个月向每户分发两到

三次的定量票证。1950 年 7 月 21 日之后执行了新的条例，要求所有新建或在建房屋都必须到公安局登记，并要得到上海市政局的建筑许可与地基规划。建筑物的数字号码被记录在门牌号上，这笔费用由房客们共同支付。[93]

虽然日据时期上海的伪警系统监管着粮食的定量与分配，但是它与国民党政府的警察系统都未将之扩展到很深的程度。但中共的公安局户口登记系统在这方面与之前的做法截然不同：虽然街道委员会及其“小脚侦缉队”直到 1954 年才建立起来，但中共从一开始就鼓励这一警戒系统的群众参与并从底层层层上推。到 1951 年 12 月，上海有 2,083 个街道居民委员会与里弄居民委员会，共有成员 24,862 人，代表了 23.9 万上海工人阶级居民。[94] 特别是在 1951–1952 年群众运动开始之后，其他的安全保卫委员会与民兵委员会都开始协助调查犯罪、报告非法旅行、协调邻里吵架、监视“管制”人口。

值得强调的重要一点就是这种群众参与在本质上是自愿性的。上海市民饱受社会治安问题困扰已久，又遭受了国民党的空袭（1950 年 1 月到 2 月的国民党空袭导致了数百人死亡，这反而增加了民众对新政权的支持），而且每周都从《解放日报》上看见国民党的秘密特工被抓获的消息。此外，他们发现公安局对市民的回应比较积极——至少是在工作方式上，这与国民党警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政府在表面上鼓励市民写信给报纸进行投诉，并将这些意见提交给被投诉的机构。这些意见中许多是提给公安局的，这种做法很明显产生了十分有益的影响。

例如，1949 年 6 月 6 日公安局发布了一条公告，要求所有上海居民——除了那些房屋被毁的——都只能住在他们的居所里，只有得到了警察允许之后才能搬家。[95] 当公安局发现这条公告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后即对这一命令进行了修正，要求要搬家的人必须找到两名担保人，并要向公安局提交一份书面申请。[96] 同样，当一个居民抱怨一名警察到他家质问他母亲为何吃得起大米与咸鸡蛋后，公安局要求这位被指责的警察就人民的“反感”写了一封检讨。[97] 人们还抱怨为了要得到定量票证而要在公安局排长队的情况，公安局的反应是下令这些定量票证由商品公司直接发放，市民只要出示公安局的证明文件即可。[98]

警察人员还在公开出版物上道歉，因为他们未能根据共产党掌权后的新情况进行调整而“随便说话、违反政策”。例如，一位八十岁母亲在抱怨她的儿子“忤逆……辱骂殴打”她时，警官杨长庆答复如下：“老太婆，想开点，你要靠谁吃饭的？”这位母亲对此的反应是给《申报》的编辑写了一封信，说“我想，今天人民公安人员不应该再存在有这样反动派的作风，希望杨同志注意改正。”在被上级批评后，杨警官进行了自我批评：“特权思想尚未根除。”他许诺要扔掉他从旧国民党警察部队那里带来的“权威思想的残余”。[99]

1950 年 8 月 9 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宣布“人民公安工作是人民国家的最重要工作之一。”作为回应，上海的公安系统发动了一场群众运动来纠正上面提到的错误，并揭露出许多“蒙蔽上级、草率办案”、“以权谋私”的例子。读者们被鼓励将他们的不满寄给《解放日报》，后者会将他们的意见转给相应的警察部门并公开结果。[100]

“蒙蔽上级”的一个例子是新城分局的一位警官错误地引导他的上级认为一个普通户主在进行毒品交易，之后以户口登记为借口命令这个男人已成年的儿子们到公安局进行“谈话”。公安局后来对这一“错误”进行了道歉和“检讨”，并将这位警官交给法庭以处理其“品德不良”的问题，公安局还批评了他的上司粗心大意、“粗枝大叶”的工作方式。[101]

而“以权谋私”的例子是蓬莱分局的一个便衣警察，他没有付钱就从一个旧货店拿走了一个平底熨斗。这个“留用人员”据说中“旧社会毒素太深”而不能被彻底再教育。前一年他曾从一个犯人那里借钱，但是他的领导人原谅了他，因为当时“解放不久”。这位警官只是被告知把钱还回去并接受“严肃教育”以便悔改。现在他不仅“旧习”复发，而且还表现出他的“贪污思想”，因此他将受到公安总局人事科的惩罚。[102]

我不记得在我读过的关于 1920、1930、1940 年代的上海警察的材料中，他们有类似这样邀请公众批评并进行回应的举措。因此，尽管国民党的警察组织主要管理的是马路周围与娱乐场所的公众生活，并不像共产党的警察组织那样深入到人民生活当中去，但是国民党警察组织对公众舆论却是冷淡、害怕与缺乏反应的。[103]

中共政权对公众生活的介入也是相当成功的。中共接管上海两天后，军管会发布了关于出版的法令，表面上是要促进言论自由，实际上是要限制言论自由。第一条是："为了保护人民出版物上的言论自由，并打击所有反革命言论与出版物，所有要出版或者要恢复出版的报纸与期刊，所有正在运行、开始运行或恢复运行的新闻社，都需要根据这些规定向本委员会登记。"[104]

6月1日，一个以陈毅为主席的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成立。6月15日该委员会接管了国立交通大学，6月24日又接管了暨南大学。[105]国民党人的速度就从来没有这么快过，即使是在"党化"高潮时期也没有这么快过；而在此时，也没有其他领域会出现这种言论（保护自由）与现实（接管大学）之间的强烈反差。[106]

但是，上海管理系统的有效性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限制上海的传统恶习方面——通过强制教育，将妓女、赌徒、吸毒者变成能进行生产的社会成员。[107]而警察系统还对各种臭名昭著的操纵市场活动——例如曾将前国民党政权打垮了的现钞投机，尽管蒋经国为此在1948年进行了金圆券改革——进行了十分积极有效的打击，这些都获得了公众的支持。[108]就在中共接管上海后不久，1949年6月初上海就出现了旧货币"银牛"。投机者操纵现钞与银币之间的兑换率，将物价推高了三倍，并叫嚣中共没有经济管理的经验因而威胁要制造金融恐慌。[109]新政府谴责了金融资本家"滥发伪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认为他们与国民党的颠覆分子有联系，但到6月8日银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已经上升到一比两千。[110]6月10日上午10点，公安局长李士英率领便衣警察与上海警备区的士兵包围了现钞交易场所，逮捕了大量的投机者并封查了这些场所。据报道这一行动获得了上海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并使银元兑换率迅速缩水一倍半并稳定了物价。[111]另一种现钞欺诈形式假币也被公众深恶痛绝。1949年12月1日，当六名假币制造者——都被说成是国民党的特工——被卡车运往死刑场的时候，上海街道上挤满了围观者。

十一、管制游民与小型犯罪

解放后，上海的警察拥有完全自由的权力来羁押与裁决各种罪犯。他们可以进行对小偷、赌徒、妓女、皮条客、鸦片吸食者、游民进行大规模的“管理性”围捕，并在长期禁闭期间对这些人采取了“非刑事犯罪”的改造措施。[112] 虽然上海的警察立刻就开始行使自己这些新权力，但是第一波真正的围捕是在一次上海人民“各界群体”代表会议之后进行的，这次会议采纳了民政局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作为“冬季赈灾计划”中遣返难民的一部分，要对所有乞丐、小偷和扒手进行“收容并改造”。[113] 1949 年 12 月 12 日夜里公安局开始执行这一命令。

在之后的三天中，超过五千多名乞丐、扒手被送往“劳动生产教养所”。[114] 在这些人中，3,700 名适合从事劳动的“流氓”被挑选出来接受“改造”。绝大多数被收容的人都愿意这样，因为他们可以获得食物并有地方睡觉。但其他人并不情愿，因为他们是被强迫的，并担心会被送往台湾作战或被送往东北去开荒。他们的看押者向他们解释说：“人民解放军是光荣的人民武装，非常壮大，不要游民去打台湾。……东北需要人才，但需要的是专家和技术人才，也不要游民。”这些被羁押者因为自信自己是懒散无能的，所以这才放了心。[115]

扒手这个制造城市各种小苦难的源泉，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公安局的新行动是逮捕了几个扒手，将他们带到公安局，记录他们的重要信息，之后向他们宣传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行为得当。当这些扒手说他们愿意悔过自新后，他们会在一张悔过表格上填上他们的名字并注明将会放弃罪行。这些扒手总是一回去就从事他们的老本行。显而易见，警察通过检查这些扒手的悔过表格就会列出一个最恶劣违反者的名单。当这些人被再次抓起来时，他们会被审讯并受到严厉的威胁；最好的合作办法就是提供关于各个区域扒手活动的信息、招收与训练新手的方法等等。作为扒手群体的改过“头目”，这些扒手被要求召集其同伙开会。当其同伙到达后，一位警官拿着扩音器宣布政府要对他们进行一项特殊训练。虽然这些扒手认识到被抓就意味着坐牢，但是由于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被押进一个羁押中心。他们被分为小组进行下列“训练”：认罪，写自我经历，接受社会主义基础教育，唱歌，发言，自我批评，审判。当训练结束后，他们被送回家。由于警察现在已经了解他们所有的一切，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扒窃。而那些又重操旧业的人则被逮捕并被直接送往远方的劳教所，此后再未露面。当这一打击在上海全市展开后，扒窃活动立刻终止。[116]

政府打击的另一个欺诈活动是人力车夫对在上海北站下车的旅客的抢劫。这些强盗的头子是一个名叫刘守礼的人，他有两个流氓当副手，将这些人力车夫组织成一个诈骗团伙，专门诈骗刚刚到达上海的“土包子”。1950 年 7 月 6 日，一位来自安徽名叫卢劲挺的旅客在北站下车，他带了 270 万元来治疗他的一条伤腿。不幸的是他挑了由刘守礼拉的人力车，后面跟着另一辆人力车。刘将卢拉进了山西北路的一条小巷，在那里他与他的两个同伙打劫了卢。由于这次抢劫的数目是如此之大，公安局北站分局坚持将这个案子追查到底，并在两个多月之后逮捕了刘守礼和他的两个副手。人力车工会十分感谢警察的介入，声称这让工会成员今后可以平平安安地做生意了。[117]

十二、镇压武装犯罪

公安局其次要处理的问题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特别是那些武装抢劫。为了打击这一犯罪，必须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各种积压案件，二是与难民、职业罪犯和国民党退伍士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共秩序混乱。在废除了国民党政府所有法律之后，[118] 中共政权于 1950 年 8 月举行了全国司法会议来讨论一系列新法律。但当时并无拟定这些法律的紧迫性——彭真在第二年 5 月表达了这种观点。[119] 这部分是因为人民法庭发挥了积极作用，该法庭在 1950 年 8 月颁布了组织方面的总条款。这些人民法庭是临时性机构，用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顺利完成农业改革、并惩罚反革命分子与敌特。[120]

自 1920 年代以来训练了许多中国律师的震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安德列·布尼臣（André Bonnichon）神父认为，中共是从此时开始在上海逐

步建立起新的法律文化的。布尼臣曾于 1953 到 1954 年间遭到关押，因此我们对他的说法应当保持一定的谨慎。他说上海城内的专业人员原以为新政府会建立新的、但是是他们所熟悉的那套立法，只是到后来他们才逐渐意识到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法律中没有刑法典，只有各种法规。官方的理由是：必须取代人们不熟悉的“资产阶级”法律程序，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诉讼人可以理解的司法程序，这是因为 1949 年之前诉讼人并未意识到法律中的阶级内涵。法官们不再是独立的仲裁者，而是政府官员，他们在宣布判决之前会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联系。判决本身（不是由一个法官宣读，而是在中共领导的赞同下由法庭集体做出）是在保密的环境下达成，不对公众公布。[121]

正如布尼臣自己和其他中外籍罪犯的经历所证明的那样，被控方在被捕后必须等待很长时间（经常是好几个月）才能接受一审。法官那时候只是简单的说：“你是有罪的，因为政府不会不经充分调查与考虑就逮捕你。因此，有两条路让你走：要么承认罪行并恳求政府宽大，这样政府就会原谅你；要么顽抗并接受最严厉的惩罚。”[122] 法官随后根据类似推理对罪犯进行定罪，根据罪犯的背景和当时所属阶级身份将其指控为蓄意破坏、封建主义、反动倾向、反革命活动。“法官很少说：‘你犯了这项或那项罪行’。而是说：‘你是一个反革命。你是一个外国间谍。’”[123]

以这种方式并根据这些新法律进行处置，国家起诉人并不用指明罪犯所犯的罪行。被逮捕的人只是被简单地告知要投降而不是要辩护，这实际上让上海的许多律师处于失业状态，并使得辩护程序变得无效。事实上，“正确”思想在整个中国成为一种司法责任，而这一事实转而又巩固了国家和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力，法院不再对犯罪下定义，对证据做真伪判决，不再从法律的角度研究供词是否可信。

在上海市区，直到新的人民法庭建立之前，公安局都是将犯人交给旧式法庭的羁押局。[124]1949 年 6 月 17 日，副市长潘汉年主持了一次法官、律师会议，与会者提议：一旦可以使用法律宗卷时，上海市应该组织一个正式的人民法院。[125] 法律工作将继续由公安局负责，就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虽然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样做违反了现代民事权，但中共的法院的确成功地清理了上海积存的法律案件——1950 年 2 月时待

受理案件多达 10,962 件。[126]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四千多名男女在押犯被上海市人民法院送往江苏省北部的东台接受“劳动改造”。[127] 到 8 月，上海、天津与北京的警察宣布在各自辖区内已经解决了 95%的抢劫案件、80%的盗窃案件。[128] 为了清理剩下的积压案件，北京的人民政府政务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在 1950 年 10 月发布命令，决定根据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法律来处理“罪大恶极”的案件，剩下各类案件由各级人民政府自行裁决。由此到 1950 年上半年，上海、天津、北京、南京、广州、重庆、武汉的法院共处理了 95,983 个案件，其中大约 35,000 件是刑事案件，51,000 件是民事案件。[129]

随着积压案件的清理，新的案件被提上了日程。华东军政委员会将消灭土匪与抢劫当作最重要的工作。[130] 中共干部来自上海以外的地区，并不了解当地情况，而“旧人员”又经常因为与上海犯罪分子有着各种社会与经济的历史联系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 6 月到 12 月的 7 个月间，上海发生了 737 起武装抢劫案件：一些匪徒是穿着西装、打劫歌舞剧院的持枪歹徒，一些是内河的强盗，一些是假装成中共军官或者公安人员的国民党前士兵与特工。他们中的一些，例如由刘吟秋在太湖沼泽地区率领的一个组织，是国民党特务与地方匪徒合作成立的；许多匪徒都有机关枪。[131] 但是在民众的帮助下，到年底公安局已经将这 737 件抢劫案件中的 665 件设法破获或解决，逮捕了 1,667 名打劫者，并收缴了大量枪支弹药。[132]

对这种土匪活动的根基——退伍士兵和难民——同时进行打击也很重要。1949 年 6 月 13 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命令前国民党士兵和游兵散勇到上海几个集中点进行登记自首。那些拒绝登记的将受到惩罚。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包括一名将军、十名少将、十七名上校在内的 7,832 人自首。另外还有三千名前国民党士兵也进行了登记。他们上缴了武器并被送回他们原籍地从事社会生产活动。[133] 同时从 6 月 29 日开始，数万名贫民窟居民与难民被遣返回他们的老家。[134]

但是难民仍然继续涌入上海，特别是当夏季降水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与山东中部引起了大范围洪涝并摧毁了庄稼之后。到 1949 年 9 月中旬，上海临时难民救济协会的六个工作站报告共收容了 455,147 名难民，

其中许多人是原来在6月与7月期间被遣返的难民，现在又重新回来寻求获得饥荒赈济。[135] 处理难民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要让上海人认识到在经济上他们与附近的经济腹地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们必须支付遣返难民回农村从事生产活动的费用；另一方面，他们必须要承担某种程度的责任来资助上海及其近郊的公共事业，以此帮助那些在家乡不能找到活干的难民。1950年1月31日，上海冬令救济委员会常委会发动了一场以工代赈运动：疏通上海三条主要船运河道与二十一条灌溉渠道。这一疏通工程一共雇用了4,350名难民。[136]

十三、镇压反革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上海最后解放的欢呼声明中夹杂着对国民党反革命活动的可怕警告。这既不是妄想也不是宣传：蒋介石政权的保密局与其他秘密警察机构的确在上海安插了大量特务。[137] 中共的新政权警告说，这些与匪徒和罪犯关系密切的国民党余孽极有可能制造社会动荡。[138]

1949年5月29日，为了指挥对土匪与散兵游勇进行的扫荡，中共建立了吴淞上海警备司令部。这一扫荡运动面对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与国民党秘密特务组织有联系的徐同、简汉雄、陈大同、康艺均等人都已经聚集了许多无业游民、游兵散勇与地痞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很快被逮捕，但是其他组织仍不断形成。[139]

根据中共发布的消息，这些组织包括了前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组”，这是一个由焦建和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戴笠建立的前半军事性的、由吴子宾（音译）领导的交通警察总局地下分支；毛森掌握的、由上海警察构成的特工组织，其中有一个专门进行暗杀与破坏活动；“江浙皖特别敢死队”的一个分遣队，由蒋经国建立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前司令陈毓庆领导。[140] 此外还有许多单个的间谍，例如范庆熙被命令建立新的间谍网、从解放军驻地与警察部门搜集情报、汇集人民政府官员的住址与证件号码、刺探钢铁厂地址，以便进行暗杀活动、空袭与工业破坏。[141]

中共领导下的新公安局一建立起来，中共政权就以军管会的命令宣布反动组织违法、所有特工组织必须解散、其非法武器与无线电台必须上缴。[142]《申报》生动描述了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中共是如何抓获了1,499名国民党间谍、并缴获了数百套电台与枪支弹药的。一些特务是国民党撤退时留下来的，一些是来自仍被国民党控制的台湾与舟山。准备刺杀陈毅的刺客被逮捕，许多执行各种破坏任务——抢劫银行、杀害战士与警察等——的国民党特务也被抓获。[143]

1949年6月6日上海军管会发布一项公告，勒令解散所有国民党特工组织。[144]但是当局相信国民党特工会继续尝试制造混乱，以此来实施他们制造“奇迹来挽救他们走向灭亡”的计划。[145]报纸随后列出了许多持假文件、武器与其他犯罪物资的前国民党军官或秘密特工被逮捕的案例。[146]

因此，在6月29日早晨4点，军管联合办事处对全上海的嫌疑场所发动了一系列“行动”“捕搜匪特和散兵游勇”。他们成功逮捕了317名国民党士兵和秘密特务，搜缴了大批武器与手枪。第二天进行了更多的突袭，又有328名颠覆者被抓获。审判完这些人后他们又抓获了六千多名“匪徒特务”。[147]这些逮捕以及随后的公开处理，在上海给人们制造了这样一种感觉：敌人到处都是，持续保持警惕是非常重要的，你的邻居很可能就是一个间谍。当然这种态度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并导致那个可怕时期出现了许多莫须有的指控。[148]

十四、浦东的反革命

浦东这个位于上海外滩黄浦江对岸的贫穷农村地区，是敌对力量的温床，就像几年前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所面对的情况一样。浦东反抗者的领导人是朱石山，此人曾是戴笠军事统计局第二处副处长。朱石山在上海解放后不久被俘，但很快被释放，他随后到浦东组织了一支抵抗共产党的部队。但这一努力毫无成效。[149]

1949年6月初到8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派出了小股部队监督浦东各村干部收缴武器。同时解放军还派出干部帮助当地的中共党组织接收当

地政府并勒令反抗者投降。在 7 月中旬之后，人民解放军的一些大部队开始在其警戒地区对抵抗组织进行扫荡。虽然对当地地形与特务的“行事风格”并不十分了解、也并未施加极端的军事压力，人民解放军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果。七十多名“匪徒”、大批当地乡村民兵以及国民党部队的许多散兵游勇被俘获。[150]

由于部队与干部联手进行了军事扫荡行动与群众政治动员行动，一个联合的剿匪司令部因此成立。武装的工作队被派往地方各个区，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发动对“余匪”的政治攻势，另一个目的是要通过帮助农民秋收来提高农民的福利和教育文盲等。在进行这一活动的同时，工作队还在三十三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10 月底，一支军警联合部队击败了“海北民众反共纵队”与“东南国民救亡军”，这些组织据猜测都听令于国民党保密局、而实际上由浦东四个匪首指挥。[151] 到 11 月末，国民党军队的残余或投降，或退到海上与在浦东和杭州之间横行的地方土匪和海盗进行联合。[152]

但是其他反抗组织也必须根除。9 月 3 日，苏南公安局对由国民党国防部指挥、在无锡地区活动的“青年国民救亡军”进行了一次打击。司令毛鑫逃脱，但是副司令被捕，二十多个秘密组织被粉碎。[153] 10 月 13 日，上海河警抓获了臭名昭著的苏北土匪头子刘占魁，刘曾是国民党的一个秘密特工，并担任过袭击新四军的游击队司令，并且“所到之处，奸淫烧杀。”[154] 1949 年 11 月，上海警察局侦破了“青年反共军”第二纵队，该组织由戴笠建立的“忠义救国军”残余分子组成，在胡少梅的指挥下进行暗杀与破坏行动。胡与他的副手们一起被俘，该纵队溃散。[155]

当中共政府的部队在 1949 年底统计其胜利成果时，他们宣布在南京与上海地区摧毁了三个地下特工组织，而苏州、常熟、无锡地区的所有抵抗组织全部被消灭。[156] 在这场运动中人民解放军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在其进行的扫荡中，吴淞警备司令部共缴获 31 挺机关枪，762 支步枪与手枪，13 门小型火炮，7 万多发弹药，7 座电台发报机，还有油印机和印制假币设备。他们至少侦破了 432 件土匪特工案件，并抓获了 2,273 名匪首、18,541 名土匪和游兵散勇。[157]

十五、公敌

公众的警惕性因为朝鲜战争而极大的加强，因为后者“刺激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革命，而人民共和国初期原本并未打算要进行这些革命”。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共产党政权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分强势的位置，可以通过强大的群众动员而渗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158] 中共政府宣布，“重要的是依靠群众，提高他们反对特工间谍的热情，增加他们的政治警惕性，将防敌特间谍工作变成人民日常生活中一个有机的、常规与重要的部分。这样就能有效的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反革命坏蛋的邪恶计划就会被彻底粉碎。”[159]

1950 年 7 月 23 日，总理周恩来发布了使用终身监禁或死刑来镇压反革命的一系列命令。[160] 这些命令在 1950 年 10 月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得到支持，该次会议宣布过去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太过宽宏大量。1951 年 2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2 月 21 日该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发布。[161] 随后开展的这一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上海，这一运动让上海人民认识了“各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制度化暴力程序，这些程序是中共当局政治形式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像后来的运动一样，镇反运动削弱了城市居民之间最为基本的彼此忠诚，让人们认识了什么是“阶级斗争”。[162] 根据 1951 年 12 月 14 日潘汉年的说法，上海在组织了这次运动之后，一共举行了三千二百多次控诉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搜集了四万多人的资料。[163] 其中数百人后来被杀，上千人被投入监狱。[164]

这些群众运动中的一个代表性机构就是居民委员会，通俗地讲就是里弄委员会。到 1952 年，上海的里弄委员会组织了各种报纸阅读小组来宣讲党的政策、解释外国局势、拓宽居民眼界、鼓动政治热情。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居民共捐款 165 亿元来购买飞机大炮。在镇反运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中，居民委员会的成员被号召对邻居进行爱国主义式的监视、甚至是对自己的父

母进行公开谴责。[165] 到 1950 年代中期，“通过居民委员会的有效工作，上海里弄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秩序得以实现。”[166]

当然，在公众敌人被消灭之后，这种生活“秩序”可以以一种良好的社会民主重建方式来实现。[167] 对于梅风里（音译）这个位于上海西南部普陀区贫穷工人阶级聚居区里的一条小里弄来说，进行“清理整顿”意味着首先要除掉对邻居们进行恐吓威胁的“头号骗子与坏蛋”徐友良（音译）。“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下，这个坏蛋作为保甲制度下的保长，强迫一位青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这位青年的父亲最后为此忧虑而死。这个坏蛋是被人民所痛恨的许多帮派团伙的头子。但是不久之前徐就被押到一个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公审大会上，人民政府根据人民的要求对其进行了他应得的惩罚。”[168] 在解放前，居民们曾尝试要安装垃圾箱和建造公共厕所，但是徐永良将这些钱纳入了自己的腰包。现在这个里弄“完全变了样。马路现在铺上了石板，墙壁也被粉刷干净。里弄还安装了许多路灯，还有消防龙头、垃圾箱与公共厕所”。据说孩子们是最幸福的。之前整条里弄只有二十个孩子进入学校读书，现在有一百多孩子都有机会上学。居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居委会则解决他们的安全与健康问题。“民主的确创造了奇迹，这条里弄里的居民现在生活在一个快乐的大家庭里。”我们被告知，梅风里这个故事“说明了上海人民在建设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方面所取得的进步”。[169]

这同时也是现代雅各宾主义——相信可以通过极权主义的行动来改变社会——的历史。[170] 上海的“清理整顿”对下面这个问题来说正中要害：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或者如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所说的“对良好社会秩序前景的强调与社会不同部分各自利益之间”的张力，个人作为自由权利主体与强调集体之间的张力，乌托邦与实现乌托邦的具体过程部分之间的张力、以及与上述这些都紧密相关的革命与正常政治之间的张力。[171] 我们是否应当简单地回归到让－雅克·卢梭提出的“公意”（general will）与“众意”(will of all) 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这一理所当然的张力上去？我想不是。事实证明，清理打扫梅风里公共厕所的代价实在太大，以至于让人难以承受。

姚昱译

注释

1 《人民日报》，1952 年 5 月 31 日第 1 版。

2 John Wilson Lewis, "Introduction: Order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City," in John Wilson Lewis, ed.,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

3 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11.

4 薄一波的报告日期为 1947 年 4 月 19 日。其他出现类似问题的城市有运城、邯郸、焦作。Ibid., 15.

5 Ibid., 14.

6 Ibid., 14–15. 此处为作者的转述。

7 Ibid., 18–19.

8 Ibid., 17.

9 《摧毁警察机构，保卫人民政权》，《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46 辑（1984），第 104 页。

10 同上，第 105 页。

11 Lewis, 2, 52.

12 Gao, 40. 李自成推翻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但是因为其农民军不能应对首都城市精英（与文化）而“丧失天命”。

13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1949, 4.

14 中共有四个基本要求：（1）不受抵抗地越过长江，在江阴、靖江与芜湖以西其他八个地区沿一条 90 英里战线建立桥头堡；（2）将国民党军队所有部队重新编入人民解放军；（3）最后共产党占领全中国；（4）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南京政府只能作为看守政府。

15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1949, 1.

16 Noel Barber, *The Fall of Shanghai* (New York: Coward, McCann and Geoghegan, 1979), 79–84.

17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1949, 2:1.

18 E. R. Hooton, *The Greatest Tumult: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36–49* (London: Brassey's 1991), 155.

19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1949, 1; April 24, 1949, 2.

20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1949, 1.

21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1949, 1.

22 Randall Gould, "Shanghai during the Takeove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77 (September 1951): 182–183, 193.

23 虽然美国的经济合作署（ECA）在 1948 年向上海提供了 190,630 吨米，但到 1949 年 4 月上海城只剩两个星期的供米储藏量。见：25 and 27, in FO5926/1015/10, Telegram from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27/4/49, in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FO371/7570。当时约 50 到 100 万的居民没有大米"储备"。到此时，因为农民对金圆券完全失去了信心，上海所能得到的中国大米供应量仅为正常供应量的三分之一。当 4 月 18 日米价又上涨了 17% 时，上海因恐慌而出现了抢米暴动。*New York Times*, April 19, 1949, 4.

24 Mable Waln Smith, *Springtime in Shanghai* (London: George G. Harrap and Co., 1957), 177.

25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1949, 2.

26 Ibid.

27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1949, 3.

28 刘峰:《在伪警察局里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集》，上册，1979，第 190–191 页。这两万名警察中包括了消防员、警察、法警与行政及一般事务人员，再加上 28 个区分局、两个警察局、监狱、警察医院、警察学校的人员。陆大公：《上海警政大权回到人民手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37 辑（1981），第 67–68 页。

29 刘峰前揭文，第 178–179 页。

30 万人：《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里的地下工作》,《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44 辑（1983），第 20 页。

31 同上；刘峰前揭文，第 180 页。

32 刘峰前揭文，第 180 页。

33 陆大公前揭文，第 62 页。

34 同上，第 62–63 页。

35 万人前揭文，第 212–213 页。

36 刘峰前揭文，第 192 页；《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07 页。

37 《解放日报》，上海，1949 年 6 月 3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04, June 3, 1949, 1–2。

38 刘峰前揭文，第 191 页；《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06–107 页。

39 陆大公前揭文，第 63–65 页。

40 Gould, 183.

41 5 月 23 日解放军突破了国民党的防御半径。Hooton, 157.

42 Percy 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 337–338; *China Daily*, February 12, 1987, 6.

43 Gao, 60.

44 Lynn Landman and Amos Landman, *Profile of Red Chin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1), 18.

45 *New York Times*, May 25, 1949, 1.

46 陆大公前揭文，第 63–64 页。

47 《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09–110、112–113 页。

48 陆大公前揭文，第 65 页。

49 同上，第 66–67 页；《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07 页。

50 《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08 页。陆大公接管上海警察局后，最初的发现之一就是在警察局总部的停尸房找到了 9 具著名政治犯的尸体。他很快就采取行动阻止了其他的屠杀。陆大公前揭文，第 68–69 页。

51 Landman and Landman, 25.

52 Barber, 146–147; *New York Times*, May 25, 1949, 1.

53 Robert Guillain, "China Under the Red Flag," trans. L. F. Duchene, in Otto B. Van der Sprenkel, ed., *New China: Three Views* (London: Turnstile Press, 1950), 84; Paolo Rossi,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Shanghai: A Warning to the West* (Denver: Twin Circle Publishing Company, 1970), 33.

54 Guillain, 84.

55 引自作者与索菲娅 · 所罗君 (Sophie Souroujon) 2004 年 4 月 23 日的采访 .

56 Mariano Ezpeleta, *Red Shadows over Shanghai* (Quezon City: Zita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2), 185.

57 Gould, 184; Interview with Joseph Chen, May 1970.

58 *New York Times*, May 27, 1949, 14.

59 Finch, 339; Rossi, 14.

60 Guillain, 101.

61 原本解放军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打垮防守百老汇大厦（译者注：今上海大厦）的大约一千名国民党士兵。但是考虑到在建筑物里有数百名平民，他们没有这样做。Ezpeleta, 189.

62 *New York Times*, May 26, 1949, 4; May 25, 1949, 1.

63 一得知英国人所有的供水系统已经被中共接管，成千的上海居民立刻拔掉了他们浴盆中的塞子放掉了存水。他们现在觉得他们可以放心地放走他们为紧急情况而储备的水了。*New York Times*, May 28, 1949, 5.

64 *New York Times*, May 28, 1949, 5.

65 《大公报》估计只有大约 2 万名国民党人得以从海上逃跑，13 万人被抛弃。还有大约 33 万名国民党士兵在江苏与浙江省投降。*New York Times*, June 4, 4.

66 陆大公前揭文，第 69–70 页。

67 Gould, 184; Ezpeleta, 193.

68 《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13–115 页。

69 陆大公前揭文，第 70 页。

70 《解放日报》，1949 年 6 月 9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06, June 7, 1949, 9。陈毅曾在法国取得过电气工程师的学位，他还曾在法国的克莱蒙费朗（Clement-Ferrand）的米其林（Michelin）工厂工作过。见 Barber, 161。

71 Henry Wei, *Courts and Police in Communist China to 1952*, Series 1, No. 1, 1952, of "Studies in Chinese Communism" (Lackland: Air Force Personnel and Training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1955), 48.

72 《人民日报》，1950 年 9 月 7 日，见 Wei, 49, 51。

73 《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09 页。

74 《商报》，上海，1949 年 6 月 7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04, June 7, 1949, 10。潘汉年估计，在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年中，前国民党人员中有超过 70%到 80%的人员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Marie-Claire Bergere and Wang Ju,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SFIC) as an Instru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ited Front Policy (1949–1952)"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a's Mid-century Transi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September 8–11, 1994), 5.

75 潘汉年作为副市长有着喜欢照顾"旧人员"的名声，潘汉年往往自己个人向"旧人员"提供生活津贴。赵祖康：《回忆潘汉年同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42 辑（1983 年 1 月），第 2–3 页。

76 领事官员十分担心"不能与到来的共产党官员建立起联系。……不是担心我们会被盖世太保所包围，而是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官员。" Gould, 184. 5 月 29 日俄罗斯人关闭了他们的领事馆，因为新政权并未正式承认苏联。*New York Times*, May 30, 1949, 1.

77 Guillain, 85–86.

78 *China Daily*, February 6, 1987, 6; *Robinhood* (tabloid), Shanghai, May 31, 1949, in *China Press Review* 912, June 15, 1949, 6.

79 《大公报》，上海，1949 年 6 月 15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12, June 15, 1949, 6。

80 Robert Loh and Humphrey Evans, *Escape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2), 149.

81 Finch, 340.

82 《解放日报》，1949 年 5 月 28 日。

83 《大公报》，上海，1949 年 6 月 15 日，《解放日报》，1949 年 5 月 28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899, May 25–27, 1949, 1, 3; *China Press Review* 900, May 28, 1949, 2。

84 《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11–117 页。

85 Ezpeleta, 189, 194.

86 《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12 页。

87 John Gardner, "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 A Study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Urban Control," in A.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477.

88 Matsumura Shiho, "Kenkoku shoki (1949–1952) ni okeru toshi jumin no toki kosaku-Chugoku toshi jumin no ryudosei to hensei genri" (《政府初建时期 [1949–1952] 城市居民的登记——中国城市居民组织的流动性本质与基本原则》) (unpublished paper, Tokyo, 2000), 12。中共也受到了苏联专家介绍的通行证制度的影响。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1955*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4), 645.

89 Gong Xikui,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the Caste-like Quality of Peasant Life," in Michael Dutton, ed., *Streetlife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81–82.

90 《飞报》，上海，1949 年 6 月 8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07, June 8, 1949, 9。

91 Lynn T. White III, "Deviance, Modernization, Rations, and Household Registers in Urban China," in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hittingham Wilson, eds.,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77), 155.

92 Ibid., 157–158.

93 *Shanghai News*, July 23, 1950, 2.

94 Gardner, 496.

95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警察有时间在发布新的居住证明文件之前，来检查这些居民之间持有的旧国民党身份证。《解放日报》，1949 年 6 月 9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08, June 9, 1949, 9。

96 《大公报》，1949 年 6 月 15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12, June 15, 1949, 6–7。

97 《解放日报》，1950 年 9 月 13 日，第 6 页。原文为第 2、6 页。

98 White, 159.

99 《解放日报》，1950 年 9 月 13 日，第 6 页。原文为第 2、6 页。

100 同上。

101 同上。

102 同上。

103 Frederic Wakeman, "Licensing Leisu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Attempt to Regulate Shanghai, 1927–194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1 (February 1995): 19–42.

104 《大公报》，1949 年 5 月 29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01, May 29–31, 1949, 14–15。

105 《解放日报》，1949 年 6 月 16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13, June 16, 1949, 10;《解放日报》，1949 年 6 月 25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22, June 29, 1949, 13。

106 见 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107 Gail Hershatter, "Regulating Sex in Shanghai: The Reform of Prostitution in 1920 and 1951,"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Wen-hsin Yeh, eds.,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145–185;《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14 页；Christian Henriot, " 'La Fermẽture' : The Abolition of Prostitution in Shanghai, 1949–1958," *China Quarterly* 142 (June 1995): 467–486; Wei, 30;《大公报》，1949 年 6 月 27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21, June 28, 1949, 9。

108 Guillain, 103; *New York Times*, June 12, 1949, 26.

109 《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13 页。

110 《解放日报》，1949 年 6 月 3 日；《大公报》，1949 年 6 月 8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07, June 8, 1949, 2。 在 1949 年 5 月 2 日到 6 月 6 日之间，一般生活消

费指数上升超过两倍多。根据南京大学的统计，以 1936 年作为基数 100 的话，5 月 2 日这一指数就高达 42,373，6 月 6 日更高达 90,380。*New York Times*, June 12, 1949, 26.

111 《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14 页；《新闻日报》，1949 年 6 月 30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23, June 30, 1949, 3。

112 Jerome Alan Cohen,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3,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0.

113 1949 年到 1957 年上海派出了一百多万人到外地生活和工作。Barnett, *Communist China*, 662.

114 《大公报》，1949 年 12 月 17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1043, December 17, 1949, 5; 《解放日报》，1950 年 1 月 18 日，9–10 版。绝大多数流浪者是被他们的邻居交出来的。Cohen, 243.

115 《解放日报》，1950 年 1 月 5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1057, January 5, 1950, 10。

116 Mu Fusheng (pseud.), *The Wilt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under Mao*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178–180; Cohen, 240–241.

117 《解放日报》，1950 年 9 月 14 日第 2 版。

118 Andre Bonnichon, *Law in Communist China* (The Hagu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56), 4; Guillain, 91.

119 在 1951 年 5 月 11 日政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彭说道，不用着急建立“完整与详细”的法典，因为这“既不成熟也不必要”。到 1955 年，新政权仍未发布民法典或刑法法典。Wei, 10.

120 Ibid., 19. 只有在 1952–1953 年进行了司法改革、而法庭清洗了来自国民党政府的人员后，共产党才有自信启用正常的司法体系。Cohen, 9–10.

121 Bonnichon, 4, 6–7, 14–15; Guillain, 105–106.

122 Bonnichon, 8.

123 Ibid., 7.

124 《商报》，1949 年 6 月 16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13, June 16, 1949, 7。

125 《解放日报》，1949 年 6 月 18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15, June 18–20, 1949, 7。

126 Wei, 12.

127 Ibid., 53.

128 Ibid., 50.

129 Ibid., 16.

130 《解放日报》，1949 年 10 月 21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96, October 21, 1949, 5。

131 《解放日报》，1949 年 10 月 19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94, October 19, 1949, 9。

132 《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13–116 页；《大公报》，1949 年 6 月 28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22, June 29, 1949, 2; 《解放日报》，1949 年 6 月 15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12, June 15, 1949, 6。

133 《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13 页；《解放日报》，1949 年 6 月 15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12, June 15, 1949, 2。

134 《大公报》，1949 年 6 月 25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21, June 28, 1949, 8;《大公报》，1949 年 6 月 29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22, June 29, 1949, 9; 也见 Guillain, 104。

135 《大公报》, 1949 年 9 月 19 日, 见 *China Press Review* 974, September 20, 1949, 7–8。

136 《解放日报》，1950 年 2 月 1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1081, February 1, 1950, 8。

137 中国的报纸声称国民党秘密特工正在利用上海作为一个联络点，来组织在松江地区的散兵游勇形成一个“国防部苏浙边区先遣军”。《新华日报》，1949 年 8 月 20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55, August 23, 1949, 7。

138 Otto Vander Sprenkel, "Part one," in Otto B. Vander Sprenkel, ed., *New China: Three Views* (London: Turnstile Press, 1950), 21;《解放日报》, 1950 年 1 月 18 日第 9 版。

139 《解放日报》，1949 年 11 月 2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1006, November 2, 1949, 9。

140 《解放日报》, 1949 年 9 月 15 日, 见 *China Press Review* 971, November 15, 1949, 7–8;《大公报》，1949 年 9 月 18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72, 11;《解放日报》，1949 年 10 月 18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93, October 18, 1949, 6–7 ;《解放日报》，1949 年 9 月 14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70, September 14, 1949, 6。

141 《解放日报》，1949 年 10 月 17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92, October 16–17, 1949, 6–7。

142 《摧毁旧警察机构》，第 117 页。

143 同上，第 116–118 页;上海市宝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722 页。

144 《大公报》，1949 年 6 月 8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07, June 8, 1949, 8。

145 《解放日报》，1949 年 6 月 15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12, June 15, 1949, 1。

146 相关的例子见《解放日报》，1949 年 6 月 24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19, June 24, 1949, 7。

147 《解放日报》，1949 年 7 月 1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24, July 1, 1949, 8。

148 《解放日报》, 1949 年 6 月 29 日, 见 *China Press Review* 922, June 29, 1949, 7;《解放日报》，1949 年 6 月 30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23, June 30, 1949, 7。魏昂德(Andrew Walder)写道:“关于阴谋到处存在这一主题长久以来都被低估。……如果我们承认阴谋与欺诈这一主题的核心性，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被导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这一来源对被认为是毛主义者长久以来进行批判的政治传统来说是十分核心的。关于隐藏阴谋的主题……是直接借自于……大清洗与公审（show trial）时期斯大林式的政治文化。”见 Walder, "Cultural Revolution Radicalism: Variations on a Stalinist Theme," in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P. W. Wong and David Zweig,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43。

149 《解放日报》，1949 年 10 月 26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1000, October 26, 1949, 10。

150 《解放日报》，1949 年 11 月 23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1023, November 23, 1949。

151 《解放日报》，1949 年 10 月 26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1000, October 26, 1949, 10。

152 《解放日报》，1949 年 11 月 23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1023, November 23, 1949。

153 《大公报》，1949 年 9 月 6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964, September 3–6, 1949, 11。

154 《解放日报》，1949 年 10 月 19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1006, November 2, 1949，9。

155 《新闻日报》，1949 年 11 月 24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1024, November 24–25, 1949，9。

156 《大公报》，1949 年 11 月 9 日，第 2 版，见 *China Press Review* 1012, November 9, 1949，6。

157 《解放日报》，1949 年 12 月 31 日，见 *China Press Review* 1054, December 31, 1949, 5–6。

158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220.

15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Hate American Campaign in Communist China" (Washington, D. C., 1953), 13–14.

160 Wei, 29.

16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公安工作法规汇编（1949 年 10 月–1956 年 6 月）》，北京：群众出版社，1958 年，第 2–7 页；Cohen, 299–302.

162 Gardner, 496.

163 赵祖康前揭文，第 3–4 页。

164 新华社，上海，1951 年 6 月 17 日；Wei, 39; Harriet C. Mills, "Thought Reform: Ideological Remolding in China," *Atlantic* 204. 6 (December 1959): 76.

165 张济顺：《上海里弄》，trans. Ma Xiaohe (unpublished pape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32–33。

166 同上，第 32 页。

167 关于"建构主义方法"，见 S. N. Eisenstadt, *Paradoxes of Democracy: Fragili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33。

168 *Shanghai News*, December 27, 1951, 4.

169 Ibid.

170 Eisenstadt, 38.

171 Ibid., 40.

第三章

国家的主人？人民共和国早期的上海工人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伴随着1949年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中国出现了过甚其辞的亲无产阶级言论，许诺说要极大地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有些官方声明宣称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是“领导阶级”，理所应当地要“当家作主”。半个多世纪后再回首这个时期，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些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声明只不过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国家所捏造的空话。但是有证据显示，当时许多工人与工会干部都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些承诺。上万名上海工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民兵队伍，在保卫他们的工厂免遭敌人破坏并将这些工厂安全地移交到革命政权之手的过程中，这些民兵组织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工人们很自然地期望在新社会秩序中也能发挥巨大影响。[1] 人民共和国初期上海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证明了他们陶醉于一种政治胆略和特权意识当中。而这种胆略和意识既受到官方宣传的鼓动，也来自工人阶级自身刚刚经历过的斗争史的激励。

本章将探讨这样一个问题：面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所提供的机会，上海的工人和工会是如何尝试把握机遇来扩大激进主义劳工运动的。以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工问题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产业工作场所里的管理关系上，而本文将主要关注基本上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的激进劳工运动。[2] 首先，我将考察中共取得胜利后的几个月里席卷了整个上海的劳工抗议浪潮，并将根据可获得的详细资料深入研究其中的几个事件。其

次我将转向工人民兵这个由工会发起、以革命先行者为榜样的组织是如何被重新建立起来的这一问题。这些民兵组织在人民共和国初期发动了上万名上海工人在工厂及其附近地区进行巡逻。1949 年 5 月新四军接管上海后，上述这两种变化很快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但是随着四年后毛泽东决定抛弃“新民主主义”、转而采用旨在实现快速工业化的斯大林模式，这些发展戛然而止。

一、工潮

根据官方工会的统计数字，仅 1949 年 6–12 月这 6 个月中，上海就发生了 3,324 次罢工和其他各种严重的工人骚动。[3] 即使是和中华民国时期相比，这些数字也是非同寻常的。而 1919 年五四运动、1925 年五卅运动、1926–1927 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及内战期间工人的游行抗议，早就已经令民国时期的中国劳工运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劳工运动之一。[4]1946 年是民国时期上海罢工运动规模最大的时期，共发生了二百八十次罢工。相比之下，1949 年下半年新成立的中共政权平均每月就要面对五百多次劳工抗争活动。[5]

这一工潮的爆发显然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困难。内战的延续，以及随后许多资本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台北、东京等地，导致了大规模的工厂停工与工人裁员。这一时期发生的绝大多数劳动纠纷都是围绕着生计问题展开的：譬如要求工厂重新开工、工人返回工厂工作、支付拖欠工资。但是，新政权对工人阶级拥有政治特权的公开承诺也鼓励了工人抗议者。

在一些情况下，官方工会（其领导人是中共地下党成员，他们在内战期间负责组织罢工和建立民兵组织）推动了无产阶级的抗争行为，并以此作为表达无产阶级特权的恰当方式。1949 年 9 月，上海市总工会（筹）在一份报告中就表示了对蓬勃发展的工人抗议运动的同情：“上海刚解放。工人群众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本家的压迫。一旦获得解放，必然掀起广泛的群众运动。大部分工人都参加了护厂运动，紧接着在政府政策和各种号召的指引下，迅速而又普遍地展开了要求开厂复工

的运动。”[6]官方声明加强了工人的革命热情，这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劳工的激进运动，对此总工会十分赞赏。但是上海市总工会（筹）报告中接下来的内容，则听起来有一些谨慎：

> 由于个别不开明的资方在解放前对工人的过苛剥削与无理压迫，加之某些工人群众单纯的翻身观念，因之若干厂内就发生了要求清算斗争之现象。如怡和纱厂离职已有20年的工友，因为当时为群众利益斗争而被开除，解放后要向资方出口气。同时由于少数特务分子的操纵鼓动，在像颐中烟厂这样的地方，原来因不同缘故而离职的600多失业工人提出了过左的复工要求。这些都增加了许多纠纷。[7]

在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看来，革命（与反革命）的各种遗产与对立带来了十分严重的挑战，它们使劳工运动日益激进化，并正朝着有潜在危险的方向发展。

1949年下半年爆发的大规模劳工骚动主要发生在中小型企业，特别是集中在棉纺织和烟草企业，当时的经济萎缩对这些行业打击最重。劳工的抗争活动大多数是分散的，并以防御姿态表达了工人阶级对自身境遇的严重不满。但是仔细观察那些历史上劳工抗争运动就长期存在并一直较为激烈的企业（包括上海市总工会报告中列举的怡和纱厂与颐中烟厂），也可以看到更为政治化的劳工抗争模式。从1920年代到国共内战时期，这些企业始终是国共两党各自的劳工组织展开激烈竞争的场所。即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这些工厂也继续存在互相竞争的派系活动——包括武装民兵的组建。而工会在新政权时期发动罢工和展开其他形式的劳工斗争是否合适这一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只能是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冲突。

我们以荣氏家族产业帝国的申新第七纱厂为例。在中共接管上海后的将近一年中，该纱厂由国民党人发起和把持的工会几乎未被触动。[8]申新总经理荣鸿元在上海解放前夕逃往香港，其继任者决定削减本已备受压迫的工人们的周工作时间和工资。1950年1月，上百名愤怒的工人两次包围了申新纺织公司的总部，要求补发拖欠的工资。当这些行动未能解决问题时，失望的工人涌向新经理荣鸿庆的住所。其中一群示威者

借口说要寻找棉纺大资本家荣毅仁，闯进了荣鸿庆的家。他们不仅拿走荣家的财物，还在屋子里做饭，大肆吃喝，随意糟蹋荣家的鸡肉、火腿和蛋糕。由于荣毅仁没有陪他们一起吃饭，这些人又跑到荣毅仁的房间里继续大吃大喝。上海市总工会后来调查发现，这种丢人的“白吃”行为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该厂的工会。在这一事件中，该工会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消极立场，以至让前国民党活跃分子篡夺了领导权。根据上海市总工会的调查，这些国民党残余分子利用了当时的各种机会，把自己打扮成为促进工人利益而斗争的“英雄”。结果却采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老的斗争方法”。为了清除这种“过时的”行为方式，在上海市总工会的建议下，申新七厂建立了一支名为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民兵组织，该组织共有一百多人，负责在工厂内进行巡逻。

更加麻烦的例子出现在正泰胶厂，那里发生的劳工骚动部分源于仍然效忠于国民党的一些人的煽动。[9] 该厂共有 1,600 名工人，其中半数为女工。工人们大都和自己离上海不远的江苏农村老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事实证明，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正泰胶厂并不适合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展。解放后中共虽想方设法要在该厂建立一个有力的党组织，但收效甚微。中共干部虽然提出了反对“经济斗争”、要求加强生产的温和声明，但工人们充耳不闻。

新四军进入上海之后没几天，正泰胶厂的工人们要求厂方提供七元的旅费补贴，以便回家过龙舟节。这是过去旅费补贴的标准，但是派到该厂负责工作的中共干部比较节俭。他们估计三、四元钱就足以支付工人回家的旅费，因为许多人实际上就来自附近的农村。由于新成立的工会并不全心全意地支持工人的要求，因此该厂的管理层坚决拒绝向工人们提供任何旅费补贴。

龙舟节这天，工厂为了过节而正式停工关闭，中共干部也没来厂里上班。趁中共的干部不在，国民党工会的残余分子号召全厂工人（估计这些工人很可能都生活在厂区里）包围了总经理的办公室。当中共干部冲进工厂试图平息抗议时，他们也被工人包围了起来。在带头人的挑唆下，情绪高涨的工人们现在提出，只有补贴十四元后他们才会离开。火上烧油的情况是，一些中共干部也加入到这一抗议中——他们也要求增加补贴。

在与工厂管理层进行谈判时，正泰胶厂的中共代表们改变了之前的立场，现在要求补贴至少十元。这一问题随即被提交到上海市总工会。由于担心支付这一补贴会鼓励全市的工人都要求得到同样的补贴，总工会站在了工厂管理层的一边。工人们对总工会的胆怯感到失望，由此引发了进一步的抗议。正泰胶厂中自称是“新青团”的国民党分子袭击并打伤了一些中共干部，并将总经理的兄弟锁在了厕所里。直到他保证所有人都将得到昂贵的新运动鞋后，才被放了出来。事态的发展激怒了正泰胶厂的管理层，他们派出手持铁棍的两百多工人民兵前来恢复工厂秩序。但是在一名带着手枪的“国民党特务”领导下，这支“护工队”实际上是试图扩大而不是打算压制这一抗议。直到中共干部也武装起来并发出威胁之后，护工队的那些领导者才放弃了要通过武力来扩大这场斗争的尝试。新青团又改变了策略，宣布中共建立的新工会是不民主的。进而声称他们自己建立了“经过改组的”工会，要与工厂管理层谈判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市政府当然拒绝承认这一敌对的工会，但该非法组织仍与中共掌握的工会展开竞争，以博得正泰胶厂工人们的认可和支持。

骚乱持续两个多星期后，上海市总工会向正泰胶厂派出一支工作队展开调查。工作队进厂时，带了些全副武装、身穿制服的纠察队配合他们工作。这确实震慑住了不少工人，但他们还是不愿合作。此外，工作队的几个成员都是在北方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的老手。他们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当地人都听不懂；当召开会议让工人鸣不平时，这些人也听不懂工人们的地方方言。后来工厂的几个管理职员向工作队敞开了心扉，承认他们很害怕工人，因为“解放后工人有地位”。工作队报告说，虽然职员们“看不起工人落后，但惧怕工人向他们斗争。”

进一步的调查表明，问题的关键在于正泰胶厂新青团这个受到国民党影响的组织。大约三十名工人加入了该组织，虽然“外表很左”，但其实际目的是要培养“特务”以阻止中共控制这个工厂。新青团的成员声称自己与无锡——那里是正泰胶厂许多工人的老家——市长关系密切，他们散布谣言说，无锡的共产党人正遭到暗杀，上海的共产党人很快也要面临同样的命运。工作队还发现，新青团的成员们已经渗入该厂的学习小组与其他政治和娱乐组织，并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利用这些群众基

础来煽动工人，反对与孤立中共干部。在获取了新青团的名单后，工作队才最终抓住了幕后黑手。

尽管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作队通过揭露和解散新青团而成功压制了这次抗议活动，但正泰胶厂的问题仍在继续。[10]1951 年阴历春节期间，该工厂报告说又发生了一系列工业破坏事件。此时恰逢上海为配合镇反运动而开始登记“反动组织”，因而这一系列破坏事件令人们怀疑正泰胶厂的“特务”活动又死灰复燃。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并在工人内部线人的帮助下，抓获了十二名“反革命分子”。工人们指证说，在被抓的这些人中，有的曾宣扬国民党很快就会反攻回来，并警告说任何人如果穿“列宁装”，一经发现，很快就会被枪毙。

随后对这些被抓者的审讯又使得该厂之外的七个人被捕，后者被指控不仅策划了正泰橡胶厂发生的一系列破坏事件，还在上海其他许多工厂中煽动仍然在位的效忠于国民党的人进行类似的破坏活动。在被捕的人中，有个名叫曹阿金的。国民党执政时期，他曾任职于上海警备司令部，现在仍然与国民党建立的护工队——这是国民党时期负责搜捕共产党劳工运动嫌疑者的一个工人民兵组织——前成员保持联系。[11] 据称 1950 年 10 月曹阿金曾召集了一次秘密会议，他在各个工厂的二十多个联系人全部到会。在会上为了鼓励这些前护工队武装分子，曹阿金使用了准预言家式的极端乐观的话来描述国民党人即将返回上海的情形：“国民党就要来了，排长及排长以上的干部都发枪。我们接收工厂，就再也不用做工了。有洋房住，汽车坐。没有汽车的，坐电车也不要买票。那时我们就是老板。”

尽管大肆宣扬了对曹阿金这样“特务”的逮捕，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年里类似的劳工骚动仍在继续。例如，仅仅在 1952 年 5 月这一个月，上海劳动局就报告了 1,153 次劳工纠纷。[12] 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劳工抗争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大东烟厂事件。因为产品销路不佳，在得到劳动局允许的情况下，大东烟厂从 1950 年 5 月开始停工一年半。[13] 停工期刚结束，该厂的工会就根据工人的要求，与厂方管理层进行恢复生产的谈判。经过五轮谈判，双方仍未达成协议。然而 1952 年 1 月，该厂管理层却以缺少资金为由向该厂所在区工商局提出申请，要求获得授

权继续关闭。由于当时正在进行三反运动，政府要求该厂暂时停止关厂。这一问题在悬置了几个月后仍未解决。直到6月中旬，上海市工商局才批准了该厂管理者关闭工厂的要求。而到此时，上海烟草工业的困境已经十分明显——解放初全市开工的烟厂共九十八家，但现在只剩下十四家，雇佣工人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了，裁员率超过40%。根据有关安排，大东烟厂的工人将得到发放的解雇费；上海市劳动局将为他们在其他食品行业或纺织行业找到就业机会。

上海市劳动局召集了多次会议，专门向大东烟厂的工会干部和工人代表解释烟草行业面临的严重问题，并说明政府已承诺安排工人从事其他工作以保证其生计。大多数工人都同意了关闭工厂的决定。但是在国民党时期曾领导该厂工会、而在最近的工会重组中被开除的一个女工却不肯服从这一决定。她和一位同事的丈夫一起，以“工人代表”的名义向上海市劳动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在获悉这名女工同事的丈夫并非该厂工人、而且还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官后，上海市劳动局通知了公安局并拒绝考虑他们的请愿。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被吓退。7月29日，他们率领十八名大东烟厂工人前往北京向中央政府表达他们的不满。为了在首都获得最大限度的同情，据有关报道说，抗议组织者让工人故意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这些人拿着毛主席的画像在大街上游行，声称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并威胁说要在北海公园跳湖自杀。上海市总工会的一名干部赶到北京想要劝说这些人返回上海，但却遭到这些请愿者的包围与殴打。

至此，大东烟厂的这一劳动纠纷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转变。在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并未咨询他们在上海的下级，而是直接将这一问题报告给毛泽东。在得知失业工人陷于绝望并以他的名义游行时，毛泽东勃然大怒，批评上海政府“不顾工人死活”。毛泽东强烈批评上海当局在处理大东烟厂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严重的官僚主义及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等错误”，并决定立即向上海市党委发出紧急电报，要求重开大东烟厂，并罢免之前批准关闭该厂的干部。上海市政府连忙照办，但是大东烟厂的管理者仍然拒绝重新开工。为完成毛泽东的命令，上海市政府表示愿意提供可观的财政支持。至此，烟厂管理者才作出了让步。

1952 年 9 月 15 日，大东烟厂正式重新开工。同时上海市劳动局、工商局、上海市总工会、食品联合会中的一批干部因为此前建议关闭大东烟厂而受到相应的处理。上海还召开了两次全市干部大会来公布这一事件。市政府下属的各个机构进行了为期一个月、以大东烟厂事件为核心的“反官僚主义”运动。但从长远来看，靠上海市政府大量向大东烟厂支付补贴以恢复生产，实在难以持久。三年之后，当心怀不满的上海工人被禁止进行劳工抗议活动时，大东烟厂静悄悄地与其他三个烟草厂合并了；1958 年这一合并企业停止了烟草生产，仍然开工的部分则转入了上海仪表厂。

这些独特的劳工抗争活动也许只是极端的例子，但是足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劳工关系的动荡不定。一方面因为中共政权对工人阶级新政治地位的承诺而受到鼓励，另一方面却又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因此工人们以各种极富戏剧性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困苦：从“白吃”和包围工厂经理的家与办公室，到目标直指政府官员的请愿和游行。工会干部被夹在中间：到底是支持工人（为此要冒被批评犯了“经济主义”与“工团主义”错误的风险），还是维护秩序（为此也许很容易被指责为“官僚主义”）？他们对此摇摆不定。由于官方工会经常受到攻击而难以有所作为，竞争群体——经常是由那些与国民党旧制度有关系的个人所建立的——趁机对不满的工人进行煽风点火。

当然，国民党政权时期的劳工关系也一直是充满争斗。罢工非常频繁。工人们分别加入彼此敌对的国共两党所发起的武装民兵组织，加剧了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种战斗传统的持续推动下，中共新政权成立初期的劳工对立也经常表现为暴力事件。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工人民兵成员——其中一些仍然效忠于国民党——掌握了劳工运动的领导权，则是此时的一个普遍特点。[14] 官方工会的举棋不定与优柔寡断，再加上客观上的经济压力，都为“反革命分子”煽动工人的不满提供了机会——他们所打的旗号正是新革命政权许诺给无产阶级的特权。

这种复杂的局势造成劳工运动的严重困境。李立三曾为上海市总工会的首位领导人。在毛泽东及其同伴集中力量发展农村根据地时，李却仍然坚持鼓动无产阶级造反，因此在党内丧失了领导地位。解放前夕，

李结束在苏联十五年的流放生涯，回到中国并负责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劳动部的工作。李立三试图采取这样一条谨慎的路线——既支持工人的权利，但同时又劝告工人不要轻易行使其权利："是不是禁止罢工？这既不可能也不正确。罢工是工人的权利，但今天的工人不需要这种办法。在过去，工人没有选择只能罢工，但今天他们可以使用理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如果谈判失败，他们可以到劳动局去……旧的方法不仅是没有好处的，也是有害的。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势。否认阶级斗争是站不住的，但阶级斗争有许多形式。"[15] 在中共已建立政权的新形势下，应当鼓励何种"阶级斗争"方式？在苦苦思考这一问题时，李立三及其工会干部同事们被引向了这样一个具有长久革命传统的制度：工人民兵。

二、工人民兵

工人民兵（即"工人纠察队"）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用来进行武装起义的第一个组织。事实上，李立三自己就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1922年安源煤矿大罢工中动员工人建立了一支由中共掌握的工人纠察队。[16] 直到五年后国民党人发动了白色恐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上海和其他城市中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之前，工人纠察队一直是中共想要实现自己革命抱负的首要手段。

虽然1927年国民党的镇压杀害了中共工人纠察队的大批成员，但是国民党人在夺取权力之后立刻建立了自己的工人武装民兵——护工队。这些护工队与国民党的安全机构互相辅助，在南京政府阻挠中共组织劳工的活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的入侵为中共创造了再次发动革命性劳工运动的机会，但在整个1940年代，中共与国民党彼此争夺——经常是以暴力形式展开——工人的拥护。在上海，国共两党在招收工人民兵时都十分依赖秘密会社的参与，双方也都十分积极地鼓励自己的民兵渗透到对方当中。这些活动使工人民兵获得了立场多变的恶名，而这一点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化了国共两党的敌对与猜忌。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建立了一个名为人民保安队的秘密组织，用来协调和中共有联系的各种上海民兵组织。到中共接管上海

时，人民保安队的人数超过六万名，大都是来自上海各大工厂的半武装工人。正是因为他们的警戒，才使得国民党人在逃跑时要进行破坏或者损毁工业物资的企图未能得逞。[17]

在上海解放期间，人民保安队不仅帮助人民解放军防止工业破坏与维持公共秩序，还在各个工厂周围进行巡逻以搜捕中共怀疑是为国民党服务的六千名“特务”。在某纱厂一千多名人民保安队成员中，有八百人因为积极协助检举清查敌人特务而在后来获得了特别嘉奖。[18] 尽管人民保安队在为新政权保卫上海和工厂方面取得了如此重要的成就，但是在新四军建立了对上海的有效控制之后，上海市军管会还是下令解散了这些保安队。[19] 军事当局对平民组建的武装工人民兵心存疑虑。此外，人民保安队的构成也是引起疑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政治风向发生明显转变以后，许多前国民党护工队的成员也隐瞒身份加入到人民保安队中。[20]

虽然军事当局解散了人民保安队，但是不少人对由工会而不是军队控制的工人民兵仍然很感兴趣。随着各种劳工抗争活动席卷了上海所有工厂，上海市总工会要求重新建立工人纠察队以恢复秩序。它强调国民党特务正在工人中间煽动罢工并散布反共谣言，因此号召重新武装工人阶级。[21] 虽然军事当局与公安部门对武装普通工人这件事并不热心，但中共却支持这样做。5 月 31 日，在一个纪念五卅运动的工人大会上，当局公开宣布重新建立由工会掌握的武装工人纠察队。此项决议随即得到执行。[22]

根据“新民主主义”的规定，作为工人阶级的官方代表，工会的地位十分崇高，且颇有影响（但只是暂时的）。[23] 而在其他官僚机构——特别是那些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的机构——看来，把可能会不守纪律的工人武装起来是一件让人担心的事情。[24] 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无产阶级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这些机构还不能对这一状况提出挑战。

1949 年 7 月，上海市总工会新建立的纠察部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到国民党特务在过去几个月里特别活跃——甚至已经渗透进刚刚成立的纠察队中，这些特务还以此为烟幕来掩盖其动员工人的阴谋。工会的解决办法是扩大工人纠察队并对之进行更好的训练与领导，以此证明工人纠

察队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25] 由于劳工抗争活动主要源于当时出现的极度经济困难，因而将此归咎于敌人特务的活动听起来不太可信，但工会关于加强纠察队力量的号召很快就因为其他事件而得到了决定性的支持。

1950 年 2 月 6 日，从台湾起飞的国民党飞机轰炸了上海。之前也有些小规模的空袭，但是 2 月 6 日的轰炸第一次在上海造成了严重的工业损失。当天由国民党空军人员驾驶的两架 B-29s 四次空袭了上海，其目标是上海的电力公司。[26]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这次袭击造成五百多人死亡，六百多人受伤，五万多人无家可归。[27] 这次轰炸让人生厌，它提醒人们国共内战仍在继续，也为恢复工人纠察队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不管怎样，它是中国革命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次袭击发生后，政府随即发布了一个紧急公告，号召上海所有工会在 48 小时之内组织起工人武装纠察队以加强防空。在 2 月 6 日的空袭中有 28 名工人死亡、32 名工人严重受伤的上海电力公司，率先建立了工人纠察队。2 月 7 日晚，工人纠察队开始冒着大雨在电厂巡逻。前国民党护工队的一个成员因为散布谣言说有更多的飞机正从台湾飞来进行轰炸而被纠察队逮捕。[28]

一份内部传阅的上海市总工会备忘录强调了在工人纠察队从平民性的工厂护卫组织向重要的公共安全负责者的转变过程中，二·六事件所起到的众所周知的重要作用：

> 上海工人纠察队是在上海人民保安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海解放以后由于我们当时没有掌握得好，把人民保安队的活动及时转变为工厂企业中经常的纠察工作；把参加人民保安队的广大工人积极分子及时改组为工厂纠察队……而一般的虽有纠察队名义，但无实际工作。仅仅是在游行示威或开大会时出动维持秩序，或者在厂内调解工人间的纠纷，处理一些偷窃的小问题。甚至在个别工厂中代替行政监视工人，抄查身体，因此引起了严重的脱离群众……
>
> 在二·六反轰炸斗争中，各厂基本上都恢复和建立了纠察队的组织，站岗放哨，保护工厂，轮班守夜，协助军警进行防空治安工作，起了很大作用。[29]

二·六事件之后，在上海市总工会主持下，一个扩大了的纠察办公室建立起来。按照该办公室的要求，两周内动员了两万多名纠察队员并向他们分发了步枪和子弹，另外还对这些纠察队员进行了简短的军事训练。[30]

无产阶级的崇高声望、工会的积极大胆领导以及全国新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很快就使工人纠察队进一步扩大了它的政治作用。1950 年 10 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几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命令。在中国东北边界之外进行的国际斗争加剧了对国内隐藏的敌人的担心。在上海，上海市总工会率先领导了工业领域的镇反运动——到 1951 年春天，工人纠察队的人数增加到大约四万五千人。[31]

上海市总工会组建了一个五人特别小组来领导这场运动。该小组由曾为中共地下党工运领导人、现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的张祺负责。在一年之内，上海总工会组织了上千次针对反革命分子的控诉会，全市将近一半的工人都积极参加。上万名纠察队员接受了特别训练来学习如何抓捕和强制拘押嫌疑人。他们还配发了手电筒、手铐、绳索以及其他东西，在全城各个工厂里都建立起搜索网。有些嫌疑人在外出工作时被突然逮捕，随后被移交给警察。[32] 到 5 月初，上海被逮捕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九千人。[33] 上海第五纱厂的一名纠察队员因为在抓捕反革命方面的突出表现而被当作典型，在全国的新闻报道中得到表扬。[34]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突然逮捕引发了激烈的反应。当时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纠察队激进主义的先行者）有三十多人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遭到羁押。随后，工人们对其中一个被羁押者提出质疑。此人是该厂机械修理车间的纠察队队长陈金福。他被上海市总工会指控说是假装成共产党积极分子的国民党员。在陈被逮捕后的第二天，上海市总工会就组织了群众大会来解释为何要逮捕陈金福。陈的工友们表示支持在这次全国危机中采取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但他们怀疑陈金福是否属于反革命分子。[35] 上海市总工会认为只要任命另一个技工来担任纠察队长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准备让另一名颇有声望的技术工人来担任此职。但是这位工会提名的候选人却拒绝了——他特别提到了中共与国民党在行动方式上的相似性：“过去，（国民党）旧当局先抓了人，然后才开会解决

事情。现在人民政府也是先抓人再开会。这有什么区别？”工会领导批评他口不择言，这名工人保持沉默，但拒绝放弃自己的立场。他的工友们也同样不为所动。这些技术工人们回忆说，陈金福曾被国民党不公正地关押过，他在工作中也十分认真勤奋。虽然陈公开承认过去与国民党有联系，但是他也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眼看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服工作，工会干部通过一些积极分子向工人们全面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工会干部坚持认为，陈金福是国民党护工队中一位职位很高的官员；他假装被国民党逮捕，只是以此来隐藏他的真实身份。被工会提名取代陈金福的候选人遭到严厉指责：“虽然我们知道你正在发泄不满，但如果人民政府因为你的放肆言论而决定处死你，你怎么办！那难道不是不公正的吗？”在如此严厉的训斥之下，这位候选人公开承认了错误。[36]

镇反运动全面扩大了工人纠察队的责任。从鼓励工厂中的政治激进主义到关押工厂外面的反革命嫌疑犯等等，都属于工人纠察队新的职责范围。例如，在上海华明烟厂，指定的各个政治学习小组组长试图逃避每周政治学习，纠察队员则被派去搜寻那些逃课者并将他们带回工厂。据说，此后该工厂的政治学习再也不成问题了！[37]1951 年 12 月，怡和纱厂的纠察队抓住了一个反革命分子。此人越狱之后正打算更改他的户口登记并搬出所居住的地区。在工会与当地公安局的协助下，工人民兵们十分顺利地抓住了这名逃犯。[38]

很明显，工会十分欢迎工人的激进主义。但是纠察队却因为一些原因而越来越遭到指责。一是人们怀疑纠察队的政治可靠性，因为它们与之前国民党类似组织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是随着工会的作用逐步消退，它领导和规范纠察队这支武装民兵的能力也逐步减弱。

纠察队与国民党的关系这一问题特别令人不安。当时曾对第十纱厂进行了一次调查。事后提交的秘密报告说明：“群众并不满意纠察队中有如此多的前国民党分子。更何况，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待普通工人往往态度蛮横。”[39]虽然护工队是镇反运动打击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许多护工队成员在这场运动中都被判处死刑或者处以劳动改造，但是以前曾加入该组织的那些成员并没有被完全消灭掉。[40]例如，镇反运动后的调查发现，在第十纱厂的 95 名纠察队员中，有 45 人曾经与国民党有过紧密的联系，其中有 13 人参加过护工队。[41]

要在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一个被指责与反动分子有联系的工人解释了中共长期以来要求渗入敌人力量内部的政策，如何使得他的政治身份变得模糊："参加护工队没有什么奇怪的。地下党的同志们不是也参加了吗？我之所以加入这些反动组织，是因为要保护工人的利益。在过去，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今天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42]

即便如此，要求揭发工人过去各种社会联系的压力仍然很大。其后果非常严重：那些被认为过去的社会联系太危险的工人丧失了国家职工所享受的劳保待遇——有关这些劳保待遇的规定是李立三起草、1950 年 3 月由劳动部发布的。[43] 这些所有人都觊觎的好处如医疗保险、就业保证、住房分配、不错的工资、退休金等都只提供给工人中的一小部分，即那些在政治上受到信任的国营企业永久职工。[44] 慷慨（并且昂贵的）的劳保待遇并未提供给许多最需要它们的工人——临时工、合同工、学徒、非国有企业职工以及据称有"反革命"背景的人。那些被拒绝享受革命斗争成果的工人经常发现自己的境遇十分难以忍受。由于被新生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各种好处拒之门外，这些工人中有不少选择了自杀。[45]

1951 年 10 月，上海开始对五万多名纠察队员进行登记，以此来对有关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并根据记录来甄别哪些人可以原谅、哪些人不可原谅。[46] 在光中印染厂，这一登记揭发出有十四名工人过去是国民党护工队的"骨干"。其中十二人已经被镇反运动处理：两人被枪毙、十人被判处监禁。剩下的一人已死，刚被发现的那名仅存的骨干人员则被开除。但是在原护工队的五十名普通成员中，许多人在 1949 年春就已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保安队，一些人甚至都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或者中国共产党，这些人都被允许保留原职。[47]

即使是这次登记过后，纪律问题仍在继续。麻烦的症结在于纠察队的低级官员往往不提交纠察队在思想、训练以及其他方面的必需的工作报告。[48] 这些缺点强化了纠察队在官僚机构方面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公安局——的指责。上述机构长期以来一直都对工会保持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感到不满。以前这些批评并不能动摇工会的特权，但是现在政治风向已经变得有利于他们了。正是在这一节骨眼上，中华

总工会的领导人——特别是李立三——遭到攻击。他们指责说，李和工会的活动过于偏离了党的领导。[49]

由于李立三领导的总工会被谴责为“工团主义”，工会越来越难以证明自己有充分合适的理由来继续维持一个由它掌握、但有时不太守纪律的庞大的武装部队。虽然上海市总工会不愿放弃这一鲜明的无产阶级权力象征，但他们一再提出的希望中共中央高层能澄清此事的要求却从未得到回应。工会的管理工作因李立三下台而陷入瘫痪，这产生了不良后果。1952 年秋天，上海市总工会因为得不到中央指示而十分恼火：“尽管我们提交了数不清的有关纠察队的文件，但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指示。我们不知道我们市一级纠察队部门是否应当取消还是不取消？……如何处理超过五万人的纠察队员？在过去，领导权如果不清楚群众就会动摇。现在怎么啦？基层纠察队员正在抱怨说：‘当领导人有问题的时候，就叫我们；当他们问题解决了，就忘记我们了。’”[50]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上海市总工会为解决纠察队问题而继续努力。在一封信给上海市党委的信里，提出考虑到纠察队过去的成就以及拥有包括许多党团员积极分子在内的五万多名成员，因此希望不解散纠察队。[51] 这一次它得到了清楚的、但并不是它想要的答复。在为新政权服务了三年半之后，工人纠察队被解散了。[52]

工人纠察队的解散，只不过是当时整个全国政策大转变——放弃“新民主主义”，转而拥抱斯大林式的五年计划工业发展模式——的一部分。[53] 虽然在 1957 年百花运动与工业社会主义化发动之后工人自己在席卷中国城市的罢工浪潮中再次建立了非法的纠察队，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国家主人”的一项合法权利，工人巡逻队才再次被正式组建起来。[54] 在“四人帮”的操纵下，臭名昭著的上海民兵将会证明自己是其革命先行者的令人恐惧的继承者。[55]

三、国家主人？

围绕着纠察队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只不过是围绕着工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在新政治秩序中地位到底如何这一问题的巨大争议的

一部分。在 1949 年 9 月北京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声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在这次会议上，李立三强调了无产阶级应当承担的特别角色：“我们工人阶级，作为这个国家最为自觉的主人，肩负着建设一个新民族与新社会的艰巨任务，将继续高举英雄斗争的革命精神前进。”[56] 作为劳动部部长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李立三大胆地构想了劳动保护法，创办和主编了《工人日报》，并大力支持工会在新的政治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57]

但是两年之后，李立三却被指责是“代表了落后工人”并推行“狭隘的经济主义”与“工团主义”，将工会置于党的领导之上。[58] 确实，得到李立三支持而于 1950–1951 年完成的几个地方性工会的章程，并未提到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59] 李是一个比较雄辩的工人利益支持者，他坚持工会必须保持独立性。1952 年初，李立三被非正式地解除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职务，据说理由是他牺牲了党的领导而鼓励工人争取福利和自主。李立三的解职令全国各地的工会陷入混乱之中。[60] 上海市工会在一开始就未能处理好五反运动，只不过是这种总体混乱的一个表现而已（具体情况见第四章温奈良 [Nara Dillon] 的文章）。

对于中国工人来说，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岁月是一段混杂着各种各样信号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声称新民主主义要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据此，工人阶级在新秩序中被赋予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远远超过工厂范围的政治角色。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强调新民主主义的特点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就体现了如下的重点转换：从革命先锋队非比寻常的特权转向了民族国家的团结与权力。在当时毛泽东和中共的各种努力中，上述模糊含混的特性反映了这样一个挑战，即尝试将一般的革命实践和革命方案同紧迫的国家建设结合在一起。就此而言，虽然毛泽东与他的同志们总是努力强调其国家治理模式与国民党的不同，但是人们仍会明白无误地看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作为中国第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国家（party-state），国民党人为其后继者树立了非常重要的示范。在国民党人传承给中共的那个庞大的统治模式中，由党控制的工会与民兵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61] 这种因国共两党在长达三十年中互相模仿和渗透而进一步加强的延续性，帮助

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反革命分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环境里能够如鱼得水。虽然我们必须要对所谓特务活动无所不在的说法保持警惕，但毫无疑问，担心与国民党有联系（至少过去是如此，尽管现在未必是这样）的各种力量的卷入——而且事实上经常的确如此，这种恐惧和担心在新近成为统治者的共产党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正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第二章里写得那样：“这既不是妄想也不是宣传：蒋介石政权的保密局与其他秘密警察单位的确在上海安插了大量特务。”在这种高度猜疑的气氛下——这一气氛又被朝鲜战争大大加强了——“新民主主义”经常会屡遭破坏、漏洞百出而难以维持，这一点也并不令人奇怪。此外，无论是中共自己的革命传统还是其前任统治者的国家建设方法，都不是特别有利于民主治理的出现。

如果当时的国际环境看起来对中国领导人并没有那么大的威胁性，也许劳工政治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并变得更加人性化。但是在当时盛行的极度紧张的冷战气氛下，相对于工作场所里的不公正，工人的“反动”倾向与无纪律很容易被认为是更大的麻烦。由于担心台湾海峡与鸭绿江边的军事冲突会进一步升级，毛泽东与他的同事们收回了革命许诺，转而急切地强调扩大国家权力。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劳工运动的战斗精神与工会组织的自主性只是诸多牺牲品中的两个。

姚昱译

注释

1 沈涵：《回忆上海人民保安队》，《上海工运史料》，1984 年第 3 期，第 16–20 页；上海市档案馆，C1-1-32。

2 Charles Hoffman, *The Chinese Work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4); William Brugger, *Democrac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1949–19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Stephen Andors, *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1949 to the Present* (London: Martin Robinson, 1977);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Dorothy Kaple,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nd Mark W. 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专门讨论了工厂之外激进主义的论著见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8)，但希恩 (Sheehan)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这一阶段只有简单的论述。

3 上海总工会秘书处编：《解放后上海工运资料》，上海：劳动出版社，1950 年，第 149–156 页。在 1950 年的一次全国劳动部门领导会议上，劳动部长李立三在发言中给出了更高的数字：从 1949 年 6 月到 12 月，15 个最大的城市中共发生了 7,021 宗劳动纠纷，其中 4,436 宗发生在上海。上海市档案馆，C1-2-250。李立三与工会得到不同统计数字的原因尚不清楚，也许是李立三对“严重冲突”的定义要比工会宽泛得多。

4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在 1919 年这一整年，上海只发生了 59 次罢工，其中 33 次是与五四运动有关。到 1925 年，上海发生了 175 次罢工，其中 100 次与五卅运动有关。这些数字来自于 Shanghai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ed., *Strikes and Lockouts in Shanghai, 1918–1932* (Shanghai: City Government of Shanghai, 1933)，与上海社会事务局在之后出版的刊物《社会月刊》。

6 《上海市总工会筹私企部三月来的工作总结》，1949 年，上海市档案馆。

7 同上。

8 《关于各级工会讨论和传达（申七事件的教训）的通知》，《上海工运资料》，第 1 期，1950 年 3 月 15 日，第 9–20 页。

9 这一个案见上海市档案馆，C1-2-41。

10 下面的个案见《解放日报》，1951 年 4 月 9 日。重印后收入《特务破坏工厂的罪行》（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 年），第 8–13 页。

11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chapter 3.

12 《上海市劳动局工作报告》，感谢上海市总工会同意本人在此处的引用。

13 大东烟厂事件的来龙去脉见张金平：《大东烟厂事件的真相》，感谢上海市总工会允许本人在此处的引用。

14 《特务破坏工厂的罪行》（1951 年）这部文集提供了上海工厂被“特务”煽动破坏的十个重要个案，在其中的七个个案中，以前的工人民兵都被指在煽动冲突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5 上海市档案馆，C1-2-240。

16 邹沛、刘真：《中国工人运动史话》，第 1 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 年，第 217–218 页。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与上海政协之友社：《光辉历程》，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6 年，第 255 页。沈涵前揭文，第 16–20 页；朱华：《上海一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90 页。

18 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年，第 163–177 页。

19 上海市档案馆，C1-2-163。李家齐编：《上海工运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年，第 430 页。

20 上海市档案馆，Q6-31-566。

21 上海市档案馆，C1-1-16。张金平：《百万职工投入保卫大上海的战斗》，江执中编：《警备大上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第 181 页。

22 张祺：《记上海人民保安队》，上海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战役》，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年，第 219 页。

23 Paul Harper, "The Party and the Unions in Commun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37 (January–March 1969): 84–119.

24 上海市档案馆，C-2-499。

25 《上海总工会纠察部关于解放前后职工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海档案馆编：《上海解放》，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 年，第 142 页。

26 David Michael Finkenstein, *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1949–1950* (Fair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1993), 292–294; and 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16, 272.

27 上海市档案馆，B120-1-6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毅在上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第 92–95 页。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民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343 页。

28 张金平：《百万职工投入保卫大上海的战斗》，第 182 页。

29 《上海工运资料》，第 13 期（1951 年 2 月 28 日），第 25–26 页。

30 张金平：《百万职工投入保卫大上海的战斗》，第 183–184 页；上海市档案馆，C1-1-54。

31 张金平：《百万职工投入保卫大上海的战斗》，第 184 页。

32 同上，第 187–189 页；上海市档案馆，C1-1-60。

33 李家齐编：《上海工运志》，第 419 页。

34 张金平：《百万职工投入保卫大上海的战斗》，第 189 页。

35 上海市档案馆，Q0-4(5)-25。

36 上海市档案馆，C1-1-54；C1-2-397，C1-2-489。

37 上海市档案馆，C1-2-363。

38 上海市档案馆，C1-2-491。

39 上海市档案馆，C1-2-458。

40 在 1951 年 1 月 11 日到 2 月 22 日，在上海私营工厂已登记的 3,341 个反革命分子中，有 1,643 人是前护厂队成员。上海市档案馆，C1-2-483 与 Q6-31-265。

41 上海市档案馆，C1-2-458。

42 上海市档案馆，B127-1-1186。

43 唐纯良：《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50 页。

44 Elizabeth J. Perry, "Labor's Love Lost: Worker Militancy in Communist China,"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50 (Fall 1996): 64–76.

45 上海市档案馆，C1-2-397。

46 上海市档案馆，C1-2-487。

47 上海市档案馆，Q6-31-566。

48 上海市档案馆，C1-2-680。

49 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1 章。

50 上海市档案馆，C1-2-680。

51 上海市档案馆，C1-2-646。

52 李家齐编：《上海工运志》，第 432 页。

53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184–185.

54 上海市档案馆，B54-4；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s 1957 Strike Wave," *China Quarterly* 137 (March 1994): 1–27.

55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chapter 5.

56 《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3 日。

57 李思慎、刘之昆前揭书，第 10 章。

58 唐纯良前揭书，第 153 页。

59 Harper, 96. 也见 Sheehan, chapter 1。

60 李家齐：《五十年代初批判工会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及其在上海的影响》，《上海工运史》，1986 年第 6 期，第 1–7 页；唐纯良前揭书，第 144–154 页。

61 Robert E. Bedeski,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 The Kuomintang in the Prewar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81);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William C. Kirby, "The Chinese Party-State under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in William C. Kirby, ed., *Realms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3–138.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与上海私人慈善的终结

温奈良（Nara Dillon）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革命性分界线这一点持怀疑态度，并正在寻找跨越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彼此断裂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时期的各种延续性。[1] 冷战的结束、新史料的出现、对革命变迁本质的理论性质疑，这些都改变了人们对1949年所具有的意义的看法。根据已经获得的各种档案文件和口述史料，学者们揭示出中共的各种计划在地方层次上表现出混乱性与偶然性（contingency）的特点。他们发现无论在个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1940年代与1950年代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延续性。[2] 结果在最近的十到十五年中，人们越来越认为1949年不具有革命性意义，反而更体现出渐进的特点。

在最近围绕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性质的一些争论中，1949年到1953年这段新民主主义时期颇难把握和处理。在中共建立全国统治的最初几年，其目标是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民粹主义联盟，建立各种半民主的政治制度，并培育一种公私混合的经济。在持“革命论”观点的学者看来，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这种延续性只是中共故意采取的一种诡计，其目的是诱使反对者接受甚至支持中共的领导，同时也巩固中共的权力。革命论者认为，除了要实现这一目标，新民主主义时期并不具有其他影响深远的重要性，而且事实上当时中国内部的许多冲突也说明这一时期不可

能持续很长时间。与此相反，持“渐进论”的学者则提出了更为直截了当的解释，即认为新民主主义与之前国民党旧政权之间的延续性是确实存在的，但这种延续性并不完全是中共的策略性步骤，其对中共政权和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甚至要大于后来毛泽东主义时期（Maoist period）所进行的激进主义试验。

虽然仍然缺乏足够的资料来判断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真实意图到底如何，但探讨 1950 年代初慈善部门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却有助于我们讨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在国家与社会的彼此互动中，相对于实业领域，私人慈善业看起来可能处于边缘位置，但却为观察中国城市精英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惊人举动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为什么旧精英阶层中有如此多的人会支持那个即将毁灭他们的政权？为什么有些人甚至在其自身所属阶层的消亡过程中还会进行合作？剖析这些令人困惑的举动，将会为探究新民主主义时期存在的有关变化和延续的各种力量，提供一个切入点。

民国时期上海就已存在一个庞大而重要的志愿团体部门，这为国家—社会关系的地区性个案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出发点。因为即便对初生的中共政权的高层来说，上海精英们所掌握的各种资源、组织与专业技能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更大规模的共产主义革命来说，新民主主义期间打击私人慈善事业的各种运动在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指责私人慈善家有腐败行为有助于清除旧精英阶层的合法性，也破坏了这些旧精英保持社会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其次，不断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各种斗争运动，逐步削弱了旧精英阶层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进行集体抵抗的能力。最后，这些运动的最终结果是消灭了在政党—国家以外拥有任何自主权的所有志愿团体和民众组织。无论这些组织在民国时期是否构成了真正的市民社会，它们在 1950 年代初的消亡的确代表了国共两党政权之间的一个根本不同。因此，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城市确实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这一变化的发生却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缓慢与平和得多。

一、新民主主义与上海的国家统合主义

根据中共官方的说法，新民主主义阶段从1949年到1953年只持续了三年多。但这一设想实则源于1930年代末的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不仅是为了建立国共联合抗日的框架，毛泽东还寻求利用新民主主义来扩大中共的吸引力，并建立一个跨阶级的工人、农民和部分资产阶级的联盟。[3] 通过将新民主主义表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要的第一步，毛泽东试图将抗战时期中共较为缓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政策描述成一个过渡性的阶段，而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后退。

新民主主义对私人慈善事业采取了更为容忍的态度。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式，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嘲讽私人慈善事业是一种欺骗手段，故意模糊了资产阶级剥削这一现实。但是战争的压力与建立跨阶级联盟的战略很快令中共转变了政策。第一个转变发生在1937年日本侵华之后，当时中共积极参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救济活动以应付上海出现的大规模难民危机。[4] 为了替中共的抗战活动募集海外资金，1938年中共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鼓励宋庆龄建立了“中国福利会”。抗战结束时，中共也建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以此游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将其战后对华援助的一部分分给中共。[5]

事实证明，虽然新民主主义未能维持一个有效的国共军事同盟，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就在国共联合战线开始无可挽回地瓦解之后，中共仍然在1945年举行的七大上将新民主主义作为其战后重返城市的战略基础。[6] 当时中共领导人预计尚需十到二十年才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7] 事实上直到1948年中共领导人还认为仍需五年才能取得国共内战的胜利。[8] 正如中共未能预料到国民党政权会突然崩溃，它也没有料到新民主主义会如此短命，更不要说对此有所筹划。

中共在取得内战军事优势后不久就抛弃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但是新民主主义的其他大部分内容则得以保留。1948年蒋经国未能控制住严重的通货膨胀反而令国民党成为上海资产阶级的敌人时，中共甚至加大了力度来争取资产阶级。1949年接管上海前后，中共采取了许多举措来劝说上海精英们留在上海而不要逃往香港或台湾。中共十分重视城市

精英们的去留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这是对新政权是否有信心的明证。此外，要迅速恢复和促进经济生产这一目标，也使得中共十分依赖资产阶级所掌握的资源与专业技能。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工作者就以私人方式接触商人并在大型宴会上讨好他们，希望以此获得他们对中共的信任。虽然绝大多数金融领袖最终离开了上海，但还是有许多商人选择了留下。上海最大、最成功的百货公司之一永安百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理郭琳爽就选择了留在上海，拥有多家棉纺厂与面粉厂的荣毅仁也是如此。中共大张旗鼓地宣扬了这些资本家留下来的决定。[9] 甚至在接管上海后，中共仍然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吸引留在香港的商人们返回上海。就像高家龙 (Sherman Cochran) 在第 15 章所论述的那样，即便是为防备革命而花费巨大精力将家族成员和资产转移出上海的著名实业家刘鸿生，也受到吸引而在六个月后返回上海。

(一)统合资本家

新民主主义不仅限于将富有的个人纳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中。譬如在市民社会领域，新民主主义与民国时期各种政策之间的延续性就非常普遍，而不仅体现在人员留用这方面。虽然中共用自己的各种群众团体取代了诸如商会、工会这样由国民党监管的统合组织，但 1949 年前后的这两类不同组织不论在内部结构还是在政党—国家中所占据的特权地位上都十分相似。

中共一建立对上海的统治，就立刻接管和更换了各种国民党官办协会，并派出接收队前去接收上海总商会及其下属的 337 个同业公会。1949 年 8 月上海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新的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成立。该筹备委员会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重新组织了其下属的各个同业公会，并对这些同业公会的领导和人事进行了审查与替换。到 1950 年 9 月，上海共有 269 个同业公会、大约 8 万名会员企业，估计占到上海工商业企业总数的一半多。在 1951 年 2 月上海市第一届工商界代表大会上，这些新的同业公会正式成立。[10]

虽然中共想要进一步发展这种延续性，但是与国民党政权联系紧密的资本家们很快发现自己已经黯然失色，曾在内战时期作为和平运动积极分

子的一群新商人的风头已经压倒了他们。国民党时期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946 年赴南京请愿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盛丕华是这一大转变的最大受益者。他成了上海副市长和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11]1946 年和平请愿代表团中的另一位资产阶级成员黄延芳，也在新的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中被授予高位。[12] 王晓籁是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市总商会主席并于 1950 年被说服返回上海，但他在新商会中并未担任任何职务。[13]

除了改革官方工会与同业公会，中国共产党并未打算要在接管期间对上海一千三百多个其他非政府组织进行更多的控制。[14] 街区接管队访问了各自街区的所有正式组织并搜集了各种信息，而像民政局这样的市政府机构则着手调查那些已经在国民党政府登记了的各种组织。[15] 各种私人慈善组织继续发挥作用，并帮助共产党人在城市里建立秩序。它们既照顾上海发生短暂战斗期间死伤的人员，也援助 1949 年夏季台风的受灾者。1950 年 2 月国民党对上海进行空袭后，像同仁辅元堂与普善山庄这样的私人慈善团体还承担了寻找和掩埋死者并向火灾受害者提供救济的工作。[16]

中共掌权初期之所以会容忍许多非官方的志愿团体的存在，并不只是说明这些团体具有较低的政治优先性。私人慈善机构甚至成功地获得了新政权的免税优待。[17]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共在处理志愿团体时所采取的政策方式更接近于国民党的国家统合主义，而不是苏联式的革命一元主义。在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几乎是在夺取权力之后就立刻展开了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进攻。[18]

(二)统合慈善家与私人慈善事业

就像国民党在 1940 年代所做的，中共也打算以同样的方式来统合慈善家。比如中共继续进行了长久以来一直进行的各种活动，像建立各种冬季赈济委员会和动员慈善家们参加募捐活动。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于 1949 年 12 月 29 日成立，随后建立了一个由上海精英们担任成员的募捐分委员会。[19] 到 1950 年 3 月底冬令救济委员会结束工作时，它共开设了 44 个临时避寒所，安置了近万名无家可归者。[20] 除了进行冬

季赈济募捐外，慈善家们也积极参与了市政府下属各专门委员会为难民与失业工人举行的各种募捐活动。[21]

甚至是国民党要将慈善事业纳入到官办联合会中的计划，也被中共继续执行。[22]1950 年 4 月，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 年 8 月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该大会将中共已有的救济组织“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转变成“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并制定了在各省、市、县建立该会分支机构的各种计划。[23] 中共资深领导人董必武在这次大会上发表演讲，阐述了中共对私人慈善事业的政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救济福利事业，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应该吸收个人和团体参加。一切从事真正救济福利工作的个人和团体，只要他们赞成我们共同规定的方针，愿意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工作，我们就有责任和义务同他们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各级救济代表会议和救济组织。”[24] 董必武还努力为慈善工作赋予新的优先性。他声称失业工人和自然灾害受害者应当最先获得物资与服务方面的救助。[25]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工作是自上而下开展的，但是也吸引了城市精英们的积极参与。受人尊敬的慈善家和慈善组织的领导人都在各个重要的筹备委员会中被授予了重要职务。例如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吴耀宗、上海红十字医院院长颜福庆都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担任领导职务。[26] 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的负责人是赵朴初。作为一个著名居士组织的领袖，赵在救济上海的战争难民活动中声名远扬。[27] 中共之所以给赵这一职位，是为了回报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地下党的帮助，以及随后在内战时期对国民党的反对。

上海人民救济代表大会于 1950 年 10 月举行，有 198 名来自私人慈善团体、官方群众团体和市政府的代表参加。与国民党时期的这类活动有所不同，这次大会还有一些来自贫民的代表，包括三个难民、三个失业工人和两个军属。尽管如此，精英阶层的代表人数还是要大大超过贫民代表，并有像王晓籁和刘鸿生这样一些民国时期的著名商人。但是这次救济大会的领导职务仍被留给了像赵朴初和黄延芳这样在内战时期就与国民党决裂的精英人物。[28]

为期四天的会议安排了发言与小组讨论，其目的是要根据中共的社会福利政策与救济政策来教育上海的慈善家与救济工作者们。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吴耀宗发表了一篇演讲，展示了他在全国大会上学到了多少中共言辞："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一面压迫人民，屠杀人民，一面又借着慈善救济的名义，欺骗人民，麻醉人民……从今以后，上海所有救济福利团体，不分性质和派别，都将在人民政府和人民救济总会领导之下……"[29] 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曹漫之宣布了未来一年全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的工作重点，在这些计划中包括了扩大那些旨在救助孤儿、老人、残疾人和难民的私人机构。[30] 这清楚地说明，上海的中共领导人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私人慈善仍将在上海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这次救济大会正式建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该分会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官僚机构，因为国民党主办的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包括它的职员、正在实施的各种规划及募捐委员会——也被纳入其中。[31] 就像其前身一样，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将私人资金募集活动进行集中管理，并对各个慈善组织的规划和服务加以控制。为了配合中共的行动，各成员组织也被要求在其职员中组织政治学习小组，来阅读和讨论在全国救济大会上通过的各种新政策。虽然现在还不清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对资金募集活动实行了多大的控制，但是它的确成功地改变了许多历史悠久的慈善活动的行为习惯。其中最大的转变之一就是让各种同乡会在援助贫民时不再以原籍为标准。例如四明公所这个上海最老牌与最有钱的同乡组织之一，就向所有上海居民开放了它的殡葬馆、医院与学校。[32]

此外，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成立后，建立新的私人慈善机构的自发性组织活动就停止了。虽然在理论上中共的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的权威并不比其国民党时代的前身大多少，但它却成功地设法终止了民国时期慈善组织活动的混乱特点。1950 年初在龙华寺建立的新孤儿院是上海最后一个独立建立的慈善机构。[33] 中共之所以能够在限制自主组织的发展方面更为成功，一个原因是它不允许各种自主组织进行注册

登记，因此收回了民国时期通过注册登记而从法律上认可这些组织的权力。[34] 虽然中共中央政府在 1950 年 9 月就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但是其具体执行却被不断推迟。[35]

即使有如此重要的转变，直到 1950 年末中共对上海精英阶层的统治政策仍然是以延续而非变化为其主要特征。和国民党相比，中共在国家统合主义的执行方面要更加迅速和有效，但是两者的计划在根本上是一样的。他们要统合的是同样的阶级，也创造出非常类似的制度，并在一个惊人的程度上遵循着同样的政策。但是，随着 1951 年中共发动了对上海精英影响很大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这种渐变过程就开始了转向。

二、新民主主义的群众运动

1951 年 1 月在上海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随着朝鲜战争的升温而发动起来的。其打击目标是国民党地下分子和其他被禁止的组织，如青帮和各种异端宗教群体。[36] 正如魏斐德在第二章所述，在城市里，这一运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维持治安的行动，其目的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群众集会及公审大会来震慑敌人，并激发中国人支持朝鲜战争的爱国热情。起初中共命令所有反革命分子到警察局进行登记。随后就开始进行逮捕，并在 4 月 27 日午夜达到高峰——当天就逮捕了 8,359 人。4 月 29 日，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在一个社区公园领导了一次有万余人参加的群众集会。这次集会进行了现场广播，成千上万的市民在办公室和全市各地集合起来收听了实况转播。会上对在 4 月 27 日午夜袭击中抓获的 9 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群众斗争，并由此让上海公众了解了这种特别的政治活动。在几个小时的愤怒控诉之后，该集会宣布判处这 9 个斗争对象死刑并立刻执行。在接下来的一天里还公开处决了另外 285 名反革命分子。[37]

在工作场所中，镇反运动主要由工会主持，打击目标是工贼和前国民党劳工组织者。大部分上海工厂与商店的资产阶级所有者和管理者在运动中并未受到触动。他们既没有被划作反革命分子，也没有被当作政治动员的对象。在镇反运动结束后，慈善事业的精英领袖们更加积极地

投入到抗美援朝运动中。这一运动的目标是要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并巩固国内对朝鲜战争的支持。中央政府下令，所有接受美国资助或有美国籍职员的慈善、教育和文化机构都必须向政府登记，以便对它们进行重组、接管或解散。[38]

为了响应中央的新命令，1951 年 1 月 19 日上海市政府设立了一个登记注册办公室来领导反美运动。作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的负责人，赵朴初尽管不是中共党员，还是被任命负责该办公室的日常事务。[39] 他将该办公室职员分为六个组，分别负责高等教育、初级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宗教团体以及文化组织。[40] 登记注册办公室的职员们与各种中外组织的职员们举行圆桌会议，解释新的反美政策并讨论朝鲜战争问题。[41] 尽管事实上像赵朴初这样的慈善领袖都有着丰富的与外国慈善团体和天主教传教士共同工作的经历，但战时爱国热情还是帮助和推动了他们，让他们去激发中国慈善家和慈善工作者们积极参与到对以前那些外国同伴的攻击中。到 1951 年 3 月底，有 660 个社团组织登记注册说明自己是接受了美国资金资助或有美国职员的组织。登记过程刚结束，该办公室就建立了调查委员会，随即又举行了针对美国籍职员以及和美国人联系紧密的中国合作者的各种斗争会议。[42]

到抗美援朝运动结束时，大多数登记注册的社团都被解散，另有 51 个组织被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与各个政府部门接收。幸存下来的包括一些医院、学校和孤儿院，很大程度上它们仍像以往那样运作，但是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只有少数几个自治组织仍然保持独立自主，这些组织是职员和资金都主要来自中国的几个天主教慈善团体，它们在排除了外国神父和修女后被政府允许继续运作。[43] 民政局在该运动刚结束后不久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上海市还有 904 个志愿团体，其中包括 261 个慈善组织。[44]

在反美运动让中国慈善家和与慈善机构领袖们第一次尝到了政治运动的滋味的同时，镇反运动也在 1951 年冬结束了他们一直以来在冬季赈灾中起到的核心作用。与以前一样，上海市政府建立了一个具有战时色彩名称的冬令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冬防委员会。[45] 但该委员会仅由党政官员组成，并未吸纳任何以前负责冬令救济委员会的精英慈善家。冬

季赈济活动很清楚地被与镇反运动联系在一起，并下达了防止怠工、间谍和偷盗的专门命令。[46] 上海市冬防委员会动员工人而不是精英来参与这一保护行动。每个企业和工厂的工会都被命令建立各自的冬防委员会来巡查工厂和附近地区。[47]

慈善领袖们配合了中共的统合主义计划，也积极参与了新的群众运动，但是他们的合作只不过是加剧了这个在社会声望、财力和组织资源上原本可以与中共政权分庭抗礼的社会群体的分裂。上海的慈善团体和资产阶级领袖们帮助中共新政权克服了上海的失业与难民问题，但是他们自己却开始沿着政治断层线发生了内部分裂：一些人是中共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另一些人则因为与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而黯然失色。通过拉拢爱国的中国慈善领袖去领导和实行对中外天主教组织的攻击，抗美援朝运动又制造了新的分裂并进一步加强了这一两极化过程。不过即使存在着这些紧张关系，上海精英中的绝大多数成员仍然在新民主主义的大联合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反腐败的三反五反运动

上海精英及其社会地位的削弱始于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三反五反运动只是对朝鲜战争引发的经济困难的反应。为了抑制因大量军事采购而引发的通货膨胀，1951 年秋毛泽东下令裁军与压缩预算。在东北进行的一场削减政府开支运动揭发出军事采购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这向中共最高领导层敲响了党风党纪状况的警钟。1951 年 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下令，其他地区也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整风运动以便挖出腐败分子。[48] 中共上海市委对这一号召迅速作出回应，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进行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该委员会主席为副市长潘汉年，副主席为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和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盛丕华。46 名成员中有不少上海精英，其中包括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会长赵朴初和实业家荣毅仁。[49]

随着 1952 年 1 月潘汉年领导的上海市三反委员会与民政局一起组建了上海市救济组织调查委员会，三反运动也扩展到了志愿团体领域中。

调查委员会由来自各政府部门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的代表组成。[50] 就像抗美援朝运动一样，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内部展开的三反运动也是由赵朴初领导的。该运动在早期阶段显然并不激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动员人们进行指控或召开斗争大会。[51]

三反运动揭露出上海市党政系统存在着严重腐败，涉案者包括了像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黎玉这样的高官。[52] 像上海、天津这样主要城市里的官员腐败程度之深令已经十分警惕的中央领导人更加震惊。对毛泽东来说，腐败对中共的威胁要比朝鲜战争更为严重。他认为城市资产阶级是引诱共产党干部犯错的主要来源。结果 1952 年 1 月中共中央下令将反腐败运动扩展到资产阶级，此即众所周知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53]

在上海，这些命令让刘长胜和上海市总工会得以控制当时正在上海工商业联合会中进行的和风细雨式的三反运动，并将其转变成一个斗争运动。为此，上海市总工会组织了一个由超过四万名工会成员组成的五反代表大会，这些人被鼓动起来去调查他们的雇主，并与他们发现的任何腐败行为进行斗争。除了使用激烈的语言，工会领袖们通过敲锣打鼓并带着木质大炮游行的方式，为阶级斗争抹上了军事色彩。工会采用了 1948 年国民党人打击上海资本家时使用的词汇，组织“打虎队”作为运动的前锋。打虎队开进工厂商店，指导工会干部和工人如何检查公司帐目，怎样诱使人们供认与揭发，以及如何举行斗争集会。此外，中共还在各个繁华的街头角落建立了许多广播电台，通过高音喇叭来发布各种宣传和指控消息。[54]

上海工人积极响应运动的号召，其斗争热情很快就超出了中共政权所针对的五种非法行为。一些工人开始批斗资本家腐朽的生活方式、只求利润的行事原则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工人们很快就要求被吓坏了的雇主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随后更要求立刻将资本家的企业国有化。在这些要求逐步升级的同时，斗争会也经常失控。两百多名资本家被他们的雇员关在办公室里，许多资本家被殴打或者遭受了痛苦和带有羞辱意味的惩罚，例如长时间跪在地上或者戴高帽子。在这种精神和身体双重侵害的压力下，48 名资本家试图自杀，其中 34 人最后“成功”自杀。[55]

2月8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上海市总工会派遣的一支联合工作队到达上海市分会并接管了五反运动领导权。随后，社会救济领域的五反运动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该工作队除了对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进行调查之外，还组织了六支打虎队来在私人团体中进行这一运动：两支负责各种同乡同业公会，两支负责慈善组织，一支负责各种同乡会，一支负责孤儿院和养老院。这些打虎队一般都会先组织一场斗争运动来作为其调查活动的前奏。基本方式是组织一个由全部雇员（在像孤儿院这样的居住场所里，则是被救济的人）参加的会议，向他们解释中共对腐败所采取的政策，并引诱人们进行供认与揭发。在开完这样的会议之后，打虎队会派出干部与这些组织的职员进行一对一的谈话，并鼓励后者进行揭发。同时，他们开展基层工作以组建一个雇员工会。在对各种供认与揭发进行了材料搜集和事实调查之后，打虎队开始举行针对某个“典型”腐败人物的斗争会，以此将这个组织从封建习惯中解放出来。斗争的目标人物通常被会议的参加者当场进行惩罚。其方式多种多样，从罚款、逮捕到殴打和其他体罚都有。为此，两个慈善工作者企图自杀。[56]

到1952年2月末，五反运动已经对上海与整个中国的经济都产生了严重影响。由于该运动导致了私人工厂和商铺纷纷关闭，因而进一步引发了生产停滞与失业。此外，公有经济部门中进行的三反运动也干扰和耽误了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国营企业和建筑项目的运作。这一运动原本是要削减政府开支和抑制通货膨胀，但到最后却演变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说明在维持城市的社会经济秩序方面，中共政权仍然有赖于资产阶级这个竞争对手的帮助。中共中央领导人迅速暂停了上海的五反运动并推迟了这一运动在其他城市的开展。为了迅速恢复生产，中共领导人还在税收、采购和订货方面采取了各种紧急措施。[57]

财政部部长，当时主持全国五反运动的中央节约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被派往上海前去执行中共中央对这一运动的控制措施。他命令立刻停止运动并释放所有被羁押的资本家。薄向北京报告说上海的领导人处于混乱之中，并指责后者对运动已经失去控制。[58] 上海市总工会党委书记刘长胜被停职，取代他的是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钟民。[59]

在五反运动暂停期间，薄一波尝试建立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中共发布了新规定，只准工人向运动领导机关报告各种犯罪，禁止工人采取其他直接行动。另一方面，12,000 名中共和工会干部进行了短期查账训练并被组织成检查队。在对 74 家企业成功进行了试验性检查后，一个新的工作队运动章程被制定出来并开始进行速成训练。3 月 25 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另一次五反大会。与第一次大会引人注目的军事化方式不同，市长陈毅强调了对这一运动的限制，并反复强调了中共政权对新民主主义的承诺："人民政府采取的措施绝不是说要改变对资产阶级的政策。"[60]

五反运动这一受到约束的阶段于 1952 年夏结束，此时中共对上海资本家们罚款已达一百多亿多元。但即使是此时，中共领导人更担心的仍然是恢复经济而不是惩罚腐败的问题。政府不仅减少了对资本家的罚款，延后了罚款的支付，还放松了对订货合同的价格管制，其目的都是要恢复经济生产。在北京最高领导人的同意下，支持中共的资产阶级领袖们得到了特别宽大的处理。[61]

虽然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而对上海工人进行的去动员化看起来是恢复了新民主主义，但是城市精英们已经受到了十分深远的长期影响。工人们对雇主不受约束的攻击削弱了后者的权威，中共许诺宽大处理揭发者的策略也削弱了资本家集体对抗中共政权的基础。[62] 国家之所以在 1952–1955 年间加快了对工业的接管，至少部分原因就是五反运动期间资本家在支付罚款方面面临很大的压力。[63]

这些反腐败运动代表了一种转变，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所承认的，对此问题更进一步的证明就是志愿团体领域中的三反五反运动从未被暂停过。尽管中共政权仍然依靠私人实业家进行生产和雇佣劳动力，但由私人慈善事业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却已经不再具有像以往那样的优先重要性。这对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与私人慈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到 1952 年 6 月末三反运动结束时，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的 435 名职员中有 151 人被打成腐败分子。但其中绝大多数人之所以被指控，往往是由于他们违反了中共的救济政策或救济管理，而不是真正有腐败行为；这些"腐败"职员中只有 45 人接受了犯罪处罚或者被从工作岗位上清洗出去。[64]

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认定的腐败雇员中，赵朴初最为声名卓著。作为惩罚，他被迫去职。赵被指控了好几条罪名，但是几乎没有哪一条算得上是犯罪行为。其中最接近犯罪指控的，是他在解放前夕任职国民党临时救济委员会时所进行的一系列现金兑换和商品购买行为，这些行为导致该委员会遭受了较大的财政损失。但是这些交易都是在中共夺取上海、接管救济委员会之前进行的，而三反运动的调查应当只限于当事人在 1949 年以后的活动。此外，赵朴初之所以进行这些交易，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该委员会的资产免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65]

对赵朴初腐败行为的各种指控，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他提倡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的自主权，使后者脱离了中共和政府的控制。最严重的指控是赵朴初对中共与政府的监管持负面态度，认为这种监管是干涉而不是指导。据说，他公开宣称："民政局与我们的级别一样，（因此我们）不需要向它报告。"[66] 赵还被指控在将救济物资分给上海各个救济机构和上海以外受灾地区时并未考虑政治因素。因此，同样是这种独立性，在 1937 年的难民救济活动中让赵朴初可以雇用中共地下党员作为难民收容所的指导员和教师，而到了 1952 年却成为他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工作中的政治缺点。

其他指控大多是说赵朴初违反了共产党人的管理习惯。例如官僚主义，因为他过分强调该分会职员的等级，而未能在这一组织中按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类似的，他还被指控有家长制作风，因为他雇用了以前管理救济事业的"封建份子"，而后者往往有资产阶级背景或者以前和国民党有联系。此外，在工作分配方面赵也未能让中共干部满意。[67]

就像赵朴初这个例子所展示的，三反运动将长期以来持续不变的统合主义救济习惯和日常政治进行了重新定义，称之为腐败。将这些行动与态度定义为不道德的行为，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与政党—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令公众眼中慈善事业精英们的形象黯然失色。这对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造成的损害是长期的、持久的。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中要求在 1952 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并未召开（以后也没有召开过这样的大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领导人也

再未更换过。相反，来自上海市民政局的职员接管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的日常运作，甚至后者连办公室也搬入了民政局。[68] 慈善领域的统合主义在 1952 年总体上宣告结束。

五反运动对“腐败”进行的内容宽泛而又意义混乱的重新定义歪曲了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对这个词的使用却是战略性的。在斗争会上，慈善家和慈善事业领袖们在他们的雇员与接受救济的人面前遭受侮辱；而在报纸上，他们又在更多公众面前遭受侮辱。无论各种指控所依据的是个人的中饱私囊，还是其他一些更加意义含混的违反中共政策的指控，将这些都当作是腐败这一点严重损害了此前慈善家们一直享有的崇高的社会声望。中共从根子上打击了私人慈善事业，从而严重削弱了上海城市精英们合法性的一个关键来源。

1952 年夏，三反运动结束，而对私人志愿团体的调查仍在继续。民政局被允许以“新三反”运动的名义继续这些调查。其目标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设想。“新三反”运动对每个私人组织的计划、服务、管理、职员情况都进行了详细审查，据称是为了合法注册做准备。只有那些可以证明自己是为社会服务并已经过彻底改造的社团才被允许登记注册，其他所有社团或者被市政府接管，或者被解散。而任何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团体，都被彻底禁止继续活动。[69] 那些中共认为对社会有益的救济工作和项目包括了医院、助产服务、孤儿院、残老院。[70]

在很大程度上，中共推动新三反运动与三反运动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工作队被派往每个非政府社团组织去建立雇员工会，并动员职员们反对其管理者和董事会。例如在四明公所，干部们将棺材生产车间的木匠和油漆匠组织成一个企业工会。虽然只有一些工人积极参与，但是一度非常强大的四明公所的管理者与指导者们并未对这一运动进行任何抵抗。四明公所很快就停止了运作，因此工人们的斗争只是令自己丢了工作。但是工人们也帮助工作队查明了四明公所拥有的土地与其他资产。1953 年四明公所将其名下的医院交给了上海公共卫生局，移交后被更名为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此后政府控制了四明公所的土地、出租屋与行会大楼，四明公所于 1954 年正式解散。[71]

新三反运动一直持续到1954年底。在为期两年的运动中，共有223个慈善性的志愿团体被调查。其中12个作为反革命团体被禁止，另有162个被关闭，其财产被上海市政府接管。总的来说，在运动期间上海市政府共没收了私人慈善团体拥有的三千多亩土地、八个大型办公建筑、六千多个住宅单位与房屋。[72]

在新三反运动中“幸存”下来的49个社团组织中，绝大多数都已经与原来的组织截然不同。例如，第二残老院虽然在表面上是私人团体，但实际上却是将以前五个同乡会的财产和部分职员合并后建立起来的。和其他类似组织一样，第二残老院也存在法律地位模糊不清的问题。尽管听上去有一个官方名称，但是它并不由市政府管理。在资金来源方面虽然依靠原来志愿团体自身物业出租所得的租金，但是新的董事会一直没有建立，纲领与规章制度也没有制定。[73]此外，该组织仍不被允许进行注册登记。[74]

在新三反运动中幸存下来的慈善组织中，确实有几个并未遭到多大触动，但是它们与政党—国家的关系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无论这种关系仍然是多么模糊。例如，由天主教主办的新普育堂是旧三反运动最早展开的慈善组织之一。在1953年完成调查之后，该育婴堂被允许继续作为一个私人主办、公家协助的组织而继续运作。所谓“公家协助”是指上海宗教事务委员会派出一个工作队，继续调查该育婴堂与天主教会的联系，而另一个来自民政局的工作队则帮助这个育婴堂降低在旧三反运动中激增的婴儿死亡率。这些工作队更换了育婴堂的职员，重组了婴儿护理部门，并提高了其卫生和营养服务水平。[75]

大多数在新三反运动中幸免而未成为打击目标的慈善组织都静悄悄地停止了运作，它们不经正式的解散程序就被其职员和董事会所放弃。[76]在这些逃脱了三反运动打击的慈善群体中，主要是60家私人医院，它们能幸存下来主要是因为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执行后对医疗卫生服务产生了巨大需求。1953年，卫生部为了解决卫生机构缺乏这一问题，将私人医院重新划为慈善性社会福利组织而不是资本家企业。这一规定使得有劳动保险的企业可以与私人医院签订合同来接受后者的医疗服务。但同时卫生局开始对私人医院的职员、服务和收费进行管理。[77]

其他幸存者主要是红十字会和中国福利会。作为与中共政权关系紧密的全国性协会，这些组织躲过了严酷的三反运动。红十字会由于它的国际联系和声望而受到重视，而中国福利会则得到了其建立者、国家副总理宋庆龄的保护。[78]

新三反运动标志着上海一度十分活跃的志愿团体领域被有效地终结。虽然这些志愿团体很少从国家那里获得可被称为是市民社会的真正自由，但长久以来这些团体一直都为上海的精英们提供了进行社会参与和加强社会声望的重要渠道。这些团体的消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其革命中进行的诸多决定性制度变迁之一。

结局：工业的社会主义化与资产阶级的消亡

1952 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十分清楚地改变了中共政权与城市精英之间的关系，但是一直到 1953 年 6 月，中共仍将新民主主义当作其官方政策。[79]1953 年 12 月，中共公开宣传了即将到来的变化。当时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国家正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并正式提出了最终消灭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目标。但是这个时间表仍然是模糊的，资产阶级继续被告知直到资本主义发展结束其历史使命后才会进行社会主义化，这也许需要十到十五年的时间。[80]

1955 年出现的经济衰退与完成农业集体化的突然要求，使得加快工业社会主义化的压力大大增加。在 1955 年 10 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与随后进行的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会议上，毛泽东赞成大大缩短过渡时期。[81]毛泽东与中共其他领导人讨论了这一过渡时期从两年到五年不等的各种时间表，最后决定要与一五计划保持同步，力求在 1956–1957 年两年内实现社会主义转变。中共领导人计划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斗争运动来发动工人反对资产阶级，以此强迫资产阶级接受政府赎买而实现工业社会主义化。刘少奇预计，为实现工业社会主义化而进行的这一斗争运动，将令之前所有的斗争运动都相形见绌。[82]

但当这一运动还在筹划之中、尚未正式进行之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就在 1956 年 1 月 15 日举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会，宣布北京已经完成了社

会主义改造的整个过程。意识到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后，上海的领导人也立刻迎头赶上。在资产阶级的积极合作和参与下，私人经济部门的社会主义改造被简化成一个填表格的工作。尚未面对中共领导人准备进行的大规模斗争运动，北京与上海的商会就已经采取主动并集体上演了他们自己的葬礼。资产评估在匆忙之中进行，绝大多数都极大地低估了私人企业的价值。随后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及其家人走上上海的街头，在庆祝游行中高举着自己要求政府赎买的请愿书。这些表演在 1 月 20 日的大型集会中达到高潮，会上政府官员隆重批准了全体私有企业要求公私合营的申请。[83]

上海剩下的志愿团体组织在新三反运动之后仍然地位模糊，一些被官方认可但是并未注册的慈善团体在国家的严密管理下仍在运作，而数以百计的组织已不再运作，变得名存实亡。这种模糊性在 1956 年 1 月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得以解决。国家接管私营企业的猛烈势头令上海市民政局与卫生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也要赶上这一潮流以彻底消除私人志愿团体。

各种慈善团体很快就被迫提交了申请，要求解散或由市政府接管。新普育堂很快就提出了接管申请，并成为上海市民政局所属的上海市儿童福利院。[84] 尚存的私人医院全部于 1956 年 2 月 7 日被卫生局接管。[85] 上百个已经不再运作、但未正式申请解散的慈善组织被正式解散，它们放弃了的财产被分配给政府各个部门进行接收。这一过程只不过是为自 1952 年以来新三反运动已经成功完成了的工作划上了句号。1952 年初上海仍有 904 个志愿团体保持运作，但到 1956 年只剩下 287 个。这 287 个幸存者中的大多数被正式确认为群众组织。上海一度十分活跃的慈善机构只剩下了红十字会和中国福利会。[86]

虽然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的喜庆气氛到处都呈现出这一表象——城市精英们十分欢迎这一对革命献身的机会，但是 1957 年的百花运动很快就揭示了非常不同的画面。一些在 1956 年庆祝把自己的企业交给国家的人，在一年后转而攻击国家的赎买政策严重低估了他们资产的价值。其他人则抱怨自己虽然身为有薪管理者，但在企业中的新职位上却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或责任。[87] 而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各种不公正措

施的不满，也使得有人提出要建立一个多方委员会来听证和调查对上述斗争运动期间各种裁定的申诉。[88]

这些事后抱怨只是强调了这一点，即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几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其间并没有任何强制，更不用说发动工人阶级参与了。即便运动过程被缩短了，但运动本身已足以令上海精英们确信应当加入革命。他们并没有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对抗中共政权，反而对各种能证明自己忠诚并转变其阶级地位的个人策略趋之若鹜。

相比私人企业而言，私人慈善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更是虎头蛇尾。由于不断进行目标相对集中的各种斗争运动，中共政权的潜在敌人早已逐步分化并且彼此内斗。而且在三反运动取消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与慈善领袖们的合法性以后，中共瓦解志愿团体的各种策略性措施已经很少或者没有遭到抵抗。相反，这些组织的昔日领袖们都忙着将自己与那些被称为封建和剥削他人的人区别开来。中共针对这些昔日精英们的政治战略，其高明之处就在于首先打击后者的合法性。对其社会声望的打击，加上挑动人们互斗的运动策略，使得慈善家们努力寻求摆脱自己权力的经济和组织资源，而不是利用这些资源来抵抗中共的压制。

中共还十分有效地利用了政策的模糊性。譬如反复许诺要对志愿团体进行注册登记，但却不断推迟并保留对所有志愿团体的法律认可。当三反运动的目标从根除腐败转向质疑私人慈善事业的目的与政治基础时，该运动也策略性地利用了模糊性这一点。中共开始直接将私人慈善事业称为“封建”组织，并将之前针对外国慈善团体的认为他们进行剥削的这一指责也扩大到所有私人慈善组织头上。

通过对慈善事业的分析，本文发现五反运动并不是中共对工人阶级的短暂失控，也不是中共为恐吓资产阶级而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相反，应当将这次运动与三反运动联系起来考察，把它看作是对旧城市精英的一次全面而又微妙的攻击。[89] 中共政权也许并未打算在 1952 年就进行一场工人阶级想进行的公开阶级战争，但是中共政权对城市精英权力发动的系统攻击却更为有效。这些反腐败运动不只是要将新成立的中共政权与它已经取代了的、满是丑闻的国民党政权区别开来，它们也的确削弱了城市精

英们的社会声望。腐败与其说是对城市精英的犯罪指控，不如说是对其合法性基础进行重新定义的政治手段。三反运动所引发的长久制度变化与市民社会的消亡这一事实，又一次说明了这些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暂时背离了原来温和的延续性政策。新民主主义自有其革命的逻辑。

由此可知，1949 年革命中变革与延续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极端复杂的。中共的确继承并延续了许多由国民党创立的统合主义制度，而且也证明了自己在获得城市精英的支持方面要比往往被认为更保守的国民党还要成功。但是这种延续性后来却成为实现下列激进变革的一种工具：先是消灭市民社会，随后是消灭统合主义本身。而上海精英不但未能抵抗其最终消亡、实际上反倒在此过程中进行合作这一事实，应当不会模糊 1950 年代初的大变革所具有的深度。

姚昱译

注释

1 例如，Joseph W.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Paul A. Cohen, "Reflections on a Watershed Date: The 1949 Divide in Chinese History" in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 William P. 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1990): 121–141; Susan Glosser, *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 1915–195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Mark 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 Elizabeth J. Perry and Lü Xiaobo, eds.,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17–19 页。

4 陆志仁：《抗战时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史料征集座谈会讲话》，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上海：上海新闻出版局，1993 年，第 7 页。Patricia Stranahan, "Radicalization of Refugees: Communist

Party Activity in Wartime Shanghai's Displaced Person's Camps," *Modern China* 26.2 (2000): 176.

5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在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年，第 2 页；董必武：《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75 页。

6 Tony Saich,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1,236–1,237.

7 Kenneth Lieberthal, "Mao vs. Liu? Policy towards Industry and Commerce, 1946–1949," *China Quarterly* 47 (July–September 1971): 519.

8 Saich, 1201.

9 朱华等：《上海一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91 页。

10 《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04–505 页；马伊里、刘汉榜：《上海社会团体概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8 页。

11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 · 民国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7 卷，第 444 页；《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第 504–505 页。

12 朱华前揭书，第 270 页。

13 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年，第 13 页。

14 这一政策的一个明显例外是中共对直接附属于国民党的各种组织——包括民兵与地下行动机构——立刻采取了行动。而像一贯道这样的异端宗教组织也被禁止。邹荣庚：《综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年；马伊里、刘汉榜前揭书，第 8 页；刘宋斌：《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1949–195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7 页。

15 章永年：《接管上海市区政权机构回顾》，石鸿熙主编：《接管上海亲历记》，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 年，第 122 页；上海市档案馆，B168-1-796，B168-1-797，B168-1-798。

16 马伊里、刘汉榜前揭书，第 8 页。

17 《解放日报》，1950 年 10 月 10 日。

18 "一元论"是指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即被允许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性机构仅限于由国家监管的、数量有限的群众社团，比较典型的是工会、农会、妇联、青年团，有时候还包括商会。众所周知，列宁称这些社团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传送带"。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5), 3: 277. 关于俄罗斯革命时期对精英们的处理，见 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3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70–74; Richard Sakwa, *Soviet Communists in Power; A Study of Moscow during the Civil War, 1918–21*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8), 14–22; 及 Dmitri

Volkogonov, *Lenin: A New Biograph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375。在此感谢李滨 (Douglas Stiffler) 介绍给我后一部分的参考书。

19 上海档案馆，B168-1-501，第 7 页。

20 同上，第 5 页。

21 同上，第 10–12 页。

22 国民党在 1946 年发布规定，要在每个城市、每个县、每个省都建立一个社会福利协会，该协会由私人慈善机构组成。见《社会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46 年），第 87–88 页。

23 《人民日报》，1950 年 5 月 5 日。

24 董必武前揭书，第 288–289 页。

25 同上，第 287 页。

26 《解放日报》，1950 年 10 月 7 日。

27 赵朴初：《抗战初期的上海难民工作》，《抗战初期的难民工作》，第 26 页；王尧山：《代序》，《抗战初期的难民工作》，第 5 页。

28 《解放日报》，1950 年 10 月 6 日。

29 《解放日报》，1950 年 10 月 10 日。

30 同上。

31 同上。

32 上海市档案馆，Q118-1-7，第 84–86 页。

33 上海市档案馆，B168-1-796，第 19 页。

34 Xu Xiaoqun,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in Shanghai 1912–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0–102.

35 马伊里、刘汉榜前揭书，第 9 页。

36 Julia C. Strauss, "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 (January 2002): 80–105; 钱丽君：《上海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第 72 页。

37 钱丽君前揭文，第 73–76 页。

38 《解放日报》，1950 年 12 月 31 日。

39 《解放日报》，1951 年 1 月 19 日。

40 马伊里、刘汉榜前揭文，第 9 页。

41 《解放日报》，1950 年 2 月 22 日。

42 《解放日报》，1951 年 3 月 28 日。

43 上海市档案馆，B168-1-509。

44 上海市档案馆，B168-1-240，第 20 页。

45 《解放日报》，1950 年 11 月 21 日。

46 上海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上海党政机构沿革：1949–198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7 页。

47 上海总工会：《两年来的上海工人运动》，上海：上海总工会，1951 年，第 9 页。

4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上卷，第 139–140 页。

49 朱华前揭书，第 320 页；John Gardner, "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 A Study of the Consolidation of Urban Control," in A.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503, 505.

50 上海市档案馆，B168-1-240，第 20 页。

51 同上，第 23 页。

52 朱华前揭书，第 321 页。

53 薄一波前揭书，上卷，第 164 页。

54 Gardner, 510–513.

55 薄一波前揭书，上卷，第 170–172 页。

56 上海市档案馆，B168-1-240，第 20–21、23、31 页。

57 薄一波前揭书，上卷，第 168–169 页。

58 同上，第 170 页。

59 中共上海市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 419 页。

60 Lyman P.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32–233.

61 薄一波前揭书，上卷，第 174–175 页。

62 Gardner, 520; and Robert Loh and Humphrey Evans, *Escape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2), 100.

63 Lynn T. White III,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71–75.

64 上海市档案馆，B168-1-240，第 24 页。

65 同上，第 27–28 页。

66 同上，第 26 页。

67 同上，第 26–28 页。

68 上海市档案馆，B168-1-506，第 23 页。

69 马伊里、刘汉榜前揭书，第 10 页。

70 上海市档案馆，B168-1-805，第 9 页。

71 上海市档案馆，Q118-2-25；熊月之：《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350 页。

72 马伊里、刘汉榜前揭书，第 10 页。

73 上海市档案馆，B168-1-805，第 5 页。

74 马伊里、刘汉榜前揭书，第 11 页。

75 上海市档案馆，B168-1-5065，第 26–27 页；Human Rights Watch/Asia, *Death by Default: A Policy of Fatal Neglect in China's State Orphanages*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1996), 118.

76 上海市档案馆，B168-1-817，第 28 页。这些程序包括向民政局提交一份解散申请并在报纸上出版合法声明。

77 《上海卫生：1949–1983》，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第 121 页。

78 上海市档案馆，B168-1-817，第 27 页。

79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N.Y.: M. E. Sharper, 1990), 121.

80 朱华前揭书，第 325 页。

81 Roderick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 19–20.

82 Ibid., 1: 21–22.

83 朱华前揭书，第 329 页。

84 Human Rights Watch/Asia, 118.

85 《上海卫生》，第 677 页。

86 上海市档案馆，B168-1-817，第 27 页。

87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Praeger, 1960), 202.

88 Ibid., 273;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White Plains, N.Y.: M. E. Sharpe, 1979), 268.

89 本研究同意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看法，即三反五反运动构成了第二次革命。见 Kenneth 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二

占领外围
(Occupying the Periphery)

第五章

从反共到抗美：1950–1951年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

周杰荣（Jeremy Brown）

1952年底，在南韩的一所军营里，战俘李华国将他的秘密向美国军事情报官员和盘托出。[1] 李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这支部队由一百多万男男女女组成，是被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派来打抗美援朝战争的。当与审讯官面对面地坐在桌子前接受讯问时，李华国一定对自己过去三年的奇特经历感到十分诧异。他31岁，原本是农民，生活在贵州省西南一个离朝鲜一千六百多英里远的村庄里。直到1949年末解放军占领贵州省兴义县之前，他都在家乡种地。但是到1950年1月，已经对新政权深恶痛绝的李华国放弃了种地，转而参加了一支反抗共产党的游击队。

说1949年11月贵州就被成功“解放”，这样的报道有些草率，至少是言之过早。在贵州全境和中国西南的其他地区，有许多像李华国这样的人拿起武器反抗前来占领的人民解放军。由于不满新政权的重税政策，当地一些人参加了各种农村民兵组织，另一些人则与国民党部队建立了各种联系。对共产党的反抗一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功。1950年3月，贵州的新领导人不得不从包括兴义在内的28个县撤回了被包围的士兵和干部。[2] 争夺贵州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51年。

1951 年 1 月，李华国和他的 142 名战友在一个深山窝巢里被中共士兵抓获，他的反抗随即宣告结束。12 名游击队领袖被枪毙，其他人则在关押了一个月后被编入人民解放军。李接受了政治训练，并在兴义的军队建设项目中工作了一年，随后被派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称为“抗美援朝”的朝鲜战争。1952 年 2 月，李华国跨过了鸭绿江并前进到位于朝鲜半岛中部的前线。在那里他接受了步兵训练，还挖了掩体。5 月的一天，李拔掉了挂在掩体墙壁上一颗手雷的撞针，炸死了两名战友并导致另一人重伤。事后李被看押，但是两天后他成功出逃并向南韩一支海军部队投了降。

李华国告诉美国陆军审讯官木薮（Kiyabu）先生，他是“不小心”引爆了那颗手雷。他还把自己知道的关于中共统治兴义县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木薮。李画了一张颇有价值的兴义地图，图上标明了监狱、警备部队营房、共产党司令部、学校、桥梁、邮局和牲畜市场的位置。在对其上司的报告中，木薮认为李华国“缺乏常识”，因为他“不能理解问题”，他“需要讲特别多的话才能表达他的思想”；但是李看起来非常合作，“拥有大量信息”，“非常友好”，并且“很有幽默感”。木薮认为李华国的情报信息相当可靠，并注意到李反对共产主义，在战俘交换时“将会拒绝返回他的故乡”。考虑到李的态度，不难理解为什么 1953 年 7 月朝鲜停火后，李华国极有可能拒绝被遣返回中国大陆，而是和其他 14,000 多名中国战俘一样选择了去台湾。[3]

从木薮的评论来看，对于那些改变了自己 1949 年之后生活的那一系列重大事件，李华国很难理解。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李华国从贵州到朝鲜、从反对共产党到抵抗美国这一旋风般的历程？如果将西南地区人民的经历作为分析的焦点，那么 1950 年代初中国的历史看起来就会与那些标准的叙述截然不同——即共产党迅速取得了胜利并顺利夺取了政权，之后是兼容并包的“蜜月时期”。[4] 当我们从贵州的角度而不是从北京或者中国北方“老解放区”的角度来考虑中国共产党如何夺取并接管政权这一问题，那么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关于新政权“十分容易地被人民接受、并令人吃惊地几乎没有遇到积极的反抗”的看法就需

要被重新考量。[5] 在中国西南，对共产党军事占领的武装反抗在最初几年之内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地势崎岖的贵州，内战并没有随着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干净利落地结束。1950 年与 1951 年内战仍在延续，并与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紧密相关。美国的陆军档案和最近披露的中国材料都说明，数千名像李华国这样的人在代表中国出战朝鲜之前都曾在西南地区与人民解放军作战。而更多的志愿军士兵是人民解放军各个部队的成员，他们曾负责征收赋税、建立地方政权、镇压反共抵抗，但在朝鲜却与他们之前的对手成为战友。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从贵州到朝鲜的历程说明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人们急剧转换着身份，简直令人有些眼花缭乱。在中共军事占领西南地区后不久，人们就转变了身份并十分轻易地被贴上了像“土匪”、“英雄”、“烈士”、“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这样的标签。但这也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时期，一个人的身份一旦被确定为“土匪”，他的家人与相关社区群体的生死就被掌握在革命的政党—国家手中。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本书第 2 章的讨论，以及高峥（James Z. Gao）对杭州的研究，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占领江南地区前进行了十分细致的筹划。[6]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在接管西南地区时却毫无准备。像邓小平与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低估了当地人民对默许一个远在北京的新政府的抗拒程度。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贵州时投降或者仅仅是被忽视了的旧地方豪强、少数民族、农民和国民党士兵，都对解放军的占领提出了挑战。更糟糕的是，中共新政权因为立刻派出了武装征粮队，从而破坏了建立良好第一印象的机会。在一些地区，原来可能倾向于新政权的穷苦农民奋起反抗 1950 年初对他们 1949 年收获粮食的征税，因为国民党政府已经征过这个税了。

1950 年春中共开征粮食税收之后，贵州的反抗变得非常明显——几十个县失守、上千名干部和士兵被杀，新政权的回应手段是进行军事包围和实施朱莉（Julia Strauss）所谓的“家长制恐怖”。[7] 在贵州，这一恐怖的表现形式是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民兵将反抗者的家庭成员关进监狱，并将被打死“土匪”的尸体进行示众。这一点之所以是家长制的，是因为

它允许反抗者悔罪并让他们随后到朝鲜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作战。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对西南地区的反抗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成功的。到1951年末，人民解放军已经击败了绝大多数游击组织。但是中共在西南地区一开始就出现严重错误、随后又采取恐怖主义军事占领，所产生的后果其影响却不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这一阶段。

本章论述的是中国共产党统治贵州及其邻近西南地区的最初几年。我将讨论是哪些人反对新的政权、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反抗这两个问题，并将探究中共对西南地区的军事占领与朝鲜战争之间的联系。本研究基于两个资料来源。一是美国陆军审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战俘的记录，这些档案保存在马里兰州柯律治公园（College Park）国家档案馆里，记载了中国战俘的简历，对了解1949到1952年间中国地方社会的变化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细节资料。我搜集了147份对战俘的审讯记录，这些战俘都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统治西南地区——包括贵州、湘西、四川、广西、云南——的最初几年。第二个资料来源是1950年代的中国政府文件，还有最近出版的中国资料文献，其中包括了各种县志和回忆录。

每一类资料都有各自的问题。我原本以为战俘审讯记录会将中共政权妖魔化。同样，我也假设中国的资料会美化中共对西南地区的接管。但令人吃惊的是，情况截然相反。军事审讯自始至终都反映着审讯者与战俘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在朝鲜，为了讨好战俘监管者，许多战俘确定无疑地对他们在反抗新政权中的作用撒了谎或者进行了夸大。但也有不少战俘对中共十分忠诚。总的来说，战俘审讯报告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关切，他们甚至还关心贵州学校的位置。有趣的是，中国大陆的材料在对待占领初期的错误以及大规模反抗方面持十分开放的态度。当然，这类资料也声称像李华国这样的农民是“被迫”参加地主领导的武装反抗的。但为了恰当地歌颂1950–1951年间的剿匪斗争，各种地方志公开说明了中共面对了多少敌人以及这些敌人是如何被消灭的。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普通民众如何被卷入国内和国际战争的画卷。

一、对西南的占领

1949年，中国重新走向统一的现实可能性来得比毛泽东预想的更快。到1949年中期，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面对的情况是要突然接管中国北方农村以外的广大地区。在老解放区，中共是通过经年累月的试错才赢得了普遍的支持。因此中共领导人十分急切地开始寻找那些既了解西南地区又靠得住的人。

1949年8月，贵州籍中共干部方士新正在向东北城市长春前进。中共中央命令驻扎在东北的华南籍与西南籍中共干部到长春集中，准备回去接管他们的家乡。与方士新一起参加贵州干部队的一些人是在1934年底、1935年初红军长征穿越贵州时参加红军的。而其他一些人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到达延安的，还有些是贵州的地下党成员。[8] 贵州干部队被派遣到南京向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四川籍，建国初期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领导的第二野战军（以下简称“二野”）报到。

在1949年9月20日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告诉方士新和他的同志们，二野将要解放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在内的西南地区。邓小平说，西南的未来是光明的，但提醒干部们要注意他们将要遇到的封建势力。邓小平还颇具预见性地说到，部队在西南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如何找到足够的粮食——“第一关是吃饭关”。[9] 二野还命令刚建立的西南服务团的大批积极分子加入到贵州干部队伍中去。西南服务团主要由一万多名上海和浙江地区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组成，他们跟随解放军一起行动并帮助进行宣传工作与征税。

在接到邓小平命令一星期后，这一组大约一千四百名干部和学生启程赶赴湖南，向那里的杨勇和苏振华司令员报到。[10] 这两位将领已经在湖南建立了一个贵州省影子政府，杨勇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和贵州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为省委书记，徐运北为副书记。[11] 这些刚被任命的贵州领导人计划在接管农村地区之前先占领像贵阳、遵义这样的大城市。从11月1日开始，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与尾随其后的贵州干部队和西南服务团的成员们从湖南进入了贵州。他们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前锋部队与

地下工作者劝降了许多国民党官员和帮会头目。11 月 15 日，解放军占领了贵州省会贵阳。

鉴于沿贵州主要交通动脉的行动进展迅速，贵州省的新领导人实施了一项合作政策。该政策得到了邓小平和毛泽东的直接批准。但是邓小平、毛泽东、杨勇和苏振华并未料想到他们的宽大仁慈会在几个月后演变成灾难。1949 年 11 月 12 日，邓小平给杨勇、苏振华、徐运北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在接管过程中接收国民党人。所有省、地区和县政府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职位都为非共产党人员保留。邓写道：这一策略“对于各种困难问题的解决，一定比较容易些，至少阻力要少些”。邓要求贵州领导人不要树敌过多，在处理武装群体特别是少数民族武装时，“要防止过急的毛病。”[12] 毛泽东十分赞成这种强调慢慢来的、海纳百川的政策。11 月 19 日他将邓小平的电报转发给了全国各地的中共领导人。[13]

就贵州的现实情况而言，毛泽东和邓小平除了宽大并无其他选择。人民解放军只接管了贵阳、安顺、遵义以及连接贵州与四川、湖南公路沿途的城镇。这一多山省份的其他地区仍然未被占领，而许多解放军部队都于 1949 年底离开贵州进入四川和云南。[14] 生活在湘西—贵阳公路沿线而不愿意放弃权力、服从共产党的人，例如地方豪强杨凤池和魏德茂，都只是在表面上投降解放军并被授予官职。在 1935–1949 年间一直担任贵州省岑巩县国民党政府保安队队长的杨凤池，于 1949 年 11 月人民解放军进入时立即投诚。他在该县两个新成立的机构中获得了职务：支前委员会副主任和剿匪指挥部副指挥长。[15] 魏德茂是一个真正的匪首，他在老家镇远县对解放军曲意逢迎，因此在当地区政府获得了一个职位。[16] 杨和魏都在等待机会反抗占领此地的中共军队。

中共占领者不分青红皂白给予各种职位的政策，在几个月后被证明是适得其反。但比起他们所给予的来说，他们所拿走的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过度的粮食征收最终将许多人推向了像杨凤池和魏德茂这样的反叛领袖那边。正如邓小平所预见的那样，1949 年末、1950 年初中共士兵、干部和学生的首要活动就是找饭吃。西南服务团成员任希文记得 1951 年 1 月重庆的一名中共财政官员传达了这样的讯息：“进入新区，要争取时

间，解决好征粮征税。”三个星期之后，任希文到达了贵州西南部。在那里，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宋任穷告诉一批准备进入云南的干部，“粮食一定要拿到手。”[17]

早在 1949 年 12 月 27 日，宋任穷就已经向他的部下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抵达云南后立刻对 1949 年收获的粮食进行征收。[18] 由于国民党已经在 1949 年秋征过这次粮，这一政策因而立刻在整个西南地区引起公愤。根据当时住在成都附近的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回忆，1950 年 2 月与 3 月成都地区的征粮率“比国民党几个月前对同次秋收的征粮率高出四分之一强”。[19] 而根据 1950 年 2 月邓小平所写的一份报告，施坚雅的数字实际上是十分保守的。邓小平在给刘少奇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新政府在四川已经征收到一百万多吨粮食，是国民党征收粮食总量的一倍多。邓承认干部们忽视了负担过重的四川“小地主”的恳求，“对向国民党缴纳的负担不予扣除”。即便如此，人们对双重征粮的普遍抵抗使得中共的征粮目标最多也只完成了四成。[20]

施坚雅认为，中共对富裕的成都平原进行狂热的征粮是为了向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提供粮食。但是资料证明，即使是相对缺粮的云贵山区也面临着沉重的征粮负担，要知道在这里高昂的运输费用使得种植鸦片远比种植粮食获利丰厚。[21] 很明显，整个西南地区的中共部队——不仅仅是那些进入西藏的部队，所需的粮食要大于西南地区实际能够提供的数量。这一问题也不仅限于西南。正如高峥在第 8 章所揭示的那样，由于未能在新疆获得充足的粮食，人民解放军部队不得不从事军垦建设。

西南地区的额外粮食征收负担已经将老百姓逼至绝境。在贵州思南县，孙秀和的两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中共的征粮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五倍。后来孙秀和作为一名朝鲜战争的战俘向美国陆军审讯官抱怨说，中共政权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人口情况，这使得许多家庭陷入穷困。孙说，在整个思南县，1950 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 60% 是马铃薯，30% 是玉米，10% 是“草、叶、根等”。孙秀和说，在更穷的人家，饮食构成的 70% 是马铃薯，30% 是各种野菜。因为他家

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下去，孙在1950年10月参加了解放军。1951年孙被派往朝鲜战场，他很快就开了小差并向美国军队投了降。[22]

我们已经看到贵州的中共占领者在若干方面估计错误。首先，中共士兵和干部很快穿过该省，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国民党投降部队。在少数人民解放军仍然占据优势的地区，旧的地方豪强也被允许渗透到新政府中。而沉重的税收效果更糟。中共狂热的粮食征收摧毁了穷苦农民和他们所谓的解放者之间的第一次互动。反抗在枪口下征收重税是富有的地方豪强和穷苦农民的共同意愿。这一同盟的存在，加上许多原来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心存异志，都在1950年春为贵州的新政权制造了麻烦。

二、反抗占领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开进了一个在过去十五年中发生了巨变的省份。抗日战争给贵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路和交通建设。但正如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所说，1949年之前贵州省并未真正地被整合进中国。在整个1940年代，当地人对外来人十分猜忌。当地帮会组织了各种反抗来抵制国民党的征兵征税。[23]1942年贵州东部爆发了一场反对国民党的暴力起义——黔东事变，该起义提出了三个简单扼要的要求："不当兵、不纳粮、要种鸦片。"[24]当地农民很讨厌外来部队的压榨，而从国民党统治中获得好处的那些人则特别感到了共产党的威胁。

1949年1月，国民政府贵州主席谷正伦、保安副司令韩文焕飞赴南京，接受了将贵州当作西南地区反共抵抗最后堡垒的命令。谷和韩返回贵州后除了加强反共宣传之外，还在贵阳建立了一个"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在那里他们武装并训练了一千六百多名贵州居民，随后将这些受训者派出去联系其他国民党的同情者。到8月末，人民解放军将很快攻进贵州省这一局势变得十分明朗，谷与韩在准备逃离之前向国民党特工人员散发了无线电台，并打开贵阳监狱释放了八百多名的"惯匪小偷"。[25]

这一网络在1949年末隐蔽起来，并利用了新政权的宽宏大量。不过司令员杨勇回忆说，人民解放军部队离开贵州前往四川和云南这一事

实怂恿了中共的敌对者。1950 年 3 月，1949 年末已投降的国民党部队突然间发动叛乱。几乎同时，各种农村武装团体“一个接一个”地起而反对新政权，[26] 据估计有 13 万人、超过 460 个武装团体开始反抗中共。贵州高级军事官员潘焱（贵州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写道：叛乱者“抢劫、破坏、杀人、暴动、劫行商、打军车、残害我人民政府工作人员”。[27] 到 1950 年中期，“土匪”已占据了贵州 79 个县中的 31 个。根据中共新政权自己的数字，四万多名政府人员与“群众”被杀，其中包括了几个新派来的县级领导。[28] 征粮队受打击最大，甚至是贵州省领导前往重庆与其上级会面时也不得不防备各种埋伏。[29] 在一份秘密报告中，贵州省领导人说明了驻地解放军对局势是如此悲观，以至于一些士兵在 6 月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人民解放军部队希望朝鲜战争能让他们找到借口离开贵州。[30] 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什么蜜月，而是一场内战。

反抗中共对西南地区的占领催生出了一个由各种组织构成的复杂联合，其中包括了地方豪强、国民党部队、农民和少数民族。许多个人经历都说明，尽管内战仍在继续，像“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这样的标签并不必然地就是人们意识中最重要的问题。生存、恐惧和家庭压倒了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

（一）地方豪强

毫不奇怪地，旧地方官员、地主、帮会领导人都害怕革命政权。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都在新政府中获得了职位。帮会首领们也鼓励其成员加入由中共组织的地方民兵。

四川西部的干部抱怨说民兵“不纯”，他们注意到某个区大约 40% 的民兵都是袍哥会成员。[31] 当外来的人民解放军宣布要对社会最富有的一群人征收重税时，各种阴谋诡计演变成了公开反抗。国民党保安队队长杨凤池在接受了岑巩县政府的几个职位后就采取了行动。1950 年 3 月 10 日，杨离开了县政府所在地，跟他的同事们说他准备去农村“说服土匪头子投诚”。事实却恰恰相反，他劝说了一个自卫队转而反抗新的中共

地方政府。造反者立刻杀死了9名干部，其中包括区党委书记。杨随后与邻县玉屏和江口的前国民党县官员一起组织了“湘黔边区反共救国军103军”。3月末、4月初，杨凤池率领三千名武装分子两次围攻岑巩县政府，但是未能击败驻守此处的解放军士兵。这次失败之后，杨和他的追随者仍然在农村地区活动，并继续组织反抗。他的部队夺取了一千吨粮食，并杀死了二十多名干部与农会骨干。[32]

在临近的镇远县，匪首魏德茂也在新地方政府中获得了一个职位，但是他继续指挥着他的武装追随者。1950年初魏德茂公开宣布对中共作战。他宣布向这一地区一支国民党抵抗部队效忠，并对中共政府机构进行了围攻。魏德茂在6月杀死三名解放军士兵后，举行了一次庆功宴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并发誓“三个月把共产党赶出镇远”。[33]

地方豪强是为了维持现状而战斗，但是他们也认识到敌对双方的争论术语已经发生了变化。两次征收1949年收获的粮食已经足以令许多农民反对共产党，但魏德茂却不得不应付有关中共即将进行减租和土地改革的诱人流言。一名打击魏德茂匪帮的人民解放军士兵记述说，土匪曾尝试自己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和群众纪律运动。[34]在诱以物质利益和强调纪律方面，魏其实是在仿效共产党。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宣称自己的办法要比共产党好的人。杨勇回忆说，贵州的各种反抗组织贴出了“抗粮”、“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这样的标语。[35]邓小平在1950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承认，这些标语再加上一个“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的口号，已经说服了许多“穷人”加入到反抗中去。[36]地方豪强将自己妆扮成贵州的真正保护者。

1949年末之前与贵州国民党政府有着各种联系的人，到了1950年变成了反抗中共统治的典型代表。但如果几个月前才放下武器的全部国民党军队没有再拿起他们的枪，1950年初的造反就远没有那么严重。

（二）国民党军队的反抗

胡正明是美国情报官员在朝鲜发现的一个宝贝——他被至少审讯了四次。[37]胡是一个非常现成的情报来源。他的审讯官满意地称他为“激

烈的反共主义者”并且“十分聪明”。胡出生在四川，上过两年小学，并在15岁的时候应征加入了国民党的一支青年部队。他在随后的九年中经过努力奋斗而不断获得升迁，并于抗战期间在江西完成了一项中美联合训练项目。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四川并负责管理四川省毗邻贵州和云南的古蔺县地方保安队。当人民解放军进军整个西南时，他已经作好了战斗的准备。

西南地区许多国民党军队在1949年末全体投降，而其他一些部队则完全被中共忽略。由田栋云将军率领的一支八千人国民党部队毫发无损并退入到川滇黔交界地区。胡正明说，田和其台湾上司保持无线电联系，并在边界地区协助游击队进行反共抵抗。胡与田建立了联系并在古蔺地区率领一千五百名士兵与共产党作战。胡的部队在1950年末曾控制了整个地区，只有县政府所在地仍为人民解放军控制。胡声称他的部队打死打伤了解放军两千人。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骚扰新政府，破坏交通线和仓库，伏击解放军部队，阻止中共征税。

而征粮问题又一次成为了反抗的原因。胡领导的游击队中有许多人都是前国民党士兵、地方保安队成员或地方豪强。但是人民解放军开始征粮后，胡正明说许多“愤怒的农民”也参加进来。胡告诉审讯官，新政权在古蔺全县征收的地税率是以前税率的七倍多。在整个西南，国民党残部通过集中攻击征粮者和粮库而加强了他们和农民的联盟。1950年4月，一个在贵州与广西之间活动的游击队制服了一支约五十人的看守新征粮食的中共部队。这些游击队主要由国民党部队组成，他们迅速抢夺了大米并立刻分给了当地的农民。[38]

（三）拿枪的农民

考虑到新政权从农民那里强力征收粮食、而游击队又将粮食还给农民的背景，我们就不会奇怪像李华国这样的能言善辩、并会拔手雷撞针的当地农民所做出的选择。在中国西南地区，农民们纷纷加入了由国民党部队领导的反抗组织。在贵州以南的广西省，18岁的李玉1951年1月之前一直在家种地，之后为了避免被人民解放军征召入伍而逃入深山。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支由国民党军官和士兵组成的部队。在这支部队的425名武装分子中，李玉估计大约40%是前国民党士兵，剩下的都是平民同情者。[39]李玉的反抗只持续了一个月。1951年3月，他的部队与解放军遭遇，但发现自己人数太少。在战斗中李玉和其他七十人被俘，并立刻被补充到这支与他们作战的解放军部队中。

其他的农民组织了各种小型的地方反抗组织，与国民党军队没有直接联系。唐汉林是一个会做剃刀的四川农民，1951年被解放军俘虏之前没有怎么离开过他的居住地。在南朝鲜，他告诉美国审讯官，除了去过邻近的几个镇子，1951年之前他从未离开过家乡。审讯官吴先生写道："因此唐缺乏一般知识，看起来是那种乡下佬。他讲一种很奇怪的方言，既不会写也不会读。"[40]但是唐认为加入一支小游击队并袭击驻扎在他村子里的解放军是有意义的。他说，1949年末时村子中的许多穷人都认可新的政府。但之后不久的重税、禁止鸦片贸易、将货币从银元兑换成人民币这些政策，都使当地人改变了看法。这些问题加上解放军收缴私人枪械的措施，引发了整个西南地区的反抗。[41]李治邦是一名地方精英份子并是唐汉林的一个熟人，他鼓动当地人就他们的不满采取行动。对于李来说，这一造反行动有其个人原因。李治邦的儿子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军官，在内战中被打死。[42]李和唐一起策划了一次袭击。1950年3月，他们组建了一支六十人的部队，从当地人那里搜集了枪支并围攻当地解放军整整一天，直到增援的解放军赶到为止。唐声称造反者在撤离前杀死了十名解放军士兵，但是之后不久李治邦和唐汉林的叔叔就被抓住并被枪毙。

（四）少数民族

当中共的占领威胁到人们的地位和生存时，地方豪强和贫穷农民联合了起来，组成了一个反对新政权的跨阶级联盟。一些当地人与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力量结合起来，另一些人则组织了自己的武装。1949年末之后一个类似的现象在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群体里也出现了。由于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共产党统治的威胁，一些少数民族领袖鼓励自己部落的

人们与国民党游击队进行合作来反抗共产党的占领。这种联盟恰恰是邓小平希望能够防止的。

长征期间邓小平和刘伯承曾经经过贵州和川西的少数民族地区。长征的传说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那就是刘伯承曾经喝过一碗“血酒”并与一位彝族首领结成了兄弟，这位彝族首领答应让红军安全通过这一地区。但是长征的红军仍然遭到少数民族的袭击并且代价惨重。刘伯承和邓小平知道，少数民族首领们的合作对于顺利接管西南是非常重要的。官方政策要求十分谨慎地对待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除了要求在与少数民族武装团体打交道时要有耐心之外，邓小平还痛斥了大汉族主义，并命令干部们只有在少数民族自己愿意改变时才进行变革。在 1950 年 7 月的一次讲话中，邓谈到在少数民族地区必须避免鲁莽行动。他说：“如果我们患急性病，像在汉族区域一样，总想很快地拿到粮食，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使工作见效，那就非出乱子不可。”[43]

这种谨慎的方式防止了少数民族爆发大规模的造反，但并未消除全部反抗。杨勇回忆说，贵州的反抗者“说服了少数民族一些上层人士来反对我们”。[44] 胡正明证实了杨勇的话。胡在南朝鲜告诉审讯官，有大约二十名彝族首领害怕中共进行干涉，决定与国民党将军田栋云合作。每个彝族首领都率领数百名战士。彝族首领还向山地边区的反抗者提供粮食。[45]

中国西南仍在持续的内战使得少数民族群体、地方豪强、农民、国民党部队都与解放军作对。解放军最初的战略是军事上快速推进、政治上宽宏大量、经济上大规模征收粮食，但事实上这些都是引发反抗的原因。邓小平对此并不满意。在 1950 年 6 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道：“这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从革命战争来说，我们是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敌人还很多。就目前说，土匪为患还很严重，封建势力原封未动，征粮收税任务的完成都还差得很远。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困难还很多，有哪一点值得骄傲呢？”[46] 邓的讲话预见了整个过程将会出现转折，这一转折将使得新政权最终粉碎反抗。1950 年 10 月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将会是解决西南战斗的一个特别方便的安全阀。将国内的反抗者送往朝鲜

来抵抗美国是新政权让其敌对者中立化的一个办法。而在中国国内，对抵抗者采取恐怖措施是另一个办法。

三、镇压西南的反抗

军事武力、放松税收政策与恐怖措施的结合使用，使得中共新政权于 1950、1951 年在西南地区连连得胜。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战略将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联系起来，并与当时国内敌人与国外威胁的状况绞合在一起。

1950 年初中共干部和士兵从贵州大约三十个县撤走，标志着中共高层认识到共产党的占领力量过于分散。那些从被放弃了的贵州各县撤出的人民解放军士兵被编入从四川和云南派来的支援部队中，并展开了一个“铁壁合围”的战役来打击反抗者。人民解放军先集中兵力、封锁游击地区，然后再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47] 根据人民解放军自己对贵州各个战斗的统计，到 1950 年底，在四千多次的战斗中有 447 股、125,515 名土匪被消灭。[48]

伪装的侦察部队承担了首先进入各个地区寻找反抗组织的艰巨任务。李树林是安徽人，在 1950 年战斗期间先后驻扎在贵州和四川。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效力三年，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加入解放军。李所在的团派出侦察部队，伪装成平民进入反抗游击队活动的区域搜集情报。侦察人员装作小盐贩或农具小贩，秘密地与由共产党掌握的农会领导人进行联系，了解当地反抗组织的情况。李描述了在贵州四川边界地区发生的一次战斗。他所在的团包围了一个地区以打击一百名游击人员。反抗者发现自己被逼到一处悬崖无路可逃。李估计从 1950 年 6 月到 12 月期间，他所在的团以这种方式抓获了大约一千名反共分子。12 月之后，李和他的同志们开往重庆，并登上火车前往汉口。从那里他们坐火车到达河北，又到达辽东，最后进入朝鲜，并在 1951 年 3 月往南行军。这是西南地区许多解放军士兵与前反抗者前往朝鲜的一条常见的路线。很明显，士兵们只被告知他们被转运至河北的“机动位置”。机动位置“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49] 当他们离开西南时，像李树林这样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将很快

在外国进行战斗。进入朝鲜几个月后，李得了痢疾，在一次战斗后没能跟上部队一起撤退。他藏在一个村子里，后来被南韩部队俘虏。[50]

有时候在中国西南部进行伪装侦察比在朝鲜得痢疾还要危险。薛雨超是一个浙江农民，也是前国民党士兵，在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并加入解放军后，他在川黔边区与反共游击队作战。薛所在的团派出了好几支十二人小分队，伪装成樵夫或者小贩来搜集反抗者的情报。1950 年 6 月，三名侦察人员在一次侦察活动中被识破伪装，被当地反共游击队打死。但是薛所在的团最终成功镇压了这一地区的反抗。在加入解放军 10 个月之后的 1950 年 11 月，薛乘船转调汉口，之后乘坐火车向北进发，并在 1951 年 3 月进入朝鲜。他的美国陆军审讯官写道，“因为不愿意战斗”，薛雨超“开了小差”，并被美国部队俘虏。[51]

在被送往朝鲜之前，人民解放军士兵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征收西南地区的剩余粮食。但由于强调高额征粮而引发了的灾难性后果，中共新政权后来被迫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措施。根据施坚雅的观察，到 1950 年中期，中共干部在征粮问题上已经有所妥协，包括地主在内的每个人都被减少了征粮份额。贫困地区的征粮被推迟至春季收获之后，而且人们可以用小麦来代替大米缴税。施坚雅认为，这对即将到来的减租和土地改革运动宣传工作十分有利。在一篇写于 1951 年初的文章里，施坚雅注意到“普通农民现在对共产党的感觉要比刚解放时好得多”。[52]

停止过度征粮的决定是十分明智的。如果新政权没有减少征粮份额，当地农民可能将会继续支持反抗力量。国民党官员胡正明告诉美国审讯官，到 1950 年中期，中共软化了的粮食征收政策已经削弱了他组织的抵抗力量。胡和他的游击队也需要吃饭，所以他们有时不得不没收农民的粮食。而人民解放军则通过延后征粮和向一些地区提供救济粮食的举措，开始说服当地农民脱离胡而接近解放军。老百姓对胡的支持越来越少，胡领导的抵抗组织也变得更容易被包围。[53]

灵活的粮食征收政策并未得到统一执行。在某些情况下，中共士兵和干部把夺取粮食当作一个武器来对付那些反抗特别激烈的地方。1950 年在四川服役的两名人民解放军士兵提到在一些游击反抗地区，他们会将剩余粮食全部征走。[54] 把反抗者饿出来是包围战略的内在的一部分。这一战略令反抗组织持续战斗的希望十分渺茫。

士兵朱代权说，未能交出粮食被认定为是与土匪勾结的证据。1950年下半年朱所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贵州西北地区负责征收粮食。朱过去曾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队服过役，1949年末被俘后被编入了解放军。在贵州，朱作为征粮队的一员每天都到各个村庄里去。他所在的征粮队有每个家庭的名册，对富人征收的数量要比穷人多十倍。但是无论贫富，当农民不能或不愿交粮时他就会严厉地对待他们。如果武装征粮队员几次登门后一个家庭还交不出任何粮食，那么这家的户主就会被认定是土匪并被抓捕。朱估计，他在贵州的这段时间内，他所在的团大约共抓捕了七百名未能交粮的农民。1951年2月，朱代权被送往朝鲜，他在中途离开了队伍，在朝鲜的山里躲藏了一个月后向美国军队投了降。[55]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个月之前朱目睹了贵州农民一见到他的征粮队就逃往山里的情景，不久朱自己就逃到了朝鲜的山里。朱代权提到的大规模抓捕，是新政权通过威吓迫使反抗者服从这一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恐怖措施成为中共在西南地区一个残酷而有效的武器，这在1950年10月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朱莉认为这一战略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批准，并说明像彭真这样的中共领导人在1950年末开始、1951年春夏升级的镇反运动中就明确提倡了“震动和恐慌”政策。朱莉注意到，对所谓国内敌人的镇压与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十分合拍，而且会不时刺激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56] 处理国内反抗者与打朝鲜战争之间的联系在西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1950年11月，毛泽东热情地支持了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两个提议：首先，将西南地区的士兵送到朝鲜参加战斗；其次，处决匪首。毛泽东称赞了邓小平将西南地区六个军送往朝鲜的建议，并将邓小平的报告转给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和西北局。[57] 毛泽东也很赞赏邓在处理西南地区反抗者问题上所持的坚定态度。西南局11月10日的一份报告对宽大处理反革命进行了批评，并抱怨因为“没有足够的牢房和食物”，他们只好“随便释放犯人”。邓提出了一个更加强硬的手段：“对于当杀者，要坚决处死，不得姑息犹豫。”他还建议处死恶霸当中的“罪大恶极者”，并处决一些“烟贩和会门头子”。他甚至给出了特定的数字。邓写到在四川西部关押的4,210名罪犯中，“需处决者约一一二零名”，并命令每个

县都提出一个“不超过三、二十人为度”的名单，将这些人在即将到来的镇反运动中处死。[58] 毛泽东认为这一计划“很好”，并将邓的意见广为传播。[59]

各地方局领导人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一讯息。在与贵州接壤的湘西边界地区（但并不受邓小平的西南局管辖），被处死的人数达到了数千。毛泽东对此很满意，并要求枪毙更多的人。1951 年 1 月毛泽东在给各地方局党领导人的一封电报中写道：“在湘西廿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第四十七军——引者注）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以防有人还不明白他的意图，他下令说“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60]

接受了政府职务、随后又举而造反的贵州反共游击队领导人杨凤池和魏德茂，很可能是这种严厉处罚的对象。1950 年末，匪首魏德茂感觉到了镇远县与三穗县被包围起来的压力。他逃出了一个被包围的地区，但最终于 1950 年 12 月在一个边远山村被抓获。他进入这个山村是为了向当地人讨饭。几个月后魏在三穗县被处死。[61] 杨凤池支撑的时间稍长一些。1951 年 2 月之前杨都成功躲过了追捕者，直到一天他被追赶到一个洞穴里，被岑巩县民兵放火窒息而死。他的尸体被运往县政府并在当地主桥的亭子里示众三天，“以平民愤”。[62]

公开行刑和尸体示众在 1951 年震动了整个西南地区。领导反抗组织的国民党军官们是最有可能被处死的。陈凌云是一名来自广东的国民党士兵，在贵州作为一名游击战士与解放军作战。1950 年 12 月，人民解放军在松桃县抓住了陈和其他大约三百名反抗者。在南朝鲜，陈告诉审讯官他们这群人中有六十个国民党军官在一个山脚下被处死，大约一百名小于 14 岁的反抗者被释放，而陈和其他人则被送往成都接受政治训练，并最终被编入人民解放军。1951 年 3 月陈所在部队进入朝鲜。5 月，在到达前线后几天，陈和两个同伴逃离了他的部队并被美军俘虏。[63]

一个曾和四川反抗武装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士兵证实说，前国民党军队营级以上军官在被抓获后都会被处死。[64] 反抗武装的领导人很清楚这一点，并在被抓捕时想方设法隐瞒他们的军衔。前文提到，放宽了的粮食征收政策和军事包围削弱了国民党军官胡正明在川黔边区领导的反抗

力量，他被捕后就是这样做的。1951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抓获了胡正明。在南朝鲜胡告诉审讯官，他假装只是反抗组织的一个小跟班的，因而逃脱了死刑。他这一招的确奏效。胡被编入了第二野战军的一个炊事班，在解放军短暂服役期间他的军衔从未被提升到士兵以上。1952 年 5 月胡离开了他在朝鲜的部队，向美国军队投降。[65]

关于大规模枪毙反抗者的谣言也到处流传。战俘刘泽高的审讯官记录到，刘声称大约在 1951 年 7 月，他听说有 40,600 名前国民党人在贵阳被处死。还有某人告诉刘，在重庆和成都有大约四十万人被处死。刘的审讯官也许错译或者夸大了刘的陈述，但刘的数字与剿匪和镇反运动中的死亡数字相当一致。西方学者根据中国领导人的声明或是中国媒体关于公开处决的报道，估计全国死亡数字在七十万到一千四百万之间。大多数学者认为大约有二百万到三百万人死亡。[66]

比听说的大规模处决更令人恐慌的是亲眼看到家庭成员被逮捕并处死。沈建勋这位在 1948 年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加入解放军的前国民党士兵，回忆了解放军是如何让镇反牵连到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沈所在部队在 1950 年末与贵州的造反者作战。解放军士兵搜查了他们怀疑是反共游击分子的家庭，并对这些人的亲戚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反抗者未能在十天之内投降，一名家庭成员将会被扣押、审讯并接受政治教育。如果这一方式在十天后还未能生效，那么这个亲属将被关押并被当作反抗者对待。沈告诉美国陆军的审讯官，对家庭成员的威胁甚至比军事包围还要管用。1951 年初，沈从西南地区调到朝鲜，后被南韩军队俘虏。[67]

由于村民们亲身体会到了死亡的威胁，因此他们很清楚反抗的代价。1950 年末廖泽元的父亲、哥哥、祖父和叔父被处死时，廖只有 19 岁。廖来自湖南西部的名门望族，家里有四十亩土地。他在亲属被处死后逃跑，他思忖用假名加入人民解放军或许能获得较大的生存机会。在经过基本训练之后，廖被派往朝鲜，在那里他参与建设了一个飞机场。他的部队随后到前线参加战斗，并遭到了敌方的猛烈炮击。在被包围两日后，廖再也无法忍受。他脱离队伍并向美国一个坦克纵队投了降。[68] 在湘西，廖刚刚从一场摧毁了他家族的内战中躲过了死亡。尽管躲避了家乡的恐

怖，廖并未躲过恐怖本身。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灾难在朝鲜的恐怖战斗中延续了下去。

四、内战、朝鲜战争

新政权利用了朝鲜战争来稳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反对美帝的宣传声称国内反抗者与国际威胁之间有直接联系。在西南地区，剿匪与镇反运动是官方发动的后方支持抗美援朝运动的核心部分。1950 年 12 月，贵阳举行了一次庆祝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贵州分会成立的会议，在会议上市委领导伍嘉谟宣布了三个专门任务。[69] 前两个是扩大爱国宣传、鼓励青年参加军事干校，这与全国政策一样。但是第三个任务是组织慰问队向打击当地反抗者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表示慰问，这却是只有西南地区才有的。

《新黔日报》一篇评论文章解释了抗美与支援贵州镇匪解放军部队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知道，我省一年多来的剿匪胜利，是与国家的和平事业及反对美国侵略分不开的，它大大巩固了我们的后方，割除了美国侵略者的爪牙，推翻了罪恶的反动统治，扩大与充实了国力。今后，在整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剿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际行动。"[70] 通过将土匪与美国侵略者在语言上联系起来，贵州省官员试图缩小贵州老百姓与朝鲜战争的距离感。但正如我们已经从李华国、胡正明和其他许多人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样，国内反抗与朝鲜战争的联系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那么简单。

贵州出版的各种回忆录证明，朝鲜战争使得中共新政权能够将国内的敌对势力中立化。1951 年 3 月，驻扎在贵州镇远县、与魏德茂领导的武装力量作战的解放军部队，在一所小学成立了一个"土匪训练班"。王珏回忆说，他所在的解放军部队命令周围农村的农民协会将所有参加过大范围反抗活动的人集合起来——包括"武装拦截车辆、对抗人民政府、攻打解放军驻地，以及横行乡里，危害百姓"。所有的参加者都带上食物和私人物品在两天内到学校报到。[71] 由于公开处决和威胁所产生的影响，有 308 名年龄在 17 岁到 54 岁之间的"土匪"出现在训练班上。三个星

期的政治课程、讨论、批评、唱歌、篮球等活动之后，这一训练结束。一些参加者回到家里，25 人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并前往朝鲜作战，还有 9 人被处死。[72]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湘西山区，那里有一万多名“经过改造和教育的土匪”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并赴朝鲜作战。[73] 这些战士中有些人最后成为美军战俘，但是至少有两人带着战斗英雄的荣誉返回了中国，其中一人是麻阳县的陈启尧。表面上以躲避被国民党军队征召入伍为理由，陈启尧在 1946 年加入了当地的一个武装组织。1949 年末陈投降解放军后参加了一个训练班，并于 1951 年 2 月进入朝鲜。

在成为一名战斗英雄之前，陈在朝鲜曾数次违犯志愿军的纪律。首先，他因与另一支部队的一个中国士兵斗殴而被关了禁闭。这一冲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陈在午饭时间发现撤退下来的部队吃的是白米饭，而他的部队吃的却是高粱和玉米这样的粗粮。当陈指出这一不平等时，一个吃米饭的士兵讥讽陈所在的部队是由“土匪改编过来的杂牌军”，只能吃杂粮。[74] 就其他士兵嘲笑陈的部队是改造的土匪这一点，说明即使是在朝鲜，土匪的称呼也没有消失。

美国陆军审讯官关于中国战俘的报告也说明，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前反抗组织被改编后并未被打散，反而完整地被送到朝鲜。梁利元与陈启尧一样，以前是来自湖南西部的反抗者，后来成为四十七军的一员。直到 1950 年中期梁被抓获为止，他都是袭击解放军的游击队成员。他告诉他的审讯官，他在朝鲜的连队士气很低，因为大约 80% 的士兵以前都是反共游击队员。梁说，许多人的家人都在 1950 年被杀，而他们的悲惨境遇在朝鲜仍然继续。梁所在连队有 11 名士兵在空袭或炮火中丧生，而 1951 年中期有 19 人逃跑。梁是这些逃兵中的一员。[75] 但陈启尧不是逃兵。

在面对吃米饭士兵的讥讽时起而捍卫吃杂粮的同志们的荣誉之后，陈启尧的问题仍在继续。陈在一次篮球比赛中打了另一名士兵，后来他又在摆弄枪的时候不慎走火令一位中国士兵严重受伤。但在 1951 年 9 月美军发起的一次反攻中，陈在头部被榴弹炮击伤的情况下仍不停向敌人掷出手雷，帮助部队守住了阵地。至此他所犯过的所有错误都被原谅了。

陈的首长要求他的上级正式承认他的战绩。[76]1953 年陈返回中国，并在回家前在北京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元帅的接见。当贺龙注意到陈发抖的左手使得他进食困难后，他送给陈一副银筷子以示关怀。但是这位受伤的老兵在返回湖南后却生活困难。他的妻子在他离开时改了嫁，他本人则在 1953 年底被送进了长沙的一家精神病院。

中国国内的内战和恐怖，再加上朝鲜战场上的战斗和受伤，已经超过了陈可以承受的范围。学者们展示了其他朝鲜战争老兵，特别是那些选择返回大陆的前战俘，许多都有着同样的困苦经历。[77] 对于那些快速经历了内战和国际战争的人来说，身份的快速转换以及伴随着各种标签而来的现实威胁实在太过沉重。

五、战争与1950年代的初期

受伤，恐惧，为生存而斗争，这些影响到了 1950 年代初中国西南地区的各种人群。在一些情况下，即使是前“土匪”和土匪镇压者发现自己在朝鲜肩并肩作战，斗争仍在继续。大多分析性框架与描述都未能充分展现这些极富人情味的故事，包括善谈的贵州农民李华国，受伤的英雄陈启尧，或者是其他在战争中被俘虏的、被从中国西南送往朝鲜的不可胜数的人。聚焦贵州，意味着我们不能将中国 1950 年初这一时期简化成为政权的顺利交接时期或蜜月期。西南地区的内战和朝鲜战争结合在一起，取消了一个田园牧歌般的蜜月期的可能性。

在我们理解贵州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对未预料到的后果的认识，极权主义概念及比较革命研究这些研究思路都是有用的，但都不能解释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极权主义模式对 1950 年代初镇压活动的强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国家发动的恐怖所引发的严重后果。[78] 但我们知道，1950 年和 1951 年中共对西南的控制还远远没有达到极权的程度。中共在西南的统治是单薄脆弱的，在征粮这一个案中甚至是毫无计划的。在这一方面，政治学家尼尔·迪亚芒特（Neil Diamant）提出的受制于其政策未预料后果的“笨拙”共产党政党国家这一概念，看起来要比极权模式更加确切。[79]

但是，尽管新政权在最初阶段表现得比较笨拙，但是它最终占领了西南地区并镇压了武装反抗。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新政权依靠了军队、地方民兵和公安机构。在研究1950年代初的中国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将恐怖看作是革命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他还注意到国民党人也不反对使用恐怖手段。[80] 事实上，在中国西南地区新政权并没有垄断恐怖。由于中共领导人致力于彻底改变全国各个角落剥削者的权力，贵州的精英们，特别是那些帮会成员和鸦片贩子，可以说极端依赖恐怖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通过刺杀中共干部和征粮队，地方豪强转变成造反头目。西南地区的武装反抗组织采取的行动原则与邓小平一样，邓要求“坚决”处死敌人，不要有“姑息犹豫”。一支在黔桂边区活动的反抗组织的一个通信员回忆说，1950年6月发生了一次战斗，他所在的一千人部队包围了150名被隔离了的解放军战士。反抗游击队俘虏了70名解放军，三天后将他们全部杀死。[81]

1950年初，如果不能摧毁仍然控制着贵州一部分地区的反抗者，中共就不能统治这个省，也不能推进它的社会重新分配计划。满怀着恐惧和对生存的忧虑，反抗组织奋起抵抗，但是他们也未能提供其他能自圆其说的替代选择。而当新政权通过威胁家属、尸体示众、将人们运往朝鲜的方法来回击反叛者时，它只是在西南地区获得了一个内容空泛的胜利。根据在西南所发生的事件来判断，正如朱莉所说的那样——恐惧的确是“内在于革命政权的根基之中”。[82] 即便是在中国西南地区最后一名反抗战士投降与朝鲜战场战斗止息之后，恐惧都不会简单地消失。恐怖和战争在中国西南地区留下的遗产将会在未来几年持续产生回响。

姚昱译

注释

1 所有关于李华国的信息来自 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342, November 1952; 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rvice (下引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5054, Box 336;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ecords of the Army Staff, 1903–92, Record Group 319;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Md. (下引 NACP)。

2 何长风等编：《贵州当代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2 页。

3 在两万一千名中国战俘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选择去台湾。见 Philip West with Li Zhihua, "Interior Stories of the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in Philip West and Ji-moon Suh, eds., *Remembering the "Forgotten War": The Korean War through Literature and Art* (Armonk, N.Y. : M.E. Sharpe, 2001), 152–186。

4 程铁军和马克 · 塞尔登 (Mark Selden) 将 1950 年代初称为 "人民共和国的蜜月期"。Tiejun Cheng and Mark Selden,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China Quarterly* 139 (September 1994): 646.

5 Joseph W. Esherick, "War and Revolution: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1940s,"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27.1 (November 2001): 26.

6 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7 Julia C. Strauss, "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 (January 2002): 80–105.

8 方士新：《忆进军大西南的贵州干部队》，《走向大西南》编委会：《走向大西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年，第 25 页。感谢高峥与我分享这一资料。

9 同上，第 26–27 页。

10 何长风前揭书，第 6 页。

11 方士新前揭文，第 29 页；何长风前揭书，第 3 页。

12 邓小平：《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42–144 页。

13 《中央转发贵州新区工作策略问题电报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 册，第 143–144 页。

14 徐运北：《回顾贵州解放初期的斗争》，《贵州文史资料选编》第 14 辑（1983），第 4 页；潘焱：《回忆贵州剿匪斗争》，见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土匪实录》，石家庄：群众出版社，1992 年，下卷，第 551 页。

15 贵州省岑巩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岑巩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884 页。

16 贵州省镇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镇远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579 页；葛仁敬《"猫科" 就擒记》，《近代中国土匪实录》，下卷，第 631–633 页。

17 任希文：《艰苦的战斗——回忆 1949 年至 1950 年公粮征收工作的历程》，《走向大西南》编委会前揭文，第 636 页。

18 同上，第 637 页。

19 G. William Skinner, "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the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 24.1 (March 1951): 64.

20 《邓小平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给刘少奇、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剿匪斗争·西南地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21 Dorothy J. Solinger,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1949–1954: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71.

2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797, October 24,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779-KG0902, File 461.01, Box 60;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Theater Intelligence Division; Records of the U.S. Army Military District of Washington, 1942–1991, Record Group 554, Entry 17A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 fo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NACP.

23 Solinger, 79.

24 周春元、何长凤、张祥光：《贵州近代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9页。

25 潘焱：《回忆贵州剿匪斗争》，前揭书，下卷，1992年，第550–551页；潘焱：《回顾贵州剿匪斗争》，《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2年，第11页。

26 杨勇：《回顾贵州解放》，《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2年，第4页。

27 潘焱，《回忆贵州剿匪斗争》，前揭书，1992年，第552页。

28 何长风前揭书，第20页。

29 《走向大西南》编委会前揭书，第2页；何长风前揭书，第20页。

30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召开各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会议的报告》，《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重庆：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1954，第1卷，第403页。感谢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与我分享这份报告。

31 《川西军区关于集训人民自卫武装骨干向西南军区的报告》，《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第1卷，第546页。

32 《岑巩县志》，第884–885页。

33 葛仁敬前揭文，下卷，第631–633页。

34 王珏：《黎明之初话镇远》，《镇远文史资料》，第四辑，1990年，第5页。

35 杨勇前揭文，第5页。

36 《剿匪斗争：西南地区》，第93页。

37 下列数字来自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293, September 19,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6;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38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Far East,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224, July 31,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5;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39 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193, June 30,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5;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19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40 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409, December 6,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7;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41 Solinger, 85.

42 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353, November 13,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6;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43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 164 页。

44 杨勇前揭文，第 5 页。

45 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293, September 19, 1952; RG 319; NACP.

46 邓小平：《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 159 页。

47 邓德礼：《建国初期贵州剿匪斗争中的铁壁合围》，《贵州社会科学》，1999 年第 6 期，第 104 页。

48 邓礼峰：《新中国军事活动纪事，1949–195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第 164 页。

49 刘朗：《流血到天明》，香港：亚洲出版社，1955 年，第 10 页。

50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695, September 4,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641–KG 0778, File 461.01, Box 59;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51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Far East,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922, January 5,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2;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52 Skinner, 66, 68.

53 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293, September 19, 1952 RG 319; NACP.

54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831, November 2,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779–KG 0902, File 461.01, Box 60;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与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Far East,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067, April 14,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3;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55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572, September 14,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480–KG 0640, File 461.01, Box 58;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56 Strauss, 83.

57 《关于西南局综合报告的复电和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661–662 页。

58 《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况和今后计划的报告》，《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第 1 卷，第 377–378 页。

59 《中央关于西南局镇压反革命活动报告的批语和复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663–664 页。

60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2 册，第 36–37 页。

61 《镇远县志》，第 579 页；葛仁敬前揭文，第 631–633 页。

62 《岑巩县志》，第 884–885 页。

63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554, n.d.;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480–KG 0640, File 461.01, Box 58;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64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831, November 2, 1951; RG 554, Entry 17A; NACP.

65 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293, September 19, 1952 RG 319; NACP.

66 朱莉提到在镇反运动中大约有最少七十万或八十万人、最高二百万人被杀；Strauss, 87。杜勉(Jurgen Domes)认为被杀人数超过三百万人，见 *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72*, trans. Rudiger Machetzki (New York: Praeger, 1973), 52。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估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三年有二百万人被处死。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72. 吴克 (Richard L. Walker) 令人吃惊地提出有一千四百万人死亡，见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219。

67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710, October 6,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641–KG 0778, File 461.01, Box 59;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68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201, August 2,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155–KG 0318, File 461.01, Box 56;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69 《新黔日报》，1950 年 12 月 20 日，第 1 版。

70 同上。在这一声明发布不久，慰问队就开始慰问解放军镇匪部队，并向他们赠

送香烟、丝织旗帜等礼物：《新黔日报》，1950年12月29日，第2版。

71 王珏前揭文，第6页。

72 同上，第7–8页。

73 田兴华：《走向光明：湘西匪首四十年改造纪实》，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

74 同上，第198页。

75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397, September 17,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T 1377–KT 1750, File 461.01, Box 65;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RG 554, Entry 17A; NACP.

76 官方报道声称陈所取得的成绩是：他“先后打垮敌人的三次进攻，一个人打了207杖手雷弹，炸伤了无数，炸死敌人67名”。见田兴华前揭书，第203页。

77 大鹰，《志愿军战俘纪事》，北京：昆仑出版社，1987年；Neil J. Diamant, "Between Martyrdom and Mischie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Predicament of CCP War Widows and Veterans, 1949–1966," in Diana Lary and Stephen MacKinnon, eds., *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UBC Press, 2001), 162–185.

78 吴克(Walker)的《共产主义下的中国》(*China under Communism*)是极权主义研究学派关于中国1950年代初研究的一个例子。

79 Neil J. Diamant, *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 Politics, Love, and Divers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1949–19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1, 47.

80 Meisner, 72–73.

81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Far East,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224, July 31, 1952; RG 319; NACP.

82 Strauss, 99.

第六章

西藏的“解放”
——发生于 1949–1951 年的一段历史

陈兼 (Chen Jian)

当 1949 年到来时，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知道，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已不再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他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创立“新中国”。这一任务具有多重涵义，包括如何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如何恢复并重建中国迭遭战争破坏的经济；如何像毛泽东长久以来所设想的那样，将革命引入更高层次的后革命阶段。从一个更为基本的层面来看，要建设“新”中国，就存在着如何界定“中国”——包括如何界定中国的疆界以及“中华民族”的构成——的问题。从实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又意味着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必须对中国本部和新疆、内蒙古及西藏等主要由各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之间的关系作出界定。

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自身革命的进程中曾不时使用“中华联邦”的概念来设想未来中国本部与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一概念，蒙古、西藏、回疆等“弱小民族”地区将在“完全自由”和“完全自愿”的基础之上，遵循“民族自决自治”的原则，来决定加入或脱离“中华联邦”。[1] 然而，当 1949 年到来时，“中华联邦”一词却在中共的官方话语中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

立包括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在内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宏大计划。这一计划的基础，则是曾经成为国民党时期国家建设支柱的“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概念。尽管中共一直宣布，它的革命将摧毁“旧中国”并创造“新中国”，而国民党政权则是中共着力要推翻的“旧中国”的统治力量，但在对新“中国”的定义中，中共却同国民党在基本思路上存在着很大的延续性。

在中共为创立统一的新中国所作的努力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为“解放”西藏而于 1949–1951 年所制定并付诸实施的各项计划。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便是以西藏必须成为新中国的一部分这一主张为前提的。这样做，不仅是新中国对于西藏拥有主权的宣示，更重要的是，这同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所发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声明是息息相关的——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一声明不仅在当时、更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为中国共产党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因而应被视为毛泽东所发表过的声明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本文所讲述的，是 1949–1951 年间西藏获得“解放”的故事。本文将首先对 1949 年前中共对于“民族自决”问题以及对西藏态度的演变作一番大略的历史考察；然后，我将对中共领导层如何作出解放西藏的决策并将之转变为相应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予以探讨；之后，我将对 1951 年 5 月北京与拉萨之间签订《十七点协议》的历史过程进行阐述。本文的结论，将就 1949–1950 年西藏“解放”的历史对于北京对西藏政策的长期影响，以及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以后新中国国家建设历史进程的深层影响，在更为一般性的意义上展开讨论。

在 1949 年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藏在中共的战略思考与政策制定中并没有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阶段，中共无论是在一般意义上处理民族问题或是特别针对西藏问题时，往往是依据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自决”理论的一种宽泛而模糊的理解行事。为了将中共民族政策与国内各种“反动力量”的相关政策区别开来，中共提出了“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

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由邦”的主张。[2] 1932 年，在针对四川与西康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声明中，中国共产党指称国民党的“五族共和”是用来掩饰其“民族压迫的政策”并“反对你们（译者注：少数民族）的独立”的；而中共则“承认一切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到承认这些（民族）脱离中国的自决权。”[3]

中共与藏区的第一次重要接触发生于 1935–1936 年的“长征”期间。在国民党部队的巨大压力下，红军被迫取道四川与西康藏区，与当地藏人之间发生了许多冲突，并导致了中共内部关于党的基本战略的一次严重分歧。（分歧的焦点，则在于红军应当北上中蒙边界，还是停留在南方，在川康一带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与张国焘的争论中提出，鉴于红军“同番民关系太坏”，同时，停留藏区会使得红军与中国其他地区隔绝开来，成为“瓮中之鳖”，红军应当尽快通过藏区。这些争论导致了张国焘对毛泽东“大汉族主义”倾向的批评。[4] 为了使红军顺利通过藏族聚居地区，中共曾经尝试与藏族上层建立暂时的“统一战线”，并特别向藏族上层作出保证，红军并不准备在藏区建立永久根据地。[5] 中共领导人还强调：“康藏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要彻底的脱离英国和中国而独立，实行民族自决，只有与英国与中国进行彻底的分离，才能使康藏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6] 在这一背景下，红四方面军于 1936 年 5 月在川康藏区扶植当地藏人建立了“波巴共和国”（“波巴”为藏语音译，意为“藏人”），宣布“所有藏青康的领土应当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7]

即便在红军到达陕北并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之后，中共仍然对中华联邦的概念持赞同立场。毛泽东在 1936 年 7 月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后”，西藏与外蒙古和新疆都“将形成附属于中华联邦的自由共和国”。[8]

然而，当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中华联邦”的概念在中共关于新中国的设计中却消失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开始宣扬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都属于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共的民族政策，则以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团结而不是“民族自决”为基础。1949 年初，毛泽东在与来访的苏共政治局成员米高扬（Anastas Mikoyan）会

面时，透露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些基本考虑。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几十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中汉族为主体，有蒙族、回族、藏族与维吾尔族这样的少数民族居住在边远地区。毛泽东表示，虽然“人们习惯地把汉族人称中国人”，但实际上，“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他进一步解释道，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但同时还要看到，“从历史上讲，汉族也多次被异族奴役过、统治过，虽然汉族是个大族。”毛泽东因而强调，中共的民族政策“必须是端正的，民族压迫必须取缔”，“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9]

毛泽东的声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中国”定义为多民族国家，将“中华民族”定义为包括“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他还强调中共的国家建设计划之所以具有历史正当性，恰恰在于它所要推行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革命将消灭包括民族压迫在内的一切压迫。“新中国”称谓中“新”这个形容词的使用，不仅使得“新中国”本身具有了合法性，也使得“中华民族”具有了宣告自己为多民族实体的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即将出任新政府总理的周恩来进一步阐释了中共对于民族问题的看法。他强调了新中国“将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的重要性。他还特别指出，尽管党继续“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他用清晰的语言表明，新中国将在民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而“不叫联邦”，不会成为联邦共和国。[10]

然而，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许多中共党员似乎并没有真正领会到党的领导层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例如，成都市委书记曹荻秋在为中共区级和解放军营级以上干部所作的一次讲话中便表示，中共遵循民族自决的原则，将继续“承认一个国家中不同民族决定自己政治命运并建立自己独立州”的权利。他进而提出，“在将来，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少数民族建立了独立国家，（如西藏、新疆和外蒙等）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华民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邦共和国。”[11] 诸如此类的言论无疑引起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警觉，他们因而决定，必须用明白无

误的语言阐明党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态度。1949 年 10 月，一份党内指示提出：

> 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12]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一指示极为重要。中共领导人从自己是中国各民族解放者的深刻信念出发，实际上改变了对于“民族自决”问题的态度。我们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做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中共领导层响亮地提出了摧毁旧中国的口号，然而，当他们即将成为中国统治者的时刻，却在如何界定“中国”、中国的疆界以及中华民族的构成等关键性问题上，十分乐意承袭旧中国所留下的遗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清朝所留下遗产）。中共领导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制定并实施“解放”西藏的各项计划的。

从 1949 年初起，毛泽东与党的领导人开始将接管西藏当作一个现实的战略与政治问题来考虑。在 1949 年初与米高扬的会面中，毛泽东将解放西藏与解放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相提并论，认为这是解放军为实现中国统一所必须完成的最后两大任务。毛泽东还提出，相形之下，解放台湾这个任务更为复杂，而西藏问题则“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根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共在解决西藏问题时将面临两项挑战：“（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13]

1949 年 6 月到 8 月间，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访问苏联，西藏再次成为刘少奇与苏联领导人之间会谈的议题。在一份向斯大林简报中共

政策与战略的报告中，刘少奇将西藏、台湾、海南与新疆列为仍然有待解放的地区，并指出，“西藏问题须用政治手段而不能用战争手段去解决。”[14]

1949 年 7 月 8 日，西藏地方政府以在国共内战中保持中立为理由，关闭了国民党政府驻拉萨代表处，并将所有汉族官员从西藏驱逐出去。这一“驱汉事件”促使中共加快了解放西藏的部署。[15] 当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得知这一事件后，立即决定应公开宣示中共对于西藏的政策。9 月 2 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指出，将汉族官员从西藏驱逐出去“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能得到解放。”新华社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16]

随着内战的进展，解放军不断迫近与西藏毗邻的地区，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开始将解放西藏纳入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并从政治与军事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1949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指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7] 当解放军在西北与西南几个省份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将“明年秋冬”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期限。毛泽东当时的考虑是，鉴于西北地区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会早于西南地区结束，又鉴于“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因此，应当主要由西北局承担起解决西藏问题的任务，并由西南局提供相关支援。[18]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西北局与一野领导立即采取行动为进军西藏做准备。但他们很快便发现，从西北方向进入西藏并非易事。12 月 30 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从西北方向进军西藏的三条可能路线，但采纳任何一条都将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从新疆南部入藏的路线，道路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都不能通行。从新疆北部入藏虽然相对容易一些，“唯须

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从青海入藏的路线，每年只有四个月可通行，其余则“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彭德怀估计，完成入藏的各项准备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相形之下，从四川和西康方向入藏就比较容易。有鉴于此，彭德怀建议应由二野及西南局承担入藏的主要任务，而由一野在西北方向承担支援任务。[19]

毛泽东当时正在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但他在审阅彭德怀报告时却没有任何耽搁，迅速批准了彭的建议。1950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在给西北局和西南局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然而，毛泽东在承认入藏存在困难的同时，仍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时间表。他提出，由于只有五月中旬到九月中旬这段时间才适合部队进藏，因此，“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毛泽东指示中共西南局与二野领导人刘伯承和邓小平“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部队及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20]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围绕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四川与西康入藏的可行性问题，邓小平与刘伯承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他们在 1 月 7 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于今年即九月占领全藏。”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将派出由张国华指挥的第十八军入藏，并由其他部队担任后备力量。[21]

毛泽东对刘邓的答复十分满意。他在 1 月 10 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并强调，在五月中旬开始进军西藏，“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他指示西南局立刻采取行动，“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来“负责筹划一切，并订出实行计划。”作为第一步，毛泽东限定西南局“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毛泽东再次提出了一个极为急迫的时间表，强调“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22]

毛泽东之所以急切地希望在短期内解决西藏问题，是出于下述关键性的假设与考虑：首先，在制定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时，毛泽东和他的

同志们的出发点是，“解放西藏”是为实现中国统一所必须走出的决定性一步，这一点，也由于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向世界作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示而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看来，是否能对西藏获得主权，是在中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面前关于新生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的一次重要测试。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要求迅速解决西藏问题，还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一地区有着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在党内讨论中，中共领导人一再表现出对于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视。解放军的一份内部文件强调，“西藏在中国西南边疆，和印度、尼泊尔、不丹接界，是西南门户，地下有丰富宝藏。英美帝国主义早想侵入，国防地位非常重要。”[23] 毛泽东明确提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24]

中共领导人还相信，当时的国际局势对他们有利。尽管西藏在20世纪上半叶曾处于某种“事实独立”的状态，但它从未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50年初已得到了几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毛泽东因而在讨论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计划时提出，“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25]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显然相信，如果能将深思熟虑的政治与外交行动与认真部署的军事行动结合起来，不仅不会导致严重的国际反弹，更不会发生外国对西藏进行军事干涉的情况。[26]

在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军指挥员看来，解放军在军事上对藏军占有绝对优势。西南军区在一份关于《西藏局势》的详细报告中指出，藏军并未经过良好训练，军事装备也大都十分落后。[27] 中共领导人与解放军将领们在制订军事战略与确定战术时，主要担心的是如何保障部队的后勤供给，而不是如何打垮藏军的抵抗。[28] 上述政治、外交和军事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坚信，在短时间内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1950年初毛泽东与西南局和西北局的上述电报往来标志着中共“解放西藏”行动的开端。此后两年间，尽管中共领导层将不断对有关计划

及其实行的时间表加以修正，但他们在一个基本点上却始终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西藏必须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南局接到毛泽东1月10日的电报后，立即采取行动。在一周内，一个以张国华为首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建立了起来，其成员包括出生于四川并于1935年加入红军的藏族党员天宝（桑吉悦希）。[29]西南局也提出了一项主要通过军事行动进占西藏的计划及更为详尽的时间表：第十八军将于1月底完成入藏准备，3月初部队开始向西藏进军，3月底部队主力在通向昌都的门户甘孜集结，5月间占领昌都。这一计划的前提是，鉴于藏军主力驻扎在昌都，“占领昌都就会震动全藏，促进（藏方）内部分化。”根据西南军区领导的估计，如果第十八军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再一个月即六月份即可占领拉萨乃至日喀则中心地区，从军事上基本解决了西藏问题。”[30]

1月24日，中共领导层批准了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并确定第十八军为进藏主力部队。除了将昌都视为入藏的主要方向外，党的领导人还指示西南局与西北局探索从新疆、青海和云南入藏的可行性，以便同时从几个方向进入西藏。在从事这些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与他的同志们并没有将进军西藏视为单纯的军事行动。显然出于为解放军入藏带来更大正当性的考虑，党的领导人又指示：“关于班禅是否随军入藏，以及在以后如何处理班禅问题，请西南局、西北局继续调查研究，并提出你们的意见。”[31]

在整个第二野战军的支持下，第十八军从2月初开始实行入藏动员。然而，他们很快便发现，由于道路状况差等诸种原因，要迟至晚春才能完成准备。与此同时，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叛乱活动在由西南军区管辖的四川和其他地区迅速扩展，造成了新政权在这些地区维持正常粮食供应的困难。为了集中力量镇压叛乱，西南局于2月底作出决定，将第十八军的部分力量投入剿匪，并因此而不得不向北京提出，“十八军推迟于冬季入藏”。[32]中央军委在答复中指出，“由于土匪骚扰及粮食困难”，同意第十八军“入藏计划……稍稍推迟”。但党的领导人同时又强调，十八军入藏不应无限延期；恰恰相反，“现在不应动摇今年完成入藏计划的决心，而应力求在今年能完成计划。”[33]

尽管受到北京方面的一再督促，但无论是第十八军还是解放军其他部队（包括西北军区即一野所属部队）都难以按照党的领导人所制订的时间表完成行动部署。当春末来临时，西南局所提出并经中央批准的时间表显然已难以实现。中共中央和军委不得不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总体战略再作考虑。

中共领导层从来没有将“解放西藏”当作纯粹的军事问题来看待。毛泽东与他的同志们笃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因而相信，“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34] 与此同时，他们又清楚地认识到，“虽然解放西藏是一个军事问题，因此应该使用一定数量的部队，但西藏问题基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35] 鉴于西藏内外情况的复杂性，毛泽东与他的同志们认为，有必要将军事行动和外交行动及统一战线工作结合起来，尤其必须重视对西藏政治和宗教上层人物的工作。[36] 1949 年末与 1950 年初，当中共领导人考虑通过军事行动入藏时，他们主要也将此视为迫使藏人接受中共方面条件的手段。当解放军的军事动员遭遇困难时，中共领导人很自然地便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到如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西藏问题上来。

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完全了解，在历史上，藏族上层人士内部存在着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之间的不和。几年前，由于在挑选十世班禅问题上的争端，当时只有十二岁的班禅喇嘛被迫滞留青海。[37]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层采取了首先争取班禅集团的战略。班禅方面也表现出了愿意合作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班禅即发出贺电，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希望早日解放西藏人民。[38] 由西藏居第二位的政治和宗教领袖所作出的这一姿态，极大地加强了中共对西藏政策的合法性。1949 年 11 月 23 日，毛泽东和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给班禅的回电中表示：“西藏人民……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39]

1950 年 1 月 20 日，中国外交部就西藏问题发表声明，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来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进行谈判。[40] 2 月底，中共西南局向北京报告，颇富名望的志清法师与“西藏政教首要相友

善”，愿意赴拉萨“说服达赖集团，索康扎萨父子等脱离英帝回到祖国。”西南局赞同这一计划，认为这可以促使“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京协商解决西藏办法，或在（解放军）进军中进行谈判，以免达赖为英帝挟持逃往印度，障碍滋多。”[41] 中共领导层立刻批准了这一计划，强调“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尚在西藏并与我和解。”[42]

在解放军军事准备进展缓慢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更感到有必要尝试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西藏问题。他们在批准西南局关于由志清法师入藏计划的同时，又指示西北局探讨让当时在青海的达赖喇嘛长兄土登晋美诺布“劝说达赖集团”的可能性。[43] 土登晋美诺布接受了这一使命，并准备于5月初离开青海去西藏。

在解放军全面进军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试图通过国际外交活动来阻止解放军入藏。从1949年末到1950年初，噶厦在一系列声明中提出，西藏向来享有独立地位，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供施关系，在西藏也不存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所以没有必要解放西藏。他们因此要求中共保证“不进攻西藏”。[44] 正如梅尔文·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所指出的那样，北京方面对于拉萨方面的这些“天真得出奇”的要求采取了完全不予理睬的态度。噶厦转而开始寻求华盛顿和伦敦的支持，要求它们帮助西藏加入联合国。1949年12月，经卜卦抽签，噶厦决定组建使团前往中国、美国、印度、英国与尼泊尔。[45]

然而，华盛顿与伦敦并不希望在这种时候接待藏人，新德里方面也是疑虑重重。华盛顿此刻仍处在将“中国丢失”给共产主义的冲击之下，因而担心执行鼓励藏人的政策将会被仍然坚称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国民党人看作是“不道义的”，同时又会被共产党人视为“挑衅”。此外，美国决策者们还担心，他们若支持西藏，“也许会加快中国共产党对西藏采取行动。”[46] 此时正在积极寻求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伦敦方面则知道，它手里并没有什么牌可以对西藏局势产生影响。此外，英国决策者们也不愿意看到英国在华利益由于西藏而遭到损害。[47]

尽管华盛顿与伦敦都很愿意让新德里在支持藏人方面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但印度却并不愿意如此行事。印度首相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认为，在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建立友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他也看不出为支持藏人而冒犯中共会给印度带来什么好处。尼赫鲁所愿意做的，至多也就是通过印度的外交影响力来劝说北京尽可能让西藏继续保持自治。

北京方面得知拉萨方面组建了使团——特别是将派往英国与美国的“亲善使团”——之后，十分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48] 最后噶厦别无选择，只得取消了向华盛顿和伦敦派出使团的计划。

但噶厦派往北京的代表团仍在继续活动。代表团由三人组成，团长为噶厦高级俗官夏格巴。代表团一行于 1950 年 2 月 10 日离开拉萨，3 月 7 日抵达印度葛伦堡（Kalimpong）。该代表团所要达到的目标包括：“获得西藏领土完整不会受到侵犯的担保”，并捍卫“西藏人民与政府不容许对达赖喇嘛统治的连续性进行干涉的任何行为”的原则。[49]4 月 2 日，夏格巴使团向负责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筹备工作的官员们提交了这些条件，并要求同北京派出的代表在香港举行谈判。[50]

北京方面并没有立即答复夏格巴。直到 1950 年 5 月初，当解放军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完成入藏准备这一点变得很明朗时，中共领导人才开始积极寻求与西藏当局进行谈判。5 月 3 日，在经历了一个月的耽搁后，中共领导人批准了西北局派遣达赖长兄土登晋美诺布到拉萨“劝说达赖集团成员”的计划，并“要西藏政府速派代表到西康与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51]

在上述背景下，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制定同藏人谈判的指导方针及相关条件。1950 年 5 月到 6 月间，在中共领导层内部以及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局之间就此进行了多次讨论。5 月 11 日，西南局向北京汇报：“我们除继续加强进军的军事准备外，拟特别加强政治争取工作。”西南局提议，谈判“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关系，才能避开英美牵制，和有实现可能”。西南局还拟定了作为“谈判的基础”的四项条件，报请中共领导层审查批准：

一、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庙宇、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52]

中共中央于5月17日作出答复，提出“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中共中央指出，西藏“上层中有分化，达赖喇嘛有某种程度的内向是可能的”。中央强调，“和平解放西藏”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损害民族感情、减少民族隔阂、有利于汉藏民族的大团结”。中共中央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应在何种条件下实现，因而强调指出，“这里基本的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如果藏方同意这些条件，“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中共中央要求“西南局与西北局再加研究，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报中央审查决定（从速）”。这些条件“要可以作为和平进军的谈判基础之用，也要能够不加修改地或只稍加修改地作为战斗进军（和平解决不成功时）的约法”。[53]

根据中央的指示，西南局在此后的两周里展开了一系列讨论。5月27日，西南局提出了与藏方谈判的十项条件，报请中央批准。毛泽东亲自审阅了这些条件。[54]在获得中央批准后，西南局于6月2日正式将十项条件转发西藏工作委员会，作为处理西藏问题的指导方针：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与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实行买卖公平。[55]

在批准上述十条时，中共领导人正在考虑与拉萨接触的三条可能渠道。第一条是前面已讨论过的由达赖长兄土登晋美诺布所率领的代表团。然而，事态发展很快便表明，土登晋美诺布并不愿意在北京与拉萨之间牵线搭桥。代表团在前往拉萨的途中一再耽搁，当他们到达藏区后，土登晋美诺布即下令扣留代表团的两名藏族成员和汉族助手，自己只身前往拉萨。当他到达拉萨后，非但没有推动拉萨与北京谈判，反而建议达赖喇嘛不要这么做。[56]

第二条渠道，是甘孜附近著名的喇嘛庙白利寺的格达活佛。早在1936年红军经过甘孜地区时，格达活佛就与红军建立了联系并向后者提供过帮助。朱德还签发了一封信表示，由于格达活佛和白利寺对共产党的帮助，他们也会受到红军的保护。[57] 解放军于1949年末入川后，格达活佛出任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5月5日，他向朱德提议，愿意担任北京与拉萨之间的信使，入藏劝和，这一计划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大力支持。[58] 格达活佛于7月10日从白利寺启程，两周后在昌都受阻。8月22日，他突然死亡，很多人相信他是死于谋杀。[59]

最后，只剩下了在新德里的夏格巴使团这一条渠道。从4月初起，该使团便寻找途径，试图同中国政府接触。4月8日，夏格巴收到娶了汉族女子为妻的达赖兄长嘉洛顿珠的岳父朱寿光的一封便签，要求西藏

代表到香港与中央政府代表会面。[60] 然而，夏格巴无法从英国人那里得到去香港的签证。与此同时，北京方面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提出，“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61] 5 月 28 日，在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耽搁之后，夏格巴使团终于收到了对他们 4 月 2 日要求的答复，得知他们“只能以西藏地方代表的名义”到北京就“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愿意这么做，将“在北京受到欢迎”。[62]

但是，夏格巴仍然受制于噶厦将谈判目标定为“获得西藏领土完整不会受到侵犯的担保”的指令。[63] 当夏格巴及其使团因未能获得去香港的签证而选择留在印度等待中国大使到来后进行谈判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中国大使馆在新德里建馆后，夏格巴等一再写信给使馆并登门造访，提出在新德里举行谈判的要求。

中国政府在答复中，要求夏格巴及其同事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身份到北京进行谈判。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申健告诉西藏代表：“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申健还坚持，夏格巴使团必须“以西藏地方政府或西藏民族的代表”的身份，“和中央人民政府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此谈判应在北京举行。”[64] 8 月 21 日，周恩来知会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P. M. Panikkar）：“我们认为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他们应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来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65]

在中共领导人似乎愿意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西藏问题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停止对解放军军事动员的督促。毛泽东与他的同志们作为宽猛兼用、恩威并施的大师，不会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清楚地知道，谈判的真正价值应在于为“解放”西藏带来更大的合法性。他们还知道，即便藏人真的愿意进行谈判，北京也仍然需要以武力为后盾来确保噶厦接受中共的主要条件。因此，中共领导人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始终将敦促解放军做好充分准备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在这方面，解放军指挥员们所面临的关键性挑战，在于部队及其装备入藏及保障后勤供给的问题。他们懂得，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必须首先修通道路。从 4 月 13 日开始，作为进攻昌都准备工作的关键一环，西南军区投入了一万八千多名战士修复雅安和甘孜之间的道路。

到 8 月底，全长 603 公里的道路已经修复打通。[66] 西南军区与第十八军还从 8 月初起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形成了在年底前占领昌都的作战计划。[67]

毛泽东立刻批准了计划并同时强调，昌都之战并不仅仅是军事行动。他指出："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他还提到："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毛泽东据此推断道，"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68]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军区于 8 月 26 日发布了《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确定战役的目标为"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69]

为了进一步阐明解放军采取军事行动是有道理的，并对噶厦施加更大的压力，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于 9 月 17 日给夏格巴发出了一封最后通谍式的函件，要求西藏谈判者"务于九月二十日之前到达北京。"[70] 在藏人并无任何动作的情况下，袁仲贤又于 9 月 23 日致函夏格巴，提出警告道："原定九月二十日期限已过，人民解放军将按计划行动"，其后果则将由藏人自负，但如果他们"能很快去北京，仍是好的"，并敦促他们"迅即动身"。[71] 夏格巴和西藏使团答复道，他们必须等待拉萨方面的命令，北京因此决定，动用武力的时刻到来了。9 月 30 日，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发布了《解放昌都有关政策指示》。三天后，西南军区发布了最后动员的命令。[72]

昌都战役于 10 月 6 日打响后，持续了两个星期。解放军从三个方向发起攻击：从北路（甘孜方向）和南路（巴塘方向）发起攻击的部队负责包围藏军并切断其退路；中路（岗拖方向）部队则直指昌都。进攻开始前，解放军部队已经从事了六个多月紧张的备战训练。相形之下，藏军显得指挥无方且准备不足。10 月 19 日，解放军占领昌都。当战斗于 10 月 24 日结束时，解放军大获全胜。据统计，藏军有 180 人伤亡，约 900 人被俘，另有 4,300 人投降。[73] 下达投降令的是藏方昌都军政总管阿沛·阿旺晋美，这成为他此后终生与中共合作的开端。[74]

解放军在昌都战役所取得的胜利，使得北京领导人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处于一种更为有利的地位。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知道，在藏人再无能

力进行有效军事抵抗的情况下，将战略重点转到与达赖喇嘛和噶厦进行谈判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还在昌都战役尚在进行之中时，毛泽东便指示袁仲贤通知西藏谈判代表，正是由于藏方“故意拖延”来京，才导致了昌都战役的发生。但谈判的大门依然是敞开的，“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75] 之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于 11 月 10 日发表公告，强调任何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都必须以拉萨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前提。北京方面并强调，就长远和根本目标而言，西藏将被改造为“人民民主”的社会，而在毛话语体系中，这意味着西藏传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然而，为了实现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共愿意作出重大妥协，包括承认达赖喇嘛的地位与权力、以及在一段时间内不改变西藏现存的宗教与政治制度，以使得藏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西藏的主权。[76]

与此同时，解放军继续为进军拉萨作准备。昌都战役后，第十八军立即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开始对干部战士进行入藏动员，将“解放西藏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第一步”。西南军区也加紧进行后勤方面的准备及道路建设，以确保部队于 1951 年春入藏。[77]

解放军在昌都的胜利，还导致了西藏上层人士内部更为深刻的分化乃至恐慌。尽管昌都一战摧毁了许多藏人将解放军阻挡在藏区以外的幻想，但仍有不少上层分子不愿意让中国在西藏行使主权。[78] 在 75 岁的拉萨摄政达扎无力有效应对局势的情况下，支持达赖喇嘛亲政的呼声日益高涨。11 月 17 日，当时年仅 16 岁的达赖喇嘛执掌政柄，而按照惯例他本来应该在年满 18 岁后之才能这么做的。

藏方领导人在无法阻止解放军入藏的情况下，又想到诉诸于联合国。11 月 7 日，仍然滞留印度的夏格巴接到了来自拉萨的命令，要他立即向联合国、美国、英国与印度发出紧急呼吁，请求它们帮助“制止中国的侵略”。[79] 当藏方提出这一呼吁时，正值中国军队开始大规模介入朝鲜战争之际，因此，华盛顿本来是愿意向藏人提供某种支持的，以便借此分散北京的注意力并限制其影响力。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英国不愿意扮

演任何领头的角色（英国人希望由印度来牵这个头），联合国最终决定不讨论西藏问题。[80]

出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印度对解放军在昌都的军事行动表现出了严重关切。10 月 26 日，新德里表示，对于“北京关于已命令解放军部队向西藏进军的声明”，它“深表遗憾”。[81] 随后，印度政府又在另一项声明表示，“西藏最近的事态发展已经影响到了（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世界和平。”新德里还指出，解放军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将造成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南亚紧张局势的加剧，并对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也会为那些试图将中国拒之于联合国之外的国家提供借口。[82]

中国政府对新德里的抗议坚决予以驳回。毛泽东完全知道，印度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有多么重要，他因而亲自指导中国外交部对印度政府作出反应。10 月 11 日，印度外交部副部长梅农（K. P. S. Menon）表达了新德里对解放军进入西藏的关切，毛泽东亲自为中国外交部拟就了中方的答复，其中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部事务。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83] 10 月 21 日，当潘尼迦提到解放军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会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努力产生负面影响时，毛泽东又要外交部在答复中强调，“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之。”[84] 10 月 31 日，当梅农对解放军入藏“深表遗憾”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与外交部：“（对印度）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85]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国外交部坚决驳回了新德里对解放军入藏的“关切”与“遗憾”。11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通知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屡次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因此，新德里企图“影响和阻止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国家主权的行使，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十分惊异”。[86]

事后看来，北京对新德里就西藏问题所表示关切的强硬反应很可能会引起双方的严重敌对。但是，很大程度上由于尼赫鲁所持的和解态度，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尽管尼赫鲁和他的许多同事们一样，担心解放军

入藏会改变西藏作为中印之间缓冲地带的作用，但他同时又相信，“有理由认为，由于地理、地形与气候上的原因，西藏的高度自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87] 结果，新德里除了表达“遗憾与关切”外，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在缺乏国际社会支持与介入的情况下，拉萨方面别无选择，只能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拉萨上层人士中，要求同北京一起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在解放军占领昌都后，阿沛·阿旺晋美留在了昌都，他强烈要求噶厦应同共产党人进行谈判。他在呈递给拉萨的报告中，以自己与解放军打交道的亲身经历说明，共产党士兵纪律严明，而通过和平方法解决问题将使得西藏人民与家园免遭战争的毁灭性影响，因而，同北京谈判是西藏“保留一定自治地位的唯一机会”。[88] 达赖喇嘛对此表示了谨慎的赞同。12 月初，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前往地处中印边界的亚东。1951 年 1 月 27 日，达赖喇嘛写信给袁仲贤，表示愿意与北京谈判。2 月 1 日，袁仲贤代表毛泽东祝贺达赖执政，并欢迎达赖“派代表赴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事情”。[89]

达赖喇嘛在离开拉萨前，已同噶厦一起，决定授予阿沛·阿旺晋美以全权，“同中国人进行谈判”。[90] 在得知联合国决定不将西藏问题纳入大会议程后，达赖喇嘛与噶厦决定派出由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在那里举行谈判。但是，阿沛·阿旺晋美所接到的指令却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被授予“全权”同北京方面谈判；但另一方面，他又被告知在没有进一步咨询噶厦与达赖喇嘛的情况下，他无权作出决定。[91]

4 月 22 日，阿沛·阿旺晋美与其他藏族代表抵达北京。五天之后，在中共领导人的安排之下，班禅喇嘛也来到了北京。西藏代表与中央政府代表之间的谈判从 4 月 29 日开始。

此后的三周里，双方共举行了七次会谈。实质性的讨论是从 5 月 2 日的第二次会议开始的。议程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解放军在西藏的地位与角色，达赖喇嘛的地位与权力，以及承认班禅的问题。尽管阿沛·阿旺晋美和他的同事们试图根据噶厦的指令争辩道，解放军完全没有必要进驻西藏，但中央首席代表李维汉等人不为所动，坚持解放军必须入藏。与此同时，李维汉等人又保证，在解放军入藏后，达赖喇嘛的地位

和权力以及西藏的宗教政治制度都会得到维护。最后，双方并未经过冗长的争论，便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然而，谈判却在是否承认班禅喇嘛的问题上几乎陷入僵局。中央代表坚持，应当在协议中包括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实行合作的条款（而这将意味着达赖喇嘛承认班禅喇嘛）。一开始，阿沛·阿旺晋美坚决拒绝接受这一条件，认为协议的目的在于界定中央政府与噶厦之间的关系，而不在于界定藏人之间的关系。但李维汉表示，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因为“班禅喇嘛和班禅集团在20世纪历史上从来没有卷入过反对祖国的任何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班禅喇嘛又表达了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坚定支持。为了不使谈判由于这个问题而失败，阿沛·阿旺晋美致电噶厦，提议承认班禅喇嘛，获得了达赖喇嘛与噶厦的赞同。[92]

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无疑是第一条：

> 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作为对于藏人所作的这一关键性让步的回报，中央政府同意维持“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改变具有封建与神权性质的西藏现存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关于“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之”。[93]

与《十七条协议》相关的还有两项秘密协议。第一项是《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其内容共有七点。[94]最重要的一点是，解放军将进入西藏并驻扎在“国防要点及交通要点”，而藏军将逐步改编为解放军部队，藏族民兵将逐步复员，所有驻藏部队将接受解放军西藏军区的指挥，军区指挥人员则由中央政府任命，驻藏解放军部队的财政预算亦由中央政府承担。[95]

第二项秘密协议涉及到达赖喇嘛。由于当时达赖喇嘛仍在亚东，而且并不清楚他何时（或者是否）会返回拉萨，该文件提出《十七条协议》将由西藏地方政府执行，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和平解放西藏

办法的协议第一年内，如因某种需要，得自行选择住地。在此期间内返职时，其地位和职权不予变更”。[96]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北京方面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在协议为达赖喇嘛本人所批准前，它对于西藏还产生不了像中共领导人所希望的那种影响。事实上，如果达赖喇嘛决定不承认阿沛·阿旺晋美等人在北京所签订的协议，《十七条协议》作为将西藏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奠基性文件的合法性便会大打折扣。

毛泽东与中共领导人十分了解让达赖喇嘛认可这一协议的重要性。因此，就在协议签订后，毛泽东立刻指派张经武为代表，前往亚东劝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97] 为了不为达赖喇嘛的回归制造任何障碍，中共领导人请求班禅喇嘛及其一行在达赖喇嘛发出要他们回去的邀请之前，暂时不要返回西藏和拉萨。[98]

在达赖喇嘛是应当接受《十七条协议》并返回拉萨，还是应当拒绝协议而继续流亡的问题上，他周围的藏族上层人士发生了分歧。经过了冗长而激烈的辩论之后，亚东国民大会向噶厦建议，达赖喇嘛应当返回拉萨。噶厦在7月10日（或11日）批准了这一提议。[99] 7月14日，张经武抵达亚东。两天后，他向达赖喇嘛递交了毛泽东署名的一封信，信中赞扬了达赖喇嘛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政府举行谈判的举措，并要求达赖喇嘛与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100] 当张经武问达赖喇嘛什么时候返回拉萨时，达赖的回答是，“快了。”[101]

8月21日，达赖喇嘛离开亚东前往拉萨，张经武亦于两天后离开亚东。8月18日，中共领导人电告张经武，指示他应在拉萨设法接近上层人士。后来，张经武广泛地会见了“贵族官员宗教上层人士，宣传协议精神，解释中央的方针政策”。[102]

然而，噶厦官员中仍然存在着对于接受协议的抗拒情绪，这在两位噶伦（主持噶厦的官员）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阿沛要求在拉萨举行官员代表会议，以便让他和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其他代表就协议内容进行解释。在达赖喇嘛的支持下，噶厦同意了这一要求。[103]

会议于9月28日举行。阿沛说明，他作为谈判代表，在北京只接受了一张毛泽东像和一箱红茶。他还强调，自己始终根据拉萨方面的指令行事。他还特别解释道，《十七条协议》并没有损害达赖喇嘛的地位与职权，也没有威胁到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制度。他在要求大会批准《十七条协议》时表示，如果大会发现协议是错误的，他愿意“以身家性命和财产保证”，接受任何惩罚。经激烈辩论后，大会决定建议达赖喇嘛批准协议。[104]

1951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北京，正式表示，他赞同《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105]

两天后，即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达赖喇嘛：“你于1951年10月24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106]

就在毛泽东与达赖喇嘛电报往来之际，班禅喇嘛也发表公开声明，拥护《十七点协议》，欢呼“西藏回到祖国”。[107] 来自西藏的两位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的赞同，为《十七条协议》提供了巨大的合法性。西藏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揭开了中国以及西藏历史上新的一页。从表面上来看，协议似乎确立了一系列双方均同意的原则，并对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方面，藏人接受了北京对于西藏的主权声明，这使得他们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祖国“大家庭”。另一方面，北京将在西藏执行不同于其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一定时期内，中共将不在西藏实行它决心要推动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在这一时期，中共将尊重西藏现存的政治、社会及宗教制度，并与之共存。

但实际上，双方在《十七条协议》中所作出的承诺是不能等量齐观的。藏人接受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承诺是永久性的和不可逆转的；而中共关于尊重西藏现存政治、社会与宗教制度并与之共存的承诺，却是有条件及带有临时性质的。通过使用“解放”来描述并界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实施，中共已经清楚地表明，它的政治与社会革命计划已经将它放置到了一种道义上的优越地位，使它获得了摧毁“旧”西藏并建立“新”西藏的历史性授权。所有这一切，又在另一个层面构成了中共以创造“新中国”为目标的国家建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我们在西藏获得“解放”的故事的背后，可以发现中共有一种历史和未来在自己这一边的深刻自信。支持这一自信的有着意识形态与文化两方面的因素。作为共产党人，毛泽东与他的同志们坚信，只有通过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才能摧毁西藏的压迫与封建社会，并代之以一个新社会。[108] 但在这一信念的背后，又深藏着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尽管毛泽东与他的同志们承认寻求“民族平等”、避免“大汉族主义”的重要性，但当他们将自己当成是西藏的“解放者”时，以及当他们谈论到改造西藏“落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的必要性时，他们已经将自己——作为中国的共产党人——放在了一个比之藏人在文化上更为优越的地位上了。

西藏地方政府为寻求独立所作的努力最终失败了。这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军事方面，藏军不仅弱小，也缺乏足够的准备，因而完全无法同解放军的精兵强将相匹敌。在外交领域，拉萨方面曾经一再尝试，但却始终未能获得实质性的国际支持。然而，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正是藏人本身的分裂为中共进占西藏打开了大门。正如本文的研究所揭示的，发生于 1949–1951 年间的这段故事，不仅是一段关于抵抗的故事，也是一段涉及合作的故事。很多像阿沛·阿旺晋美这样的藏人之所以选择与中共合作，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被中共的军事力量所压倒，更是因为他们为中共的道义优势所折服。所有这一切，又转而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共接管西藏并不是征服、而是解放的声明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

1949–1951 年间，中共在处理西藏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了军事、政治和外交上的高度成功。西藏“解放”的实现，标志着新政权完成了对于中国大陆的统一。然而，从历史的长远眼光来看，1949–1951 年间中共对于西藏的胜利接管，也在民族、宗教与文化的层面对毛泽东和中共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正如以后的历史发展所表明的那样，毛泽东和他的

同志们还远远没有为应对这些挑战做好准备。随着西藏的加入，“新中国”对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来说也成为一个更复杂、也更具有多样性的国家。中共的政治战略与军事实力使它得以于 1949–1951 年实现西藏的“解放”，但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带来“西藏问题”的最后解决。在西藏获得“解放”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国家依然面对着如何对西藏在中国的地位作出界定、以及如何对“中国”作出界定这两项互有关联的基本挑战。

姚昱初译，陈之宏重译，陈兼修改校订

注释

1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 1 卷，第 111 页；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31–32、123–124 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62–63 页。

3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77–180、185–186 页。

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150–152 页。

5 金冲及等：《朱德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372–373 页。

6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288 页。

7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495 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 473–481 页。本文英文原文中没有包括对“波巴共和国”的讨论。这一段是在对中文译文的修订中根据杨奎松的建议加入的。在此，谨对杨奎松表示感谢。

8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68), 444.

9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年，第 342–343 页。

10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265–1,267 页。

11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348 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1 卷，第 24 页。

13 师哲前揭书，第 339–340 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 卷，第 2 页。

15 Melvyn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613–614.

16 新华社：《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载《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3 日，第 1 版。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1 页。

18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4–5 页。

19 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文献选编》，第 2 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99–700 页；又参见《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7–8 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 卷，第 208–209 页。

21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9 页。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卷，第 226–227 页。

23 《和平解放西藏》，第 59–60 页。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卷，第 208 页。

25 同上，第 226 页。

26 《和平解放西藏》，第 60 页。

27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 年，第 32–33 页。

28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38–39 页。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2 卷，第 281–282 页。

30 《和平解放西藏》，第 51 页。

31 同上，第 56 页。

32 同上，第 69 页。

33 同上，第 69 页。

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卷，第 152 页。

35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卷，第 2 页；《和平解放西藏》，第 59–60 页。

36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9–10 页；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 页。

37 十世班禅喇嘛的产生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与认可，但并未得到达赖喇嘛的认可。

38 《和平解放西藏》，第 252 页。

39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3 页。

40 《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21 日。

41 《和平解放西藏》，第 67 页。

42 同上，第 68 页。

43 同上，第 68 页。

44 Goldstein, 623–624.

45 Ibid., 626.

4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1950* (Washington, D.C.: GPO,) 1976, Vol. 6, 275–276.

47 Zh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9–50.

48 《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21 日，第 1 版。

49 Tsepon 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300.)

50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 9 页；《和平解放西藏》，第 20–21 页。

51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 10 页。

52 《和平解放西藏》，第 75–76 页。

53 同上，第 77–78 页；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西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36 页。

54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6 页。

55 同上，第 20–21 页；《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 12 页。

56 Goldstein, 738–739.

57 吉柚权前揭书，第 121–122 页。

58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 13 页。

59 Goldstein, 685–686.

60 Ibid., 645.

61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5 页。

62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 19 页；《和平解放西藏》，第 20–21 页。

63 Shakabpa, 299.

6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 卷，第 61、65 页。

65 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周恩来与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年，第 6–7 页。

66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 9–10 页。

67 吉柚权前揭书，第 143–144 页。

6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卷，第 475–477 页。

69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 15 页。

70 同上，第 16 页。

71 同上，第 16–17 页。

72 同上，第 17 页。

73 Goldstein, Chapter 18; 又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 卷，第 212–215 页。

74 Goldstein, 687.

7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卷，第 549 页。
76 《当代中国的西藏》，第 156 页；《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309 页。
77 同上，第 149–150 页。
78 Goldstein, 699–702.
79 Ibid., 707–708.
80 Zhai Qiang, 58–62.
81 Indian note, October 26, 1950, Margaret Carlyle, ed.,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9–195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550–551.
82 Indian note, October 31, 1950, in Ibid., 552–554.
8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卷，第 549 页。
84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33 页。
85 同上，第 34–35 页。
86 《和平解放西藏》，第 176–178 页；也见 Carlyle, 554–556。
87 B. N. Mullik, *My Years with Nehru: The Chinese Betrayal*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1971), 80.
88 《和平解放西藏》，第 213–214 页；又参见 Goldstein, 742–743.
89 同上，第 119 页；《周恩来与西藏》，第 11–12 页。
90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62.
91 Ibid., 64.
92 《当代中国的西藏》，第 164 页；Shakya, 69.
93 关于《十七条协议》的文本，见 Shakya, 449–452。
94 这与 Goldstein 的论述不一样，后者认为第一个秘密协议内容有八条。Goldstein, 770.
95 《和平解放西藏》，第 129–130 页。
96 同上书，第 130 页。
97 《当代中国的西藏》，第 188–189 页。
98 牙含章：《护送班禅额尔德尼返回西藏的回忆》，张羽新主编《和平解放西藏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32–333 页。
99 Goldstein, 757–758;《和平解放西藏》，第 218–219 页。
100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 30–31 页。
101 Shakya, 85.
102 《和平解放西藏》第 269 页。
103 同上，第 219 页。
104 同上，第 219 页；《和平解放西藏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第 320 页。
105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56 页。
106 同上，第 56 页。
107 《和平解放西藏》，第 207 页。
10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 1 卷，第 36 页。

第七章

老大哥在盯着：1945–1955 年中苏地方关系与新大连的建设

何凯思（Christian A. Hess）

1955 年整个春天，位于中国东北辽东半岛顶端的大连成了大规模庆祝中苏友谊群众活动的中心。在大连最大的公共空间斯大林广场上，人们举行各种盛大集会来庆祝当地的中苏友好关系，并感谢苏联军队解放和保护了大连。那种满脸笑容的苏联士兵的图片也多次出现在《大连日报》头版显著位置。这些图片将苏联士兵描绘成了超级明星而非普通士兵：他们或者是被兴奋的人群高高抛起，或者在为激动的中国青年学生们签名。[1] 为了纪念当年因帮助解放东北而牺牲的苏联烈士，在 1955 年的短短一个月内就有三座纪念雕塑揭幕落成，其中一座是一个苏联士兵的大型青铜雕像，塑像坐落在大理石基底上。[2] 这个青铜铸造的士兵手里紧握着一枝机关枪，远眺着大连市政府办公大楼，时刻保持着警惕。

考虑到许多学者都认为 1950 年代中期正是中苏关系的高峰时期，上述那些景象看起来也许并不出奇。但是苏联人在大连的角色绝非如此平常和简单。1945 年 8 月 22 日，苏联空军与坦克师首次开入大连并逼近旅顺，从而结束了日本对这一地区长达四十年的殖民统治。不过这座城市的解放者并未打算要很快离开。事实上，迟至 1955 年 5 月，在苏联人解放大连十年之后，最后一批苏联部队和军官才撤离大连。1955 年大连举行的各种盛大庆祝其实是欢送会，标志着从 19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章节最终落幕。

十年前，苏联军队因在大连掠夺工厂、强奸中国妇女、欺辱当地居民而在当地人心目中形象极差，相较而言 1955 年关于中苏友好的各种公

开描述十分令人惊讶。当时，大连当地居民中的常见说法甚至将苏联人的到来与日本人的行为相提并论："走了小鼻子（日本人），来了大鼻子（苏联人）。"[3] 在1940年代末苏联人对大连地区——即此前以"关东州租界地"而为人熟知的日本殖民地——进行军事统治的高峰期，驻扎在当地的苏联部队高达三十万人。[4]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达成的《雅尔塔协定》，以及随后国民党政府和苏联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授予苏联在旅顺港建设与维持一个海军基地的三十年租用权。这片基地从旅顺向北，一直延伸到石河镇。同时大连港口设施的一半也被租借给苏联，尽管大连这座城市名义上是由一个"民事的"中国政府进行管理的。更重要的是，《雅尔塔协定》虽然许诺保持大连国际港口的地位，但这必须要在签订了对日和约之后才能施行。[5]

苏联在二战后获得的这一战利品，有可能成为当时正在酝酿中的中国内战与全球冷战的一个引爆点。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想要由自己来建立并控制大连的民事政府。作为当时获得国际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于当年9月和10月先后派代表抵达大连。[6] 美国希望大连港依据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对国际船只开放，所以曾在1946年尝试派出海军官员登陆大连。[7] 而中共也期望可以获得苏联的支持，因此连忙从延安、山东与东北派出大批干部进入大连以建立自己在该地区的统治机构。

新近出版的内部文件和干部回忆，揭示了苏联驻大连的军事当局与中共派往大连工作的干部在城市管理、恢复工业、群众动员、贸易往来等一系列问题上遭遇的困难与两方之间的冲突。这些新近出现的可得的资料——许多是来自被派往大连工作的中共干部们的一手资料——说明，对于初抵大连，以重建当地社会秩序和恢复经济发展为工作重心的中共干部来说，他们并不总是明了和认可苏联人带来的军事稳定与专业知识的"好处"。一些被派往大连的中共干部甚至认为，苏联驻大连军事当局的活动是帝国主义的表现。在中共1945年之后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中，至关紧要的有这样两个问题：如何管理城市及其资源；以及在这样做时，如何与苏联人合作。

被派往大连的中共干部来自全中国各个农村根据地。在他们看来，大连及周边农村地区必定是播撒革命种子的肥沃土壤：这些地区被日本人统治了四十年，充斥着被压迫的工人、叛国投敌的地主和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的商人。然而驻大连的苏联军事领导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计划。大连的造船设施、化学工业、盐场和免税港口都能帮助满足二战后苏联的一些紧迫需求。按照《雅尔塔协定》等国际协议的要求，该地区应建立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非军事的民事政府。苏联人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由中共发起组织的各种群众性政治集会、斗争大会与充满暴力色彩的阶级斗争。对莫斯科的领导人来说，中共的这些活动会成为国民党及其后台美国篡夺苏联战后战利品的借口。依据基于《雅尔塔协定》建立的复杂政治环境来行事，苏联当局是不允许中共在大连地区进行公开活动的。直到 1949 年 4 月，中共在大连当地的管理机构才能公开露面和活动。[8]

中苏关系是 1945 年之后的大连历史中的一个关键层面。许多已有的研究主要探讨关于中苏关系的起源和衰落这种高端政治（high politics）问题。[9] 本章考察的则是 1945 到 1955 年间大连及其周边地区的中苏关系。我们将主要关注这一关系中中国这一方，并完全以中文资料为基础。而和中苏关系这种政治敏感题材有关的回忆录与官方史书，必须谨慎使用。从 1950 年代末到整个 1960 年代，中苏关系转向对立。对于中共干部来说，与苏联人关系密切在此时是一种政治麻烦。这样一来，尽管有许多回忆录承认苏联人在大连的存在的确带来了一些好处，但都倾向于强调中苏之间的摩擦与敌对。然而，如果将这些材料与官方档案放在一起阅读，就为我们了解在大连的中共干部与苏联当局之间的矛盾特性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与公开描述的中苏团结友好截然不同的画面。当然，利用前苏联的档案来做进一步研究以便更充分地了解苏联方面的情况，也是必要的。[10]

一、旅大事件与大连被占领时期的中苏政治关系：1945—1950年

1945年底，上百名中共干部从农村解放区涌入大连。此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管理大连这个曾经被日本殖民的城市？就此而言，这些中共干部们的设想与苏联人的看法之间可能会有怎样的冲突？对于中共来说，大连是一块蕴藏着巨大机会的肥沃处女地；但同时这里的环境也极易产生冲突。摆在中共与苏联面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将会考验两者之间的初期关系。“旅大事件”及其后续影响——大连的几位中共高级干部被苏联军事当局勒令下台——为我们观察当代中国史上一段尚未得到充分探究时期的地方层次的中苏政治关系，提供了一扇重要的窗口。

（一）危机的累积：街道层面上的冲突与对中共行动的限制

1945年中共干部刚一到达大连，苏联占领军对中国平民的暴行——特别是凌辱中国妇女——就为中苏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各种困扰。其时苏联当局曾派七位东北抗日联军干部前往大连组建当地的警备部队。刘玉泉是其中之一。这些抗联干部曾在苏联呆过一段时间，他们身穿苏联军服，是到达大连的第一批中共干部。不少人是和苏联部队一起来到此地的。[11] 有一天，刘玉泉发现两名苏联空军军官正在强奸一位中国妇女。刘在事发现场十分愤怒，拒绝让这两名苏联军官离开。在激烈争吵中，一名苏联军官从枪套中拔出手枪并将子弹上了膛。刘玉泉见状向这名军官开了火，打死了他。这名被打死的苏联军官是受过嘉奖的战斗英雄，因此该事件引起了苏联当局的全面调查。因为刘玉泉是进行自卫，而这名苏联军官又确实强奸了那名妇女，所以刘最后被释放，但却被迫离开大连。董崇斌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名军官。同样，他也回忆到自己曾用武力制止一名苏联士兵强奸一位中国妇女。董缴了这个苏联士兵的枪，并把他押到当地警察局去。[12]

建立某种政治秩序以管治大连居民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其中潜藏着许多问题，尽管不像上述事件表现得那么激烈，但依然给中苏关系制造

了困扰。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要求，苏联任命了一位平民担任大连市长。但这位名叫迟子祥的市长原本是日据殖民地时期的一个富裕商人；在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里，他与本地最富有的中国企业家张本政一起维持着大连的日常管理。[13] 迟子祥这个市长虽然有名无实，但他在各种官方活动中的出现还是令中共一直恼火不已。韩光曾于 1945 年 10 月到 1948 年 7 月期间担任中共大连地委书记。据他回忆，他曾多次要求苏联当局将迟子祥撤掉，但都遭到苏联人的断然拒绝。[14] 在与驻大连的苏军司令克兹洛夫（Kozlov）会面时，韩光曾询问可否任命一名共产党员来做市长，但却得到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莫斯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15] 1947 年 4 月苏联人建立了一个民事政府来管理整个大连地区，迟子祥再次被推选为大连市名义上的首脑。

到 1946 年中期，苏联部队的胡作非为与不受中共欢迎的苏联政治任命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减退。随之出现的是一个新问题，其后果对本地的中共组织更具破坏性。此时越来越多的中共干部从山东与华北地区来到大连，他们开始利用抗日战争期间在农村根据地所掌握的策略在大连发动工作。这样，大连城乡地区的商人、地主、工头，以及此前日据殖民地时期与日本合作的警察都可能成为中共"清算"运动打击的对象。

中共这些干部刚开始行动没有多久，就遭到了苏联当局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遭到了粗暴的制止。1946–1947 年这一阶段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苏双方发生政治争执与冲突的时期——在大连的中共干部与苏联军事领导人经常因为各自不同的行动风格而彼此冲突碰撞。由于中共的城市政策还不成熟，中共干部发现自己不仅要先想方设法拿出一套城市治理的行动方案，还不得不每天都要与试图限制自己行动的苏联军事当局打交道。到最后，对加强中苏关系的强调成为中共政治工作领域中的一个压倒性主题。尽管如此，苏联当局在大连的实际影响力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因为对于许多被派到大连的中共干部来说，苏联在城市管理方面的指导作用和榜样力量所具有的吸引力，并不如他们自己所熟悉的策略和所面临的需要更重要。即使是在大连周边的农村地区，中共的许多发动群众、争取支持的惯用策略也遭到了苏联军事当局的攻击。

苏联人起初并未就中共在农村地区的活动发布专门指令。但是随着1946年2月与3月中共干部开始着手进行“清算”运动与土地改革，这一局势发生了变化。[16] 苏联当局在了解到在大连北部的金县进行的一次群众集会后，要求中共立刻停止这种活动。他们认为这会让刚刚恢复的社会秩序重新变得混乱与不稳定。但中共干部却认为苏联人不了解他们的意图与策略。[17] 双方之间的误解对大连周围农村地区开展的土地改革活动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为批斗一个地主，中共干部在大连西南部的某村庄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而苏联驻大连当局却得到消息说，这次集会实际上是要掩护一群武装匪徒准备进行疯狂抢劫，为此苏联军队赶往该地并向当时在场的规模不小的人群开枪。主持这次会议的中共干部被逮捕，直到中共旅顺市委书记王其人要求苏联当局对该事件进行调查时这些干部才被释放。 王其人是1945年11月从山东派到旅顺的中共干部，他反对苏联干涉中共的群众动员活动。王公开对抗苏联官员，说道：“蒋介石没有给人民集会的自由，现在你们苏联人也不允许群众集会！”[18]

金县逐渐成为中苏之间围绕着土地改革展开的各种冲突的温床。1947年，许多重要的问题都在梅家村爆发。该村的中共干部公开蔑视苏联的命令，“秘密”进行了土地改革。苏联当局很快发现了此事并立即传召中共金县党委书记陈少景，并告诉陈说要逮捕卷入此事的中共干部。据说该地区的苏军指挥官甚至告诉被卷入这次土改的地主不要担心，因为土改很快就会停止。[19] 中共的一份工作报告也提到了金县的问题，其中讲了这样一件事：苏联当局发现一个未提到名字的村庄进行了土改活动，居然命令中共干部们将一个地主被没收的土地发还回去！[20] 中共干部的工作越受阻，他们就越对苏联人反对他们所有的农村工作并干涉中国内政的态度抱怨重重。[21] 王立志被从山东派到金县担任某地区的领导，像他这样的干部是如此失望，以至于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借口离开。譬如王立志就借口说他不得不回家照顾家人。后来他得偿所愿，回到了原来的根据地工作。[22]

在大连市区召开群众会议批判卖国贼和工头，这样的活动也同样不被苏联人所允许。苏联军队曾驱散了一个由中共干部领导的群众集会，该集会的目的是要控诉几个被指控谋害了中国人的日本人。由于担心会出现大规模的反抗和骚乱，苏联军官甚至派出坦克来驱散人群。[23] 工会领袖柳运光是 1945 年 11 月被从山东派往大连工作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这种公众活动对于中共合法性的重要性："我们要镇压汉奸，反革命，斗地主恶霸。特别是'红房子'那个地方，百姓自己起来斗汉奸，狗腿子。对这样的事怎么办？我们不能阻止，得支持群众，要不我们怎么赢得群众？苏军驻连司令部不允许这样搞。发动群众搞土改苏军更不同意。他们不相信我们的道理。总而言之，莫斯科没有这个政策，你就别动，动了就要纠正。"[24] 韩光被迫向苏联压力屈服，要求到 1946 年底结束这类活动。

在 1946 年一整年与 1947 年初，中共在城市地区最为成功的活动是那些旨在减轻城市贫民最紧迫负担的活动。如果这些活动并不涉及公开斗争或是强行夺取土地和财产，苏联当局是愿意通融和提供一些帮助的。其中有一项运动是在全市范围内，将居住在郊区贫民窟的贫民家庭迁入之前由在大连的日本人所占据的公寓和房屋里。[25]

这些措施确保了暂时的社会稳定，但是大连的中共干部却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如何管理与塑造一个更加长治久安的城市社会？如何让工厂重新开工并同时配备好相应的城市劳动力？此外，中共干部还必须注意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不能与苏联军事当局发生冲突。因为后者在大连的活动自有其安排，更不要说苏联当局本身就在经营城市和管理大工业劳动力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这些独特的政治条件使得大连的中共干部们很早就开始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与多大范围内，中共干部应当听从苏联的意见？一些中共干部发现他们受到了太大的限制；还有一些干部既不信任苏联官员，也不尊重苏联在大连的政策。这些问题在 1947 年达到了顶点——几位大连的中共高层干部开始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反对苏联的控制，并拒绝遵守苏联的政策。

（二）痛苦的加剧：当地中共干部的反抗

中共干部到达大连后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改换行头。这并没有丝毫的夸张，因为根据苏联当局的要求，服务于关东行政公署——1947年4月由苏联人在大连建立的民事政府——的官员们必须讲究衣着。大连的中共干部们被要求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而不是像在中共其他根据地那样穿军队制服或普通衣服。韩光回忆到："[我们]叫这种政策是'西瓜政策'，外面绿、里面红。"[26] 一些中共高层干部十分不愿意适应这种情况。中共大连党委副书记刘顺元就十分鄙视这一规定。他在山东出生和长大，一直是一个农民，对穿西装、打领带一直感到十分别扭。他甚至还因为衣着打扮问题遭到苏联官员的攻击。据称一个苏联官员曾这样对韩光说："你们刘顺元是不是没钱理发？告诉他到这里（苏军司令部）来，我们可以借给他。"[27]

在大连的诸多政策与规定中，有不少是令中共干部感到难以适应的，而适当着装只是其中之一。整个1940年代末期，大连中共干部的构成可谓深具多样性：既有来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也有经验丰富的当地地下工作者，还有像中共大连领导人韩光这样曾经在苏联学习过并熟练掌握俄语的人。他们都是肩负着不同的任务来到大连的。一些人是从邻近的山东省来购买布匹、医药甚至是中共打内战所需的军火的。这些人与当地政治并没有长久的利害关系，他们得到各自所需后就离开了。还有一些人被派到大连来建立各种商贸公司和小型制造业，借此为各自的根据地募集资金。[28] 唐韵超1945年之后负责大连地区的工会工作，像他这类干部就出生在大连地区并一直作为中共地下党在大连工作多年。而像刘顺元这样的中共干部则是从山东迁来为当地政府服务的。由于这种多样性，要制定出一套单一的城市管理方案就变得十分困难。此外，这种多样性也使得中共干部从各自的背景与经验出发，从多个角度来看待苏联当局。

随着1947年中共的使命从控制农村地区转变成将更大的城市中心也囊括进来——这一点在东北地区尤其如此——大连的中共领导人由于上述多样性而引起的各种差别在这一关键时期就开始显现出来。城市要领导农村——这一趋势在毛泽东1949年的公开表态中达到了顶点——

而管理大连的中共干部们当时正好身处这一潮流的最前线。[29] 中共的政治使命正在发生转变。在 1947–1948 年这一时期，许多负责城市工作的干部因为继续试图将农村根据地的政策搬用到城市而遭到了批判。但是在大连，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中共干部与苏联当局之间的各种冲突也是这幅政治画面的一部分。在大连，随着苏联官员的办事风格被广泛推行，当地的中共负责干部与苏联驻大连当局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这一冲突导致 1947 年末出现了由苏联人主导的当地领导层的巨大震荡，由此凸显了在大连地方政治中，苏联权力的大小以及中苏关系所具有的核心位置。

为了更好地理解在大连的中共领导人与苏联当局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里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卷入 1947 年“旅大事件”的两个主要中共干部的背景与活动。抗日战争末期在大连附近的金州从事地下工作的唐韵超于 1945 年来到大连。唐是出生在金州的当地人，整个 1920 年代他都在大连从事劳工运动并因此三次入狱。[30] 唐肩负着将工人组织起来并建立一个大型群众工会组织的任务，1945 年 8 月他从事的主要活动是建立各种护厂队以保护工厂、防止工业设备被偷或被破坏。到 1945 年 9 月初，唐的工会已经拥有来自 52 个各种小工厂的两百名成员。在之后的几个月内，这一数字持续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31] 唐韵超在关照工人和采取激烈对抗策略方面声名卓著，这既为他赢得了追随者的尊敬，也使他遭到了被打击对象的憎恨，其中就包括像张本政这样日据时期的富有商人，因为唐曾要求张向他的工会定期提供捐助。[32]

但是对唐韵超的前途影响最大的是他对待苏联占领军的态度。随着 1946 年末、1947 年恢复生产措施的加强，唐韵超与苏联当局的冲突升级。这一点在苏联控制的工厂中表现得特别明显。[33] 唐韵超对苏联指导的不信任与最终抵抗源于这样几个事件。第一件事曾让唐大丢脸面。大连机车厂是一个曾由日本人经营、现在被苏联人控制的工厂，苏联的工厂领导人告诉中国工人他们正在维护仓库里的设备与新制服。唐韵超经过谈判与苏联人议定了价格来购买这些物品，他打算付款后将这些物品分发给他的工人们。结果他发现他通过谈判购买到的只是成堆的破布和旧制服。当唐韵超要求苏联人归还他的钱款时却遭到了拒绝。[34] 唐韵超被欺骗了，而且他领导的工人们都知道了这件事。

中苏双方在工资问题上也暗藏着矛盾。1946 年与 1947 年大连的工厂经常用粮食支付工人们的工资。唐韵超曾答应在苏联控制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们，会让他们的工资和中资工厂的工资相匹配（中资工厂的工资较高，这是中共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而采取的政策的一部分）。但是他发现，由苏联控制的企业发给工人的工资要比中资企业少五到十公斤的粮食。根据苏联当局的说法，唐韵超在他的工会刊物上报导了此事，甚至允许他的工人称苏联为“帝国主义国家”。1947 年春在欢迎一位苏联远东军区将军的招待会上，唐韵超公开对这些问题表示了不满。对于苏联人来说，唐的行为越界了。在一份控告唐韵超的简要报告中，苏联当局强调了以下事情：唐的工会往往不理睬苏联当局的各种声明，而且从不在他们的出版物上刊载赞扬苏联解放东北的文章。因为唐韵超在工人当中深受欢迎，工人们“赞扬他帮助工人和解放工人”的义举，但却从不提及苏联的援助。[35] 苏联人还指出，由于非常关心工人们的短期福利待遇，唐韵超在处理其工会与苏联人的关系时并不积极乐观。唐在回忆录中提到，高岗宣布他犯了“反苏”罪行——这是已有资料中极少数有关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的文献之一。至此唐韵超在大连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刘顺元是中共在大连的高层干部之一，既是中共大连市委副书记，也是 1947 年 4 月苏联人作为幌子而建立的“民事”政府“关东行政公署”的副主席。[36] 他也是当时最敢于公开批评苏联的人之一。正是因为刘在几个关键政策上与苏联人发生争执，才触发了在大连的中共领导层的大清洗。事实上甚至早在抗议那几项具体政策之前，刘顺元就已经对苏联人的行为方式持有异议了。在回忆录中，刘描述了他所见的苏联联络官在中共各个组织中的压迫行为。他抱怨道：“当时大小部门都有一个苏军代表，大小事情都要他们同意才能办。一切都是命令式的，他们让干什么，不能也不准有不同意见，否则就挨训斥。”对刘顺元来说，最让人不舒服的是苏联人还出现在中共的各种会议中，甚至还出席批判中共干部的会议。“我们党委开个会苏军都派人参加。我们开会争论得那样激烈，他们都看到了，也听到了。这种做法我就看不惯。”[37]

刘顺元与苏联人之间的第一次严重冲突，起因于他对 1947 年苏联当局货币改革的公开批评与不信任。1945 年 8 月苏联军队到达东北后就一直发放自己的军票。中共担心国民党人也许会把从东北其他地区搜集来的苏联军票大批投放到大连市场，这将会对价格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引起更加严重的经济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联当局启动了一个计划来回笼流通的军票。居民可以按照十比一的比例用他们手里的旧军票来兑换新军票。但每人最多只能兑换 300 元（旧军票）。[38] 直到这一计划已准备就绪就要实施，刘顺元与中共其他高层干部才或多或少地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在兑换率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发言权。由于担心这一兑换可能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刘顺元强烈反对这一政策。他甚至命令下属不要理会这一政策。为了缓和局面，苏联当局向刘顺元及其他持怀疑意见的人解释说，他们已经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只会损害富人而非普通工人。[39] 但刘顺元从根本上就不信任苏联人或是他们的政策。

随着刘顺元公开指责苏联人并无视他在苏联人设立的“关东行政公署”中承担的职务，他的反抗已经达到了引发危机的地步。刘指责“关东行政公署”中有资产阶级大商人，因此拒绝参加该政府的任何重要活动。当旅顺的苏联民政局局长命令刘顺元作为“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参加在金州举行的一个庆祝苏军解放东北的会议时，刘索性就没有露面。[40] 后来刘顺元还引人注目地缺席了一次高调庆祝大连解放的会议。

刘顺元拒绝签署一份建立中苏合资企业的协议是将苏联当局惹恼的最后一根稻草。刘自己是这样回忆这些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怕国民党政府来接管大连，更把大连的主要企业和资源，统统改为‘中苏合营’，实际上我们挂个名，还是由他们控制经营。”当苏联人让他到旅顺去签这项协议时，刘顺元断然拒绝。刘回忆说，虽被告知必须要在当天签署，但他一直等到后半夜才最终获准同意看到这份协议。刘顺元拒绝签署，他说自己和其他中共干部必须先要充分地讨论这份协议才行。令刘更加生气的是，当时急切想要签署这份文件的迟子祥，这位以前日据时期的实业家、此时关东行政公署名义上的主席，居然也在场。[41]

由于像刘顺元和唐韵超这样的中共高级干部公开反对苏联的政策，权威问题与在重建大连过程中中共角色的特性问题在1947年达到了顶点。到9月，苏联人已经受够了。9月17日，在与前来视察这一地区工作的东北民主联军领导干部杜平举行的会谈中，苏联军事当局将他们的批评与不满全部都发泄了出来。对于杜平和像韩光这样的当地中共领导人来说，很明确的一点是必须要澄清中共在这一地区的目标以及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唐韵超与刘顺元的行为不会再被容忍。苏联当局告诉杜平说："当你的同志们要与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不应当那么骄傲。如果你们听我们的，就请相信我们，这样这一地区的经济问题就肯定会解决，我们也能对你们的计划提供帮助。"在谈到刘顺元的问题时，杜平被告知："刘不明白，这里是苏军监督，他认为不要监督，认为这里同解放区一样，由中共来领导，不同意苏军政策。"苏方还批评说："刘认为，把资本家，地主的钱拿出来帮助前方。我们认为，经济问题需有各界合作，如资本家、工人、老百姓。"苏联人指责刘顺元和其他中共干部在大连实行了其他解放区实行的策略与政策，并且无视苏联的权威。[42]

在杜平看来，必须采取某些行动，否则冲突将会继续。作为对苏联人批评的回应，1947年10月韩光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以明确目前在当地的中苏关系这一问题上"正确的路线"应当是怎么样的，并号召要彻底解决大连的中共干部与苏联当局之间仍然拖而未决的冲突。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以苏为主"的政策以号召全面加强当地的中苏关系，该政策成为当地政治图景的核心特色。[43]像韩光这样的高层干部现在被夹在中间，对于他们来说，在持续不断的中苏冲突继续损害着当地干群关系这一背景下，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执行这一新的路线。

（三）收拾残局："以苏为主"

当1947年末政治冲突与举行的会议所带来的乌云散去之时，苏联人成功地要求中共调走了大连党组五个高级干部中的三个。大连的中共领导核心被彻底清洗。中共失去了唐韵超这位很受欢迎的、当地最大工

会组织的领袖，也失去了党委副书记刘顺元。同时被赶走的还有负责警察事务的边慎斋，以及其他几位劳工组织者。[44] 边慎斋被赶走是因为他“偷偷增加生产而不通知苏联当局”。[45] 这一事件反映了苏联在大连拥有多大的权力。很明显，公开批评苏联的政策与苏联当局的权威，会给中共干部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必须指出的是，1947 年末这些会议召开时正值中共反左倾运动开展之时，在这次运动中，像刘顺元、唐韵超这样的干部所坚信的许多东西都遭到了攻击。[46] 但是要赶走刘顺元与唐韵超的最初导火索却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苏联的权威。东北地区的中共高干们都认为，这些干部在批评苏联时越过了界。换句话说，中共与苏联当局的关系是当地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中共统治城市中心的新政治路线正在向右倾斜，趋向采用更加苏联式的政策与改革。对于大连的中共地方干部来说，这意味着接受苏联权威。如果不考虑与苏联人的冲突，像刘顺元与唐韵超这样的干部是否会被当作左倾分子而被赶走？根据向其他干部解释为何处分这些人的中共内部文件和会议记录，刘唐二人犯的主要错误是他们对苏联当局的傲慢无礼。刘顺元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曾得到像刘少奇这样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向他说明他为什么要理解新路线并与苏联人一起合作。尽管被赶出了大连，唐韵超与刘顺元还继续在其他地方担任要职。[47]

韩光在 1947 年 10 月会议上提出的要点之一，就是“关东党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控制这一根据地的苏方并按他们的要求来进行工作”。另一要点是在“群众中要大胆宣传苏联，宣传苏联政策”。[48] 这次会议还指出，迫切需要在苏联当局与中共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特别是在政策执行方面。韩光很清楚，尽管中共高级干部在拒绝认同苏联权威、认为大连与其他解放区没有区别这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苏联军事官员的态度也应受到谴责。韩光说：“对苏军某些人员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和出现违纪事件，不一味容忍迁就，而以同志式的态度，提出认真严肃的批评。”[49] 韩光总结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对于关东季节工及生活管理是无计划。我们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发展经济的计划。”中共的任务现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推行新的口号“发展生产、安定民生”，另一方面

是在这样做时要服从苏联人的要求。[50] 但讽刺的是，从像韩光这样的地方领导人的角度来看，要做到后一点往往会阻碍前一点的实现。

中共自己通过 1948 年的整风运动进一步巩固了新路线。负责东北事务的中共高级干部专程赶到大连来解决过去刘顺元与唐韵超所犯的错误并实施未来的计划。中共东北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人张闻天为大连的高级干部召集了一次会议。在开场白中，他这样评论到："地委责任同志在思想上有些毛病，如阶级关系上、作风上都有毛病。好在有苏联帮助，路线上，基本政策上不出大乱子。苏联比我们高明。"[51]

但是把苏联人放在第一位在大连究竟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城乡的阶级斗争要让位给增加生产，后者成为主要目标——这一点在中共与苏联当局之间已经达成共识。听从苏联的指挥也意味着建立并利用一套司法体系来处理社会问题和犯罪。在全中国已经解放的地区，中共已经非常习惯通过群众集会来进行惩罚。但苏联人则希望这种惩罚关起门来进行，即在法庭范围内进行。因此他们建议中共建立各种司法、警察与检察系统来管理社会。[52] 苏联人还"要求中国同志借此机会向苏联同志学习管理国家、工厂、企业，经营贸易，锄奸保卫，宣传教育等等工作经验"。[53]

所有这些，都与 1947 年末到整个 1948 年期间为人所熟知的中共政策的著名转变相一致。[54] 就像在其他被中共占领的城市中心一样，大连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两条路线的冲突：一条路线是亲苏的，另一条则更倾向于本土政策。但当地存在着苏联军事当局这一现实令大连的情况更加复杂。尽管被要求服从苏联人并向之学习，但许多大连的中共干部仍然对服从苏联政策这一点心存疑虑，因为他们与苏联人一起工作时所获得的直接经验是如此糟糕。当时在这些抱着怀疑态度的干部中流传着一段叫做"以苏为主，以我为奴"的讽刺性顺口溜，就反映了这种疑虑。[55] 向苏联权威的屈服，不仅意味着要学习国外专业知识，还意味着当地干部在应对不断出现的中苏之间新冲突时身处困境。

像韩光这样的中共地方领导人因此处于这样一种困境之中，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实施这一政策转变，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与苏联当局不断出现的冲突。为了达到目的，1948 年 3 月 15 日韩光和大连其他中共高级领

导干部向驻旅顺的苏军司令部发出了一份措辞谨慎的六万字长信，其中概括了中共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份文件对理解中共当时是怎样看待苏联对待中共地方干部的态度这一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还可以让我们对苏联人究竟想从对大连的控制中获得什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该文件提到的问题中，包括这样几个：税收与贸易、苏联对中共“群众”工作的不断干涉、公开的关东民事当局与苏联自己的民事管理机构之间缺乏沟通。[56]

中共与苏联在贸易和税收问题上的冲突揭示了苏联对大连经济的控制达到了何种程度。苏联军队完全控制了大连规模庞大的港口设施，并利用自己的军用船只将货物免税出口到苏联，但是苏联的民用船只则必须纳税。1948 年春，苏联一艘非军用商船在大连的一个码头靠岸，并要求中国码头工人为其装盐，但该船船长拒绝为其船只纳税。听到这个消息后，韩光命令码头工人罢工，直到问题解决后才为这艘船装货。在与苏联军事当局进行了几轮沟通之后，问题得到了解决，苏联人答应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57] 对于韩光来说，问题不仅仅是对盐运进行课税这么简单。如果苏联在大连的代表都会欺骗中共干部，那么又怎么能指望当地的中共干部们向苏联学习呢？

韩光的这封信还反映了苏联为获得并保护其在大连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的其他手段，即使这些手段最后损害了中共实施自己计划和兑现对当地人民承诺的能力。韩光抱怨的主要内容涉及到苏联人对贸易的管制以及伪造出口记录。一个例子就是用盐（大连的地方特产）来交换宝贵的化肥，毫无疑问这是中共为帮助当地农民而做出的许诺之一。苏联人本来要用预先说好的一定数量的化肥来换这些盐。但是收到盐后，苏联人却并未向中方交付已经承诺了的化肥。结果就像韩光所说的，这极大地损害了中共在这一地区的农业计划。韩光还谈到了中苏双方在像花生这样重要的地方作物的价格管制方面所产生的矛盾，因为苏联人要求进行“自由买卖”、以低价来购买花生。[58]

因为强调生产，苏联人还下令减少大连的节假日。对于已经答应工人要有一定休息与节假日的中共来说，这也成了一个问题。韩光在信里专门提到这是如何让中共官员名誉扫地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宣布取消一个已经答应实行的假日安排。中共干部原计划在 1948 年 3 月 8 日国际

妇女节这一天让工人们休息。但就在中共大肆宣传了这一计划后，苏联当局却命令取消这一节日。韩光提到，这严重地打击了中共领导的妇女联合会与关东行政公署的合法性。甚至连因苏联人才获得政治职务的迟子祥也抱怨说："这里的事，主席也好，副主席也好，县长也好，市长也好，没有司令官的同意，什么也办不通。"[59]

1949 年 4 月，大连的中共最终可以公开活动。这一行动本身对于当地的中苏关系来说有很大好处，而对中共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现在可以在地方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和公开的作用。此外，在这一年的 9 月，中共干部与苏联军事当局在大连的工作开始向整个新中国进行展示。当时大连举办了一个重要的工业展览会，吸引了大约 30 万的访问者前来这座城市参观。这次展览旨在展示大连工业基地重新恢复后所取得的成就，但大连本身也构成了展览的一部分。在关于"新大连"这个词语的定义中，中苏关系是其中颇为引入注目的一部分。各地出版的杂志上都刊登文章，称赞大连是"新中国的模范城市"，其特点是"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每个人都在辛勤工作并分享其成果的城市"。[60] 这次工业展览会的最后一个展馆为"中苏友好大会堂"，其展览主题包括中共与苏联关系史、苏联军队为东北解放而进行的英勇奋斗，当地工业、教育和文化成就的展示，所有这些都指明：是苏联帮助了新大连的建设。[61] 有一群记者甚至宣称大连将会是"工人们的天堂"。[62]

但对于当地许多中共干部来说，治理大连却是一次痛苦的学习经历，因为他们自己的政策措施往往受到苏联当局的质疑与阻挠。苏联人想要维持秩序并从这一地区获得经贸上的好处，因此经常忽略中共的利益，甚至损害中共的需求与计划。被从大连撵走的劳工领袖唐韵超，在读到有关大连成为工人阶级天堂的报道时必会心存怀疑。但是大连的确发生了变化。从 1947 年的冲突到 1949 年大连成为"模范城市"这段时间里，中苏之间的纽带确实得到了加强。1950 年之后才开始出现了真正的不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一项条约，苏联对大连的军事统治正式结束。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在整个朝鲜战争时期苏联军队仍然驻扎在大连以保护这一地区免受来自美国的可能打击，但是苏联人已经不再拥有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统治权力。[63]

二、从“大鼻子”到“老大哥”：大连的中苏文化关系，1945—1952年

当然，大连的中苏关系还有另外的一面。大连的普通人是如何经历为期十年的苏联军事管理的？同样重要的是，中共是如何动员大连的居民支持自己的计划、同时又与苏联的权威保持一致的？对苏联或者其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当地居民，同样很可能会质疑苏联军队为什么要控制大连。苏联人在他们眼中是外国人。苏联军队强奸妇女、劫掠百姓和搬走工业设备的故事在当地是众所周知的。当地居民经常用带有种族意味的蔑称来描述苏联军队。在有些情况下某个苏军指挥官的态度与行为会引起当地人的谴责。[64] 一些大众宗教组织还利用当地人对外国驻军的恐惧与愤怒来进行反苏、反中共的宣传。[65]

如何扭转对苏联当局的负面看法，是大连的中共干部遇到的主要挑战之一。他们面对着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如何在解释这一地区的苏联军事存在的同时，在当地群众中建立自己的威信和组织。为了完成这一多重目标，同时也为了向国际社会加强中国马上就会像苏联一样享受社会主义果实的印象，中共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其中包括利用电影、报纸和各种社会组织，甚至模仿苏联建立起儿童夏令营等。中共的这些举措说明他们当时在尽可能地向当地社会的各个阶层传达一个信息——在大连认同苏联的权威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选择——为此中共做出了巨大努力。

中苏友好协会

在大连推广苏联文化的各种组织中，最受欢迎的是中苏友好协会。第一个这样的友好组织形成于1945年下半年，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借以在大连进行活动的外围组织。[66]1947年之后，根据中共加强当地中苏关系的新要求，中苏友协的作用大大增强；到1949年，据称该地区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成为中苏友协八百多个分会中的成员。中苏友协通过电影、报纸、杂志、演讲与讨论会等方式来宣传苏联文化，这些分会同时也是中共干部讨论与倾听人民对苏联的感觉的重要场所。[67] 到1949年，关

东中苏友好协会宣称共举行了 180 多场的图片展览和 3,000 次讨论会，并放映了 700 部苏联电影。[68]

关东中苏友好协会的主要出版物《友谊》曾刊登了几篇文章，强调协会下属的讨论小组是如何活动的。这些讨论小组的任务是教育人们了解苏联，并说明苏联军队在解放大连与帮助大连建立新社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些文章中，有一篇描述了在大连最穷的地方之一寺儿沟举行的一场中苏友协会议。一开始，中共干部主持召开会议，并向当地居民讲述苏联的社会主义，结果发现人们对他们所讲的东西毫无概念。最后居民们确实获得了“苏联是好的”这个信息。然而一位参加了这种会议的榨油厂工人却这样说:“我知道苏联是好的，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并不了解它怎么好，是不是和社会主义一样？”[69]

有些工人怀疑苏联对辽东半岛的企图。在听了关于大连殖民压迫史的演讲后，有一个工人提出了一个极具煽动性的问题：“这里过去就是俄罗斯的租界，现在怎么就被苏联人解放了？苏联人不是俄国人吗？到底怎么回事儿？”[70] 为了更详细地宣传苏联的经验和说明苏联军队在大连的作用，中共干部在随后的会议上花了更多时间来介绍苏联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这些讨论包括介绍苏联的劳工状况、工厂的工人生活、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妇女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等。中共干部还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解释苏联的对外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苏联军队在“解放”大连中的作用。[71]

为了让人们对驻大连的苏联军队形成良好的印象，中共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宣传会上讲故事。组织者通常会邀请一位讲演人，讲述苏联士兵帮助当地中国人的英雄事迹。这些故事被搜集起来，并在各种会议或报纸上广为传播。有趣的是，这些信息往往在当地中苏关系究竟为何这一问题上给人们造成了彼此冲突的印象。一方面，在电影与报纸上苏联被描绘成社会主义的天堂，是中国某一天也要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像寺儿沟这样的贫困地区，当地人正把苏联人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他们认为苏联人与自己非常相像，都是穷人。例如某烟草厂的工人李先生在听完一个关于中苏友谊的故事后大声喊道：“瞧，我们的苏联老大哥真是伟大，这就是说天下穷人一家亲。”[72]

尽管存在上述那些混杂的信息，中苏友好协会和当地报纸还是大量散播这些中苏友好故事用以向一般公众宣传中苏关系。到1950年代初，在大连散播的这些故事主要有这样几个主题。一些故事回忆了苏联士兵在帮助当地中国人时的英勇行为，在这些故事里，情节经常是苏军挽救了一个孩子或老人的生命。[73] 另一个主题是对家庭的强调。在大连，这类故事对苏联人的称谓已经比“苏联老大哥”这种熟悉的提法更进了一步。在这些故事里，正是苏联军人被带入了家庭叙事，比如中国儿童会在故事中宣称要把他们的爱敬献给“苏军叔叔”与苏联母亲。[74] 对于将在大连的苏联人宣传成中国人的保护者与帮助者这种形象来说，上述母性化的叙述主题非常有力。

还有些故事是用来反击把苏联军队作为“外国人”的各种负面形象的。例如宋峰筹这位六年级的小学生就写了一篇题为《我爱苏军叔叔》的文章。他文章中的这个“叔叔”是一位住在他家隔壁的苏联官员，他就根本不像其他外国人。宋问道：“过去我们生活在南京蒋介石匪帮政权统治下，我曾经见到过美国士兵并很担心我的生命。为什么我见到苏联士兵不仅不害怕，而且在他们身边还感到很放心呢？”宋的妈妈给出了理所当然的答案，因为“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苏联人是和我们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75] 这就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正是社会主义的共同纽带将外国士兵转变成更加熟悉的人。在上述事例中，外国士兵变成了家庭的一员。

母亲是中苏友好故事中经常出现的另一个主题，而苏联妇女收养中国儿童的故事更是屡见不鲜。1955年最后一批苏军及其家属撤出大连时，这类故事开始大量出现。这些故事通常以在火车站的泪别为高潮：一个中国人留下来，看着他或她的苏联家庭成员回国。例如，有一份日报刊登了杨守明的故事。她与一个苏联家庭一起生活了九年。在文章中，杨守明回忆道：苏联母亲“爱我就像我的亲生母亲。我相信所有的苏联母亲都爱所有中国的孩子”。杨写下了这个家庭离去给她带来的感伤：“我最亲爱的妈妈，我最亲爱的哥哥姐姐们最后离开了我，除了悲伤我还能做什么？”[76]

与1940年代末中共干部与苏联当局之间非常真实的政治紧张相比，这些故事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人们很难想象，对苏联当局曾经相当普遍的冷淡、彻底的憎恨和公然的反抗是如何迅速转变成家庭成员之间的敬爱的。显然，对生活在大连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故事并没有反映真正的现实。中苏友好的故事是要让苏联军队显得更加人性化——这些经常是通过家庭式的语言和修辞来实现的——并要树立苏联军人对中国居民即热心又友爱的形象。这些故事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和1955年苏联军队撤出大连前的几个月达到了高潮，此时中苏之间的大部分政治冲突已经结束，接受苏联的存在成为唯一的政治选择。这些故事是让人们接受这一点的一种方式。当在大连的苏联人被描绘成富有爱心的母亲与英勇善战的士兵时，人们怎能继续蔑视他们？同样，在中苏友好协会举行的会议上，中共干部向工人、家庭妇女和学生们灌输了太多的苏联形象和信息，这些都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批评苏联在大连的政策。

正因如此，中苏友协的工作是两方面的。基于对1947年大连事件的反应，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传播有关苏联文化的信息，让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深入人心，并树立苏联人在大连的正面形象。中苏友协的这些活动也代表了一种方式，说明中共是如何适应当时由苏联当局所确定的独特政治条件的。虽然在1949年之前中共还不能将其计划向工人这样的重要社会群体公开，但中共干部还是借助中苏友协来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和接受，而且也可以借此进行重要的地下工作，以便为中共不受苏联干涉自主管理大连那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在此意义上中苏友协代表了一种重要的妥协，它满足了中共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需要，同时又能作为重要的组织机构来帮助中共发动重要的社会群体并教育他们了解社会主义事业。中苏友好协会大肆公开赞扬苏联军人，并且努力让苏联军队及其家属看起来更加人性化，这都是旨在展示苏联军队到大连来是要帮助当地人的。他们拯救儿童，他们保护大连不受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他们被中国人当作“家庭成员”来爱戴。换句话说，苏联军队属于这里。

通过将大连塑造成一个“中—苏”城市，像中苏友好协会这样的组织同时也有助于将大连整合进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里，大连

不仅受益于苏联军队的存在，同时也仿效了苏联经验来建设城市社会。1940年代末，中共干部未能以和其他解放区同样的方式来对大连进行改革，他们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中共干部被迫进行了妥协，通过设立组织，大力宣传中苏友好团结并许诺一个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唾手可得，他们的工作才得以进行。社会主义是在中苏友好的大框架下被介绍给大连居民的，其方法与信息都借自苏联。

大连的经历突出显示了中苏双方在发动革命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方面的不同特点。对被派往大连工作的中共干部来说，对比他们在农村根据地所使用的策略，苏联人在那里的行为与法规制度被看成是奇怪的，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就像许多征服性的政权一样，苏联当局强调保持秩序，这在他们占领大连初期时尤其如此。相反，中共的农村战略旨在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性的社会革命，不太重视经济稳定与工业重建。随着政治风向的改变要求大连的中共干部去取悦苏联人，中共自己在城市治理问题上也开始非常强调苏联的样板意义。大连的中共干部们努力在苏联的权威下开展工作，而这经常意味着要改善中苏关系，并意味着为了中国的未来，大连要效仿苏联模式。

本章突破了1949年的界限，并将1950年代看作是自1945年8月开始的社会重建与秩序恢复这一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要了解1950年代初期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承认存在着一个更长的接管时期，该时期要回溯到1945年。大连这个例子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城市变迁的理解，它也提出了一些可以与其他城市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问题。像大连这样受苏联影响很大的城市的经历，与像上海这样后来才解放、苏联的影响并不强大的城市相比，有着怎样的不同？大连在二战后的经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线，可以借此来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各个主要城市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

1950年代初期，大连摆脱了四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恢复时期的一个核心地区。在向新中国大力宣传大连的1949年工业展览会期间，有位到访的参观者赞扬了大连这座模范城市。但是他的报告也暗示了某种不确定性。这位作者提到，必须要确保大连在未来能“面对”整个国家，确保大连在未来发展中获得的好处将不仅限于

对大连自己有益。[77] 这位作者很可能是在担心苏联会与中国分享大连的财富——因此才需要“面对”中国。虽然当时的意识形态与经济现实都要求中苏双方建立更大的联系，但是对于经历过 1940 年代末期中苏政治冲突的中共干部来说，下面这一点肯定是极具讽刺性的——那个为纪念苏军解放大连而树立的、在大理石基底上拿着机关枪的苏联士兵铜像，他的眼睛盯着大连市政府的窗户，好像在监视着所有事情。

姚昱译

注释

1 《大连日报》，1955 年 5 月 9 日–10 日。

2 张玉芬：《大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寻踪》，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69–71 页。

3 万杰夫：《苏军驻金县的情况》，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苏联红军在大连》，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15 页。

4 夏振铎：《苏联红军在大连十年素描》，《大连春秋》第 771 辑，1995 年，第 30 页。到苏联撤出大连时，其军队数量已经降到了 12 万人。

5 Dieter Heinzi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0: 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 (Armonk, N. Y.: M. E. Sharpe, 2004), 51–125, 348, 415.

6 国民党人在 1949 年 9 月任命了一个市长。不过这位被任命的史毅（音译）市长，在大连从来没有展开过哪怕是一天的工作。

7 Paul Paddock, *China Diary: Crisis Diplomacy in Dairen*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38–39.

8 《苏联红军在大连》，第 17–18 页。

9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也见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及 James Reardon-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 The Origin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10 旅大地区包括了大连、旅顺、金州与其他被称为关东租界的前日本殖民地区。

11 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25 页。

12 大连市公安局史志研究室编：《大连公安史选编》，大连：大连北海印刷公司，1985年，第1卷，第277页。

13 《大汉奸张本政》，《大连春秋》，第744辑，1994年，第34–36页。

14 韩光：《旅大八年》，《苏联红军在大连》，第65页。

15 韩光：《关于大连解放初期党若干情况的说明》，《大连春秋》，第831辑，1996年，第8页。

16 董希政：《苏军在旅顺的十年》，《大连党史》，第53期，第1辑，1991年，第16页。

17 万杰夫前揭文，第208–215页。

18 王其人：《处理与苏军当局关系的几个原则》，《苏联红军在大连》，第105页。

19 万杰夫前揭文，第213页。

20 《中共大连区党委关于三年来中苏关系的总结报告》，《苏联红军在大连》，第307–310页。

21 《张闻天在东北局组织部召开的大连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苏联红军在大连》，第288–290页。

22 万杰夫前揭文，第213–214页。

23 谭松平：《接管大关场警察署与建立中山区委》，中共大连市中山区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山春晓》，大连：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6页。

24 柳运光：《我所了解的苏军》，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大连卷》，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红房子”是由一家日本企业建造的一栋很拥挤的建筑，到大连码头从事季节性工作的中国临时工往往会住在那里。

25 在大连有三次大规模的遣返日本人浪潮，最大的一次从1946年12月一直持续到1947年4月，共有18万日本人被遣送回日本。见《大连港史》编委会编：《大连港史》，大连：大连出版社，1995年，第242–244页。

26 韩光：《旅大八年》，第64页。

27 丁群：《刘顺元与“旅大事件”》，《新华文摘》，1996年第5期，第142页。

28 见兆基颤：《晋察冀边区驻大连的办事机构》，《大连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6期（9月），第23–32页。

29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Lanham, Md: Rowan and Littlefield, 1999 [1978]), 331. Pepper引用了毛泽东1949年3月5日的著名声明：“从城市转入农村，城市领导农村的阶段现在开始。”

30 刘功成、王彦静：《二十世纪大连工人运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6–447页。

31 唐韵超：《解放初期的大连工人运动》，中共大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解放初期的大连》，大连：大连日报社印刷厂，1985年，第18页。

32 唐韵超：《重返工运战线》，《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157–161页。

33 苏联人在1945年8月接管了大连主要的日本重工业企业，后者于1947年成为中苏“联合企业”。这些企业包括了大连造船设施、一个石油精炼厂、一个发电

厂、制盐设备，总共超过 30 个厂矿企业。祝丽：《纪念苏军解放大连 52 周年》，《西港文史资料》，1997 年第 4 期，第 135 页。

34 唐韵超：《日本投降后苏军在大连的情况》，《苏联红军在大连》，第 86 页。

35 《巴申与杜平谈话纪要》，1947 年 9 月 17 日，《苏联红军在大连》，第 279–280 页。

36 关东行政公署建立于 1947 年 4 月，这是根据雅尔塔协议建立的名义上的“本地区民事政府”。以旅顺为司令部的苏联军事当局也有其负责处理民事管理的机构，中文文献称之为民政局。由中共控制的关东行政公署的所有政策与公开声明都必须首先由苏联军事当局的民政局批准。

37 刘顺元：《中共大连党组织与驻连苏军关系》，《苏联红军在大连》，第 76–77 页。

38 王世明：《旅顺解放初期与苏军关系的回顾》，《苏联红军在大连》，第 114–115 页。

39 《巴申与杜平谈话纪要》，第 278–279 页。

40 《关于联共与中共同志在完成巩固关东苏联海军军事根据地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关东党委，1948 年 3 月 15 日，《苏联红军在大连》，第 292–299 页。

41 丁群前揭文，第 142 页。

42 《巴申与杜平谈话纪要》，第 278–279 页。

43 《关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苏联红军在大连》，第 284–285 页。

44 丁群前揭文，第 139 页。

45 《巴申与杜平谈话纪要》，第 278–279 页。

46 Pepper, 377–381.

47 刘顺元被任命为山东省委副书记，而唐韵超去了哈尔滨组织工会。刘顺元前揭文，第 76–77 页。

48 《关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第 284 页。

49 梁恩宝编：《旅顺晨光（1945–1956）》，旅顺：旅顺党史出版社，1993 年，第 55 页。

50 《关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第 284–286 页。

51 《张闻天在东北局组织部召开的大连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苏联红军在大连》，第 288–290 页。

52 韩光：《旅大八年》，第 63–64 页。

53 《韩光、袁守华与巴申同志、安特罗波夫同志谈话纪略》，1948 年 3 月 16 日，《苏联红军在大连》，第 300–306 页。

54 见 Pepper, 377–381。

55 《伍修权在东北局组织部召开的大连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苏联红军在大连》，第 288–290 页。

56 《关于联共与中共同志在完成巩固关东苏联海军军事根据地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关东党委，1948 年 3 月 15 日，《苏联红军在大连》，第 292–299 页。

57 韩光：《旅大八年》，第 59 页。

58 《苏联红军在大连》，第 293–299 页。

59 同上，第 296 页。

60 陈琪英：《大连：新中国的模范都市》，《旅游杂志》第 23 卷第 11 期（1949 年 11 月），第 1–8 页。

61 志成：《参观中苏友谊馆谈伟大的中苏友谊》，《民主青年》，第 80 期（1949 年 11 月 5 日），第 9 页。

62 李宗瀛、浏士伟、廖冰兄编：《东北行》，香港：大公报出版社，1950 年，第 52–53 页。

63 1950 年 2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结束了苏联对关东地区的军事控制，并规定苏联在 1952 年底撤出大连。

64 万杰夫前揭文，第 211–215 页。

65 大连公安局编：《大连公安历史长编》，大连：大连印刷工业总厂，1987 年，第 141–152 页。

66 刘影：《大连中苏友好协会》，《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 294–303 页。还见 Klaus H. Pringsheim, "The Sino-Soviet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ctober 1949–October 1951)" (master's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59)。

67 《市友协一年半工作总结》，《友谊》，第 3 卷第 8 期，1948 年 10 月 15 日，第 18–21 页。

68 刘影前揭文，第 294–303 页。

69 归芳：《介绍寺儿沟区友协分会》，《友谊》，第 3 卷第 5 期，1948 年 9 月 1 日，第 13 页。

70 《沙河口区友协工作与社教工作结合》，《友谊》，第 3 卷第 1 期，1948 年 7 月 1 日，第 15 页。

71 《市友协一年半工作总结》，《友谊》，第 3 卷第 8 期，1948 年 10 月 15 日，第 19 页。

72 归芳前揭文，第 13 页。

73 见《救命恩人》，《大连人民日报》，1955 年 6 月 6 日。也见《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什么》，《大连人民日报》，1955 年 5 月 28 日。

74 《我爱苏军叔叔》，《大连人民日报》，1955 年 6 月 6 日。也见杨守明：《做苏联妈妈最喜欢的人》，《大连人民日报》，1955 年 5 月 28 日；厉风：《莉娜（徐桂英）和她的妈妈》，《中苏友谊的故事》，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55 年，第 69–73 页。

75 《我爱苏军叔叔》。

76 杨守明前揭文。

77 张沛：《大连访问概要》，东北新华书店，1949 年，第 74–75 页。

第八章

绿洲的召唤：1949–1953 年的新疆“和平解放”

高峥（James Z. Gao）

在与国民党进行了漫长的角力之后，中国共产党终于在 1949 年取得了中国大陆的全面胜利。面对不同的政治与文化生态，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各种举措来管制和改造地方社会。在汉族人口占少数的各个边疆地区，中共这个新的统治者理所当然地遇到了更大的挑战。然而，有关中共接管政权的已有研究基本上只涉及到了汉族聚居的中国腹地，并未揭示 1949 年革命对于中国边区及少数民族的影响。[1] 为弥补这一缺憾，本章将探索中国共产党挥师挺进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意义——即众所周知的“和平解放”新疆。

本章从边疆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共对新疆的接管，认为这既是一个政治改造的革命事件，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的衍变过程。本文首先检视各种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在新疆地区的互动（包括了汉族与非汉族、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互动），然后再观察导致中共接管新疆的各种环境因素，最后以述说人民解放军的女战士到达新疆并在那里安营扎寨的故事结尾。作者认为，数万名汉族女兵奇迹般地安家边陲、创建绿洲，标志了新疆“和平解放”的最终完成。

一、边疆政策

新疆是17世纪满族人通过军事扩张拓展出来的边疆地区。当时，当地的哈萨克与维吾尔人仍以小群聚居，彼此鲜为来往。新疆首府迪化（即今天的乌鲁木齐）建于1763年。第一批汉族商人是与满族军队一起到达此地的，他们很快发现这里有进行贸易与交换的良机，于是将农业产品运到迪化城，开辟了汉族与非汉族人展开最初接触的新边疆。满族皇帝乾隆之所以赐与这个城市以迪化之名（意思是启迪教化），是希望新疆地方政府不仅能统治土地，还能教育与同化土著人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迪化一直并非这个地区的中心都市，而仍然是一个本土文化与入侵文化不断交汇碰撞的边缘地带，大多数的当地人继续生活在塔里木盆地中彼此隔绝的众多绿洲里。

陆德生（Justin Jon Rudelson）曾指出："新疆各个绿洲的历史焦点既非指向自身内部、也非指向彼此，而是指向穿越边界的外部。"[2]事实的确如此，沙漠绿洲之间的交流反而不如绿洲定居者与外界的联系来得紧密。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受到了印度文化的浸润，新疆北部则受到西土耳其斯坦地区的影响；新疆西北部指向了中亚诸国，而东部则与中国核心地区紧密相连。[3]

核心—边陲的二元结构是中国长久以来的特征——即中国核心地区控制着像新疆、西藏、内蒙古这样的边陲地区。但在新疆人民看来，中国核心地区反而是他们的边陲地区，在中国核心地区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对于他们来讲都只有次要意义。无论是1911年革命还是中日战争，都未直接影响到新疆。绝大多数新疆人都以一种挖苦的眼光看待中国核心地区发生的政权更迭。中华民国第一个新疆总督杨增新看不起北京的所有军阀政府，但是他根据"认庙不认神"的原则承认每一个中央政权。根据这一信条，无论谁将在南京或者北京上台，他的继任者一直准备与新政府打交道。[4]这是因为许多边疆地区的政府官员都是汉族人。他们对非汉族土著居民的权威因为中央政府的承认而得到加强，他们对其对手和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也变得合法。[5]同时，自清朝以来新疆地方政府的

军事供给与财政收入都仰赖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敬庙不敬神”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它既可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又可以使地方政府避免与中国核心地区发生冲突。

到中华民国时期，由于交通运输的不发达和南京政府财政支持的逐步减少，“新疆（新的边疆）”与中国核心地区分离开来，新疆成为“附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区”。[6] 汉族军阀盛世才统治新疆长达十一年并建立了自己的极权王国。1934 年蒋介石计划耗资 1,500 万元、动员 15 万人的部队讨伐盛世才，但是蒋被告知，他的部队不能确保会得到充足的食物、水、燃料及其他供应。[7] 当蒋介石撤销这一计划时，盛世才评价说：“蒋介石并不喜欢我的政策，但是他拿我没办法。我对他是鞭长莫及。”[8] 蒋介石之所以在盛世才被迫离职后还任命他为农林部部长，因为蒋介石认为盛虽然残暴独裁，但他“并未宣布对南京政府独立、也未让俄罗斯人吞并新疆”。[9] 但在非汉族人看来，盛世才的离职只不过是一个汉族军阀取代另一个汉族军阀，当地非汉族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仇恨以及接二连三的叛乱一直未变。对于新疆的汉族省政府来说，要渗入农村地区仍然困难重重。苛税与劳役曾数次激起了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的造反。“汉”这个词成为压迫与腐败的同义词。世代居住在沙漠绿洲上的人们“为了与汉族竞争”，发展出了“维吾尔族的民族认同”。[10]

不过，除了压迫和冲突，新疆的边疆史也是一部关于合作和同化的历史。虽然迪化成了暴政的象征符号，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来迪化上学、经商或参政。为了统治这个边疆城市，汉族统治者不得不寻求当地盟友，采取了一种“利用阿訇维持治安”的策略。[11] 在 1940 年代，国民党人开始招收年轻的维吾尔族城市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机关。被认为具有“强烈祖国（中国）观念”的包尔汉（Burhan Shahidi）被任命为新疆省长。[12] 但即便是像赛福鼎·艾则孜（Saifudin Azizi）这样亲中国的维吾尔族政府官员也未能改变国民党的政策——真正的权力必须掌握在汉族军事领导人的手中。

20 世纪上半叶新疆边疆史的特点是军阀主义盛行与外国影响的不断加强。与其他边疆地区一样，新疆也遭到许多外部势力入侵，例如土耳其、俄罗斯与英国势力。在彼此长期的较量中，没有任何单个外部势

力能成功地在新疆建立自己的统治。盛世才与莫斯科结盟以稳固其独裁统治，而张治中则利用泛突厥主义领袖麦斯武德（Masud Sabri）来限制俄罗斯的影响。新疆的地区政治不断发生转变，其背景就是外国势力的插手。

当沙皇俄国将注意力放在对新疆进行政治与经济扩张时，奥斯曼帝国则在新疆发动了文化渗透。早在 1915 年，喀什就建立了几间小学，向儿童教授伊斯兰教与泛突厥主义意识形态，“一些土耳其人经常给伊斯兰伊玛目与我们的军事官员发放各种小册子与信件，以此宣传伊斯兰教和泛突厥主义。”[13] 俄罗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也在迪化建立了学校并向新疆出口图书、报纸与电影，并为当地人专门制作了广播节目。

苏联在新疆的影响之所以得到增长，主要是因为苏联两个彼此矛盾的政策。一个是支持国民党汉人政府，目的是为了确保苏联在与汉人政府进行条约谈判时可以获得政治与商业上的特权；另一个政策却是煽动哈萨克人或维吾尔人进行反汉叛乱，以建立俄罗斯的权力基础。1944 年苏联策动并援助了伊犁暴动——即著名的“三区革命”，试图将这次反汉、反蒋介石的暴动转变成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苏联人很快就发现在造反者中存在着强烈的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倾向，莫斯科未曾预料到“三区”的穆斯林独立思潮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苏联对自己国内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控制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

1949 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沿着各条战线迅速推进，西北地区的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在迪化，学生和知识分子分裂成亲苏与反苏两派。我的一个受访者阿卜杜拉希姆·阿敏（Abdurahim Amin）1949 年时是新疆学院的一名新生，他讲述了彼此敌对的学生团体在学校争夺新生的情况。阿明回忆说，一天晚上新疆学院放映了苏联电影《海军上将乌萨科夫》（*Admiral Usakof*），这部电影描写的是沙皇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几场战争。当电影演到土耳其人打败俄罗斯人时，亲土耳其的学生反应狂热，而当电影描写俄罗斯摧毁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时，亲苏学生高兴得跳了起来。这部电影的放映随后因为两派学生发生打斗而被中断。[14]

在这所大学里，极受学生欢迎的新疆学院教授艾沙·优素福·阿布泰金（Isa Yusuf Alptekin）详细阐述了他要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伊斯兰

国家的梦想。他辩称“东土耳其斯坦（新疆）一万年来就是维吾尔族人的故乡，所以在东土耳其斯坦只有维吾尔族人才有做主人的权利，其他各民族都是客居民族，他们没有做主人的权利…… ”[15] 此外，艾沙还强调中亚地区讲土耳其语的各种穆斯林团体在种族和文化上是同根同源的。他的这种论调激怒了苏联。[16] 在包尔汉公开赞成亲苏政策的时候，艾沙却变得更加反苏而甚于反汉、反国民党。苏联领事报告说，艾沙曾经与马步芳讨论过在西北建立一个独立伊斯兰国家的可能性，而穆罕默德·伊敏（Mehmed Emin）的妻子已经赴南疆为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作准备。[17] 这些报告说明新疆的局势非常严重，因为“美帝国主义在维吾尔人中十分活跃…… 英国领事馆与马苏德和艾沙关系紧密。”[18] 苏联领导人认为，在这一关键时刻必须重新调整政策。

因此，在中共与伊犁政权关系这一问题上，苏联的相关政策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数年前，莫斯科已经清洗了尝试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三区革命领袖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l Kerim Abasoff）。[19] 但在1949年6月，莫斯科突然要求中共派一名代表携带无线电收发机前往伊宁，以便在伊犁政权与北京之间建立有效的通讯。此外，莫斯科还于9月要求中共将伊犁政权的武装力量“国民革命军”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20]

根据艾伦·怀廷（Allen Whiting）和盛世才的说法，1949上半年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不断会晤陶峙岳，以外蒙古为先例建议后者宣布新疆独立。苏联总领事向陶峙岳许诺：苏联将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21] 这一说法很明显与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和刘少奇的谈话相矛盾，当时斯大林要求人民解放军尽早进军新疆。如果怀廷的说法无误，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斯大林在6月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

苏联政策的改变与斯大林对新疆政治前景的判断有关。1949年维吾尔分离运动增强了西方的影响并威胁到苏联在新疆的地位。莫斯科不会容忍新疆成为一个反苏基地，但是它无力利用伊犁政权或者军事干涉来扼杀这一分离运动。在进行有关未来中苏关系的谈判时，斯大林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做了一些妥协，随后毛泽东表示他尊重外蒙古的独立。而既然苏联解决不了新疆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让中国人接手。[22] 新解密的档案说明，苏

联的主要目标是要把新疆复杂的政治与种族问题交给中国共产党。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核心地区所取得的军事进展也让莫斯科确信，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迪特·海茵茨格（Dieter Heinzig）指出，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莫斯科对国家安全的考量都是苏联对华政策的驱动性因素。[23] 在新疆这个个案中，对苏联来说可行的方案是让汉族共产党人控制这个穆斯林地区，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仿效苏联的多民族国家模式、镇压一切泛突厥主义叛乱与反苏叛乱，这也就保证了中国与苏联的边界安全。

二、新疆起义

毛泽东在1949年上半年制定的计划是等到1950年春才派出军队进攻新疆。[24] 但由于1949年7月10日到14日人民解放军在陕西西部的决定性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主力部队4.4万人，[25] 毛泽东于7月23日命令彭德怀改变原定计划、要“在（1949年）冬天占领迪化”。[26] 一个月之后中共部队击败了穆斯林骑兵并攻占兰州后，毛泽东命令王震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停止进军宁夏与青海，转而迅速西进以切断国民党军队退往新疆的道路。[27] 中共战地记者杜鹏程写道，奉命赴疆不断赶路的急行军士兵疲惫得甚至可以在大雨中入睡。[28]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急切，是因为斯大林对他进行了催促。斯大林批评毛泽东不仅高估了穆斯林骑兵的战斗力，而且还在进军新疆问题上犹豫不决。为了鼓励毛泽东，斯大林答应向人民解放军提供包括动用苏联空军在内的各种援助。此外，斯大林还建议中共不仅应当进军新疆，而且应当迅速改变这一边疆地区的人口构成。为了稳固中共的控制，斯大林认为应当通过大规模移民的方式使新疆汉族人口的比重从原来的5%上升到30%。[29]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令国民党军队魂飞胆丧，并赢得了西北前线的最后胜利。8月6日毛泽东发给彭德怀一份电报，说他希望“利用张治中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新疆军政委员会”，以此来和平解决新疆问题。[30] 但是此时的新疆国民党政府已经分裂成和战两派。双方要达成毛泽东所建议的和平解决殊为不易。

张治中早在一年前就已经预见到国民党人的失败不可避免，因此他打算“退保西北”。[31] 他认为人民解放军不会进军新疆，因此并未在新疆与甘肃交界之处修筑任何防御工事。1949 年军事危机日益逼近，新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梁客浔提出建议：新疆政府应当根据以往的“认庙不认神”的模式来和共产党人达成一项协议。[32] 梁的这一建议与张治中之前提出与中共达成和平、同时完整保持原新疆政府的建议不谋而合。[33] 几个月之后，张治中发表了广播声明进一步表明了他的立场——他号召新疆的国民党人“正式宣布与广州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并转向人民民主阵营”。[34]

在莫斯科的鼓励下，伊犁政权也表示愿意加入中国革命并将其军队编入人民解放军。[35] 毛泽东答复说，“（伊犁政权的）多年斗争是我们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他邀请伊犁政权的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36] 国民党领导人陶峙岳想要投诚，但又担心苏联扶植的伊犁政权对他不利。与苏联人和中共联系密切的包尔汉告诉陶峙岳，只要陶峙岳支持反国民党的新疆起义，“我以八十高龄的老母做担保，对您不会有什么损害。”[37]

9 月 19 日张治中从北京电告陶峙岳，强调“在中共的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之前”发动起义是最好的时机。这令陶峙岳感到有必要立刻采取行动，但是他明白，如何说服国民党内部的死硬分子是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因为包括了整编 78 师师长叶成、179 旅旅长罗恕人、骑兵第五军军长马呈祥在内的死硬分子控制着新疆四分之三的军队。陶峙岳在随后两个月内数次会晤叶城、罗恕人、马呈祥，对他们说，如果坚持抵抗，“数千名官兵将会白白牺牲，新疆人民将居无定所，不同种族将互相残杀，我们不能以战斗赢得和平，而战败后乞求和平，则更不可能。”[38] 陶峙岳建议叶、罗、马等人交出部队，带着自己的钱财离开新疆。陶将保证他们的安全。

两个事件令陶峙岳的说辞变得更有说服力。一是盛世才的十一名亲属在兰州被残忍谋杀，其中包括盛世才十一岁的侄子与五岁的侄女。据警方调查，凶手都是盛世才以前的下属，他们这样做是为在新疆被盛世才杀死的亲友报仇。当这个消息传到迪化后，维吾尔人组织了由艾沙率

领的三十六人代表团前去慰问凶手并为他们辩护。[39] 艾沙认为在新疆滥杀无辜的盛世才遭此惩罚是罪有应得。这个事件意味着新疆也随时可能发生仇杀事件。二是在银川发生的马鸿逵骑兵强奸妇女事件。这支骑兵部队被共产党军队击败并退回宁夏后，马鸿逵已经不能控制他的穆斯林士兵，后者开始打劫回族商铺、强奸穆斯林妇女，并焚烧了宁夏首府银川的建筑物。[40]

此外，陶峙岳与国民党死硬派都认识到他们已不能再号召他们的士兵们进行战斗，因为来自中央政府的军事供应已经完全被切断，士兵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军饷。[41] 国民党无力控制新疆的通货膨胀与现金贬值。新疆国民党部队一个下级军官的月薪只够买两包香烟。[42] 更糟的是，马步芳在他的军队被击败后居然席卷五万美元的军饷逃往香港。来自临近省份的报告显示，国民党部队都开始纷纷投降。9 月 19 日，国民党八十一军宣布将加入人民解放军。四天之后宁夏的国民党军队与中共政府签订了和平解决协议、欢迎共产党接管。9 月 24 日，三万名国民党士兵在酒泉投降。此时通往新疆的大门已经敞开。

当陶峙岳与包尔汉决定“和平起义”时，迪化的商会、伊斯兰商会与市议会举行了各种会议表示支持。随后，一个维吾尔人代表团前往兰州欢迎人民解放军。在此关键时刻，国民党强硬派发生了分裂。由于家属已飞离青海前往香港，马呈祥急于与他们团聚。叶成的妻子反对叶城和共产党打仗、要求他高价出售所有财产然后合家逃走。罗恕人也许想要进行最后一搏，但是他绝不愿意独自一人战斗。在最后一刻，陶峙岳终于设法说服了马、叶、罗放弃战斗，护送他们离开迪化。[43]

9 月 25 与 26 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宣布：“（新疆的部队与政府）自即日起和广州反动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的八项和平声明和国内和平协定。并将省政府改组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暂时维持全省政务，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44] 这就是著名的“新疆和平起义。”9 月 28 日迪化发布戒严令，社会秩序迅速恢复。

新疆和平起义的成功增强了陶峙岳对统治迪化和整个新疆省的信心。他派出自己的代表曾震武将军到兰州与彭德怀会面，建议人民解放军暂时不要进入新疆，这样有利于新疆的和平与稳定。9 月 26 日毛泽东命令

彭德怀“不要与他（曾震武）辩论，也不要告诉他解放军将在今冬进入新疆。但是你必须在11月1日或10日之前做好准备以便在11月中旬开拔。”[45]中共中央强调每一个军事行动都必须得到北京批准、拒绝了伊犁政权让其部队“控制国民党撤出地区”的要求。[46]很显然，伊犁政权这个由苏联支持的“国中之国”将会被解散，新疆必须处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之下。毛泽东继承了大清王朝与国民党政府的历史遗产，将要建立一个隶属于中国的新疆省，但新疆必须处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之下。他不会允许任何边疆地区享有曾经有过的“相对独立”，也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只认庙不认神”的边疆政府的存在。

三、大进军

王震带往新疆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包括了第二军、第六军与第五机械化团，总计九万人。这支部队有760辆卡车、589头骆驼以及大量食物、被服、煤油、医药和其他供应物资。苏联提供了四十架运输机来运送部分部队。1949年11月10日，第一批解放军士兵555人乘坐45辆装甲车和37辆卡车向新疆进发。他们穿越沙漠与大雪覆盖的山脉，经过10天779英里（1253公里）的急行军到达迪化，那里五万城市居民排列成绵延三英里的队伍夹道欢迎他们。

人民解放军在穿越一个荒芜的边疆地区时遇到了诸多困难，这些困难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士兵们从未想象过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将国民党政府西北问题研究会编辑的小册子《新疆交通介绍》重印分发给所有入疆部队。这个小册子一开始就给出了十分有用的建议：“在沙漠中行军时，每次停歇都必须根据尚有水与饲料多少进行计算，而不是一天脚力如何。”[47]这本小册子列出了从迪化到主要城镇沿途所有河流、小溪与水井。它甚至描述了包括只有五到十户农舍在内的所有村庄，并记录了各种可见的自然与人工标记。这本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南。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团于12月5日从阿克苏出发，计划沿干涸河床行军247英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被认为人类之前未曾踏足的地方

而进入和田地区。部队研究了这本小册子提出的所有路线，以及一个有关神秘鸽子的传奇故事：

> 鸽子坝。此坝位于沙漠西部边缘。许多沙丘不断变幻组合。乾隆时期，将军周文率领其部队在此迷路。后来跟着一个飞鸽走了出来。此后，他命令士兵开垦土地，耕种黍米，并挖了一口井来喂养鸽子。……。光绪初年，董将军的部队向和田移动而路经此地。他的士兵打了几十口井都只有苦水。突然，董将军看见鸽子在他头上飞。他相信有鸽子的地方就有泉水，他下令他的部队跟着鸽子，最终找到了甜水。[48]

这一带的维吾尔农民曾于1932年举行过一次造反，但最后遭到镇压。国民党士兵洗劫了城镇与农村，但是没有人敢动鸽子。[49]这些汉人害怕这些荒凉的异族地区，他们深信如果没有神明或者神秘鸽子的保佑，谁也不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活下来。1949年这一地区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们来说依然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士兵们行军时为刺骨的寒冷与凛冽的强风所折磨；他们携带的水几乎耗尽，而威胁生命安全的沙尘暴随时都会发生。为了穿越“死亡沙漠”，共产党相信能够帮助他们的是维吾尔族的向导而不是鸽子。但向导却很难找到。

在一开始，人民解放军十分高兴能遇到友好的当地居民。对于许多维吾尔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共产主义。由于他们极度痛恨国民党人，所以他们十分欢迎将国民党汉族政府驱逐出去的部队。但是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他们中国发现共产党人也是汉人。在人民解放军迫切希望找到一个向导的时候，几乎没有维吾尔人愿意伸出援手。他们不相信任何汉族士兵。[50]此时，中共必须展现自己与以往的汉族统治者有何不同。

以往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处，就要当地居民提供食物、房子、金钱与劳役。但人民解放军通过村庄时并未骚扰当地居民，老百姓高兴并惊讶地发现战士们都带着自己的食物并睡在路边。此外，无论到哪里人民解放军都会铺路搭桥，既为军用也为民用。

阿卜杜拉希姆·阿敏回忆说，1949年以前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生活在迪化时，每年的五、六月间他被禁止上街玩耍。因为冬天的积雪融化

时城市的道路会变成一片沼泽，小孩子如果摔倒就可能陷入泥沼而被溺死。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冬天抵达迪化后，立刻着手准备石头修路。春天来临时，修路计划启动了，许多街道很快变成了鹅卵石路。孩子们高兴地在大街上玩耍起来，城市居民欣喜地发现解放军士兵原来竟然是城市的建造者。[51]

1950年3月，最后一支部队抵达了他们在北疆阿尔泰的前哨。人民解放军很快发动了一次军事行动，对麦斯武德和贾尼木汉（Janimhan）领导的、估计有两万名哈萨克斯牧民参加的叛乱进行镇压。人民解放军动用了一个师外加几个团发动进攻，此外还在哈萨克人中举行了群众集会，谴责这两个人是“穆斯林叛徒与美国间谍”以孤立叛匪。[52]这次行动最终摧毁了叛乱部队并在7月15日抓获麦斯武德，最终使1.64万名哈萨克牧民恢复了平静的生活。[53]

在军事占领期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之一是介入当地政治与文化活动。例如，解放军成功地在喀什葛尔展开了语言学习计划，不仅教维吾尔人学习汉语，还教汉族干部学习维吾尔语。通过这些语言学习班产生了第一批维吾尔族干部。[54]共产党人还开始从当地居民那里招收新的共产党员。这一招收遵循“自上而下的方式”：从城市开始、然后扩展到农村；首先招收革命的知识分子、然后扩大到工人农民。根据王震和邓力群的建议，1949年12月23日包括包尔汉与赛福鼎在内的十五位维吾尔族领导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新疆中共领导机构中的新成员。[55]中共的政权很快在省、市和群众阶层建立起来。

中共在新疆进行的减租运动和土改运动与中国内地并无明显不同。这些运动产生了一大批支持汉族共产党人的非汉族追随者。人民解放军部队最后离开时，留下了包括一些妇女在内的部分军官帮助地方政府。[56]中共在与当地居民打交道、处理其宗教活动的最初阶段非常谨慎。但是后来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一些军事和政治运动使一大批无辜的维吾尔人成为受害者，这破坏了维吾尔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并在新疆的民族关系上制造了新的紧张。[57]

人民解放军对他们这一“大进军”的成功十分自豪。1847年清朝皇庭为控制新疆发动了一场远征，左宗棠的远征军费时两年多才控制了整

个新疆省。对比之下，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九万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就成功抵达驻所，并有效地控制了整个新疆。[58] 但后勤供应仍然是军事行动的瓶颈。作为一个贫瘠的边疆省份，新疆没有能力为这些突然增加的军事力量提供粮食，当地政府为此开始抱怨。[59] 解放军部队只好自己生产粮食布匹来养活自己，这导致了建立军垦的决定。

军垦政策的提出不仅是为了解决人民解放军的经济问题，也是要确保新疆的安全与发展。这反映了长久以来中国“屯垦戍边”的实践传统。受到“屯垦戍边”战略的启发，王震与其他中共新疆领导人开始调查适宜的军垦地区。王震强调人民解放军不应“与民争地”，命令他的部队在沙漠中建设新的绿洲。按照王震的蓝图，军垦应当从农业开始，然后发展工业、商业、各种服务业以及教育。[60] 这一计划需要男性与女性都付出巨大的努力。

四、新绿洲

许多研究都把中共接管新疆描绘成一个男人们的故事，对妇女在其中的参与却视而不见。但最近人们开始关注与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起或随后进入新疆的女战士的经历。女战士的个人回忆录已刊登在各种刊物上，电视上也播出过对她们的采访。此外，新解密的档案材料也为人们评价妇女对新疆“和平解放”所作出的贡献提供了参考资料。

根据政府的各种报告，第一批女战士来自甘肃省临遥县。1949 年 8 月与 9 月，人民解放军从那里招收了 1,350 名男性与 150 名女性进入第一军政干校。学生们踊跃登记，但并不知道他们要被派往何处。其中的一个女学生回忆说，“部队学校”对她吸引很大，但是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被派往新疆，她就不会参加这个学校。可是，她很快就对这一想法感到羞愧，因为她和她的同学们被教导要对她们“解放与开发”新疆的任务感到骄傲与坚定。[61] 经过短暂训练之后，这些女学生被火车运往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在那里“学校”解散了，女学生们被分到不同的军事驻地当兵。从新疆第一个绿洲城市吐鲁番开始，这些妇女们艰难地向沙漠徒步进发，与男同志们承受同样的艰难险阻、担当同样的任务。[62]

四十九年之后，这次行军的照片与女战士们的回忆录一起展出。妇女们穿着男式军装、编成三个纵队行军，在休息营地又唱又跳，仿佛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会让她们害怕。[63] 尽管如此，这些女战士们经历过了行军中的艰苦，她们对到达驻地后的艰难生活都有了心理准备。

第二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女战士是从湖南招募的。王震认为，除非中共能帮助士兵们建立家庭，否则人民解放军很难在边疆地区扎下根来。新疆已经有了十万国民党部队，现在又来了将近十万解放军部队。王震担心在一个只有男性的世界里，士兵很可能变成土匪。此外，为了避免种族冲突，中共又禁止汉族人与非汉族妇女通婚。[64] 王震于 1950 年给他的朋友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写了一封信，请求后者提供帮助："（我要）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八九岁以上的未婚女青年，有一定文化的女学生，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要她们来新疆成为好工人，好妻子，好母亲。"[65] 一份未公开的文件更进一步解释了王震对所招收妇女的要求。首先，女孩子们必须是未婚的或合法离婚的。第二，女孩子们必须身体健康、五官端正。第三，也可以招收地主与富农家庭的女孩子们，甚至家中有被共产党政府镇压的家属亲戚的也可以。[66] 这些要求说明，新的女战士作为"贤妻良母"要比作为"好工人"更重要。

1951 年 2 月 10 日《新湖南报》刊登了一条广告，招募大约二百名专家、技术工人与女学生。[67] 事实上，招聘团只是想要征召女战士。该招聘团以新疆有很好的机会作为诱饵：可能去苏联深造；也可以选择进工厂学技术，可能进文工队当文艺兵；还可以选择进苏式集体农庄开拖拉机。最后同样诱人的是，可以吃到中国内地从未尝过的可口水果。

有三批女孩子对此非常踊跃。第一批是那些有理想主义思想的学生，她们希望能够改变生活、走上与她们的同学和绝大多数妇女不同的道路。她们不仅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士，人民解放军还许诺给她们这样的待遇：中学毕业生将会被任命为排长、大学毕业生被任命为连长。事实上这些女学生一到达新疆，她们当中的大多数立刻成为教师和秘书，享受着与连长或排长同样的待遇。[68]

第二批女孩子来自于贫困家庭，家中有年幼的弟妹。在 1950 年到 1951 年，贫困和疾病仍然困扰着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女孩子们找不到教

育和工作机会，去新疆是她们、也是她们家庭的一个出路。由于相信来自贫困家庭的妇女更能吃苦耐劳，1951 年以后王震的招募对象从城镇转向了贫穷落后的乡村。[69]

第三批是地主、富农或其他“剥削阶级”家庭的女孩子，以及那些父亲曾为国民党部队或旧政府服务的女孩子们。由于她们“可耻”的家庭背景，这些女孩子们就业时遭到歧视，并在公共场合感到低人一等。当她们听说可以不计家庭背景加入军队时，她们把这当作“脱胎换骨”并且可以改变家庭社会地位的一个机会。刘思湘的母亲回忆说，她被录取后，整个家庭都十分高兴，因为她的“资产阶级家庭现在变成了革命军属”，这会使家庭得到当地政府的优待。[70]

但早在她们到达新疆之前，这些湖南的女孩子们就已经开始怀疑这次招募的动机。为什么招聘团只征召女战士？为什么火车每停靠一站，地方首长都来看望这些女孩子并询问结婚问题？一个谣言开始传播，说这些女孩子将被分配给受伤与残疾了的战士、或者将被强迫结婚并且每个人会被分给好几个丈夫。

现实并没有那么糟糕。中共是准备安排她们与战士们结婚，但并没有进行暴力强迫。她们被告知，指导原则是“组织分配、个人同意”，虽然这些女孩子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根据人民解放军的结婚规定，意欲结婚的男性必须达到以下标准中的一条：(1) 营长或同级别官员；(2) 军龄五年、年龄达到 26 岁的连长或同级别官员；(3) 1937 年 7 月 7 日之前入伍的老红军；(4) 有六年以上革命经验并至少三十岁的老兵。[71] 由于绝大多数新招收的女兵都只有十七八岁，因此丈夫比自己大十到二十岁的情况并不少见。1990 年代回首往事时，一些妇女说她们的婚姻结果很好，因为她们的丈夫对待她们像对小妹妹一样；但也有人抱怨说，年龄和教育上的差别导致她们的婚姻十分失败。[73]

由于大多数城市姑娘和年轻女孩子不想匆忙结婚，人民解放军开始从四川、河南、山东、甘肃这样的贫困省份招募年纪介于二十与三十之间的农村妇女或寡妇。[74] 解放军甚至允许离婚妇女或者年轻寡妇带着自己的孩子到新疆来。[75]1953 年，新疆女兵招募工作团决定“不再接受任

何年龄介于十八到十九岁之间的女孩子”。[76] 同时，也放松了对男性年龄、职务、服役年限的限制，以使更多的中年男子可以和妇女结婚。

第一批到达新疆的女学生参加了各种工作，最主要的是教育与幼儿护理。人民解放军向西进军时组建了第一间护士学校，招收自陕西的女学生一直跟随部队到新疆，在各个部队与军垦农场中服务。1950 年 8 月 1 日，第一个幼儿园向军人子女开放，所有幼儿园保育员都是来自山东的年轻妇女。在这一年，人民解放军还发动了一场文化运动，要求每个战士学习读写。所有有中学教育水平的女战士都成为全日制教师。一大批中小学逐步建立起来并开始聘用男女教师。

尽管每个绿洲农场中的女战士数量并不多，但是她们所从事的教育和医疗工作对新疆各个社区产生了重要的文明影响。年轻妇女帮助男战士们洗衣与打扫卫生，营区的环境为之改观。妇女们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服务，减轻了社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每个绿洲农场都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因此与维吾尔农民的联系有限。虽然农场偶尔会在用水问题上与邻居们爆发冲突，但是在 1950 年代，环境污染问题还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人民解放军的军垦农场很快就初具规模，其中女战士贡献良多。一个姓李的汉族女性回忆说，维吾尔人目睹女兵如此吃苦耐劳，便到她们的农场来，要求用四百头羊交换几个女战士。维吾尔人想与这些工作努力的女孩子们结婚，但是中共的农场不允许不是“自己人”的人娶走他们的女人。[77]

虽然中共要求政府机构雇佣更多的妇女、并鼓励妇女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但是家庭仍然是一个妇女的生命核心，而且与中国内地一样，“家庭生活”的意识形态依然主导着边疆地区。[78] 女战士的年龄、教育、城市出身与革命理想，并没有太大地改变她们的性别角色和期望。操持家务与抚养孩子是将她们招到新疆来的主要目的。王震与陶峙岳发布了一条命令，要求怀孕妇女不能从事任何重体力工作，并给她们各种假期：怀孕初期有一次短假，从怀孕第七个月开始实行部分时间工作制，孩子出生后又有两个月产假。[79] 建设兵团的司令部规定年轻母亲的工作量必须减轻，并答应任何非军职的母亲都可以享受人民解放军士兵的待遇，只要她生育并抚养三个或以上的孩子。[80]

1952 年之后到达新疆的妇女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她们与男人们干同样的活，包括伐木、耕地、播种、收割。1952 年 6 月 152 名湖南女孩子被分配到第二十五师，到 7 月又有 476 名山东女孩子加入进来。她们刚一到达驻扎在老炮台的第二十五师农场，就遇到了一场可怕的蝗虫灾害。蝗虫象黑云一样铺天盖地地飞过来袭击每一株绿色庄稼。蝗虫飞走后，农场有 133,333 平方英亩（515 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焦土。这些女战士们不得不与她们的男同事们一起没日没夜的奋斗。她们扑灭蝗虫，清理耕地，将玛纳斯河的水引入田里，并开垦出一个新的稻米庄园。到了这一年年底，她们最终可以庆贺农业获得了丰收、垦区人口有了增长以及出现了新的家庭。[81]

一开始，老炮台和其他农垦农场的几对夫妻只能共用一间卧室，他们用床单将每张床隔开。后来她们住进非常简陋的屋子，在边疆地区生了孩子。随着新绿洲在沙漠边缘的扩大，年轻妇女们很快变老。由于照顾家庭和孩子占用了她们的主要精力，这些妇女们没有机会继续她们的教育或者获得技术训练。当农场开始机械化、男人们变成技术工人后，许多妇女继续从事体力劳动。沙漠阻止了妇女们返回她们遥远的故乡，而边疆既扩大了又缩小了她们的活动平台。绝大多数的妇女熬过了艰苦的体力劳动、孤独、家庭争吵、民族冲突与思乡，她们对整个新疆地区星罗棋布的绿洲农场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作为妻子、母亲与农场职工、老师、护士、商店售货员与各种劳工，妇女占了这一边疆地区越来越大的人口比重。她们使内地的汉子们在边关定居、为边疆地区的改造和开发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3 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高度评价了这些招收到新疆的女战士们，并制定了在五年内从中国核心区再招收 99,300 名妇女到新疆的新计划，希望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民解放军军垦农场中的性别不均问题。[82] 中央政府将招收任务分配给每个省，而各个省又将招收指标分配给每个县与区。[83] 妇女的持续到来和定居稳定了新疆的生活，并帮助人民解放军实现了“和平解放”新疆的目标。

五、控制边疆

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 1949 到 1953 年间新疆发生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胜利后，迪化并没有出现一场阶级斗争，伊犁也没有发动革命造反。自从盛世才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以来直至 1949 年，新疆没有发展过一个共产党员和中共党组织。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与其说是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核心地区军事胜利的简单扩张，不如说是一个偶然事件。在 1949 年初，新疆仍然远离中国内战的主战场，而新疆的人民相信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军事失利只是意味着未来有种种不同的可能性。新疆地区各种本土与入侵的政治力量都很强大，但也都很脆弱。在接下来几个月中社会各个不同势力之间的碰撞、竞争与谈判对这一边疆地区复杂的政治状况作出了重新定义。

汉族主导的新疆国民党政府过于脆弱而难以对新的中央政府作出抵抗。它既缺乏宣布独立的合法性，也没有依靠外国势力存活下去的机会。俄罗斯文化在城市地区影响很大，但在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竞争时，它对维吾尔农民与哈萨克牧民的吸引力就小得多。虽然伊斯兰传统在农牧民中间根深蒂固，但“绿洲人口仍然彼此隔绝”，因此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政体。[84] 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言论虽然极富煽动性，但其政治筹划只对一些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村精英有吸引力。新疆问题的和平解决并非出于几个政治家的智慧，而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较量和对话的结果。历史学家不会忽略张治中、包尔汉、陶峙岳、共产党人王震以及国民党死硬分子等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决定了他们思考方式、政策取向与谈判立场的，是整个新疆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态和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而不是他们的个人性格和智商。

新疆的“和平解放”用一种更加有效的统治方式替代了国民党政权。与其他地方相比，人民解放军作为“执行党的政策的军事机器”这一功能表现得更加明显，它将国家统治扩大到满清政府与国民党人从未到达过的地方。[85] 人民解放军军垦农场遍布整个新疆省，这有益于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屯垦戍边的政策，这一政策实际上是传统的帝国政策，是通过军事驻扎来维持对新征服边疆地区的控制。而从

中国内地迁入妇女这一举措，不仅使战士们得以享受家庭生活，也把屯垦戍边变成了一项永久的事业。

在国内移民问题上，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军事援助和建议，但是并没有完全仿效苏联处理中亚地区时采取的加盟共和国模式。就在中共接管新疆后不久，伊犁政权不再存在，其武装力量被下令从国防军中撤出而加入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安排反映了毛泽东对地方民族主义及苏联影响的警惕。[86]

人民解放军军垦的成功开创了内地向新疆移民之先河，汉族人口的不断流入改变了新疆的人口构成。这也为以后岁月中的人口迁移确定了模式：国家在将工厂从内地迁入新疆或在新疆勘探石油时，也将工人与他们的家属一起带入新疆。中国共产党号召知识青年到边疆去的时候，既招收男性也招收女性。结果是汉族人口现在占新疆省人口总数的43.02%，维吾尔族占43.35%、哈萨克族占6.47%。[87]如果再加上河南与四川省大批季节性迁入的摘棉花工人、与当地及中亚各国做生意的浙江和江苏商人，那么汉族人的比例还会更高。

然而，新疆的接管模式也加剧了当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种族隔阂。首先，人民解放军创造了自给自足的孤立绿洲，而汉族妇女的出现使这些农场成为更加封闭的汉族世界。新的绿洲未能成功地将维吾尔族农业整合进整个地区经济。“不与当地人民争地”这一政策对于避免冲突来说是一个聪明的想法，但是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汉族中心主义的观点——只要人民解放军占领的是尚未开发的土地、并可以对之更加有效地加以利用，这就不算剥夺非汉族人的任何财产。第二，国民党政府利用“与非汉族合作但将权力掌握在汉族手中”的方式来统治这一边疆地区。中国共产党也遵循了这一方式并将之纳入了“和平革命”的框架。既是汉族人又是共产党员的老兵们领导着非汉族的非党员官员；中国共产党的论资排辈原则使得王震和王恩茂在党内的地位远远高于包尔汉和赛福鼎，这就使他们得以压制任何关于汉族沙文主义的道德批评。[88]根据特纳（Turner）和汤普森（Thompson）的“边疆理论”，边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因异族的入侵而开始，经过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遇、冲突、吸收、互动，最后以一种文化占据统治地位而结束。而这一

过程的结束即标志了“边疆”的消失。在新疆，此种边疆过程还未结束，本土的居民表现出了对入侵文化适应并生存的巨大能力。双方在宗教上各自不同的固有态度加强了非汉人与汉人在外表、服饰、语言、饮食方面的巨大差异。中共的接管在新疆建立了新的政治统治，但并未结束所谓的“边疆社会文化过程”。[89] 这一过程依然充满冲突、对话和互动。1949 年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依然是新疆作为边疆地区的一个压倒性主题。

姚昱译

注释

1 关于中国共产党接管的重要著作有：Ezra E.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Kenneth G. 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Steven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以及 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2 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42.

3 Ibid., 41. 另见 Thomas Hoppe, “Observation on Uyghur Land in Turpan Country, Xinjiang—A Preliminary Report on Fieldwork in Summer, 1985,”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1.3–4 (1987): 224–251。

4 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 9 页。

5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 年，第 3,264 页。

6 Donald H. McMillen, *Chinese Communist Power and Policy in Xinjiang, 1949–1977* (Boulder: Westview, 1979), 25. 1885 年，清朝政府向新疆提供了 365 万两白银的军饷，但到 1904 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 224 万两。但当时新疆军事开支仅为每年约 190 万两，因此剩余部分可帮助新疆政府平衡其政府预算。国民党政府则以纸币支付对新疆的财政援助，但由于纸币在 1940 年代出现严重贬值，新疆地方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地方资源来自己解决财政问题”。见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述论》，第 239 页。

7 黄绍竑：《五十回忆》，长沙：岳麓出版社，1999 年，第 290–291、296–297 页。

8 金绍先：《国民党统治新疆的方法研究》，《新疆文史资料选》，第 2 辑，1995 年，第 70 页。

9 林正言：《盛世才小传》，《传记文学》，第 55 卷第 2 期，1990 年，第 1–28 页。

10 Rudelson, 7. 直到 1930 年代“维吾尔”一词才被用来指称突厥穆斯林定居者。Dru C. Gladney, “The Ethnogenesis of the Uighur,” *Central Asian Survey*, 9.1 (1990): 1–28.

11 杨增新：《电呈新疆回队用命情形文》，《通令各县所属乡庄阿洪不准地方官派充》，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89 页。

12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年，第 541 页。

13 《新疆总督杨增新的报告》，1917 年 9 月 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新疆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年，第 6 页。

14 2003 年 12 月采访阿卜杜拉希姆·阿敏，北京。

15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年，第 329 页。

16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Xinj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17.

1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4/3/64。伊敏此时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

1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4/3/64。

19 对阿巴索夫的详细讨论，见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53–360。

20 赛福鼎·艾则孜：《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年，第 514 页。

21 Allen Whiting and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117–118. 怀廷 (Allen Whiting) 写道，他是从“一个可靠的来源”获得的这一信息。但是陶峙岳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到他是否与苏联总领事进行过这一谈话。

22 见 Dieter Heinzi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0: 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 (Armonk, N. Y.: M. E. Sharpe, 2004), chapter 3。

23 Ibid., 385.

24 袁德金、刘振华：《西北解放战争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508–514 页。

25 《群众日报》，1949 年 7 月 17 日。

26 袁德金、刘振华前揭书，第 542 页。

27 同上，第 594 页。

28 杜鹏程：《战争日记（1947–1949）》，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518 页。

29 The Minutes of Stalin’s Meeting with the Deleg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eaded by Liu Shaoqi (June 27, 1949), Presidential Archiv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F), 45/1/328.

30 袁德金、刘振华前揭书，第 568–670 页。
31 张治中前揭书，第 784 页。
32 黄建华前揭书，第 191 页。
33 张治中前揭书，第 788 页。
34 陶峙岳：《陶峙岳自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05–106 页。
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4/3/64。
36 Wang, 360.
37 包尔汉前揭书，第 356–357 页。
38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编：《新疆和平解放》，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 页。
39 见《甘肃日报》，1949 年 5 月 19 日；《大公报》，1949 年 5 月 20 日；《西北日报》，1949 年 7 月 20 日；《和平日报》，1949 年 7 月 22 日。
40 《甘肃日报》，1949 年 9 月 14–15 日。
4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2/5/901。
42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三卷，第 498 页。
43 罗恕人、马呈祥与国民党情报机构于 9 月 24 日离开迪化；叶城直到 9 月 25 日早晨才离开。随后，包括新疆省政府副主席伊敏和艾沙·优素福·阿布泰金在内的泛突厥领导人逃往印度。
4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75/1/1。
4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4/3/64。
4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4/3/64。
47 西北研究会：《新疆交通介绍》，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重印，1949 年 9 月 1 日，第 1 页。
48 同上，第 4 页。
49 同上。
50 2003 年 12 月采访阿敏，北京。
51 同上。阿敏回忆，迪化只有在大十字那里才有只有两条被铺过的路，到 1949 年总长不到 0.8 英里。
5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75/2/65。
53 范殷凯：《新疆建设兵团史》，乌鲁木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年，第 166 页。
54 2004 年 1 月采访古力斯阿提·吐尔逊 (Gulisiati Tursun)，乌鲁木齐。
55 李福生编：《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7 年，第 148 页。
5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75/2/65。
57 关于相关个案报告，见《内部参考》，1954 年，藏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58 李学军、李敏杰：《西北大决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551–553 页。

5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75/2/42。

6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M1/1/9。

61 李开全：《甘肃女兵访谈录》，新疆建设兵团历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建设兵团历史资料选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3 卷，第 238 页。

62 同上，第 13 卷，第 239–244 页。

63 袁国祥编：《20 世纪新疆图片纪实》，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 年，第 2 卷，第 83–91 页。

64 新疆军区档案馆，13/7。

65 廖亦武：《女兵的女儿——刘思湘》，《中国底层访谈录》，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年，第 7 页。

66 新疆军区档案馆，13/18。

67 《新湖南报》，1951 年 2 月 10 日。

68 李开全前揭文，第 13 卷，第 239 页。

69 新疆军区档案馆，13/42。

70 廖亦武前揭文，第 7–8 页。

71 新疆军区档案馆，13/15。

72 2003 年李开全采访魏玉英（音译）和其他女战士，石河子。

73 新疆军区档案馆，13/23，13/27。

74 该档案规定每个妇女最多可以带三个孩子到新疆。新疆军区档案馆，13/42。

75 新疆军区档案馆，13/80。

76 廖亦武前揭文，第 10 页。

77 新疆军区档案馆，13/80。

78 新疆军区档案馆，13/75。

79 新疆军区档案馆，13/96。

80 李福生前揭书，第 221 页。

81 到 1952 年底，新疆军区共招收 13,644 名女学生。另外 12,892 名妇女是根据其他安排到新疆来的。

82 例如山东省计划招收 7,000 名妇女。山东派出了十四个招收队到文登县和莱阳县的农村，要求每个队招收大约 450 名妇女。新疆军区档案馆，13/58。1955 年，上海将 1,200 名接受过劳改教育、年龄在 18 到 35 岁之间的前妓女送往新疆，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军垦农场。政府许诺，她们过去的历史将永远保密，以便有助她们在新疆开始新的生活。《内部参考》，第 162 期，1955 年 5 月 26 日，第 388 页。

83 Rudelson, 17.

84 "On Correcting Mistaken Ideas in the Party" (December 1929),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3), 1:106.

85 李福生前揭书，第 290–293 页。

86 李升：《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87 另一个偶然事件是伊犁政权的资深领导人，包括阿合买提江·卡斯米 (Abmet Jan Kasim)，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 (Ishakjan Monhakiyev)，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 (Abdul Kerim Abasoff) 和罗志在内，都在去北京的路上因飞机失事而丧生。

88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olt, 1921). 汤普森（Leonard Thompson）与霍华德·拉马尔（Howard Lamar）把边疆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过程来讨论，认为在一个边疆地区建立了政治统治之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进程仍可继续。Leonard Thompson and Howard Lamar, eds.,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North America and Southern Africa Compar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Vol. 7, 310–311.

三

适应环境变迁的文化
(The Culture of Accommodation)

第九章

鳄鱼鸟：1950年代初期的相声

林培瑞（Perry Link）

后见之明并不总是可信。我们常说自己“受益”于后见之明；事实也的确如此。但也许人们更容易看到的只是后见之明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可能付出的代价。对于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说，后见之明的代价之一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事实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对过去某个时期的印象。为此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过去的任何历史时期，当事人彼时对后来发生了什么是完全一无所知的。如果真想体会过去那些人在当时所面临的真实状况并打算“进入”其感觉和看法，我们必须尝试一种高超的想像：我们必须从记忆中清除掉某些显著、重要的后发事实。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设法从脑海中抹去自己因为知道后发事实而产生的所有联想和暗示，不管这种联想和暗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要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确实，我认为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是不可能臻至完美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充其量只能努力将后见之明的影响最小化。

如果事情后来演变成巨大的灾难，这种后见之明的问题会变得尤为棘手。例如1945年8月6日早晨，在遭到原子弹轰炸前的十分钟，一个广岛市民的感觉是怎样的呢？大江健三郎、约翰·赫西（John Hersey）和其他一些人都曾努力去想象那个时刻，试图无畏地再现那一刻的平凡，但这些尝试最终都失败了。人们如何想象才可能免于失败呢？是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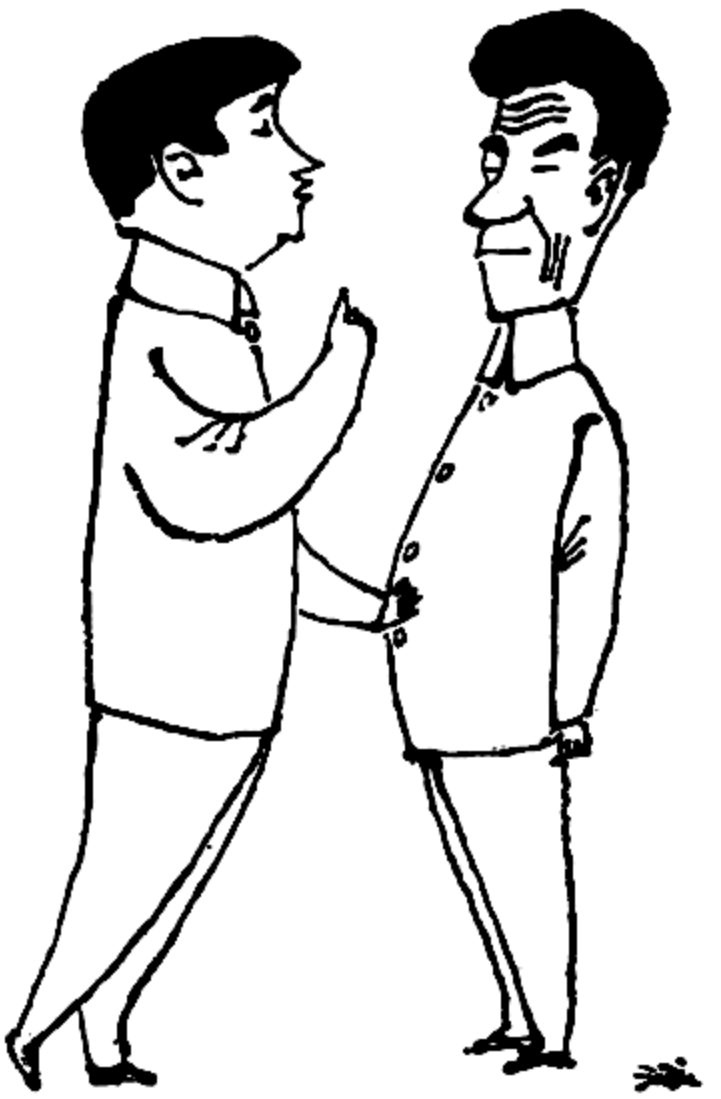
们可以重构某天早晨刷牙时的画面：洗脸槽、镜子、牙刷和一杯水。我们能在脑海中“看到”这些东西。但在重构广岛那天早晨的情形时，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尝试，都无法抹掉另外一个因素——那是一种可怕的预感、一种焦灼的意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脑海中构想的画面即将被炸毁。如此看来，画面中的洗脸槽与镜子似乎就已经暗含了这种预感。然而，对于当时经历过此事的那些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预感。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把这种预感当作内在于镜子的一部分去体会是不准确的。

中国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和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并不如广岛的原子弹轰炸那样突然——当然它们之间还有其他许多不同，但历史学家在想象这些事件当时的真实状况时面临着基本类似的挑战。要了解 1950 年代初期中国的作家与演员们，我们必须努力想象他们在对未来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到底有着怎样的看法。当时许多作家和演员（当然不是全部）对共产主义事业满腔热情。他们目睹并感受到了中国的新黎明；他们希望帮助建设共产主义事业，也乐意为找到最好的帮助方法而出谋划策；他们心怀善意，并认为其他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可能的前景充满乐观；他们根本没想到自己将遭到迎面痛击。

本章着眼于相声演员和相声作家。相声是一门颇受大众欢迎的表演艺术，其字面意思是“面‘相’与‘声’音”（face and voice），经常被误译为“交叉谈话”（crosstalk）。[1] 也许最好将这个词简单地译为“喜剧演员的剧目”。相声大致类似于美国的杂耍表演。其惯用手段是幽默，尤其是讽刺，但也包含了演唱、摹声和其他口头滑稽表演。相声在中国已有数百年的传统，但由于它基本上是一门师徒相传、没有文字记录的口头艺术，因此人们对中共执政前的相声史了解不多。1930 和 1940 年代时相声演员主要在集市上表演，并在观众中传递一只碗来收集赏钱。从 1950 年代开始，相声走进剧院并出现在电台与电视的广播节目中。这虽然使相声的观众数量有了极大增长，但相声演员与观众进行现场交流的机会却受到了很大限制。

相声一般由两个喜剧演员表演，分别是“逗哏的”与“捧哏的”（当然也有单口相声、三口相声、四口相声或五口相声，但不太常见）。著名漫画家方成的一幅素描很好地描绘了逗哏的和捧哏的之间的基本关系（见

插图）。图中左侧的人物是逗哏的，他显然正在向捧哏的胡说八道，捧哏的的任务则是为观众的常识代言。这幅素描利用眼睛和嘴巴的平直线条成功地捕捉了捧哏的表情：在纵容逗哏的胡扯的同时，也夹杂着对其一派胡言的怀疑。



插图说明

两个相声喜剧演员：逗哏的（喜剧演员，左侧）向捧哏的（喜剧演员的配角，右侧）胡说八道。方成画，见薛宝琨：《中国的相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76 页。

传统上所有相声段子都是事先定好的，表演者靠死记硬背来熟悉这些段子。就像听戏曲那样，观众们并不要求艺术创新，只希望听到著名段子被尽可能好地表演出来。只有经验丰富的表演者才敢做些即兴改动，但也只是偶尔为之。近数十年相声艺术的侧重点逐步从死记硬背的表演转向新作品的创作。观众们现在喜欢听新的讽刺作品甚于旧的心头好。我已有其他论文讨论相声的历史与结构，此处不再赘言。[2]

相声的特点是轻快活泼，这一点使得1950年代相声演员们的命运或许比其他领域的作者和艺术家们显得更加悲惨：他们本来想要帮助革命，但随后却被打倒。不像中国的历史、诗歌和小说写作者，后者已经习惯了社会对其作品赋予的各种道德承载，也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念。就在刚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又借用斯大林的说法，要求他们成为“灵魂的工程师”。相声演员们并不熟悉这些沉闷乏味的宏大词语。但是相声这种嘻笑怒骂的艺术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高度，还是令他们在震惊之余颇感兴奋。相声演员接受了这种想法：通过揭示新社会存在的一些缺点，他们在作品中表达的讽刺可以帮助净化新社会。这何尝不可呢？

相声演员的自我认识在好几个方面和有着“鳄鱼鸟”（*Pluvianus aegyptius*）之称的非洲千鸟类似。鳄鱼鸟以鳄鱼身上的寄生虫为食，据称有时甚至会冒险飞进鳄鱼张开的嘴里在其牙缝间觅食。对鳄鱼而言，它们（至少据说是如此）张开嘴是因为与鳄鱼鸟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但是鳄鱼的上颚会有多经常落到鳄鱼鸟身上呢？这个问题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不过在鳄鱼即将合上嘴的倒计时刻，鳄鱼鸟有什么感觉和打算？这为本章接下来准备研究的内容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隐喻。我将试着暂时搁置现已为我们所熟知的1956年以后中国发生的各种事情，并尝试重构1950年至1955年相声界对新社会的设想和展望。

一、遗产

在1940年代，相声表演是在集市城镇里的空旷地方或者诸如北京天桥那样的城市娱乐场所进行的。天津和沈阳也是相声的主要中心，但是这门艺术当时还未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方。相声演员身穿大褂，用折扇给自己扇风，或者——折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用途——猛地合拢扇子当作小棍子假装敲打另一位表演者。相声演员开场时先用石灰粉在地上写下将要表演的节目表，然后再用唱腔或讲一小段滑稽的段子（称之为“垫话”）来吸引观众。一旦被吸引过来，观众就不得不从道义上考虑表演结束后要在演员的碗里放多少铜板的问题。徒弟要学相声，就要和师

父住在一起并服侍师父的日常生活（诸如端茶、洗脚等），同时还要巨细无遗地记忆与模仿师父的表演。师徒之间的传承形成了“派”。各个流派彼此竞争，甚至会出现对立。

如果可以使用一个不属于那个年代的词来形容，传统的相声段子在内容上往往是不太“政治正确的”。乡巴佬是相声最喜欢讽刺的对象之一：满身大蒜味，口音滑稽可笑，进城后茫然无助，不知所措。瘸子、哑巴和傻子也是被取笑的对象。在表演这些人时，逗哏的在言行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疯狂错乱的逻辑和亚奇·邦克（Archie Bunker）* 的胡言乱语类似，自有一套不合乎其他任何人逻辑规则的大道理（如果陷入明显的自我矛盾，逗哏的会靠这样的言辞逃脱出来：“你觉得奇怪？……对！连我都觉得奇怪”。）[3]

当时还有许多色情段子，即所谓的“荤段子”，以区别于回避性问题的“素段子”。荤段子一度非常普遍，但表演时不欢迎女人和儿童。据目击者说，如果荤段子在进行公开表演时碰巧有妇女走过来，相声演员就会停下来并向她鞠躬，然后一言不发地等她离开。[4]但是这一针对女人的禁忌也有例外的时候：荤段子经常由女演员来表演。这一点很有趣，因为在多数场合，相声在不少时候只由男性来表演。但在对口相声的荤段子里女性经常出任其中的一个表演者，可能是两性间的尖锐对比更容易突出荤段子里的色情成份。

按照现今的标准，荤段子实际上颇为平淡。荤段子在描写性的时候非常迂回巧妙，有时也非常好笑。有个名为《雀儿不叫》的荤段子就是利用了“雀儿”这个双关语——“雀儿”同时也是男性生殖器的代称。[5]观众知道这一点，逗哏的也知道。但是由女性出演的捧哏的则认为“雀儿”就只是“雀儿”。她想知道逗哏的的“雀儿”是什么样的。

“是全毛儿雀儿吗？”

“唔……不是。通身光出溜啊，靠尾根子下呀，有一撮毛。”

“您这是扁毛吗？”

---

* 1970与80年代美国畅销电视喜剧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及其续集 *Archie Bunker's Place* 中的人物，是一个自以为是、头脑顽固的工人。——译者注

“唔……是圆毛。”

“圆毛？这可新鲜！眼睛呢？鸽子眼还是凤子眼？”

“唔……一只眼，在上头……。”

在中国北方，人们有遛鸟的习惯，到茶馆喝茶时，就把鸟笼挂在墙上或椽子上。捧哏的女演员想知道逗哏的是否也这样安置他的鸟：

“挂起来？不行啊！”

“怎么呢？”

“晕高儿啊。”

“嗨！雀儿不晕高啊！”

“不，我晕高啊！”

“干你什么事啊？”

“我的雀儿呢！”

“喝，您挂上，您下来！”

“挂上就下不来了！”

这段对话巧妙地展示了相声的另外一个幽默特点。这在素段子中也十分常见——换着花样地讲一个笑话，以此来营造一种气氛。第一轮提到要把一个男人的生殖器挂在茶馆的椽子上也许已经够好笑了，但相声艺术常常要将一个“包袱”反复“逗”好几次，来展开这个笑话的含义（把雀儿挂起来会让人“晕高”、“下不来”）。反复讲一个笑话会产生一种累积效应，或者说一种氛围，对娱乐效果的放大是任何单句的奇言妙语都无法媲美的。

已出版的研究 1949 年以前相声活动的著作，一般都十分枯燥乏味。[6] 有些论著对早至《左传》这样的文本中出现的隐晦记载就提供了猜测性的评论。另一些作品考察了最近两个世纪左右相声的口述传统，但只是比较枯燥地记录了相声的各个流派与群体。还没有任何著作能捕捉到相声这门艺术的生命内涵并对其进行到位的描述。抓住相声的艺术生命内涵恰恰是相声界在 1950 年所面临的任务，当时新成立的中共政府正要求相声界施以援手。为此，相声界必须筛去附着在相声“生命”与“艺术”中的各种“政治不正确”的糟粕。

二、改革的努力

老舍这位因《骆驼祥子》和其他文学作品而驰名中外的杰出作家，一直以来痴迷于中国的曲艺。为了适应现代的需要，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就已经尝试对这些艺术进行“改革”，亲自写了几个激励民众反抗日本侵略的相声段子。[7]1946 年，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项目的资助下，老舍前往美国。1949 年中国共产党胜利时，他正在访问美国的西海岸地区。老舍决定回到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获悉老舍于 1949 年 12 月回到北京后，一天晚上侯宝林、侯一尘、于世德与北京的其他相声演员直接“拜访”了老舍。据于世德回忆，老舍对相声的前途非常热心。[8] 据说老舍曾表示：“改嘛！”他还自愿亲自改写一些传统的相声段子，以此来为改革开个头。

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刊登了《相声艺人访老舍》这条新闻。在中共核心报纸上刊登的这篇报道，不但较大地提高了相声的声誉，而且表明了新政府肯定是在背后支持相声演员们拜访老舍的，否则这一消息不会如此迅速地见报。虽然不能证实，不过这似乎很可能是出自毛泽东的推动。毛是个相声迷，1950 年代初曾定期邀请侯宝林到他在中南海的住所进行私人表演。1982 年侯宝林写了一篇文章回忆演出的一些细节，其中提到是毛泽东推动了“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9] 这个“小组”后来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0 年 1 月 19 日，“小组”在北京前门正式建立，就在天桥娱乐区的北边。小组成员除了有老舍和几个相声演员带头人之外，还有语言学家罗常培、吕淑湘与文学家吴晓铃等著名学者。老舍和吴晓铃在“小组”中以不同的方式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于世德回忆到，这些著名学者和作家愿意屈尊到下里巴人的水平，令相声演员们十分高兴与振奋。[10] 在此之前，一些相声演员显然担心相声这一表演艺术会被革命后的政权铲除，实际上不少人正在考虑改行。但是如今政府决定尊称他们为“文艺工作者”。

老舍注意到，以他的声望来支持相声有个缺点：相声演员显然出于敬畏而不愿批评他亲自写的一些相声。另一方面，老舍和其他人又发现，

学者和作家的声望也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把相声演员们吸引到一起。[11] 在中共新政权的支持下，著名作家和学者对相声界给予了热情而一致的关注，相声演员之间的门户之争与互相妒忌因而逐步缓和下来。

“小组”正式存在了两年，此后两个更大的团体，“北京市曲艺工作团”和“相声大会”，代替了它的任务。[12] 相声的改进工作始于1950年。当时“小组”草拟了一份雄心勃勃的任务一览表：首先，为了提升相声的地位和重要性，组织研究和学习相声史；其次，将相声从一门地方性、区域性艺术的改造为全国性、民族性的艺术；第三，扩大相声表演的地域范围不仅有利于传播革命新思想，还可以帮助各地的方言使用者掌握如今叫做“普通话”的北方官话（最后这条目标包含一个有意思的例外：“小组”也赞成使用非普通话的方言创作相声，甚至藏语、蒙古语这些少数民族语言。这说明传播社会和政治理想的目标高于推广普通话的目标）。“小组”甚至还承担了成立“识字班”的任务。对参加这种活动的相声演员而言这一任务或许有些不寻常，因为直至彼时相声仍然是一种纯粹的口头表演艺术。但是这件事也再次说明了“小组”是何等深刻地接受了新政府比较广阔的社会目标。

相比之下上述这些任务都是次要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要创作内容适合新社会的相声。这项工作相应分为两部分：审编旧段子和创作新段子。通过重写《贾博士》与《维生素》这两个段子，老舍开始了审编旧段子的工作。这两个段子里有许多“贯口”。所谓“贯口”是一种像机关枪似的连续快速的讲话技巧，会让人联想到美国中西部一两代之前的拍卖商。对“贯口”进行“改造”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从演员口里喷涌而出的是什么词语并不重要，只要数量大就可以。比如在《贾博士》里，老舍把中共认可的六十六部文学作品名称串成一个长句——这就成了一段政治上正确、具有“教育价值”的“贯口”，只等相声演员的如簧巧舌把它传送出来。

老舍也开始写作新段子，但并不热情且有些勉强，因为他认为这项工作由相声演员担任更适合。老舍后来写到，作家固然会有一些好想法，但最好的相声作品只能出自相声演员，[13] 因为他们与观众接触更紧密。传统上一个相声段子会通过演员之间的流传不断得到改进而日臻完美，

因为每个演员都要把这个段子放到现场观众面前接受检验。[14] 根据达尔文式的进化逻辑，只有不断进行调整适应并坚持改良的作品才能得到持久的生存。

“小组”很清楚这套准则，建立了精细的相声创作工序。作者写出相声段子后，“小组”进行评审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在观众面前表演这个段子，同时经验丰富的相声演员在后台密切观察表演情况并作记录，观众也会被邀请发表意见。当时的一些逸事表明，1950 年代初“政治正确性”的要求并不只是出于中共的推动，相声演员有时也会感到来自“舞台下面”的压力，观众要求表演内容更具有社会健康意义。于世德透露，相声演员偶尔口出粗言时会遭到观众的奚落。[15] 无论如何，相声段子只有根据现场观众的检验进行修改之后才能公开发表。在成立后的头十个月里，“小组”共发表了三十二个新创作的或经过充分修改的段子。[16]

这些段子在篇幅长度、艺术水平和信息的繁复程度方面参差不齐，但是所有作品都洋溢着热情的理想主义，这一点在当时创作的快板书、京韵大鼓和其他“曲艺”中也很普遍。翻看 1950 年代初出版的新官方曲艺杂志《说说唱唱》，好像每页都会蹦出“但愿中国日益好！”这种话。

1950 年秋中共发动了抗美援朝运动，“小组”立刻投入到这一任务中。1951 年 3 月中国派出一个相声演员代表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军队。我猜测——但不能证实——中国的这一慰问行动部分程度上是对数月前美国派喜剧演员鲍勃·霍普（Bob Hope）慰问驻韩美军的回应。[17] 极受欢迎的天津派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堃在这次慰问中丧生，这一可怕的事实反而进一步推动了相声界投身于“抗美”运动。1951 年 6 月，相声演员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四处宣传抗美援朝。这是相声真正成为全国性艺术的第一步。相声段子被译成各地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并在电台中得到了广播。

1950 年夏末，这次运动的三个标志性相声段子在小组的主持下很快被创作出来。这三个段子分别是描述美国士兵懦弱无能的《纸老虎》、刻画美国贫富差距的《如此美国》和歌颂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国际斗争的《拥护和平》。[18] 作为相声改造的实验品，这些段子质量极差，如果没有抗美

援朝运动的推动，这些作品根本不会有任何地位。段子里插入了完全没有幽默感的政治口号，例如从外表“滑稽”的逗哏的嘴里会突然冒出来这样的话：“苏联很早以前就把原子能应用于工业了！”[19] 有一个贯口甚至将全世界所有常备军的番号从头到尾数了一遍。[20] 似乎是为了减轻政治说教的意味，段子里还会出现一些粗鄙的脏话：驻扎在朝鲜的美国士兵给女朋友写信强烈要求寄卫生纸，因为他们“一听到人民军来了，屎拉在裤兜子里啦！”[21] 这些段子最有意思的缺点在于，它们对美国的诸多刻画在中国听众听来亦褒亦贬。美国的摩天大楼有多高？某人坐了三个小时的电梯还没有到顶楼！（哇！令人难忘！）但是，我们随后知道这只是因为电梯工人在罢工。[22] 这个笑话引人发笑，但也让观众们牢牢记住了美国摩天大楼高得令人难以想象。相声中类似这种具有歧义的言辞本来是想批判美国，但实际上却强调了美国的军力强盛、科技发达和生活富足。看起来相声演员并非故意要让这些讯息具有双重效果，很可能这些段子是在仓促之间完成的，创作者还没来得及仔细考虑观众可能产生的复杂反应。

最好的“抗美援朝”作品出自老舍之手。他在美国的经历为创作提供了第一手素材。老舍认为，相声的本质是“不老实”，因此这种艺术性质特别适合用来讽刺美国：相比于其他艺术形式，相声在颠倒事实方面更胜一筹。[23] 不清楚这是否是指相声（1）能够扭转中国人民当时对美国仍然残存的正面印象；或（2）可以展示美国政府颠倒黑白的意图。老舍可能两个方面的意思都有。下面让我们各举一例。

在一个名为《对对联》的段子中，逗哏的是一位到美国旅游的、热衷于批评资本主义的对联名家。[24] 他一到美国就写了一副对联（甲为逗哏的，乙为捧哏的，下同）：

甲：上联我写：“我投机、我发财、我享福、我命好、我活着死乐！”

乙：怎么尽是“我”字？

甲：下联就尽是“你”字啦！

乙：怎么写的？

甲：下联写：“你老实、你受穷、你挨饿、你倒霉、你死了活该！”

乙：（假装误解“你”是指他自己）你死了才活该呢！

甲：这是美国的社会的贫富不均情形，不是说你。

逗哏的接连去了舞厅、医院、征兵局、最高法院、联邦调查局、好莱坞等地。每到一处他都写一幅讽刺性的对联，同时机智地逃避警察的捕捉。这个段子要比《纸老虎》和《如此美国》更能成功“扭转”人们对美国的正面印象。

有个段子展示了相声“不老实”的第二个用处——揭露美国政府颠倒黑白的花言巧语。这个“垫话”段子叫《访问杜勒斯》：[25]

甲：国务卿先生，请问苏联为什么屡次裁军？

乙：因为苏联的军队越裁越多，越可怕！

甲：国务卿先生，美国也预备裁军吗？

乙：不，我们扩军！

甲：请问，为什么呢？

乙：美国军队越扩越少，越和平！

甲：原谅我，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苏联军队越裁越多，美国军队越扩越少呢？

乙：有时候数目越加越少，越减越多！

这里语言的流畅与内容的荒谬所形成的反差正是传统相声的一种标准技巧。杜勒斯先生台词中的节奏、排比和自信都含蓄地宣告了一种“合理性”，同时他的荒唐逻辑又削弱了这种“合理性”，其中的反差颇为有趣。

老舍期望相声演员们能够创作出最好的新段子，但资料显示终究是职业作家们表现更好。新作品中最差的段子都是由相声演员创作的，像上面提到的几个“抗美援朝”的段子。相声演员侯宝林创作的几段相声虽然长于技巧，但在改进内容方面却不在行。例如，名为《妙手成患》的段子讲了一位外科医生的故事，这位医生工作的医院认为欢笑有助康复因而专门设立了一个相声科，但这位医生总是在缝合患者伤口时将手术器具落在患者体内。[26]

将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得最好的，是热爱相声却不从事表演的三位作家。其中一位是老舍，他在1950年代初新编、改写了三十多段子。[27]老舍在节奏、措辞和对话的鲜活性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敏感性。唯一的瑕疵是喜欢在作品中过多使用“我们都爱苏联！”、“斯大林的伟大照遍了大地”这类政治短语[28]（我认为与其说这是老舍才能上的缺陷，不如说反映了他诚心诚意地想要帮助共产党）。另一位十分成功的相声作家是何迟，其背景与老舍截然不同。老舍懂英语，年少时就读于基督教主日学校，并在英格兰和美国生活过，他必须向中国共产党证明自己的忠诚。而何迟是一位参加过晋察冀、陕甘宁边区游击斗争的老共产党员与老战士，并没有老舍那样的负担。从一开始他就站在革命的一方。和每个普通人一样，何迟有资格说新社会是属于“他的”；批评新社会也应该属于他的权利。[29]何迟天生就有种一本正经的幽默感。他创作的《买猴》、《开会迷》等段子属于1950年代初期最成功也最有争议性的社会政治讽刺作品之列。第三位值得注意的相声作家是工人出身的王国祥，他创作的《飞油壶》和其他几个段子都展示了真正的艺术才华。“小组”成员、文学家吴晓铃在1955年写了一篇文章，特别指出王国祥的作品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新思想和正宗相声技巧的完美结合。[30]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考察何迟、王国祥和其他相声作家当时所面临的问题，然后再讨论这两位作家的作品。

三、改革的问题

19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关于相声改进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由新政府的文化部完成的。这些指导方针也许能为相声作家与演员提供精神支持，但在相声的实践工作中并没有多大用处。指导方针要求新作品消除“野蛮、恐怖、淫秽、奴化、庸俗……以及不爱国”的事物，而代之以“健康、进步与优美的元素”。[31]指导方针原则上没有问题，但并不能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相声作家只能自己猜想在实际上应该如何行动。

相声中最容易进行改造的部分是摹声、贯口等口头杂技，其中词语含义重要性不大，因此可以轻易替换词组。但是这些简单的替换只是相

声的次要部分，并未触及相声艺术的核心。即使词语的替换很成功，也无助于发扬进步的思想。罗列一串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的名称虽然听起来有趣、也确实能使人捧腹，但却难以让听众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主义原则。

要让观众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的原则，相声的意义就至关重要。必须设法传达新思想。中共的指导方针认为“歌颂”新社会是关键。这一方针虽然得到了相声作者和演员的普遍认可，却令相声界在此后几年里陷入了棘手的困境。

问题在于相声的本质是讽刺。逗哏的在舞台上的定位就是一个自我嘲讽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以讽刺性为本质的艺术怎样才能对事物进行“歌颂”？如何“歌颂”才能让观众发笑？这是相声演员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技术挑战。

在相声中加入“歌颂”的一些最初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讽刺总是像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似地偷偷溜回到相声里。老舍讲了一个有关朝鲜战争的段子（作者不详）：一个人“穿上军衣，戴上钢盔，防毒面具，拿起手提机关枪，大枪，戴上盒子炮，刺刀，拉着过山炮”。[32] 有人问他：

“你干吗哪？”

“我给军队搬家哪！”

“你就上了阵？”

“没有。”

“怎么？”

“我吓得忘了穿裤子。”

这个笑话（它本身还有其他缺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表面上是要“歌颂”朝鲜战争的胜利成果，却恰恰讽刺了它本来想要歌颂的东西。席香远创作了一个讲述建设康藏公路的段子《西行漫记》。[33] 这个段子本应歌颂汉藏同胞之间建立的亲情纽带，但它的玩笑却是建立在对藏族人的轻视和贬低之上的。藏族人的语言听起来很奇怪，他们为汉族人洗车，却无知地将汽车称为牦牛。[34] 而另一个段子本来打算劝阻偷窃粮食的行

为，结果却引起了观众对小偷的同情，小偷聪明的手段也赢得了人们的钦佩。[35] 有一个段子表面上鼓励男女平等，但是仔细一读却是在讽刺有进取心的妇女：[36]

甲：旧社会妇女受压迫，新社会妇女管男人。

乙：是的……（之后认识到了问题）嗯？应该说呀，新社会妇女翻了身，男女都一样。

甲：一样？不能吧。

乙：你有什么证据呀？

甲：你拿我们生产队来说：队长是女的，副队长是女的，机耕员是女的，民兵指导员还是女的……

乙：哦，全是女的？

甲：只有会计是男的，可是这会计不争气呀。

乙：怎么着？

甲：搞了个对象还是女的！

逗哏的在这里本应是很荒谬的。他的整个观点都是“错误”的。然而观众很有可能不是嘲笑逗哏的，而是跟着他一起发笑。讽刺的出发点本是要人们对一些根深蒂固的事情产生怀疑，却恰恰可能对其针砭对象进行了支持。要求相声演员们只能用可以引发“正确”欢笑的方式进行表演实在是强人所难。

如果说人们可能对相声段子的歌颂对象报以嘲笑，他们也可能在段子中对本来要贬低的东西间接产生好印象。例如，针对老舍的相声段子《对对联》（一部讽刺美国的制度的作品，见上文），一位中共理论家写到：“相声主要给广大群众听，不见得每个人都很了解美帝的本质和内部矛盾，光用讽刺语气，提到‘民主’、‘言论自由’、‘合法程序’、‘科学文明’、‘兵源充足’、‘精兵百万’这一连串反话，在思想上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混乱。”[37] 简而言之，“相声怎样歌颂”的问题被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控制这种不可靠的艺术？”

1951 至 1955 年间，相声界为解答这个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尝试。一些演员在正式对白开始之前的“垫话”部分保留了真正的讽刺。这些垫话

不用预先批准，因此更加灵活。一个名叫张毅民（音译）的说书人在垫话中告诫听众不要购买国债。他开玩笑说，“国债”中的“国”字看起来就像一张哭丧着的脸。他进而告诉听众，如果谁买了国债，谁看起来就会变成那样。也许不止因为这一个原因，张毅民最终被送往劳改营。[38]

另一种叫作“外插花”的技巧在好些方面很有用。借助于“外插花”，演员能够把笑话穿插到本来基本上是政治独白的段子中，或者反过来，他们也可以把政治观点穿插到与主题毫不相关的段子中。较早运用这种做法的一个例子是基于传统段子《大改行》的修订本。《大改行》在1949年以前很受欢迎。它讲的是因为避讳一位皇帝的去世，清朝的京剧演员被迫停止表演三年；为了谋生，他们成为走街串巷的小摊贩，还用京剧的唱腔吆喝买卖。1950年代初有人打算在电台里表演这个段子，并准备不时插入“看看这万恶的旧社会！”这类台词。[39]然而这种机械的插入过于生硬，并没有把政治讯息有机地融入到相声段子中。

赵佩茹和常宝堃的《新灯谜》则较好地实现了艺术与政治的融合。在这个段子里，“新社会”的内容被穿插到传统的文字游戏中。两个相声演员玩一个游戏，逗哏的想方设法让捧哏的说出“好”这个词，而捧哏的则极力避免说这个词。

甲：你好啊？

乙：还那样。

甲：您家里好？

乙：看您问谁啦。

捧哏的很机灵。然后谈论的主题转向了政治：

甲：现在参军最为……

乙：光荣。

甲：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可……

乙：严。

甲：纪律严仗可就打得……

乙：勇敢。

甲：老百姓都说解放军……

乙：可爱。[40]

赵佩茹与常宝堃的这种方法也有缺点。整个段子虽然听起来活泼自然，但对新社会仅仅进行了肤浅的分析。政治信息与相声艺术之间的融合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但是早期尝试进一步深入的段子常常沦为无聊的说教。《西行漫记》这个段子讲的是康藏公路的故事，其开场倒是轻快活泼，但随后就变成下面这样：[41]

甲：告诉您，康藏公路是1954年12月25日通的车。康藏公路这一通车，那对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上，都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对于西藏的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身临其境、体验生活，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么一个伟大的工程，介绍给全国广大群众啊？

乙：对了。哎，还有什么好处啊？

甲：好处可多了。康藏公路是修筑在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头，全长就有2,255公里，由打1950年起，就这几年来，我们解放军筑路部队，跟民工们，都发挥了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他们是在日以继夜的、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跟大自然做顽强的搏斗，战胜了冰山、流沙、雪山、草地和原始森林。他们建设了230多座桥跨越悬崖激流，在岩石上打了2,860多个涵洞，移走了2,900多万立方的土石。沿着康藏公路走一趟，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学习呀！

对细节的一味铺陈和过度的一本正经一样，也会使相声失去生命力。1950年，新政府开始镇压其未能控制、继而产生担忧的土生宗教“一贯道”。当时侯宝林与孙玉奎创作了一个段子来揭露一贯道的“迷信活动”是如何毒害人们的生活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女儿割下了自己的肉来给她生病的母亲吃。[42]这样的故事很难成为相声的素材。简而言之，“外插花”自有其局限：“花”如果太小，看起来就只是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如果太大，又会产生反作用。

为了解决讽刺手法和改革主题相结合所面临的困境，有一种更有效的手法：以一种友善的方式讽刺那些有缺点但本质上善良的人。相声能够帮助这些人克服自身的缺点，而这对革命是有益的。侯宝

林 1949 年创作的段子《婚姻与迷信》就讽刺了那些思想过于守旧的好人。[43]1954 年的段子《夜行记》则描述了主人公的这样一些缺点，如总爱乱穿马路，搭公共汽车时不爱排队等候，骑自行车时又不爱遵守交通规则。[44] 这个人虽然有些无赖，但也不是坏人。在《夜行记》中，他得到了“善意的规劝”。用相声史学家薛宝琨的话来说，这种相声的目的是“洗脸不砍头”。[45] 吴晓铃对这个道理进行了更明确的阐释：“讽刺作品特别适合以生动而具体的方式来突出进步与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通过与强大的、不可征服的新生力量形成对照，腐朽制度可笑、令人唾弃和基本无用的方面会全部更加清晰地突显出来。那就是讽刺不但能加快落后、腐朽事物的灭亡，而且促进新生、进步事物成长的原因。”[46] 但在实践中，这种策略的效果却是喜忧参半。《婚姻与迷信》这个段子有些沉闷，《夜行记》则沦为粗俗的闹剧。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段子利用这一新模式后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分别是何迟的《买猴》、《开会迷》和王国祥的《飞油壶》。

《买猴》批评了一名因马虎而引起大麻烦的商店文书。他的名字叫马大哈，马是马马虎虎，大是大大咧咧，哈是嘻嘻哈哈（翻译成英文，大致就是“活见鬼”、“差不多”、“谁在乎”这样的意思）。[47] 马大哈要给香油桶与桐油桶贴上标签，贴倒是贴了，但因为女朋友电话的干扰，他把标签贴反了。几天之后，城里食品加工厂糕点部十分生气，因为他们制作的面包因为错用了桐油而臭不可闻，而城里的家具厂也抱怨他们生产的桌子因为错用了香油成了废品。但麻烦才刚刚开始。马大哈在抄一个命令时闹了最大的笑话：“某同志：立刻到（城市）东北角购买五十箱猴牌肥皂。”马大哈再次由于分心错写成：“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五十个。”接受命令的某同志也无顾常识就毫不怀疑地照单全收，立刻出发到东北去买猴。最有趣的一段发生在他到了沈阳之后试着亲自解释：[48]

甲：我是天津百货公司的，上级派我到东北办一批货，请多帮助！

乙：那没问题。你们打算办什么货呢？

甲：我们公司打算买五十只猴儿。

乙：买什么？

甲：买猴儿。

乙：什么猴儿？

甲：就是浑身上下有毛的那种猴儿嘛。

沈阳方面负责供应的办事员对买猴一事虽然感到非常惊讶，但却非常热情。他介绍这位同志到长白山下一个可能会有猴子的村子去买。长白村的村长同样对买猴这个奇怪的订货感到纳闷，但仍建议当天晚上举行本地猎户合作社大会，以方便这位同志直接解释他的任务。这位同志此刻站在台上不得不正式发言了，但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来买猴。不过他还是竭尽所能：

老乡们！（掌声）

同志们！（掌声）

（咳嗽）我……（咳嗽）我……（咳嗽）（转向一边的捧哏的）我要说什么来着？

同志们！上级派我来，到咱村买猴儿，这猴儿有什么用处呢？这猴儿……（问捧哏的）你说有什么用？

胡扯了一通后，这位同志找到了答案："猴子对我们国家有一定的贡献"。下面的听众对此显然不满意。在听众的压力和催促下，这位同志又提出猴子能看家，能表演，还能用猴毛纺毛线。他甚至说人就是从猴子进化来的。

作者何迟后来告诉我们，这个段子是根据他读到的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据报道，此事发生在天津，当时"买猴牌肥皂"被不经意缩写成了"买猴"。[49]这个小火花点燃了何迟幽默的想像力。其时正值1953年，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写出了整个段子。这个段子被著名相声大师马三立和他的搭档张庆森所采用，1954年11月又在《沈阳日报》公开发表。社会各界都非常欢迎这个段子，以至于"马大哈"这个词进入了日常语言。人们说："我又马大哈了"或"那个家伙完全是个马大哈"。[50]

这个段子的成功无疑来自它与日常生活产生的共鸣。到东北买猴的想法固然牵强，但是它所反映的普遍问题——工作懒散、盲目服从、爱

打官腔——是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这些问题的普遍性还反映在另一个事实中：段子里并不是只有马大哈一个人暴露出缺点。负责采购的那位同志、沈阳的那位办事员、马大哈的女朋友以及其他人都不完美。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人民的敌人”。马大哈做事马虎、不负责任，但并没有什么恶意。他有人情味、滑稽有趣，甚至能让人觉得有些可爱。

何迟的《开会迷》则讽刺了既罗嗦又自以为是的官员。这些官员认为自己的声音在会议上没完没了地嗡嗡作响本身就很有价值。关于一个简单的“洗脸盆问题”，剧团团长说到：[51]

> 同志们，我们评剧团的脸盆太破了，当然破了就需要焊，可是破得焊也焊不成了，因此我们就决定买两个新的脸盆。当然这两个新脸盆早晚也会破的，不过还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脸盆是必须买的。可是，由于我们评剧团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在一般情况之下，男同志主张用素脸盆，女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就希望用花脸盆；同时男同志当中也有少数人愿意用花脸盆的，而女同志当中也有少数人愿意用素脸盆的，因此我们就需要统一思想。否则，在买回脸盆的时候，如果全买的是素脸盆，那么女同志会有意见，如果全买的是花脸盆，那么男同志又会有意见。因此我们就需要在矛盾中求得一致，在对立中求得统一，为了保证我们行动的一致，我们就需要首先取得思想上的一致，否则会因为脸盆问题而引起我们评剧团内部的分歧。

团长的这种囉嗦空话甚至发展到了比上引段还要更高的理论水平。但是，就像对马大哈那样，讽刺基本上还是善意的。这位官员的确喜欢自我陶醉，甚至有一点愚蠢（例如他不知道应该让职工们排队回家还是各走各路）；但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对男女同志以及他们在脸盆上的不同偏好的关心虽然可能有些无聊—但这毕竟是平等主义，而且他对开会讨论问题的执着意味着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尊重集体意见，尽管他垄断了一切话语。这位官员一直面带笑容，也许是假笑，但至少是笑容而不是怒容。他总是很“积极”，而且不抽烟、不酗酒。

王国祥创作的《飞油壶》虽不及何迟的作品出名，但他在表达对改革思想的支持时更为成功地融合了效果自然的讽刺。这个段子描述了一

名懒散粗心的工人，他经常迟到，耽误别人的工作，有一次还忘了给机器上油，结果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意外事故，把他自己“光荣地”——他自己这样认为——送进了医院。这个段子的语言特别生动、自然、明白易懂。这种语言是不折不扣的“工人俚语”，几乎没有受到政治语言、西化文法或中日文混合的现代白话的影响。在受伤的英雄自诩“光荣”时，捧哏的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并斥责说：“别不嫌寒碜”——这样五个尖刻的音节包含了两三层的讽刺。老舍与何迟的相声段子总是让人至少隐隐约约地感觉是学者“向下”写给工人观众的；但在王国祥的作品中就看不到这种痕迹。

为了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王国祥精心编排了他的作品。他把这名麻烦的工人刻画成对自己给他人留下的恶劣印象完全一无所知。人们批评他的时候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因此愤愤不平地重复着他们的批评（“他们说我工作迟到！”“他们认为我马虎！”），巧妙地让我们直接从他自己的口中了解到他的过失细节。政治教育也很自然地融进了相声段子里，而没有“外插花”的刻意。例如，这名懒散的工人抱怨说：“你说这不是寒碜我吗？”逗哏的立刻打断他说：“他这是在帮你呢！”这个段子虽然丝毫没有提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类政治口号，但已经说明了时下里正时髦的政治观点。

这三个段子艺术水平十分突出，但在相声改进事业的层面上采用的都是惯常手法。1950 年代初创作出来的其他许多段子都对相声的改进试验表现出同样真诚乃至天真的热情。无论讽刺的对象是工人、官员、文书还是其他人，这些段子都待之以同样的宽容大度。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当然是敌人；但是我们中国人无论有没有缺点，都应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投入到为新社会而努力的工作中。相比于十年前往往总是嘲笑乡巴佬、残疾人与讲荤段子的旧式相声，我们应当公正地承认这些新相声段子已经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然而，当时中国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四、鳄鱼的颚

此时新相声的创作者已经开始触怒从宣传部和文化部内部观察相声的中共意识形态专家们，尽管相声作家在主观上并没有冒犯的想法（他

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在让人怀疑）。意识形态专家们并不反对讽刺旧社会，但当新社会的问题出现在相声段子里面时，他们开始关注了。

到 1954 年底，《买猴》已经大受欢迎；但 1955 年中共领导人却命令中央广播电台减少播放这个段子的次数。[52] 随后，包括“否定性观点”在内的一些“不同意见”开始出现在中共控制的报刊上。《剧本》杂志的编辑肯定收到了上级的特别指示。因为该杂志 1955 年新开设的栏目“给编辑的信”刊登的来信中对《买猴》的批评意见多于赞扬，这与公众舆论的看法完全相反。杂志社接着还召开了一次关于“讽刺剧”的讨论会，针对的就是《买猴》和其他走得太远的段子。[53]

如果站在中共当局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我们可能也许能够理解他们为何变得如此多疑。《买猴》中的幽默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于新社会的弱点之上——那些问题旧社会或者没有，或者已经存在但在今天看来更为严重。马大哈似乎对公共财产漠不关心；负责采购的某同志好像是集权体制下的走卒；政治会议看起来有点像一场闹剧。当逗哏的转向观众哭诉“我该怎么办？”时，他恐怕过多地触动了拥有类似日常生活经验的观众的心弦。

有时含蓄的批评会诉诸具体的言辞（对这些相声段子进行的公开批评往往并不引述有问题的台词，笔者推测这或许是因为官方担心引用后只会让读者更注意这些词儿，结果反而适得其反）。在一个名为《统一病》的段子中，何迟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在一个家庭里面“只是因为家长喜欢”，每个人就必须穿同样的衣服。[54] 在《开会迷》中，那个罗嗦官员感兴趣并乐意为此召开会议的话题之一就是“一百年后工人的幸福”。下面是这番对话：

乙：一百年后的事，干嘛现在就讨论哪？

甲：要展望一下儿共产主义的美丽远景啊。

乙：多美丽也甭这么老早就讨论哪！

我觉得在上下文中这些话读起来并不具有颠覆性。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何迟依然把它们当作善意的讽刺。但是神经过分紧张的官僚却很可能认为这些话是毒草。

我认为这正是中共理论家在相声改进时期所犯的根本性错误。他们太疑神疑鬼、太缺乏安全感了。他们应当相信相声作者和相声演员的专业能力——而且这些人在根本上是抱着善意的目的进行艺术创作的；官方也应该相信中国民众，让他们以正常的、有益于身心的方式开怀大笑，而不需要官方的微观管理。他们应该放松。鳄鱼鸟对鳄鱼是有益的。

另一方面，相声艺术家的错误则在于太过天真。在真正遭逢劫难前，他们本来早就应当发觉鳄鱼锋利的颚正阴森森地悬在上空，随时都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当他们在《说说唱唱》等杂志上交流彼此创作新相声的最初经验时，相声艺术家们就应当注意到一位左翼老作家就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问题进行的坦白交代，[55] 而该杂志的编辑也因为对表演艺术的“思想特点”持“错误观点”和缺乏关注而正在进行“自我批评”。[56]“毛泽东思想”与“一小撮”（从那时起这个词就经常被使用，甚至直到后来还明显出现在 1989 年北京屠杀中）这样的政治术语也突然间到处泛滥。[57] 在范围更大的整个文化界，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已经作为范例和标靶，升级为全国性的大批判。但是相声界并未注意到这些迹象——或者即使注意到了，他们也以为这类批评不会牵涉到相声界。

何迟后来在自传里说得很清楚，他一点儿都没料到自己会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即使因为“仇恨社会主义、组织反党集团、追求名利”的罪名而被游行示众并遭到嘲弄，何迟也一直在配合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显然相信，下次这些人必定会认识到他的无辜而放了自己。[58] 即使明明已经知道第一次的批斗会是场灾难，何迟还是同意回来参加第二次批斗会。他“承认”追求名利，虽然内心里认为“这些问题完全不存在”。他同意交出自己的私人信件，相信这些信件会证明自己无罪，但随后却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信件变成了指控自己的“铁证”。简而言之，何迟艰难地被夹在两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之间：（1）他对中国共产党完全没有任何恶意，（2）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不正确，所以一定是自己在某些事、某些地方真的有问题。无论如何，“右派”的帽子还是牢牢地扣在了他的头上；在何迟此后数次进出劳改营的二十二年里，这顶帽子一直跟着他。

1979 年，何迟获得正式“平反”而复出，并于次年在全国性的重要民俗表演艺术杂志《曲艺》上发表长篇自辩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仍然坚持“我不反党”，并借用毛泽东 1957 年提出的一个广为流传的词语，说自己只是写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对于当年那些针对他的抨击，他还是给予了相当的理解。例如他写到，马大哈的行为“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个人主义行为”。[59] 实际上 1954 年的情况恰好相反：马大哈这个人物之所以受欢迎，主要——甚至完全——是因为它就是新社会的评注。难道何迟已经忘记了这一点？难道二十二年的困苦永久地扭曲了他的观点？抑或他只是想保护自己以防政治风暴再次出现？我不知道，但估计是第三种可能。在 1980 年的这篇文章里，何迟于另一处写到：“1953 或 1954 年描写马大哈这样的人物完全出于写实主义。但今天再写这样的人物就不正确了。”[60] 这样的话看起来像是明显的自我保护。何迟一定知道，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 1980 年中国社会中的马大哈现象比 1954 年更加常见。“马大哈”一词仍然活跃在日常语言中，甚至今天还可以听到。

不管怎样，何迟还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而相声界的其他一些人则未能幸存，包括最令人痛心的老舍。1966 年老舍并非专门因为相声自杀，但他在相声领域的活动无疑预示了后来将要落在他头上的那些无妄之灾。1949 年，老舍完全可以留在美国或应邀前往台湾。但他回到了北京，还写作相声段子讽刺美国、支持抗美援朝、赞扬苏联友邦、歌颂斯大林。早在 1951 年，老舍就写出了“毛主席万岁”这句话（远早于此语后来流行的时期）。[61] 随着政治麻烦开始出现，与何迟一样，老舍也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善良意愿和辛勤工作会遭到诋毁。而且与何迟一样，老舍也深深陷入了两难困境：既希望帮助新中国，又要设法努力理解对他的攻击，而攻击他的恰恰是他认为自己正在帮助的那些人。身陷囹圄的老舍最终放弃了挣扎。

但是，让我们再次尝试从记忆中抹去这些后来发生的劫难，重新想象 1950 年代初期的形势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当时社会改造计划正在进行，相声界刚被赋予了更高的社会地位，为贡献社会主义摩拳擦掌。相声界组织起来了。他们进行了各种尝试，而且实践证明其中一些探索比另一

些更有效。相声界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到1954年，他们在如何使讽刺手法更好地配合革命目标这个问题上已经走近了一个很好的答案。相声界吸引了听众，而且听众的人数在迅速增加。总的局面看来相当不错。有一个问题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确切答案：相声的实验本来有没有可能取得成功？假如后来没有出现严重的打击，假如执政的是一个内心更有自信、更宽容的政权，相声的试验会不会取得成功？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只跟相声有关，但我认为它的意义更广。我认为它与1950年代初中国社会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有可比之处。

郭又新、姚昱译

注释

1 这一错误是因为把四声的“相”（相貌）读成了一声的“相”（互相）。这就像将英语的“comedy”（喜剧）根据“come”（来）的字面意思而直接翻译成“来戏”一样。

2 林培瑞：《相声语言艺术杂谈》，《半洋随笔》，台北：三民出版社，1999年，第243–264页；Perry Link, "The Genie and the Lamp: Revolutionary Xiangsheng," in Bonnie S. McDougall, ed.,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7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83–111.

3 侯宝林、郭启儒：《戏剧杂谈》，载于全美出版社编《中国相声精华》，台北：全美出版社，无出版日期，第3卷，第95页。

4 吴晓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

5 由孙玉奎、回婉华表演，罗常培1953年记录。见Perry Link, "The Mum Sparrow: Non-Vegetarian Xiangsheng in Action," *CHINOPERL Papers* 16 (1992): 1–27。

6 王决、汪景寿、藤田香的《中国相声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是最优秀的相声简史著作之一。顾也文的《相声介绍》（上海：文艺出版社，1952年）是这类作品的先驱。

7 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前揭文，第233页。

8 于世德：《我这半辈子》，《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5辑（1984年12月），转引自www.mapai.org。也见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前揭书，第222页以下。

9 《曲艺》，1982年7月，第11–12页。

10 于世德前揭文。

11 老舍的《向相声小组道喜》，《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谈相声的改造》，均收入《老舍曲艺文选》，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第186、188、190–191页。也见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前揭书，第231页。

12 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前揭书，第228页；于世德前揭书。

13 老舍：《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第188页。

14 老舍：《谈相声的改造》，第190–191页。

15 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前揭书，第221、223页。

16 同上，第226页。

17 http://www.saturdayeveningpost.com/wp-content/uploads/satevepost/BobHopeKoreanWar3.jpg 上有鲍勃·霍普慰问驻朝美军的一张照片。常宝堃慰问中国志愿军的照片见《常宝堃相声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页之前。

18 收入席香远、孙玉奎编《纸老虎》，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

19 同上，第7页。

20 同上，第24–25页。

21 同上，第4页。

22 同上，第12页。

23 老舍：《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第189页。

24 在顾也文前揭书中部分重印。

25 中国曲艺研究会：《相声垫话选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26 中国曲艺研究会编：《相声创作选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85–192页。

27 见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前揭书，第2233页。

28 这些例子来自于《十月革命颂赞》，《说说唱唱》第23辑，1951年11月；《中苏关系史说本》，《说说唱唱》第3辑，1950年7月。

29 有关何迟的这些概括在《何迟自传》（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中不难得到例证。也见薛宝琨：《中国的相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5页以下。

30 吴晓铃：《略谈相声的创作问题》，《北京文艺》，第8辑，1955年，第20–21页。

31 引自 Marja Kaikkonen, *Laughable Propaganda: Modern Xiangsheng as Didactic Entertainment*, East Asian Monographs, No. 1 (Stockholm: Institute of Oriental Language, 1990), 122。

32 老舍：《谈相声的改造》，第191–192页。

33 席香远、刘宝瑞、郭全宝：《西行漫记》，《相声创作选集》，第12–22页。

34 同上，第18–19页。

35 陈涌泉、张善曾：《盗运粮食的人》，《北京文艺》，1955年第8期，第11–14页。

36 夏雨田：《女队长》，《新相声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65年，第28–29页。

37 《给〈对对联〉提的意见》，见顾也文前揭书，第109页。

38 在此我要专门感谢高峥提供的这个例子。关于张毅民更多情况的介绍，见高峥的著作：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232–233, 305n. 58。

39 陈弧彤：《对相声改革工作的意见》，上海文化出版社编：《相声论丛》，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 年，第 102 页。

40 《相声创作选集》，第 4–5 页。

41 同上，第 13–14 页。

42 《侯宝林相声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第 12–22 页。

43 同上，第 1–11 页。

44 郎德沣、陈文海、蒋清奎、贾鸿彬、侯伯照、李培基：《夜行记》，《相声创作选集》，第 217–226 页。

45 薛宝琨前揭书，第 139 页。

46 吴晓铃：《略谈相声的创作问题》，第 20 页。

47 何迟在自传中告诉我们，当时战士们用这三句话来描述他们当中一些工作不负责任的人。《何迟自传》，第 250 页。《买猴》这个段子的文本出现在《相声创作选集》，第 88–105 页。

48 《相声创作选集》，第 97–99 页。

49 《何迟自传》，第 250–251 页；也见何迟：《从〈买猴〉谈起：对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相声创作的一些看法》，《曲艺》第 3 辑，1980 年，第 25 页。

50 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前揭书，第 238–239 页。

51 《相声创作选集》，第 202–203 页。

52 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前揭书，第 240 页。

53 同上，第 240–241 页。

54 《何迟自传》，第 264 页。

55 《说说唱唱》，1952 年第 2 期，第 9–13 页。

56 《说说唱唱》，1951 年第 19 期，第 51 页；《说说唱唱》，1952 年第 2 期，第 4–8 页。

57 例如，“毛泽东思想”出现在老舍：《文艺作家也要增产节约》，《说说唱唱》，第 4 卷第 6 期，1951 年，第 9 页。“一小撮”出现在席香远、孙玉奎前揭书，第 26 页。

58 《何迟自传》，第 283–288 页。

59 何迟：《从〈买猴〉谈起》，第 26 页。

60 同上，第 24 页。

61 《说说唱唱》，1951 年第 10 期，第 10 页。

第十章

“第一堂课”：1950年代初期中国人类进化的教学

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

欧克澜（Cuthbert O'Gara），天主教主教，1924年起被派到中国传教，并在整个共产主义革命期间一直留在中国。他一直主持管理着自己的教堂，直到1951年6月在大规模的镇压基督教运动期间被捕入狱，随后于1953年被驱逐出境。多年以后，欧克澜这样描述中国共产党一掌权便立刻在全国人民中建立各种学习小组的活动情况：“现在如果我问大家，当时给思想灌输对象上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有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肯定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留下的智慧瑰宝。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第一堂课，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堂课，竟然是从猿进化到人——也就是达尔文学说！”[1]

的确，“从猿到人”的故事是当时各种学习小组和政治报告的“第一堂课”，也是始于1950、1951年间的针对各种层次的阅读群体的诸多展览、幻灯片、杂志文章和图书论著的主题内容。考虑到当时新中国还有其他重要事情亟需操劳，例如结束内陆地区的革命、控制各种文化机构、应付朝鲜战争等等，这不禁令人纳闷：为什么传授人类进化的宣教活动会具有如此的优先重要性？

答案就在于：新中国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关键作用。换言之，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坚持认为，改造人民的思想意识，将有助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更为宏伟的目标。这也许有些讽刺。因为在此种改造人民思想意识的早期活动中，重点之一恰恰就是要根除“唯心主义”，

并以“唯物主义”完全取而代之。基于马克思主义重要文本的各种宣传要求人们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一同看作是物质力量的产物，而讽刺之处在于，认为在教育人们以唯物主义方式进行思考之后就能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主张——思想高于物质、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基础。不过看起来1950年代初的中共宣传家们并没有为这种矛盾而困扰。按照他们的理解，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唯心主义”实则等同于宗教和迷信，而“唯物主义”则代表科学和客观现实。这些宣传家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向民众灌输唯物主义将是把这个国家迅速带入社会主义轨道的便利手段。正是从人类进化的故事中他们发现了一种特别有力的媒介，可以教化人们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即便对那些识字不多、只受过有限教育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完美文本的存在。此即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76年撰写的一篇内容简洁而文字优美的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在中国，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和他所著《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部分段落被共同编入一本简洁地题为《从猿到人》的小册子多次出版发行。社会主义中国和苏联一样广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在这种历史框架里，《从猿到人》构成了整个叙述的开场白。该文本所反映的人类起源学说对各种宗教世界观构成了有力挑战并最终取代了后者。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宣称：虽然一些唯心论者认为上帝造人，但是“我们讲从猿到人”。[2]

研究人类的起源与进化问题具有政治的效用——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当时的古人类学研究必须由恩格斯的理论来主导。尽管如此，古人类学的各种科普资料还是有很大余地来保持其自身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阶段。在1950年和1951年初，倡导兼容并包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一直鼓励知识分子甚至是宗教领袖，让他们相信他们的观点是受到尊重的，至少是得到容许的。况且，即便大多数知识分子确实打算适应辩证唯物主义的新范式，这一调整过程需要相当的时间。古人类学家们把他们在非社会主义环境下——包括与外国科学家

一起工作时——获取的知识带到了1949年以后。最后，古人类学领域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强化了当时反映出来的各种看法的多样性。例如，人类最早出现在非洲还是亚洲？这一暂无确定答案的问题就为当时的许多科普课本增添了一笔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直到1950年代初期，北京猿人化石在人类始祖演进史上的确切地位仍然不很清楚。这些距今大约五十万年的人类化石，是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由中外科学家合作在周口店（就在北京城外）挖掘出来的。虽然周口店遗址的发现为世界提供了最丰富的人类化石材料之一，但是那些化石与现代人类之间的准确关系还没有得到解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里，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逐步得到了更明确的界定，也因此促使了可以被认为是人类起源正统学说的看法的最终成形。出版流程与批评工作对把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解释区分开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在1951年，关于人类起源的各种文献普遍都清除了创世论和唯心论的痕迹。此外，朝鲜战争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它厘清和确定了人类起源正统学说在政治上的敌人，并加强了对敌方意识形态的抵抗与反击。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国内阵线）不仅激起了对外国教堂的攻击，还格外凸现了当时正在兴起的正统派学说中两个最重要的主题：国际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与此同时，纽约方面发生的有关古人类学的一系列事件完全改变了人类始祖谱系的形态，这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对北京猿人化石的解释。

追溯这些过程将有助于揭示科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意识形态奠基工作中发挥的巨大重要性。科学普及活动为国家提供了很好的服务，特别是在人类起源这一重要问题方面。然而，我们必须反对政治决定科学、科学服务于政治这样过于简单的定论。科学并不只是政党领袖别有用心、出于特定目的而玩弄的一种政治游戏。虽然一些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受到了限制，但是源于古人类学内部产生的各种问题有力地塑造了这一学科的话语论述。另外，鼓励人民进行批判性和科学性的思考本身就是国家优先考虑的事情，科普资料中展现出来的实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在收集到足够必要证据之前允许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保持开放性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一、旧石器时代的革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里，有另一件更早之前发生的开端性事件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人类的起源。在1951年出版的《我们五十万年前的祖先》系列图画书的绪言中，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将这两件极富变革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实在说起来，不但我们翻了身，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北京人'，也随着解放的胜利而翻了身。"贾兰坡特别提到，新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北京猿人，以便向"广大群众"讲授人类进化知识。其实贾的这一论述也有隐喻的含义：作为革命标志之一的北京猿人也开始了具有新意义的新生活。[3]"从猿到人"的故事是一个有关解放和改造的故事，它与当时的政治胜利存在着共鸣。

1950到1951年间，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制作了大量资料，打算让"群众"既熟悉"人类起源与发展"的社会主义解释，也了解在中国发现的人类进化的化石证据。这些资料既有针对各种教育水平的读者的图书，也有刊登在科普杂志和通俗读物中的文章，还有政治大课和各种干部班，更有在博物馆和其他场所进行的展览，以及在工厂和其他工作场合进行的演讲报告和幻灯片放映。在大批这种最初的相关活动勃兴过后，仍有新材料以较慢的速度继续出现，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基本上所有这些科普资料都以恩格斯"劳动创造人"这一观点作为基础。1876年，恩格斯写了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928年，该文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发行。[4]1949年后，这篇文章立即成为许多图书和各种科普杂志文章的讨论基础。这些科普资料有些是译自苏联的文本，但大多数都是原创的，作者通常都是古人类学家。比如像裴文中（1929年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便归功于他）和贾兰坡，还有像刘咸这样曾留学欧洲学习，并曾与外国科学家一起从事过北京猿人遗址挖掘工作的科学家。这些人把他们丰富的知识与多样化的经验都整合进恩格斯提供的新框架之中。虽然这些人中有不少对恩格斯很陌生，但他们对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并不陌生。在破除"迷信"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官员是同盟者。

新政府并不指望人民自己亲身阅读有关人类进化的相关图书和杂志文章。相反，由像艾思奇这样的重要中共知识分子负责讲授的“政治大课”，向许多人介绍了恩格斯对人类进化问题的解释。[5] 而更多的人则是通过参加由干部、工人、农民和士兵组成的“学习小组”了解到恩格斯的理论。[6] 根据在香港对当时来自大陆的逃亡者的采访，鲍大可（A. Doak Barnett）写道：1950 年代初，学习小组“最普遍使用的课本之一，是一本名为《社会发展史》的书……每个人都读《从猿到人》”。[7] 与此类似，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采访的一名中国人也回想起一次“令人难忘的”长达五个小时的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讲座；讲座的开头部分就是基于一本名为《通过劳动从猿到人》的“通俗小册子”。[8]

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是：因为直立行走，人的双手得到“解放”，这使劳动成为可能；而反过来，劳动又推动和促进了复杂的社会交往、语言能力、大脑发展以及其他把人同猿区别开来的特征。恩格斯强调劳动本身“改进”了双手：“手不但是劳动底器官，*它还是劳动底产物*。”[9] 双手的发展让人类从事更为复杂的劳动成为可能，促进了人类的“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这相应地产生了语言的需要。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早期人类的大脑才开始受到刺激，脑容量得以增长、大脑活动日趋“完善”。[10]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设想了一种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劳动和社会刺激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展、脑容量的增长又促进了更复杂的劳动形式以及社会交往的出现，但是他从未质疑过是劳动而不是大脑的发展启动了这一良性循环。[11] 对恩格斯来说，这直接来自于对自然现象的唯物主义理解，这种理解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的。大脑优先论属于唯心主义，这不仅由于它不能解释大脑发展的物质原因，还因为它认为人类的智力发展是进化的推动力。尽管与恩格斯同时代的人未必同意他的哲学视角以及他阐释这些问题的那些术语，但他们确实就大脑发展与直立姿势孰先孰后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实际上在非社会主义的西方世界，这个问题始终是人类进化争论中的核心话题，至少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中叶达尔文主义研究发生理论革命、皮尔当人（Piltdown Man）化石被揭发为纯属伪造之前。在 1912 年皮尔当人“被发现”之后的 41 年里，人

们一直认为这些化石证明了这样一种流行观点，即大脑的发展早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其他形态学变化。但是 1953 年证明皮尔当人化石是由一个猩猩的颚骨和两个人类的头骨做旧伪造而成之后，人们就恩格斯提出的见解达成了一致意见——尽管在表面上并没有科学家将其清晰地表述为劳动创造了人。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初期，所有描述北京猿人和其他早期原始人类的生活状况及其生活时期的通俗著作都以恩格斯的论点为基础。1950 年出版的一本以韵文写作的图画书用以下这些简洁的词句强调了恩格斯的论点：

> 只因劳动，直起了腰，会跑会跳，用手用脑，
> 又有火烧，话会说了，几十万年，猿变人了。
> 这些都是：暮暮朝朝，劳动创造！[12]

在另一本书中，读者了解到："因为能够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实行劳动，所以猿人才能够变成人，野蛮人才能够变成文明人。"[13] 此外，几乎所有关于人类起源的通俗读物都至少包括了"劳动创造了人"这样的短语。通过这样的方式，用科学的手段把人类定义为劳动者和群居的社会动物，劳动也被很自然地定义为一个对人类经验具有根本意义的范畴。因此，科普著作和像电影《思想问题》（见本书第 11 章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的讨论）这样的文化产品一起将不劳动者贴上了不是真正的人类的标签。通过这样的话语论述，劳动阶级在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劳动创造了人"这一基本概念轻而易举地扩大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核心要素。在"原始共产主义"阶段，人类组成了以内部关系和谐、外部环境危险为特征的小团体。制造工具、搜寻粮草、狩猎以及其他活动都需要共同劳动，因为只有通过集体劳动原始人类才能勉强生存并保护自己免遭凶猛的食肉动物的伤害。在 1950 年出版的另一本图画书中，画家描绘了一群正在制造工具的集体劳动者，在图画旁边，贾兰坡写道："由左起第一人表示在河岸上寻找石器材料，第二人表示打制石片，第三人表示修制一件石片石器，第四人表示在学习他们制造的经验，有这种共同的劳动，交流着共同的经验。"[14] 几年后一本面向高级阅读能

力读者的书从同一立场出发对比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人类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虽然“统治阶级”认为人类天生就是彼此竞争和生性好斗的，但是原始人类社会实际上是通过文化交流与和平互动而保持运转的。[15] 此外，在原始社会里人人都必须参加劳动；也没有阶级界限，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投身于生产。[16] 虽然这样的社会可能看起来充满了吸引力，但一位作者提醒到，期望回到较早的历史阶段是没有用的。这位作者继续说，不过不要紧，因为还有“更美丽、幸福、自由、快乐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17]

二、从“上帝创造人”到“劳动创造人”

因此，无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层面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方面，从猿到人的故事都是美丽的一课。不过，许多科普读物的作者并没有因此就抛开了更宏大的问题。相反，他们跳出这个具体问题，转而将恩格斯提出的理论放到一个更大的叙事架构之中，在这里唯物主义世界观取得了对唯心主义的全面胜利。苏联和中国的书籍都将达尔文与恩格斯树立为打击唯心主义的两个唯物主义利器：达尔文证明了人类与动物具有相同之处；恩格斯则宣告了劳动的首要地位。主要目标是打击唯心主义，特别是宗教唯心主义，因此在这些书籍中各种宗教创世故事都被当成辩驳对象。

苏联书籍《人类是怎样长成的》开宗明义地提出：“是相信圣经呢，还是相信科学呢？”[18] 中国的科普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苏联著作对基督教的讨伐，有时他们还添入中国的创世故事作为攻击目标——最常见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创造世界和女娲用泥浆造人。[19] 遵循苏联科普作家米凯尔·伊林（Mikhail Ilin）的教导，中国科普作者们也留意到了1925年发生在美国的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田纳西州的一名教师对一项禁止在课堂上教授进化论的法律提出了挑战，但当地居民提出抗议，声明他们既“不是猴子”，“也不愿意被看作是由猴子进化来的”。[20] 这个故事有助于深化这样一种政治信息：在很多人的想像中更为先进的美国实际上被宗教信仰束缚了发展。

总的来说，这些作者们以极富同情心的笔触解释了为何对自然现象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宗教解释。贾兰坡在一本图画书里谈到，迷信源自早期人类对诸如雷、电等自然现象的恐惧和误解。[21] 中国后来出版的书籍则进一步指出，古代基督教、埃及以及中国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有着共同的主题：都把人类描述为是由尘土、粘土或泥浆制造出来的，因此这些故事很可能是在制陶术成为这些社会的重要技术的某个阶段被虚构出来的。[22]

不过，大多数科普资料都把注意力放在宗教后来如何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欺骗和剥削劳动者的工具这一问题上。在《人类是如何生产与发展的》一书中，苏联作家普列雪茨基（M. S. Plisetskii）用了整整一章的内容来讨论“资产阶级为什么要支持宗教”这个问题，并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宗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23] 1950 年中国出版的《从猿到人：通俗讲话》一书宣称：“这种宗教迷信思想，对工人很有害处……使他们以为自己没有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力量。”[24] 中国有些书籍进一步将宗教对人类起源的解释嘲笑成“鬼话”，以此将其与社会主义制度决心根除的各种形式的迷信联系在一起。[25]

虽然一些关于人类起源的科普资料也提到了中国本土的信仰——最常见的是女娲传说，有时也有佛教传说，但所谓“迷信”主要指的是基督教的创世说。在一个总人口超过 5 亿、而基督徒只有几百万的国家中，这未免有些奇怪。[26] 毫无疑问，部分要归因于苏联模式的绝对影响力。在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几年里，这还有可能是因为中共担心民国时期的教会教育对知识分子和其他都市人群所产生的影响。至少在生物学方面，接受过民国时期的教育的科学家几乎都在教会学校上过学。[27]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因素的影响力渐渐消褪，仍然坚持对基督教“唯心主义”进行连续不断的抨击，其实是用来提醒人们注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方式，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这些科普资料提到各种创世故事，其目的就是要让科学来打倒它们。达尔文通常受到最高赞誉，他证明了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被誉为“战胜了宗教”、“伟大的科学家”。[28] 这样的观点与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非常相近。例如马克思在 1860 年写给恩格

斯的一封信中就谈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29] 在另一封信中，马克思详细地阐述道：《物种起源》“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意义”。[30]

然而，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尔文主义完全满意。更确切的说，他们认为达尔文受到生活环境的过度影响，他在思想层面上是唯心主义、在社会层面上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在一封 1862 年写给恩格斯、后来经常被引用的信中谈到：“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31]

在介绍人类进化时，中国和苏联的书籍作者有时也会响应马克思对达尔文的批评。比如 1950 年中国方面出版的一本书就提到，达尔文的唯心主义视角使他只看到竞争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合作的影响。[32]1951 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一位苏联作者的著作，则进一步将达尔文对竞争的重视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联系在一起。[33] 然而最为常见的情况是，这类著作仅仅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描述成是不彻底的，而非存在哲学意义上的缺陷。正如另一位苏联作者谈到的，达尔文“没有完全解决人类起源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彻底解决人类从生物界分离出来的问题。”[34] 同样，在 1954 年合作出版的科普著作《劳动创造人》中，裴文中和贾兰坡也认为，进化论存在着一个“本质上的缺点”，因为达尔文“并未认识到人与动物界的基本区别，所以不能指出人类发展的原因与其他动物发展的原因的基本不同之处”。[35] 这些科普资料认为，恩格斯自己弥补了这个缺点。后来另一位中国古人类学家这样简练地概括到：“如果说达尔文把人类从上帝手里解放了出来，归还于动物界；那末恩格斯又把人类从动物界中区别出来，使人看清了人作为劳动者、作为自然的改造者。”[36]

三、清除唯心主义

职是之故，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这一命题成为教育人们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令人信服并且非常有效的手段，同时它也给唯心主义、特别是基督教带来了中共渴望已久的“致命打击”。但是，新的正统派学要巩固其自身理论基础、已出版的各种科普材料要规范管理、形成一致，其间颇费了一番功夫。造成有关人类进化的科普资料最初所呈现出的多样性的成因有好几个，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新国家政权所承诺的兼容并包政策。

在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几年里，中共仍然坚持拥护 1930—1940 年间在延安革命根据地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目标。根据毛泽东的文章《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一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而条件则是这些人需要摆脱“反动的唯心论”。[37]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这种兼容并包的语言仍在继续，目的是要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对社会和民族重建所做出的贡献将会得到重视。1950 年代初期，新民主主义政治对于宣传人类进化论的科普作者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作者经常并且是有意识地将新民主主义理论与自己的写作和出版行为联系起来就说明了这一点。[38]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承诺说：即使“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共产党员仍然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在政治行动上建立起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39] 在 1950 年和 1951 年初，信奉基督教的新教教徒与天主教徒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颇具建设意义的会谈。在会议上，周甚至临场发挥，保证说中国天主教会可以维持与梵蒂冈的联系。[40] 虽然当时特别强调普及对人类起源的科学解释，因此只有充分认识到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宽容政治气氛，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部从创世论的角度探讨人类起源的著作会在 1951 年 1 月得以出版。

这本书题为《人类起源问题》，由天主教教育联合委员会出版，试图通过令人信服的讨论来否定从科学角度解释人类起源的正当性（或至少否定科学理论的必然性）。作者采用的方法和今天还坚持创世论的不少

人类似。他引用了包括裴文中和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在内的一些著名科学家的言论，由此揭示一些科学家自身也承认人类化石记录并不完整，而且难以解释到底存在的是什么。该作者接着指出："通常我们在读进化论时，都会碰见这样的话（指达尔文的贡献）：'这一来上帝创造人的鬼话被打倒了！'但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目前人类进化问题还是一个未被证实的假设。"[41] 就进化论提出几个问题之后，该作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类进化需要一个"计划者"。[42] 如果这位作者的写作再耽搁几个月，他的书很可能就无法出版了。到 1951 年夏天，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把目标对准了在中国活动的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一些宗教领袖遭到迫害，政府也明显加强了对所有与教会相关活动的监视。[43]

我还没有发现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年创世论出版物的其他例子。但无论如何，唯心主义的幽灵仍然在人民共和国初期一些关于人类进化的著作中挥之不去。这固然部分因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宽容大度，不过也是因为当时科学家们尚需时日调整旧思维。

刘咸的经历最为生动地表现了知识分子适应社会新秩序的过程。刘咸在伦敦跟随著名的阿瑟·基思（Arthur Keith ）爵士学习。基思属于这样的学者，他们最强调大脑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并认为人脑的发展是进化过程的潜在趋势造成的。[44] 如前所述，这正好与恩格斯的观点相反。恩格斯认为，大脑的发展是在双手解放和劳动开始之后才发生的，而这些改变的根源在于物质世界。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基思的认识反映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在人类进化理论方面，基斯赞同定向进化学说（orthogenesis，又译直生论），认为进化是随着人类内在趋势的实现而发生的。

刘咸从英国回国后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之一。1947 年他在暨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45]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一开始刘咸在新国家的前途看似很有希望。1950 年，他出版了一本普及性的科普读物，题为《从猿到人发展史》。同事卢于道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并在其中乐观地宣称：自"北京人"的石器时代以来，人类一直以令人惊讶

的速度在进化发展；随着现在“已进入到‘新民主主义’时代，这就告诉我们大家用手用脑来创造了”。[46]

八个月后，一位名叫韩文理（此人现在只知其名、并无其他信息）的读者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攻击刘咸的这本书。[47] 据刘咸回忆，书店很快作出反应，将他的这本书下架。[48] 韩文理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刘咸的唯心主义上。按照刘的看法，我们的类人猿祖先能成功完成从树上到地面的转变，是因为他们大胆积累新的经验并能利用这些经验来构想行动计划。的确，刘咸对人类进化的描述具有很强的唯意志论色彩，这会使人联想到他的老师基思信奉的大脑先行的理论。在刘的解释中，类人猿似乎是靠自己的设想策划了进化路线。[49]

但更确切地说，韩文理并不是反对唯意志论。毕竟从奠基者李大钊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毛泽东，唯意志论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50] 让韩感到困扰的是，刘咸认为这种唯意志论存在于人类从事劳动所必须的第一个阶段之前。从刘的著作引用了相关段落之后，韩问到：“这不是等于说，还没有开始劳动的古代人猿，已经能够思维了吗？”几段之后，韩文理总结到：“要知道，古猿的变成人，不是靠着气候的突然变化，也不是靠着‘勇气’和‘决心’；而是靠着长期的慢慢学来的劳动。”[51]

刘咸其实并非刻意挑战权威。他的雄心并不是要挑战恩格斯，相反他在这本书中煞费苦心地想要证明恩格斯的理论。他也没有打算写一本书来改变人们对劳动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的传统看法。最可能的解释是，刘咸在解释他对人类起源的理解时，没有成功地结合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的理论。刘咸像做三明治一样把自己的叙述夹在“劳动创造人”的厚面包片中，但是肉和面包——他固有的理解和恩格斯的理论——之间却存在着真实的哲学分歧。

1950 年出版的关于人类进化的书籍中，有些并没有提及恩格斯或他的“劳动创造人”理论。[52] 甚至在 1951 年 1 月还可以出版一本从创世论的角度来解释人类起源的著作。但 1951 年 5 月对刘咸的批评、加上 6 月份至少一篇针对另一本人类起源普及读物的负面评论，都表明最初的宽松政策已经开始收紧。[53] 朝鲜战争深化了与外国唯心主义、资本主义发

生瓜葛的政治风险，而评论家们也开始忙于审读新近出版物，审查其中不当的政治内容，这一切使得人们最初对新民主主义抱有的希望迅速消褪。即使出发点是真诚的、倾向正确的，如果不能正确阐释恩格斯的理论还是会遭到攻击，就像刘咸那样。

这一事件并没有结束刘咸的职业生涯。1952 年，他在复旦大学协助建立了建国后中国最重要的人类学系。但是，由于韩文理的批评，刘咸后来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还是接连不断地受到批评和干扰。在 1955 年中国科学院的反唯心主义运动中，他再次成为批判目标。尽管他受到《科学通报》的编辑邀请为该杂志准备推出的专刊发表意见，但是后来编辑们认为他的稿件缺少足够的自我批评而最终未予刊登。刘咸回忆到，1956 年“在批判过程中，乱戴帽子，说我是唯心论、拟人论”。他的书也再次遭到批判。这次是因为“传播了反动的政治思想”和“危害了学习运动”。[54]1957 年毛泽东发动百花运动，刘咸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获得了表达懊悔的机会。和其他人一起，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短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篇短文就是本段引述刘咸回忆的来源。但在随后的反右运动期间，刘再次遭到批判。据当时在复旦大学人类学系学习的学生回忆，由于被划为“右派”，刘咸已经被驱逐到图书馆工作。当然，有时（大约是 1960 年代初）刘咸也被允许教几堂课，讲授如何运用经典文本来学习人类学。[55]

四、“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

1950–1951 年中国有关人类进化的作品之所以在意识形态上比较自由，一是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兼容并包原则，二是因为知识分子需要时间来适应唯物主义的观点。第三个原因可以从当时国际古人类学的历史情境中寻找。1950 年是古人类学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出现了一些在恩格斯时代还未发生的问题，但直到 1950 年之前，这些问题仍悬而未决——例如北京猿人是否是人类祖先的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彼此关联但又互相对立的问题显得利害攸关：一是某些进化理论是否能用于解释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二是北京猿人是否能

被当作一个民族的象征来运用。在这些问题上达成普遍共识（虽然有些自相矛盾）要考虑到古人类学的“现代综合进化理论”与朝鲜战争这些完全不相干的因素。

在中华民国时期，北京猿人是人类祖先这一看法在国内外都未得到广泛承认。从1920年代开始直至二战结束，科学家倾向于关注原始人类化石之间的差异而非相似之处，因此他们不仅把这些人类化石归为不同的种，而且还归为不同的属。[56]这样，爪哇人、北京人、尼安德特人与其他一些猿人都被看作是人类谱系的旁支。这些猿人已经灭绝，被人类的直系祖先所取代，而后者很明显没有留下化石资料。[57]

但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是个例外。他在1934年步达生（Davidson Black）去世后担任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研究主任工作。魏敦瑞认为人类进化遵循线性模式，也就是说，生活在任何一个具体的进化阶段的人类都是同一人种的不同种族。因此，并没有所谓的“取代”与“灭绝”，有的只是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进化。魏敦瑞发现北京猿人和现代蒙古人种之间、其他化石与该化石发现地的现代人之间都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很明显的形态学的相似之处。这些种群都保留了自身特殊的种群特征，但同时也遵循一些基本的、有普遍性的人类进化“趋势”——魏敦瑞的模式与阿瑟·基思提出的定向进化模式有相似之处。他认为，北京猿人不仅是人类的祖先，确切说来更是中国人的祖先。[58]

1950年纽约冷泉港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活动，与会的科学家把进化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进化论运用到古人类学研究中。参加座谈会的科学家大幅度简化了人类谱系，将北京猿人放在直立人种（Homo erectus）中，直接成为智人（Homo sapiens）的祖先。[59]虽然魏敦瑞的种族连续进化理论被回避了，但是他从事的“单一人种”研究却成为此后古人类学领域的理论基础。[60]重要的是，现代综合进化论也将基思和魏敦瑞所持的定向进化理论的反对者团结起来了。但是，与韩文理对刘咸的批评不同，冷泉港的科学家对劳动在进化中的作用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自然选择。

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中国也出现了向线性进化论的过渡，把北京猿人和其他人类化石置于进化谱系的主干中。目前还没有直

接的证据可以表明中国科学家是根据国际学界的新共识而改变了他们的主张。尽管如此，这种巧合却是惊人的。考虑到这些年里中国的科学家一直与他们的外国同仁保持着接触和联系，很难说中国的这种转变与国外发生的变化没有丝毫关系。[61]

虽然1950、1951年出版的一些科普资料把北京猿人描写为人类的直系祖先，但另一些资料则继续认为北京猿人是一个旁支，或者坚持认为目前尚无足够证据能给这个问题以明确的最终回答。例如，裴文中在1950年写道："我们还没法指出哪一种猿人是现在人类的祖先，也许全不是人类底祖先——他还等待我们发现。"[62]1940年初版、1950年再版的一本重要著作甚至提出，北京猿人在某些方面更像现代欧洲人，而不是现代亚洲人。[63]

贾兰坡的《中国猿人》也于1950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北京猿人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并特别引用了魏敦瑞的论据来加以证实。但是贾兰坡不同意魏敦瑞的连续进化理论。他提到了经魏敦瑞确认的北京猿人和蒙古人种（包括东亚人在内的一个主要人类族群）之间共有的特征，也提到了魏敦瑞得出的这两者间有种族连续性的结论。而后贾兰坡明确地反对了魏敦瑞的这种理论构想。他指出现代人类的各个种族都十分相像，不太可能会有北京猿人这样的古代祖先。贾兰坡认为，人种的分裂一定是发生在尼安德特人时期之后。[64]

1952年左右出版的科普著作中，关于北京猿人作为人类祖先的观点不再含有不确定性。此后"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越来越多地被中国科普作者专门并且反复提及。在一本辞藻特别华丽的著作中，"我们的祖先"这个词语在不足一百个句子中出现了二十四次，其中十次明确地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65]尽管贾兰坡自己显然并未被说服，但1950年代至少有两本书进一步指出北京猿人和她的现代后裔（有时被称为"蒙古人种"，有时又被称为"华北人"）在骨骼结构上存在明显的相似性。[66]

虽然人类谱系的变革有助于人们借助科学的术语将北京猿人称为人类祖先，但北京猿人之所以在面向大众的科普著作中变得如此脍炙人口，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北京猿人是否属于人类祖先这个问题的部分关键

在于中国人祖先的古迹是否根源于中国。按照以前的理论，中国人被认为最初来自巴比伦、中亚、日本和其他一些地方。一位作者察觉到过去的这种说法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67] 而北京猿人让“中国人才找到了自己的祖先，证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不是舶来品”。[68] 一旦承认北京猿人为中国人的祖先，那么国家就可以将中国形成的时间上推到五十万年前，由此加强国人的民族认同。[69]

让人类进化的故事变得更加“中国化”的另一种方式，是把古人类学的证据和中国经典著作中的典故编织在一起。在那些古代文献中，人类社会被追溯到诸如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这些对中国文明贡献过重要发明的远古人物。1950 年与 1951 年出版的历史课本则将北京猿人化石和这些传说人物放在一起介绍。[70] 传说故事展现了“我们的祖先”的生活图景，使原本枯燥无味的化石骨头变得有血有肉。当时出版的历史课本也强调，这些传说人物的出现次序充分符合现代对于历史的认识。“依一般进化规律说，人类最初过着树上生活，其后发明用火，又其后发明渔猎，又其后发明牧畜，又其后发明农业。这与有巢、燧人、疱牺（也被称为伏羲，是捕鱼和狩猎的发明者）、神农的先后次序大体符合。”[71]

人类进化方面的通俗读物和各种教材课本一起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利用为中国创造了一种*中国*人的历史。以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和恩格斯的著作为基础，1952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人类进化的书籍使用了有巢氏、燧人氏和伏羲氏的故事，对原始人类社会组织的转变情况进行了描述。在有巢氏时代，人们过着平等主义的生活，所有社会成员与他人共同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在燧人氏时代，男性打猎，女性采摘果实，团体与团体之间互享劳动成果。伏羲时代进入了母系社会，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生产关系，但仍然没有私有财产。[72] 还有一本书用大量篇幅引述了古书《礼记》中有关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穴居生活的描写。[73]

没有什么比北京猿人化石的下落不明所引起的激动和失落更能在人类进化问题上引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了。出于安全保护的考虑，北京猿人化石于 1941 年被送往美国，然而却在途中丢失。在 1950 年出版的一本书里，作者谈到化石的丢失是“我国最宝贵的人民财产受到巨大的损失”，并暗示是美国暗中策划了这个罪恶的“阴谋”、心怀“野心”

地劫掠了这个珍宝。[74]1950 年和 1951 年发表的各种报纸文章提出了更明确的指控。《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纽约时报》和其他国际报纸报道了更多的细节，按裴文中的说法，丢失了的北京猿人化石被秘密收藏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75] 这些说法在中国很容易就找到了现成的相信者。中国公众早就对美国非法收集许多珍贵文物感到愤怒了。[76] 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了让公众的怒火持续不灭的政治语境。

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涌现出对美国的广泛指控。1956 年参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展览馆（1953 年建立）的访客们经常在来宾留言簿上强调这个问题。一位来自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参观者怒斥道："我们看过了很多化石，但是都不是原来的真化石，这些原来的真化石都被美日帝国主义者用鄙卑的手段盗走，这些都是中国人的，我们要向帝国主义者讨还这笔债。"[77] 另一位来自人民解放军的参观者写道："在参观时，使我遗憾的一点是好些东西只能看到模型而见不到真的实物，原来，他们是被美帝国主义劫走了，这使我更加深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认识。是的，我们要向全世界控诉美帝这种盗窃文物的罪行。"[78]1961 年发表的一部电影剧本以"偷盗"北京猿人化石为主题，名字就是《国恨家仇》。[79]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为北京猿人化石的丢失感到痛心。但这件事与其说是对科学的损害，还不如说是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正如 1946 年出版的一本中国的科学杂志预言，1930 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制造的北京猿人化石的精美石膏模型及魏敦瑞对北京猿人化石的详尽描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研究的需要。[80] 当今的一位中国古人类学家则解释说，北京猿人化石的丢失是"精神的损失"，而不是科学的损失，"因为它们已经被研究的非常仔细，几乎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非常重要的信息。"[81] 人们之所以十分关注化石的失踪，尤其是所谓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因为这种"精神损失"具有特别的意义：北京猿人化石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祖先，正是这一观念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归属感。

五、国际社会主义:“全世界的人类是一家”

人民共和国初期撰写人类进化普及读物的作者要同时应对各种影响因素与优先次序，而这些因素与优先次序往往彼此冲突，其中民族主义范式和国际主义范式就是一对尖锐矛盾。长达一个世纪的反帝斗争在朝鲜战争期间达到高潮，人们普遍坚信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对保护国家和人民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在中共领导及中苏特殊关系这一背景下，此时的中国成为推崇国际主义、尤其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国际社会成员。而在这一国际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相对于力图压迫“有色人种”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致力于传播国际社会主义解放力量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中华民族本身的诉求则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有关人类起源的教育资料为传播这一新意识形态的核心主题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在非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人类学充斥着对帝国主义的公开辩护，其所依据的就是所谓各种族与生俱来的不同与不平等。另外，马克思、特别是列宁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而可信的描述。有了这样容易的目标和现成的武器，苏联和中国的科普作者在关于人类起源的叙事中加入对反帝斗争的强调几乎毫无困难。

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反美政治的影响下，人民共和国早期人类进化读物的作者加大了对人类学中帝国主义论调的抨击力度。这些关于人类进化的材料有时会挑选美国的人类学作品作为恶名昭著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例证。例如，1950 年一位作者以 1900 年出版的美国书籍《黑人野兽》（*The Negro a Beast*）以及美国人欧内斯特·A·胡顿（Earnest A. Hooton）当时刚出版不久的关于人类起源与种族问题的著作为例，试图证明人类学有多么龌龊。[82] 充满讽刺——甚至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些批评的主要目标之一不是别人，正是魏敦瑞。即使魏敦瑞曾大张旗鼓地捍卫过当时得到认可的北京猿人在中国的祖先地位，他的种族连续性理论还是被抨击为美帝国主义的象征。

更讽刺的是，作为曾经逃离纳粹统治的德国犹太人，魏敦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不是人们所指责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类学家。逃离德国后，魏敦瑞只在美国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只是在战争的迫使下，

他才不得不离开中国回到美国。而且魏敦瑞的种族连续性理论与臭名昭著的多地起源说并不相同。他明确抵制早前的人类多地起源理论，后者认为现代人种来源于不同的类人猿（“黑人源自大猩猩，蒙古人源自猩猩，白人源自非洲的小人猿”）。[83] 根据魏敦瑞的解释，所有人类都源自同一种类人猿，人类种族通过杂交繁殖在整个进化历史中一直是单一物种。然而，由于种族问题的政治敏感性，这两种本来不同的理论还是很容易被混淆。

魏敦瑞和贾兰坡之间有深厚的师生关系，这可能说明了为什么贾兰坡会接受他提出的北京猿人是现代人类祖先的结论。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到 1950 年贾也抵制和否认了魏敦瑞的种族连续性理论。然而，即使贾兰坡对魏敦瑞有这样的批评，裴文中在为贾的著作撰写序言时还是表示担心贾会吸收魏敦瑞的观点并因此受到唯心主义的毒害。裴以颇具策略性的口吻建议贾在为该书进行修订再版前应该多读些马克思主义哲学。[84] 到 1952 年，贾兰坡已意识到与自己的外国老师明确保持距离的重要性。在一篇题为《用人类学的观点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段》的文章中，贾对魏敦瑞所持的现代人种拥有不同进化起源这个观点提出了公开批评。[85]

方且是 1950 年出版的《从猿到人》的作者。在 1951 年出版的《中华民族的儿女》一书中，他进一步把对魏敦瑞的批评和国内的“大汉族主义”问题联系起来。在方看来，魏敦瑞宣称北京猿人是“中华人种的直系祖先”，这实际上与过去中国人长期流传的观念“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有着惊人的相似。方且批评说，这个观念之所以吸引人，原因就在于人们为黄帝赋予了很高的名声，认定他征服了苗族领袖蚩尤，因此美化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人。方继续谈到，认为中国人是黄帝子孙的观点实际上只不过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护身符，是错误的大汉族主义者的高傲碑”。然后，他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当前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多民族长期以来互相交往的历史论述；他还引述了斯大林的话，大意是“民族并不是一个种族共同体”。[86] 对于将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归入更大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强烈坚持，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希望获得这些民族的忠诚并因此尽可能地维护之前的中华帝国版图。[87] 有趣的是，这一新的

中国民族主义计划，却恰恰是从对旧的“大汉族主义”的抨击中获得了力量。

将魏敦瑞与古人类学中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作为一个整体所开展的批判为随后社会主义中国关于人类进化的科普资料定下了基调。中国的科普作者们并不仅是揭露政治上声名狼藉的外国同行的著作中存在的种族主义；他们还有正面的任务要完成。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通常在作品的最后章节才出现，这样的章节往往被乐观地命名为“全世界的人类是一家”或者类似的题目。[88]1959 年为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展览馆拍摄的一部影片以这样一幅美好的画面结尾：来自不同种族的一群年轻人高兴且坚定地手拉着手，一个画外音说到：“世界上一切人类，不管他们的肤色是什么颜色，不管他们是什么种族，都经过同样的发展过程。”[89]1954 年一本目标读者为青年人的书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这个观念。上述那部电影突出的是全人类在过去发展的同一性，这本书则在结尾部分预言了人类目前和未来的发展。作者解释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苏联许多少数民族遭受压迫、生活简陋、文化退步；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迅速发展，现在和最先进的民族处于同一水平。作者暗示说，这是国际社会主义为世界其他地方带来的希望。[90]

因此，加入这样一些主题的科普作品经常在解释人类起源时深刻强调国际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立场。但与此同时，对《礼记》这样典型中国资料的使用，加上人们越来越认为北京猿人就是中国人的祖先，这些都透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图。科普读物作者并未对这一明显的矛盾感到不自在。对这种情况的一个可能解释是，作者也许根据各自的权力关系将不同的标准强加于不同的读者群。因此，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由西方帝国主义掌控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从中国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由汉族人掌控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但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对一个受尽帝国主义国家压迫的民族而言，它的民族主义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

六、1950年代初中国的科学与意识形态

“从猿到人”的故事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统治的最初时期的“第一堂课”，现在人们不应再为此感到惊讶。人类进化不仅是一个非常适用于革命胜利时期的关于解放与转变的故事；对新的领导群体来说，让全体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也是至关重要的。恩格斯关于人类进化的论述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提供了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序言。此外，事实证明它也是批判唯心主义、特别是批判以创世论等人类起源说为形式的唯心主义的完美武器。恩格斯否定了“上帝创造人”，而代之以“劳动创造人”。在用科学世界观取代宗教世界观的努力过程中，国家从科学家中找到了现成的拥护者，这些科学家把“劳动创造人”与化石证据相结合，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打造出多种多样的科普教育读物。

恩格斯关于人类进化的看法给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强调它认为具有重要宣传作用的概念。将劳动定义为人的本质，就是对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劳动阶级的赞美。另外，一个过去曾经存在的和谐的无阶级社会，以及民族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这一对在部分意义上彼此对立但又都得到国家强调的概念，也都在关于人类起源的科普读物中分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科学在国家的手中是强大的工具。1949年革命胜利后不久，国家就承诺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普及有关人类进化的知识，由此可以认识到古人类学所具有的政治效用。此外，国家认为人类进化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允许多种解释同时存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见证了关于人类进化的正统学说的日渐强化，而被认定是异类的理论和解释则遭到批判与审查。创世论以及关于人类进化的唯心主义和帝国主义解释成为清查目标。中国这次清除异见活动所使用的各种审查和政治干扰手段绝对是为民主社会所不容的，但人们也应该注意到，在20世纪中后期，古人类学中所有关于创世论、唯心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论调也都遭到了全世界科学家的强烈批评和鄙夷。[91] 现代综合进化论的拥护者可能也会认为刘咸的进化模式缺少对物质力量的关注。

进而言之，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科学来进行宣传，并不是无视科学本身也是一种追问知识的经验主义模型。宣传家之所以关心科学，是因为运用科学可以有效地把政治真理转变为“自然”真理，所以支持国家各种优先政治政策的科学理论会受到他们的典型偏爱。尽管如此，他们也认为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可以把人们从意识形态统治下解放出来并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在这一点上，科学家和中共的官员再次发现了共同利益。科普读物强调经验主义证据在证明人与类人猿之间的进化关系问题上具有的重要性。虽然在这类文本中恩格斯是无可争辩的权威人物，但中国的科普作者几乎很少仅仅依靠恩格斯的理论来解释问题。为了让读者相信人类进化的事实，科普作者们会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到化石、解剖学、胚胎学、人与类人猿的行为比较，以此作为他们论述的证据。此外，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会明确宣布一些科学问题因缺少证据而悬而未决，即使在明显会使自身政治利益面临风险时也是如此。例如，虽然中国科普作者们对人类亚洲起源说的偏爱甚于非洲起源说，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在没有更多的证据之前这个问题不能定论。[92]

当科学普及进入到早期人民共和国的画面时，国家有些不一样了。意识形态是新国家至关重要的优先问题之一，这一点并不是新的发现。以前鲍大可、罗伯特·利夫顿、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怀默霆（Matin King Whyte）等人在研究社会主义中国时都强调了意识形态、特别是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性。[93]但是这些研究中都存在着典型不足，那就是缺乏有关意识形态灌输的细节内容。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的文章是一个丰富的知识源泉，为人们提供了令人振奋、又有启迪性的新思想。虽然“劳动创造人”的确曾被当作攻击敌对思考方式的武器，但它也让数百万人了解了进化论、了解经验主义证据在解决与世界有关的问题上所具有的价值。一位在 1956 年参观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作协成员给这第一堂课作出了如下定论。毫无疑问，主教欧克澜会把这位参观者的评论当作意识形态灌输的证据，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我认为，从中我们也能判断他真正受到了社会主义和科学的启迪：

这次的参观太有意义了。1949年在干部学习班上，曾听教师讲过："人是猿猴变成的"。当时我十分怀疑：人怎么能是猿猴变成的呢？社会发展史在理论上并没有说服力。只是在事实面前，我才从内心里佩服了这一点。我们祖先的化石——这种铁一样的事实教育了我："劳动创造了人"。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今后我将更加积极地参加各项劳动，充分利用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产，全心投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中。[94]

郭又新译

注释

1 Cuthbert M. O'Gara, *The Surrender to Secularism* (St. Louis, Mo.: Cardinal Mindszenty Foundation, 1989[1967]), 11.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5卷，第34页。

3 没有资料显示贾兰坡有意识地表达了这种双重含义。杨鹤汀（绘图）、贾兰坡（说明）：《我们的祖先（一）：我们五十万年前的祖先》，天津：知识书店，1951年，前言。

4 它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义出版，参见恩格斯遗稿，陆一远译：《马克斯主义的人种由来说》（上海：春潮书局，1928年）。我没能找到这本书现存的版本、也找不到1930年恩格斯文章的译文。我找到的最早版本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曹葆华、于光远译：《从猿到人》（石家庄：解放社，1948年）。

5 林耀华：《从猿到人的研究》，北京：耕耘出版社，1951年。

6 目前关于学习小组最详尽的资料，仍然当推 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7 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55* (New York: Praeger, 1964), 101.

8 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69[1961]), 257.

9 恩格斯的这本书已有了较好的英译本，而且中文版在意思上也区别不大，因此笔者此处借用了 Frederick Engels, *The Part Played by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0), 9。有关中文本，参见恩格斯：《从猿到人》，第4页。

10 恩格斯：《从猿到人》，第5–7页。

11 同上，第8页；另见前引英文本，第34页。

12 薛鸿达主编：《从猿到人》，上海：华东书店，1950年，第34页。

13 贾祖璋：《从猿到人》，上海：开明书店，1950年，第30页。

14 杨鹤汀、贾兰坡：《我们的祖先（一）》，第17页。

15 裴文中：《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11页。

16 杨鹤汀、贾兰坡：《我们的祖先（一）》，第17页；贾兰坡、刘宪亭：《从鱼到人》，天津：知识书店，1951年，前言；杨叶：《我们的祖先》，汉口：武汉工人出版社，1952年，第35–37页。

17 杨叶前揭书，第35–36页。

18 古列夫（Gurev）：《人类是怎样长成的》，陈迎新译，上海：开明书店，1950（1946）年。

19 在各种作品中，可参见王山：《劳动创造人类》，上海：上海群众出版社，1951年，第1页；郭以实：《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第1页。讨论佛教创世故事的资料比较稀少，王山的著作是其中之一。

20 M. Illin and E. A. Segal, *How Man Became a Giant*, trans. Beatrice Kinkead (London: Routledge, 1942), 19. 中文的例证见杨叶前揭书，第7页；贾祖璋前揭书，第2–3页。

21 杨鹤汀（绘图）、贾兰坡（说明）：《我们的祖先2：我们二十万年前的祖先》，天津：知识书店，1951年，第47页。

22 黄维荣：《中国猿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年，第1–2页；吴汝康：《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65年，第5页。专家可能暗示说正是女娲的劳动创造了人类。

23 普列雪茨基：《人类是怎样生产和发展的》，毕黎译，上海：中华书局，1951年，第17–21页。

24 王小石：《从猿到人：通俗讲话》，上海：新亚书店，1950年，第61页。其他的例证很多。

25 杨鹤汀、贾兰坡：《我们的祖先（二）》，前言。后来的例证见董爽秋：《人是怎样来的》，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页。

26 1949年，中国大约有三百万的天主教徒和不到一百万的基督新教教徒。Richard Madsen, *China's Catholics: 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37.

27 Laurence Schneider, *Biology and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280.

28 声名狼藉的李森科主义者（Lysenkoist）对孟德尔（Mendelian）遗传学的批评并未阻止达尔文被奉为名人。我在博士论文中详细讨论了这个主题，Sigrid Schmalzer,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Paleoanthrop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4)。

29 Karl Marx, "Karl Marx to Frederick Engels, 19 December 1860," in E. J. Hobshawm et al., eds.,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5), 41: 232.

30 Karl Marx,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16 January 1861," in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41: 247.

31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 1975), 120.

32 方且：《从猿到人透视：劳动怎样创造了人类本身和世界》，上海：上海编译社，1950 年，第 8 页。

33 普列雪茨基前揭书，第 56 页。

34 古列夫（Gurev）：《人类是怎样长成的》，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年，第 18 页。

35 裴文中、贾兰坡：《劳动创造了人》，北京：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4 年，第 1–2 页。

36 吴汝康前揭书，第 11 页。直到 2005 年，还可以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猩猩馆附近看到非常相似的话语。

3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 年，第 2 卷，第 381 页。

38 目前已发现四个例证，其中之一见王山前揭书，前言。

39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 380 页。

40 见 John Tong, "The Church from 1949 to 1990," in Edmond Tang and Jean-Paul Wiest, ed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Modern China: Perspectives* (Maryknoll, N. Y.: Orbis Books, 1993), 8–9。

41 李清波：《人类起源问题》，上海：新生出版社，1951 年，第 23 页。

42 例如，作者提出了为什么森林消失的时候有些类人猿依然是类人猿、并没有进化成人的问题。同上，第 30 页。

43 Tong, 10–11.

44 Peter Bowler, *Theories of Human Evolution: A Century of Debate, 1844–194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8, 207–208. 也见 Arthur Keith, *Concerning Man's Origi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28), 27。

45 Gregory Guldin,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ao*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4), 66, 68, 100.

46 参见卢于道：前言（二），收在刘咸：《从猿到人发展史》，上海：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1950 年。

47 韩文理：《简评刘咸著〈从猿到人发展史〉》，《人民日报》，1951 年 6 月 17 日，第 6 版。

48 《上海知识界该贯彻"百家争鸣"问题》，《光明日报》，1957 年 5 月 1 日，第 2 版。

49 对刘的著作的不同解释，见 Schimerder, 152–153。

50 Maurice Meisner, *Li D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51 韩文理前揭文，第 6 版。

52 朱洗：《我们的祖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 年初版、1950 年再版。

53 《文汇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批评了一本图画书，此即涂景宗、陈光镒：《劳动创造人》，上海：上海文华书店，1951 年。这篇评论认为该书的错误之一是把劳动的社会组织及其成果归功于类人猿。见周龙：《评〈劳动创造人〉》，《文汇报副刊》，1951 年 6 月 19 日。

54 《上海知识界该贯彻“百家争鸣”问题》，第 2 版。

55 刘咸并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亡的其他知识分子那样不幸。文化大革命后，他甚至可以在更自由的邓小平施政时期参与人类学学科的重建工作。采访资料，2002 年。

56 Bowler, 75.

57 早期的一个例外是阿勒斯·赫德历柯（Ales Hrdlicka），他坚持认为尼安德特猿人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见 Ales Hrdlicka, “The Neanderthal Phase of M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57 (1927): 249–274。

58 举个例子，比如 Franz Weidenreich, *Apes, Giants, and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Franz Weidenreich, “Some Problems Dealing with Ancient M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2.3 (1940): 380–383。

59 Ernst Mayr, “Taxonomic Categories in Fossil Hominids,” *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a on Quantitative Biology* 15 (1950): 109–118.

60 战后背景中单一人种模型和种族政治问题的论述，见 Robert N. Proctor, “Three Roots of Human Recency: Molecular Anthropology, the Refigured Acheulean, and the UNESCO Response to Auschwitz,” *Current Anthropology* 44.2 (2003): 213–239。

61 例如，藏于北京脊椎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所的杨钟健个人藏书中有他在 1950 年代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到的资料。

62 裴文中：《自然发展简史》，北京：联营书店，1950 年，第 58 页。有人回应了这个观点，见承名世、方诗铭：《从猿到人通俗画史》，上海：人世间出版社，1951 年，第 42 页。杨叶倾向于把北京猿人看作人类祖先，但他坚持说需要更多的证据去确认（杨叶前揭书，第 12 页）。而认为种系发生的谱系表明北京猿人是人类一个分支的例子，见薛宏达前揭书，第 3 页；裴文中：《自然发展》，第 45 页；王晓石前揭书，第 24 页。

63 朱洗：《我们的祖先》，1950 年，第 163 页。

64 贾兰坡：《中国猿人》，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0 年，第 135–137 页。

65 程万孚、秦觉石主编：《中国猿人：我们五十万年的祖先》，南京：民风印书馆，1953 年，第 14–28 页。

66 方少青（方宗熙的笔名）：《古猿怎样变成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 年，第 48 页；杨叶前揭书，第 10 页。

67 关于民国时期的人类“西方起源”理论，见 Fa-ti Fan, “How Did the Chinese Become Natives? Science and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Origins in the May Fourth Era,” in Kai-wing Chow, Tze-ki Hon, Hung-yok Ip, and Don C. Price, eds.,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

68 杨叶前揭书，第 6 页。

69 关于北京猿人对当代中国民族认同十分有用这一点，见 Barry Sautman, "Peking Man and the Politics of Paleoanthropological Nation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1 (2001): 95–124。我在博士论文中进一步拓展了萨特曼（Barry Sautman）的论点并对其做了评论。

70 中国历史研究会：《高级中学中国历史》，第一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50 年；前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级小学历史课本》，第一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1950）年。

71 例如中国历史研究会前引书第一册，第 5 页。这些论述遵循的方法是由下面这本书开创出来的，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年增订版（1943 年第一版）。

72 杨叶前揭文，第 25–28 页。另见贾兰坡：《中国猿人》，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4 页。

73 方且：《从猿到人》，第 70–71 页。官方的历史教师手册特别规定这样利用《礼记》来举例说明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社会的转变。Joseph R. Levenson, "The Place of Confucius in Communist China," in Albert Feuerwerker, 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60.

74 方且：《从猿到人》，第 79 页。

75 有许多描写寻找失踪的北京猿人化石的作品。1952 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驳斥了不久前大陆方面提出的指控，而且暗示是苏联从中国拿走了化石。见卫聚贤：《北京人的下落》，香港：说文社，1952 年。新近研究这个题目的作品，参见李鸣生、岳南：《寻找“北京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年。在中国，人们熟悉的研究这个题目最有名的英文书籍是：Harry L. Shapiro, *Peking 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4)。沙毗洛（Shapiro）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体质人类学家，因此他本人对揭开这个谜很有兴趣。

76 见 Cheng Te-k'un, "Archaeology in Communist China," in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53。

77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展览馆来宾留言簿，1956 年 4 月 19 日（以下引用简称为周口店来宾留言簿）。不幸的是，看起来只有 1956 年的留言簿保留了下来。以后的留言簿只有名字和日期，没有评论。

78 周口店来店来宾留言簿，1956 年 6 月 29 日。

79 汪岁寒：《国恨家仇》，《电影文学》，1961 年第 5 期，第 18–33 页。

80 这篇文章特别谈到，“假如‘北京人’骨真找不到，这也不算是太严重的损失，因为全世界各大博物院里都已经铸好了所有的模型，而且有一套全世界最好的模型，现在依然在北平呢。”济之：《北京人头骨下落不明》，《科学知识》，1946 年，第 1 卷第 2 期，第 42 页。

81 采访作者，2002 年 10 月 8 日。

82 方且：《从猿到人》，第 7–8 页。Charles Carroll, *The Negro a Beast* (St. Louis, Mo.: American Book and Bible House, 1900).

83 Weidenreich, *Apes, Giants, and Man*, 24.

84 贾兰坡：《中国猿人》，1950 年，前言，第 2–3 页。

85 贾兰坡：《用人类学的观点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段》，《科学大众》，1952 年第 5 期，第 110 页。

86 方且：《中华民族的儿女》，上海：上海编译出版社，1951 年，第 3–6 页。

87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见 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Ralph Litzinger, *Other Chinas: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8 例如，可以参见林耀华前揭书，第 149 页；黄维荣前揭书，第 33 页；裴文中、贾兰坡：《劳动创造了人》，第 16 页；裴文中：《人类的起源》，第 11 页；吴汝康前揭书，第 73 页。

89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国猿人》，1959 年。

90 黄维荣前揭书，第 35 页。

91 我并非断言民主社会就不会出现政治审查和干扰，而是强调这种行为在民主社会往往会遭到普遍的反对，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为法律所禁止。

92 例如，可以参见朱洗：《我们的祖先》，1950 年，第 146 页；贾兰坡：《中国猿人》，1950 年，第 11–16 页；黄维荣前揭书，第 29–32 页；方少青前揭书，第 91–92 页。

93 Barnett; Lifton;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Whyte.

94 周口店来宾留言簿，1956 年 6 月 22 日？（具体日期待考）。

第十一章

像革命者一样演戏：1949–1952 年间的石挥、文华影业公司和私营电影制片厂

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

一、石挥：“狗崽子”

我第一次见到银幕上的石挥是在 1977 年，香港上映《假凤虚凰》（1947 年）和《哀乐中年》（1948 年）这两部中国内战时期的重要影片。这两部优秀的喜剧电影都是战后中国最好的电影公司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的作品。《假凤虚凰》里的石挥是一位顽皮但可爱的骗子理发师，在《哀乐中年》里他则饰演一位睿智而又极富同情心的小学校长。我当时就断定石挥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多才多艺的男演员。但很显然，只要提到石挥和文华影业，这两者的成功几乎总和另一些重要名字联系在一起。《假凤虚凰》的编剧是桑弧（战时、战后中国戏剧与电影界的新秀，石挥的亲密伙伴），导演是黄佐临（这位老牌剑桥大学毕业生在二战期间的上海成为石挥的导师），摄影是黄绍芬（其非凡的摄影技术在中国电影业数一数二）。[1] 而《哀乐中年》的编剧和导演都是桑弧。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石挥和文华影业，我开展过一项口述史项目，采访了桑弧、黄佐临、李丽华（在《假凤虚凰》里她和石挥演对手戏）等人。关于石挥最有意思的评论来自他的老朋友黄宗江：

石挥特别好斗。1940年代如果我一个月赚六百（元），他就要赚六百零一。他年轻时打过许多零工，例如他曾在一列火车上当过服务员，被人呼来喝去。有钱有势的人凌辱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愤世嫉俗，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不过他憎恨富人。国民党倒台时他没有感到任何遗憾。

他在朋友中也非常自大傲慢。但同时他却经常和娼妓、酒鬼之类的社会下九流混在一起。所以“反右运动”（1957年）一开始、石挥遭到非难时，没人为他感到惋惜，也没人愿意去帮他。1980年李丽华（回到中国）来看我的时候，还一直把石挥称为“狗崽子”。

石挥对人很不尊敬。一次在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里，他坐在一架高级钢琴前很不正经地弹奏古典音乐，时不时大声放一个屁来打断自己的弹奏。

就在“反右运动”打倒他之前，他和我一起看卓别林的《大独裁者》。石挥沮丧地说，“八年了，我们都没有这样笑过。”他一直都讲这样的话——所以后来才出了问题。如果其他人发表这种言论，没有人会在意。但是石挥这么讲，人们就会把他的话报告上去。

1949年以后，在新制度和新政治结构下，石挥成一个局外人。如果要进入主流，就不得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因如此，石挥才对入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他不习惯过被人冷落的生活。但是，他入党的机会微乎其微。

二、石挥：日据时期上海的“话剧皇帝”

经过政治漂白的石挥官方传记对他的一生进行了更加系统、也更加单调的记述。[2]1916年石挥出生在天津附近。他虽然在上海成名，但从未改掉浓重的北方口音，也没抛弃他对北方文化的喜爱，包括传统戏剧和相声等其它大众艺术形式。石挥一岁时，父亲将全家迁到北京。上中学时由于父亲失业，石挥不得不辍学，在1930年参加了京沈铁路局举办的一个培训班。1931年年末之前他一直在火车上和山海关车站里工作，

此后回到北京，在真光电影院以卖杂货为生。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观摩了许多国内外电影。同时石挥在一个函授班学习英语，并在业余时间练习京剧和二胡。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石挥在“中国旅行剧团”开始了演员生涯，这使他后来得以进入陈绵在战前建立的“沙龙剧团”工作。[3] 在他的早期表演生涯中，石挥曾出演过曹禺著名的话剧《雷雨》和《日出》。

1940 年，石挥年满二十五岁，此时陈绵把他介绍给上海戏剧界的人士，此后整个抗战时期石挥一直在上海工作。他的表演充满激情，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抗战期间许多重要演员撤离上海，给石挥这样的新手创造了机会。他参演了上海剧艺社——一个据说与中共地下组织有松散联系的剧团——推出的《家》和其他“进步”戏剧。1941 年夏天，他和黄佐临（他的新师傅）、吴仞之以及其他一些人离开了上海剧艺社，创建了上海职业剧团。

1941 年 12 月，日本驻上海部队控制了国际租界区，黄佐临的新剧团也随之关闭。1942 年初秋，黄佐临和另一些人成立了著名的“苦干剧团”，这个剧团让石挥登上了上海戏剧界的顶峰。在黄佐临和费穆的精心支持下，石挥很快成为战时上海最受欢迎的男演员。他曾在《大马戏团》和《秋海棠》中出演重要角色：《大马戏团》轰动一时，10 月、11 月连续上演了四十天，而《秋海棠》则在 1942 年 12 月至 1943 年 5 月之间破纪录地连续上演了一百三十五天。[4] 戏迷们开始把年仅 28 岁的石挥封为“话剧皇帝”。

二战结束后石挥留在上海。他继续从事舞台表演，但是和许多戏剧界人士一样，他也开始逐渐步入电影界。1947 年石挥与老朋友黄佐临和桑弧一起创建了文华影业公司，这个私营电影公司专门拍摄具有超凡艺术价值的人文主义电影。这里有四个角色值得特别强调，它们把石挥推上了战后电影明星的地位。桑弧编剧、黄佐临导演的令人捧腹的喜剧《假凤虚凰》中，石挥扮演一名勉强糊口的上海理发师。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的《太太万岁》（1947 年）以及柯灵编剧、黄佐临导演的《夜店》（1947 年）中，石挥扮演的都是坏脾气的老头。[5] 曹禺编剧、导演的《艳阳天》（1948 年）里，石挥扮演一位律师。形势一片大好，《假

凤虚凰》的拍摄过程中美国的《生活》（*Life*）杂志专门刊登了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介绍了石挥和战后中国的电影业。

1948 年年末上海的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石挥开始编写、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母亲》（1949 年发行放映）。但石挥之所以声名卓著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演技，而且他无与伦比的票房号召力是勿庸置疑的。1949 年初，桑弧请他在《哀乐中年》中扮演男主角。《哀乐中年》是桑弧编剧、导演的一部感人喜剧，讲述了一位善良的小学校长在晚年找到爱情的故事。《母亲》和《哀乐中年》都采用了轻松、乐观的风格来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然而，1949 年 4 月文华影业公司大门外的社会正在土崩瓦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军队即将进入上海。

三、石挥：解放的庆祝者

当上海最重要的国有电影公司老板罗学谦于 1949 年 5 月 3 日逃离大陆时，电影界的大多数人都明白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即将结束了。[6] 熠熠生辉的上海电影界几乎没有人同情国民党的离去。电影人有许多逃离的机会，但却几乎没人离开。不过电影人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也很少与中共的代表共事过。

当时中国电影界普遍认为国内电影产业的状况令人痛心。许多人认为，在保护战后中国电影业免受美国电影市场的侵略方面，国民党政府几乎毫无作为。许多人觉得好莱坞的竞争可能会摧毁国内电影业。1940 年代末不断有人呼吁对美国进口到中国的电影数量进行控制。男女演员、编剧和导演们都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但国民党政府的反应令人失望，不过人们相信共产党人在这一问题上会更加坚定。因此，上海的电影人之所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反美立场是有其自身原因的。

1949 年 5 月 25 日，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上海。六天后的 5 月 31 日，作为上海全城举行的“解放”庆祝大会的一部分，电影业和戏剧业人士匆忙召开了会议。第二天，电影业和戏剧业人士也走上街头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游行。文华、昆仑、国泰这三间上海最重要的私营影业公司从五月中旬开始歇业两周，之后于 6 月 2 日重新开始营业。[7]

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了欢迎来自戏剧界和电影界人士的政治支持。而共产党人也的确积极吸收电影界人士参与他们的事业，这与国民党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并不怀疑这些资产阶级电影明星的意识形态取向，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和石挥一样在日据时期留在被占领的上海，并在血腥的内战期间继续光彩照人地从事他们的演艺事业。但是，鉴于中共经常对文艺、知识领域表现出很大兴趣，而且强烈希望巩固在城市中心的统治，它十分需要城市电影人在大众传媒方面所具有的专长。

1949 年 6 月 2 日，中共正式接管了国民党在上海的两个主要电影公司，将其合并改名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的国有电影制作公司，派经验丰富的老党员于伶管理。[8] 但中共也公布了这样的消息：新的国有电影制片厂仍然需要时间加以调整，因此仍需要包括文华在内的私营电影公司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上海这个解放前的中国电影工业中心。

为了更好的控制上海文艺界，1949 年 6 月 18 日上海戏剧电影协会成立。该协会的领导人是经过一次投票选举而产生的。这一选举是如何组织的并不清楚，但是得票率最高的二十七位代表所获的票数被公布出来了。[9] 老党员于伶和夏衍得票最多，分别获得 586 和 554 票。这份名单中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明确希望与中共合作、希望在解放后的上海艺术界发挥领导作用的著名无党派人士。石挥的导师黄佐临以 450 票位居第五位，深受大众欢迎的演员赵丹以 356 票位居第七位，接着是导演陈鲤庭（342 票，第九位）、导演应云卫（287 票，第十位）、导演吴永刚（274 票，第十一位）、演员蓝马（252 票，第十二位）、导演郑君里（235 票，第十四位）。石挥以 215 票列第十六位。

对石挥来说这次投票是个好消息，因为他被任命为该协会的执行委员，也就是认可了他是“解放”的热烈拥护者——这一点正是石挥强烈渴望得到承认的。但这也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因为这份名单中许多排名比他高的人，在资历上都难以与他相比肩。像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 24 岁女演员黄宗英（以 180 票列第二十一位）这样虽然知名度较低的人，其所得票数却与石挥相差不远。

国民党在对戏剧界和电影界人士的培养和支持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这加深了公众眼里男女演员既愚笨、又纵欲、还爱慕虚荣的负面形象。相比之下，中共的殷勤恭维令上海的电影人沾沾自喜。1949 年夏秋，许多电影人都深刻地意识到重要时机就在当下，都希望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新政权的关注并被认作是革命积极分子。这种竞争有其现实意义。人们都认为，谁能够获得革命资格，谁就能在解放后的电影界起到带头作用，而那些未能引起政治关注的人将被冷落。在最初几个月，高度活跃的气氛带来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众所周知，所有的电影明星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个人经历和乏善可陈的政治活动记录。但在 1949 年年中，这一点看似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行动上要表现得像革命积极分子。于是，新成立的戏剧电影协会一开始支持举办的大型活动之一就是在 7 月 4 日举行的表演艺术家慰问人民解放军大会演。[10] 几乎所有大明星都参加了这次会演。

几天之后上海戏剧电影协会就宣布，为了清理电影界，成员们决定禁止上映不健康的华语电影。夏衍号召电影界进行审查和自律，并要求老电影工作者签写一份要保持电影高标准的保证书。《青青电影》刊登了石挥和黄佐临签写保证书的照片。[11] 随后有几部电影被禁。尽管电影界做出了郑重的保证，但实际上从 1949 年 4 月到 1951 年 5 月这两年间，仍然有成百上千部解放前拍摄的华语电影与极少数解放后的新电影一起在上海上映。二战前 1930 年代、有争议的日据时期以及内战时期拍摄的电影，还有来自香港的电影，都在上海广泛上映。1949 年上海大约有四十八家电影院，其中只有二十二家是专门放映新片的高质量电影院。[12] 事实上所有这些电影院都是私人所有、私人经营的。在上面提到的那两年里，这些电影院为二千四百万观众放映了四万六千多场华语电影。[13]

对于 1949 年深夏与此后开展的反对“有毒”好莱坞电影的各种运动，上海电影界的老工作者们都积极支持。[14] 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年轻时曾沉迷于好莱坞电影文化；但现在他们的艺术、经济和政治利益驱使他们公开抨击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但在 1949 年和 195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为满足公众对电影的需求并缓和解放后的转变，上海依然需要放映美国

和英国电影。从 1949 年 4 月到 1950 年 10 月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十八个月间，为上海一千四百多万观众放映了六百四十六部美国、英国电影（几乎所有这些电影都是 1949 以前拍摄的）共三万三千场。[15] 西方电影文化在解放后的最初阶段仍然占了很大市场。

在 1949 年中后期，石挥十分活跃地热情支持新政权。在 8 月 1 日人民解放军建军节那天，作为为军队老兵发起的广播募捐活动的一部分，石挥和他的朋友表演了相声。五天后，石挥出售了他亲笔签名的扇子，以此募集资金来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难民的老兵。10 月 1 日，为了支持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他和深受欢迎的默片男演员金焰领导戏剧电影工作者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16]

与新政权政治关系更好的其他明星则参加了更为高调的公众活动。7 月末，赵丹前往北京出席了中国电影戏剧工作者协会第一次会议，该协会的作用是帮助协调全国电影摄制工作。女演员白杨（在上海解放之前她就和积极参政的导演张骏祥从香港赶到北京向中共表示敬意）则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于 10 月末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周年庆典。仅仅在两年前的 1947 年，白杨还是蒋介石最佳女演员奖的第一位获奖者！但现在她却是电影界最引人注目的共产党支持者之一。12 月从莫斯科回国后，白杨被分派到国有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在那里她做了一场生动的报告讲述访苏见闻。1949 年 12 月 21 日，白杨甚至在上海的公众集会上朗诵了一首诗歌来庆贺斯大林的七十岁生日。[17]

从 1949 年 7 月开始，于伶和夏衍领导的政府机构——新成立的上海文艺处召集了几次会议，包括四个主要私营电影公司代表在内的私营和国有制片公司都参加了这些会议。[18] 这几次会议笼统地制定出了新的基本规则，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并未提出来：例如在解放前上海电影界的老影人中，谁能进入党和政府？他们怎样证明自己够资格？

1949 年 11 月初，石挥赶到北京筹划文华在解放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虽然新政府和上海私营电影公司的关系尚未明朗，但是电影的拍摄仍在快步前进。

四、石挥：善良的警察

1949 年秋，文华影业的主要经济资助者吴性裁仍然留在香港。但是在北京新成立的电影管理局很快让他恢复了对文华影业公司的兴趣。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后，文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制作宏大的《我这一辈子》，该片根据老舍 1939 年出版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而成。[19] 这部电影于 1949 年深秋开机，计划在 1950 年初的农历新年假日期间杀青。石挥不仅是《我这一辈子》的导演，他还在剧中担任主角——一位旧社会的北京警察。[20]

这一尝试为文华在解放后获得开门红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我这一辈子》有这样几个优势。第一，它是一部重要的五四风格小说，作者是深受人们景仰的党外作家老舍，他在解放后返回中国并在一开始对新秩序十分热心。第二，1949 年前很少有人将五四小说改编成电影。第三，文华影业通过这部电影帮了新政权一个忙，证明了新社会是五四文化遗产的合法继承者。第四，这部电影彰显了新秩序温和而灵活的一面。

《我这一辈子》当时很被看好，也是因为它具有史诗的特质。不像大多数电影只是微观地考察某一特定瞬间，《我这一辈子》这部电影展示了北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老舍原著中的时间跨度为 1909 年到 1921 年。为了使这部电影的历史时段更加宏大，编剧杨柳青和石挥紧密合作，特地将故事延续到 1949 年中共取得胜利。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这一辈子》堪称是石挥在导演和表演两个领域的杰作。影片追溯了一名平凡警察的一生，其中充满了老舍所深爱的北京当地生活的各种细节。这部影片以鲜明的感性方式，极富效果地展现了北京人丰富的语言与街头风俗习惯。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一位专门调停各种琐碎纠纷的警察，他为人大方、正直、温和、谦逊，获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尊重。作为一名二十二岁的警察，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心里充满了热情。但是他天真质朴，根本不了解政治。1911 年清王朝突然崩溃时他心中充满了困惑。

我们的男主人公在随后的军阀政权时期继续工作。但是，他和伙伴们被分派去做各种丢人的工作（例如为腐败的政府官员看门护院）或者

被迫去骚扰爱国学生——这些爱国学生最早在1915年走上街头反对“二十一条”、当时的抗议活动后来在1919年发展成为“五四运动”。我们的主人公依然天真质朴，他同情学生，不能理解为什么政府镇压他们。同时，北京的地方经济开始萧条，这些警察不得不为了维持家庭生计而挣扎。影片的前半部分使用了老舍原著中的素材，并尽可能地忠于原著。

《我这一辈子》的第二部分从老舍的结尾处开始，让人失望的是，这一部分几乎没有北京地方特色，而包含了更多的政治内容，这些政治内容与1940年代末中共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国民党迁都南京后十年里的北京被表现为走向衰落。男主人公的妻子去世，女儿也嫁到另一名警察的家里。只有当上了警察的儿子留了下来。就像父亲一样，儿子是正派人，但是他更有政治觉悟，并和许多革命学生成为朋友。

这部影片以非常感人但却老套的手法处理了日本人占领北京的那个时期，并特别强调了民众对一起强奸事件（解放前后的华语电影中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个隐喻）作出愤怒反应这一情节。这位警察的儿子和一位可爱的农村姑娘订了婚。一天，相貌险恶的日本人在汉奸的陪同下来到主人公家里寻找可强迫成为慰安妇的“中国姑娘”。警察和他的儿子费尽心思想要骗走恶徒，可最终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少女尖叫挣扎着被拖走。后来儿子决心离开北京参加游击队。父亲容许他这样做，但是告诉儿子，他走了以后年老的父亲在世上将孤独无依。

《我这一辈子》最后的情节发生在国共内战、国民党重返北京时期。不出人们所料，电影把国民党描绘成一个彻底腐败的政权。一个现在为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前汉奸对这个老警察严刑拷打，想要得到他儿子在八路军里的消息。在监狱里，老警察遇见了曾是儿子朋友的一个年轻革命者。但他只能无助地看着这个年轻人被处死。

后来这位老警察被强迫加入了一个劳动队，随后又像垃圾一样被抛弃。他被迫乞讨，徘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寻找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和食物，最后在一个深夜死在陋巷中。之后屏幕上简短地出现了他儿子身穿解放军制服、为赢得全国胜利而战斗的图像，但这对老人来说已经太迟了。

虽然《我这一辈子》的第二部分既墨守陈规，又有政治宣传目的，但是必须承认这部电影的确有信服力地融合了以下两点：一是文华影业在解放前的温和、人文主义关怀与带有高度美感的传统；一是解放后为巩固中共历史观所必须的、不加掩饰的强硬的政治化叙述。如果说作为一部统战电影《我这一辈子》既要包含一点旧元素、又要包含一点新风格的话，那么这部电影和石挥是相当成功的。唯一的小问题是最后的情节。是否应当让老人孤独地死在街上而未能看到他儿子和新社会的幸福？还是应该让他欢迎儿子归来并加入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中去？原剧本原本有一个幸福的结局。但是石挥提出了各种理由，坚持要以悲剧的方式结尾。在 1950 年 2 月 13 日有许多电影界名人出席的一次上海会议上，石挥有些自我辩护地解释到，他原来很想根据剧本来拍，但是像军队进城这样的大场景对私营电影公司来说过于昂贵。他说他曾尝试在上海租用一个简易机场来拍摄最后的大场景，但是国民党的飞行员一直往这个地区投掷炸弹。[21] 直到今天，这一从未被拍摄过的美好结尾仍一直出现在电影简介中。[22]

《我这一辈子》的影评相当不错，观众们也确实认为这是 1950 年春节一个完美的贺岁礼物。1950 年，这部电影在上海放映了 575 次，观众达 314,389 人，此项纪录没有其它任何一部文华 1950 年的出品能够望其项背。[23] 新政府对这部电影也很满意，决定选送它参加在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电影节。

在公开场合石挥对这部电影的艺术性只表达过一个保留意见。他告诉电影界的一些内部人士说，老舍的原著中并没有那个贯串电影始终而最终被处死的年轻革命者角色。石挥有些后悔在叙事中强加了这个角色，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表现方法僵硬呆板、难以令人信服。[24]

五、石挥：好心肠的小镇裁缝

文华在解放后拍摄的第二部电影是《太平春》。1950 年春末发行的这部电影汇集了老文华影业团队中的许多关键性成员，其中包括了导演

桑弧和优秀摄影师黄绍芬。石挥扮演的是一位个性复杂但心肠很好的旧式裁缝刘金发，故事发生在浙江东部的一个小镇，时间背景是日据时期到人民解放军抵达后这一时期。

精致的摄影、专业的剪辑与恰到好处的表演，使得《太平春》这部电影既简洁又引人注目，很多方面都让人想起1940年代晚期文华出品的电影。石挥以细腻的演技饰演影片主角刘裁缝。刘裁缝是个为人正派、待人善良、性格温和、逆来顺受的人物，他不想伤害任何人。实际上他尽可能地取悦周围的人。对裁缝的塑造体现了文华典型的人文主义关怀：刘是一位非常能打动观众的角色，影片从肯定的角度描写了他温和的性格。

在这部电影的第一部分，裁缝刘金发收留了可怜的乡下男孩根宝做长期学徒。随着时间的流逝，很明显勤奋的根宝是刘金发女儿凤英的理想婚姻对象，战后著名女演员上官云珠对凤英这个角色进行了精彩的诠释（上官云珠1950年代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上海的一座建筑物上跳楼自杀）。[25] 刘裁缝只看到了每个人身上好的方面，但是两个年轻人在政治上更加精明。

赵老爷及其妻子是另外两个主要角色，他俩是刘裁缝多年的好主顾、富有的当地权贵。刘十分感激他们的惠顾，但凤英和根宝却清楚地了解赵老爷不仅勾结日本人，在战后又和当地国民党紧密合作。刘裁缝十分珍视他与赵氏夫妇的旧式关系，但两个年轻人对此却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凤英和根宝还是非常尊重老裁缝，并未质疑他的权威。简而言之，虽然担心居心叵测的人可能会利用仁慈的老人，他们还是用合乎儒家礼法的方式敬爱和崇拜他。

影片接近尾声处详细描写了两次危机。在第一次危机中，一直没有儿子的赵老爷想要纳刘裁缝的女儿凤英为妾。刘裁缝除了拒绝之外别无选择，他只能告诉赵老爷凤英已经许配给学徒根宝。因此赵老爷便背地里设法使根宝被征召入伍，并在他拒绝服役时将他投入监狱。诡计多端的赵老爷知道刘裁缝会向他求救，这样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做笔交易。如果刘同意把他的女儿嫁给赵老爷，赵就会“用他的影响力”释放根宝。

为了救根宝，刘裁缝同意了赵老爷的要求。但在举行婚礼前，两个年轻人背着刘裁缝逃走了。

不承认事先知道孩子们逃跑计划的刘裁缝被投进了监狱。但此后不久人民解放军就抵达小镇的郊区。这时赵老爷的妻子来到监狱，告诉刘裁缝她为他的遭遇感到难过，会托人释放他。可是刘裁缝刚一出狱，赵老爷的妻子就让他帮忙。她强迫刘裁缝为她藏匿了几箱“需要妥善保管”的贵重物品，并用金钱报答他的帮助。考虑到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长期生意关系以及相信赵夫人“救了他的命”，刘裁缝愚蠢地同意了。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人民解放军到来之后。起初，刘裁缝的女儿和根宝返回家中，小区中每个人都欢欣鼓舞地欢迎“新社会”到来，一切都令人满意。但是后来凤英偶然发现她的父亲藏匿着属于赵氏夫妇的贵重物品。在结尾一组精彩的镜头中，凤英与他的父亲发生了对立，但是老人坚持认为他没有做错。赵氏夫妇过去帮助他，他们是好主顾。既然他已经做出了承诺，他就必须遵守诺言。凤英公然反抗了父亲，并把这件事告诉了根宝。根宝一直非常尊重他未来的岳父，但是他已经加入了当地的中共党组织，认为唯一合乎道德标准的事就是把这些贵重物品交给新政府。刘裁缝拼命反对，坚持认为他的诺言和传统人际关系很重要。

年轻人的反驳中既有道德的成份也有现实的成份。首先，他们说现在有了新的道德标准。赵氏夫妇是剥削者和卖国贼，因此把他们的财产交给“人民”从道德上讲是正当的。其次，赵氏夫妇是“反动分子”，任何帮助他们的人都会沾上反动分子的污名。年轻人懂得这些道理，但是刘裁缝仍然固守着他的道德阵地。

当刘裁缝一位被国民党强征入伍的朋友以失去了一条腿的形象出现在裁缝店时，刘裁缝深感不安。他的女儿告诉他必须交出贵重物品。但是刘继续犹豫不决。只有当根宝收到家乡来信得知他亲爱的母亲已在国民党的空袭中丧生时，刘裁缝才终于被激怒了，交出了贵重物品。刘说他现在知道什么是残忍的反动分子，而他想当“人”。一位地方政府干部告诉刘，他有资格得到酬谢，但是刘说他不会要。这位干部坚持要他收下。在最后一幕中，刘因为用他的奖金购买了政府债券而在公众大会上得到表扬。

《太平春》在许多方面都很成功，和《我这一辈子》一样，它几乎天衣无缝地将解放前后的上海文化景观连接了起来。这部影片政治立场鲜明地反对二战时日本的侵略和战后国民党的无能。它也展示了社会的阶级结构，表现了阶级敌人（赵氏夫妇）与国内外压迫者的狼狈为奸，并立场鲜明地对革命和劳动人民群众的胜利进行了颂扬。从这点来讲，《太平春》和解放后文华的第一部影片《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区别。

在《太平春》中，文华在没有牺牲艺术完整性的情况下实现了所有这一切。这部电影主要是石挥、导演兼编剧桑弧、摄影黄绍芬成就的，几乎和他们解放前拍摄的文华电影一样。尽管《太平春》公开赞扬革命，但是无论是看起来还是感觉起来都很像电影《哀乐中年》，后者也由桑弧编剧兼导演、石挥担任主角，在国民党政权倒台之前的 1949 年初由文华影业发行放映。实际上，1949 年 5 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后好一段时间，《哀乐中年》都一直在放映（包括 1949 年解放后放映的 322 场、1950 年 14 场）。[26]

《太平春》的人文主义理念压倒了它对包括阶级压迫和国际斗争在内的人类冲突的关注。《太平春》竭力想具有革命性，但结果还是一部人文主义作品。影片中最有意思的人物是石挥扮演的善良裁缝刘金发。由于石挥出色的表演，刘裁缝这一角色完全令观众信服并产生了共鸣。观众喜欢他，即使他对周围的各种罪恶视而不见。他不仅不抵抗坏人，就是不义行为近在眼前时他也完全无法辨认出来。问题不在于刘裁缝的天真和轻信，而在于尽管刘裁缝如此多愁善感，却仍然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角色。对于老人一直不能了解的残酷现实，年轻人的了解要深刻得多，但是他们同时也被儒教的家长制所束缚。在整个电影中，两个年轻人都一直顺从父亲的权威，这揭示了他们被“旧”社会关系束缚程度之深。

《太平春》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仅在 1950 年就在上海放映了 467 次、观众达 188,577 人次。因此中共的评论员对影片提出质疑时，石挥和他的老朋友、编剧兼导演桑弧肯定感到十分震惊。[27]1950 年 6 月 24 日的《文汇报》登载的两篇文章恶毒地攻击了这部电影。一位评论家说，导演桑弧忽视了人们提出要求修改剧本的警告。这位评论家还公然指责说，这个凭空想象出来的故事里有许多情节会被电影观众曲解——阶级

敌人没有因其罪行受到惩罚，反而很容易地逃脱了；影片结尾革命干部向老裁缝颁发奖金完全不合适，因为老裁缝的行为就不应该获得奖赏。[28]

更严厉的攻击来自梅朵，《文汇报》逢双周出版的戏剧、电影副刊的编辑。他认为这部电影的问题主要在于编剧桑弧的落后思想。电影以老裁缝这个毫无希望的“空虚”角色的一生为中心，这属于意识形态误导。梅说，裁缝和当地阶级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合逻辑的，电影并未充分揭露赵老爷这个地头蛇的剥削本质。他写道，桑弧有“态度”问题，急需思想改造。[29]

这些批评发表前桑弧就知道会遇到麻烦。他的回应发表在新杂志《大众电影》的第二期。[30] 桑弧以屈辱的姿态毫不抵抗地屈服了。在这篇充斥自我鞭笞的文章里，他承认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整个故事是不负责任的编造。他说，所有对《太平春》的批评都正中要害。他写道，实际上这部电影是“失败了”。对这部影片的批评是毁灭性的：这部电影不再发行，此后很少被提及。

六、石挥：文化革命者

在《太平春》受到批评不久后的 1950 年 7 月，石挥发表了《解放一年来的上海影剧界》，这篇文章既有高度政治性、又作出了自我肯定。[31] 他在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到《太平春》的失败以及他和这部电影的关系。相反，他以电影戏剧界想要“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解放军”给了他们开始新生活的机会为开场白，谈了他个人在 1949 年 6 月至 1950 年 6 月期间的全面发展。石挥用新的政治行话写道，由于过去的上海被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官僚资本主义所控制，因此电影院和戏院只为极少数人服务。过去的上海到处都是舞厅、饭店和戏院，但是石挥经过反思已经认识到，电影戏剧界人士得到的仅是残渣剩饭。

石挥赞扬到，上海解放一年后，艺术家们已经抛弃了那种自认为在上海拥有社会特权地位的错误的自豪感。共产党赋予他们新生以来，旧电影明星们积极努力地工作、尽一切力量实现成功。他写道：“在解放后

的三天内，我们就建立了几十个巡演剧团”到各个工厂里为“工人兄弟们”进行表演。此外他还提醒读者们，戏剧电影界人士也与战士和普通民众一起积极参加了大型胜利游行。虽然那天下着大雨，但是“明星们”依旧出去“在街上跳舞”。按照石挥的说法，战士说“你们就像我们在前线时一样的英勇”。

在组织方面，石挥认为上海戏剧电影协会的成立是一件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因为它让表演艺术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团结起来，因此促进了文化活动“集体化”。1949 年夏，上海戏剧电影协会发起了表演艺术界工作者庆祝解放的大型游行，并组织了为期六天、场面壮观的户外募捐活动。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公园来观看他们喜爱的明星。石挥认为，正是演艺人员与大众之间的直接接触让戏剧电影界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进步。此后又成功举办了一项为老兵和难民们长期募捐的广播活动。石挥把这种活动描述为是在旧社会不可能发生的“奇迹”。让许多艺术家沉溺于“自我放纵”的“小资产阶级优越感”也消失了。

石挥写道，文艺界发生的转变是如此重大，“包括各种艺术家在内的许多同志都参军、下乡或进入了革命大学”，而这些地方都是学习新政治的速成学校。艺术家们不再想成为令人羡慕的特权阶级，他们想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革命工作者”。他认为这些艺术家们在第一年就实现了这一点——他们制作了几部面向大众的短片来劝导爱国公民购买政府债券。但讽刺的是，购买债券恰恰是目前名誉扫地的电影《太平春》中主人公刘金发所做的事情。

在文章的结尾，石挥向已经推出两部新作《红旗歌》和《思想问题》的戏剧工作者表示敬意。他提到，《红旗歌》描写的是工人阶级，这要求艺术家熟悉无产阶级的生活。《思想问题》则是为了教育人民。石挥总结到，在未来，戏剧电影界无疑会面对诸多挑战和问题。但他认为第一年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重要的是文化舞台上的人们想要“翻身”、已经与“人民”打成一片，并愿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取得进步。[32]

值得注意的是，石挥这篇自吹自擂的文章提到了《思想问题》这部拙劣的戏剧的所谓贡献。文华在解放后拍摄的第三部故事片（也是在《太平春》论战后拍摄的第一部）其实就是《思想问题》的电影版。这部吓

人的电影在 1950 年 8 月发行（1950 年一共放映 446 次，上海观众人数达 220,516），无论与《我这一辈子》、《太平春》这两部电影还是文华的人文主义传统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33] 石挥本人完全没有参与这部影片的制作。

毫无疑问，对于文华来说拍摄《思想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在《太平春》遭到批评之后。石挥的导师、文华的领导人黄佐临虽然是影片的监制，但在电影的姓名列表中仅是文华影业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双方组成的八人“集体”导演之一。尽管黄佐临是一位艺术天才，《思想问题》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作，即使它颇具政治锋芒。不仅演员的表演和摄影糟糕，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生硬笨拙，故事本身更是非常僵硬。更糟糕的是，这部影片前所未有地大肆宣扬反智主义。

《思想问题》讲的是 1949 年中国建立的诸多“革命大学”中的一所——坐落在上海郊区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表面上看这所大学为受过教育的非共产党人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改造他们的“思想”，做好准备接受新社会分配给他们的工作。由于学生们的阶级背景和文化倾向都不可靠，所有学生都有态度问题。这所学校起到了思想改造营地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它的确很像一所关押意识形态罪犯的监狱。所有被拘禁在这所学校的人都是必须要净化思想之后才能返回社会的思想犯。事实上，这所学校的环境与 1950 年代初李克 (Allyn Rickett) 和李又安（Adele Rickett）的名著《解放的囚徒》（*Prisoners of Liberation*）所描写的刑事拘留所非常相像。[34]

这所学校的一些学生狂热地想要向政府证明自己是纯洁的，已经做好准备在新社会里担任领导职位。一名积极分子受到自己患有严重性病这一现实的刺激，一直执着地希望让党注意到他的思想倾向是“纯洁”的。这些冷酷无情的积极分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欺辱其他思想落后的学生，并威胁要召开“斗争大会”批斗他们。

这所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是思想受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观污染的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自私的个人主义。这些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有多么需要赎罪。他们当中包括这样几个典型角色：一个美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交际花和一个地主儿子。

另一个典型角色监督着学习班的进展——一个十分男性化的中年女干部：她身材丰腴、面带假笑、始终平静、自以为是，在每一个场景中都身穿不分男女、松松垮垮的毛泽东式制服并带着一顶工人帽。这部电影主要由一个接一个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构成，在这些大会中男女演员都直挺挺地站着，看起来仿佛在念贴在摄像机旁边提示板上的台词。

电影《思想问题》一开始给人们的印象是，令人讨厌的政治狂热行为与资产阶级落后行为这两个问题会得到英明的中共干部的同等关注，并因此得到同时解决。但是，随着影片的继续，极端左倾的问题被忽略了，所有重点都放在非党员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落后思想上。电影中并未出现一开始狂热分子就威胁要召开的那种“斗争大会”，因为中共干部更愿意以一种友善的方式来推动落后学生的思想转变，但是影片一开始就提到的“斗争大会”作为一种选择也从未被否决过。那些有罪的学生清楚地知道“斗争”仍然是可能的。

大多数学生都拒绝全盘承认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罪恶。但是长时间的说教和更为冗长的会议让他们认识到承认是唯一的解救办法。所有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接受”新道德。

在本书第十章，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提到1950年代初中国人对人类起源问题以及“人”的界定标准问题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电影《思想问题》也十分明确地谈到了这个问题。[35] 影片逻辑以这样一种基本观点为基础——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要么拥护革命并站在人民一边，要么就是反对革命。另外，这部影片还想方设法将那些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阵营内的人们进行“非人化”。根据这个逻辑，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非人类。既然没有人想被看作是反人类，那么坚定地站在革命阵营内就是必要的。当这所革命大学里的学生承认他们是真想要通过改造“思想”来获得拯救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想加入“人”的行列。

了解了电影《思想问题》的政治内涵，人们就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石挥精心扮演的热心裁缝刘金发会在1950年招致尖锐的批评。桑弧的剧本、石挥的演绎、更不要说黄绍芬巧妙的摄影，都把非革命者表现得富有人性。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电影《思想问题》让观众们无法欣赏那些

有“思想”问题的丑恶人物。虽然刘裁缝身上的问题与他们一样多，但他却是一个值得喜爱和尊重的角色，即使与他生活在一起的进步青年也是如此认为。不像《思想问题》，电影《太平春》注意到刘裁缝这样的正派人虽然充满矛盾，但依然展现了彻底的人性。

电影《思想问题》相当直白地说明，仅仅是“思想改造”还不能让人成为人。没有劳动——艰苦的体力劳动，思想改造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电影中一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那位男性化的女干部提出了反驳，认为自己思想健康，可以在其他地方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不需要在田地里工作。但这段话却促使垮裤子女干部对劳动的神圣本质进行了一次冗长的演说。

《思想问题》与文华制片人得到了新闻界的大肆吹捧。文化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表示非常满意看到私营电影公司拍摄出这么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36] 这部影片在全国与上海的观众数量被广泛谈及，例如仅在 1950 年的最后三个月，上海就放映了《思想问题》446 次，观众达到 22 万多人。但这些数字颇具误导性。观众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组织者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安排各种团体进行观看，而且提前三至四天购买集体入场券可获得高达 80% 的折扣。[37] 这些努力结束后，这部影片的上映次数和观众数量骤然下落——1951 年只上映了 18 次，观众只有 6500 人。[38]

七、石挥：皮条客

文华因为愿意帮助拍摄《思想问题》而得到了回报。就在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前的 1950 年夏末秋初，文华开始制作另一部相对温和的影片，该影片既和《我这一辈子》和《太平春》类似，又秉持了文华长久以来的艺术传统。这部电影的蓝本是著名作家茅盾在 1941 年出版的五四风格小说《腐蚀》，由受人尊敬的上海文学家柯灵改编成剧本，刚忙完《思想问题》的黄佐临导演了这部电影。[39]《腐蚀》这部电影因为希望模仿“苏联电影制作经验”而被文华的领导列为重点项目，并于 1950 年 12 月 15 日发行。[40]

该影片以1940年为背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战时重庆一位以自我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年轻女人离开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丈夫而追求冒险生活。女主人公遇人不淑，最后沦落为一名间谍，为与美国情报机构相勾结的国民党秘密警察工作。石挥扮演这个女人的前夫——一名共产党员，这是《太平春》之后石挥的第一个角色。纵观其演艺生涯，石挥擅长扮演各种有趣的普通人、包括一些下层人物。对石挥来说，扮演轮廓鲜明的革命青年尚属首次，不过他的表演虽然令人信服，但却黯淡无光。

在影片中，这位年轻堕落的女人公泄漏了她前夫的资料。前夫被捕后，国民党当局派她去劝说他招供，但她因为钦佩前夫的刚毅而拒绝合作。之后不久女主人公与另一名像她一样落入陷阱的女青年成为了朋友。后来，女主人公十分震惊地得知了前夫被处死的消息。她的前夫在遗书中恳求她离开当前所处的可怕环境，读过遗书后女主人公看到了光明，带着那名女青年一起逃到解放区。茅盾似乎并未反对这部电影对他小说的改动，虽然原著更加内省，没有这么政治化，也没有两个女人转而投奔共产党根据地这样的结尾。

石挥在共产党解放上海后文华所拍摄的第五部电影中扮演了一个更加让人难忘的角色。这部让人心如刀割的电影名为《姐姐妹妹站起来》，以声名狼藉的民国妓女为主题。《姐姐妹妹站起来》拍摄于1950年秋末冬初、1951年初发行，由新手陈西禾编剧和导演，陈西禾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还专门到北京参观了一个女子劳动训练所——旧社会的妓女们都被分配到那里。为了在政治上保险起见，陈西禾还组织了一些“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上他谦恭地征询各个政治和文化主管机构的“建议”。[41]

《姐姐妹妹站起来》以1947年的北京为背景，电影的第一部分用高度戏剧化但几近民族志般的方法展开悲惨的色情业的描写。影片聚焦于不识字的乡下女孩大香的悲惨故事，她的母亲被骗把她卖作妓女，通过她的故事观众可以详细地看到民国末期的北京妓女是如何被招募、买卖、训练、控制和进行交易的。影片除了介绍七个妓女各自不同的个人经历外，还让观众近距离观察这个行业中的许多行家，包括管理女青年的可怕皮条客、控制资金的年长男人、负责训练妓女的年长妇女和真正经营

妓院的残忍无情的年轻男人。同样重要的是，影片也刻画了男嫖客、妓女的父母双亲和爱人、以及收取保护费的腐败警察。

虽然这部电影的第一部分很吸引人，但看起来仍然不得不说是相当肤浅的，几乎没有展示贺萧（Gail Hershatter）在其中国妓女问题研究中提到的这个行业的微妙之处和灰色地带。[42] 在这部电影里，管理这个行业的人都是恶人，妓女只是被残酷压迫的牺牲品。完全没有中间地带。这种刻画固然生动、可憎、十分有力，但由于这些失真，观众在电影上半段看到至少有些妓女听天由命而在某种程度上和“老鸨”联合在一起时，不免会感到出乎意外。这些老鸨就是那些管理妓女的年长妇女，她们对外界的新闻精心挑选后再灌输给妓女们。例如，当有消息说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城外时，这些年长的妇女毫不费力地让她们控制下的妓女相信，中国共产党把妓女看作毫无人性的社会渣滓，会对她们进行围捕、谋杀。

我们根据某些材料得知，石挥本人很熟悉 1949 年前的妓女世界。在这部影片中，石挥出色地扮演了让人厌恶的马三，一位卑鄙的皮条客，控制着年轻而单纯的妓女们。和《我这一辈子》中一样，石挥成功地使用洪亮清晰、生动有趣的北京方言，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北京地方特色。他把马三这个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姐姐妹妹站起来》第二部分在时间顺序上正好与中共占领北京后的最初几个月相吻合。这一部分令人非常失望，而且内容毫无新意——这部分石挥几乎没有戏份。事实上第二部分与《思想问题》很像，同样一脸假笑、永远正确、男性化、穿松垮裤子、戴毛式帽子的女干部，又再次出现在《姐姐妹妹站起来》中——这里她们负责对妓女进行再教育。

妓女们害怕得要命，她们被送到再教育中心（类似《思想问题》中“解放大学”那样的地方，外观与感觉上都很像监狱），在那里被清理干净并组成学习小组。垮裤子女干部引导着这些妓女进行每一步改造。经过无数次集会和学习后，这些女人逐渐讲出她们可怕的经历，了解到旧社会的剥削本质。我们的女主人公大香变成了积极分子，并被指派为小组长。

“人性”和“劳动”问题再次成为《姐姐妹妹站起来》的关注点。中共再三告诉这些女人，做妓女并不是她们的错误，而是罪恶阶级敌人的错误。不过这部影片并未跳出这个结论：这些妓女身处拘禁中心，她们的身份低人一等。要不然的话，这些妓女为什么需要再教育？女干部解释说，她们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完成思想改造。当然，她没有把妓女看作真正的劳工。这些前妓女们自然想要通过从事正当的工作来变成“人”。实际上，包括大香在内的许多妓女完成了自己的学习课程后，立刻“自愿”参加苏北地区的妓女再教育工作（因此放弃与家人和爱人的重新团聚，大香也放弃了与她未婚夫的团聚）。上海的电影观众们应该注意到了这部影片对苏北地区的提及，因为许多人都认为苏北地区是上海大部分下层妓女的家乡。[43]

1951 年初，《姐姐妹妹站起来》在上海得到广泛上映。1951 年仅在上海就放映了 657 次，观众达 344,521 万人，超过了一年前《我这一辈子》的水平。[44] 虽然石挥扮演的卑鄙马三的风头盖过了丁文饰演的乏善可陈的女干部，这部电影还是受到了评论家们的热烈欢迎。[45]

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之所以被接受，可以解释为是文华从《太平春》中吸取了教训。也就是说，文华意识到在电影结束前必须展现出群众的战斗性已经被唤醒、并要让阶级敌人受到惩罚。因此，《姐姐妹妹站起来》加进了《太平春》没有的场面：大规模的斗争大会。影片设置了一个平台，劳动营中的大批妓女聚集在一起，阶级敌人被拖到前面，女干部们控制着斗争会的进行。从前的妓女因为新的觉悟而鼓起了勇气，她们痛斥过去妓院的老板，并向他们吐唾沫。然后妓女们冲向舞台企图打死阶级敌人。女干部进行了干预，说新社会要求“依法”处理这些案件。但是她又问愤怒的群众，“你们认为该如何惩罚他们？”女人们大叫，“死刑！”女干部高声回应：“好！”这样的场景使《姐姐妹妹站起来》免遭批评。[46]

八、石挥：农民士兵

战争需要战争电影，朝鲜战争也不例外，因此资深电影人立即表现出对战争的热心支持。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后不久，1950 年 12 月中旬，一份广受欢迎的电影杂志刊登了著名女演员白杨和上官云珠在拥军大会上演唱反美歌曲的照片。[47]

在拍摄了《姐姐妹妹站起来》后不久，文华影业和石挥很快就着手拍摄根据朱定的宣传小说改编而成的战争电影《关连长》。这项工作将 1950 年初摄制《我这一辈子》的创作小组重新聚集起来，其中包括了编剧杨柳青与导演兼主演石挥。《关连长》于 1951 年春发行。这是石挥第一次扮演农民士兵角色。黄佐临和文华影业的其他领导都断定，文华尽自己一份爱国之力对自身是有利的。这部影片将是一部“安全的”、无可争议的鼓动性宣传电影。但他们错了。

在 1951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新闻界对另一部电影《武训传》发起的批判运动中，《关连长》也不幸成为政治受害者之一。《武训传》是由上海一家私营公司拍摄的电影，资深导演孙瑜和左翼男演员赵丹这两位电影界的代表人物都参与了制作。[48] 从表面来看，对这一电影的批判针对的是 19 世纪中叶中国一个知识分子发动的错误的、因此也是反革命的大众教育活动。但事实上这一批判是从 1951 年中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令人惊恐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其打击目标是所谓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作家和艺术家。1950 年夏天黄佐临拍摄的那部别扭的电影《思想问题》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运动的政治含义。但这一次，中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已经不能被忽视、削弱或回避：毛泽东本人亲自撰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充当这次运动的先锋。[49]

在某种意义上，《关连长》实际上并无任何问题。该电影以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前最后几个星期的江苏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关连长这个人的简单故事。他本是山东穷苦农民，在内战期间升至连长，平易近人，受到他的士兵和上司的尊重。

这一切是通过电影开场时许多非常有趣的情节得到交代的——由于许多士兵都是文盲，一个正在军队中积极工作、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

生”被派到关连长的连队里，负责对普通士兵进行“文化教育”。中共当局除了希望这名大学生能帮助士兵“提高文化水平”之外，还希望他借此机会能变得谦虚，并能了解在前线冲锋牺牲的士兵所过的艰苦生活。

但这个大学生出师不利，因为他的说话方式非常抽象，普通士兵难以理解。但在影片中，大学生与士兵们的紧张关系很快就得到解决，他们建立了十分亲切的关系。这部电影的第二部分的全部焦点集中在关连长的连队攻占上海西部国民党部队一个重要阵地时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上。胆怯的国民党军队躲在一座有许多妇女和孤儿的建筑物中负隅顽抗，关连长必须找出既能消灭敌人但又不伤及无辜的办法。连队取得了胜利，但关连长自己在最后冲锋时牺牲。

1951 年《关连长》在上海广泛上映，共放映了 347 次，观众总数几乎达到 20 万人，但令石挥非常沮丧的是，当时批判《武训传》这一运动刚刚过去，城市里的中共知识分子评论家根本不喜欢这部电影。[50] 问题出在石挥把农民战士关连长塑造得过于生动传神了。在扮演地方警察、老裁缝、皮条客这些角色时，石挥都尽力表现出这些令人难忘的人物所具有的特点和复杂的真实性。他扮演的农民战士同样逼真。关连长和他的士兵来自北方（山东），在陌生的南方进行作战。他们的山东口音非常重，说话时夹杂奇特的山东俗语，也会用粗俗的词语骂人。简而言之，关连长和他的士兵们有着很突出的地方特点。这对朝鲜战争期间的评论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们希望看到中国和中国军队被塑造为讲标准普通话、整齐划一、举止文雅的“国家”主人。

电影《关连长》中生动而莽撞的农民战士形象让城市里的中共理论家感到尴尬。他们对电影的批评暴露了他们与农民之间复杂的爱恨关系。一方面，根据中共的官方路线方针，农民是值得尊敬的革命英雄。但另一方面，要表现农民的真实面貌却又很令人为难。以民间特色的方式来表现农民固然很好，但是对人物的塑造太过于靠近现实是十分危险的。周杰荣（Jeremy Brown）在对毛泽东时代末期的研究中指出，城市居民与知识分子其实十分蔑视农民在中共刻画的神气十足的农民形象之下往往隐藏着深深的厌恶和反感。[51] 从城市居民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电影《关连长》中的农民战士言行举止就像一群愚昧的粗人和乡巴佬，特

别是关连长本人。这并不是中共领导人想让全世界甚至是中国国民看到的中国英勇战士的形象。虽然石挥认为他在尽自己的本分，但是从评论员们的反应看来，他太过于看重演技了。[52]

电影《关连长》的另一个问题是这部电影未能坚持列宁式的等级制度和纪律观念。电影刚开始的一幕里，那个新来的大学生很难定位在泥土里打滚、和偷他帽子的当地孩子一起打闹的关连长。更糟糕的是，关连长和士兵们的关系看起来太随便了。从中共的观点来看，关连长的行为举止并不像一个手握权力的军官，他的下级也没有对他的“权威”表示出充分的重视，这个连队缺乏足够的“组织性”。

其中一幕特别有趣，一场重要战斗开始了，上级军官命令关连长率领部队在后方等待命令。观众看到关连长再三向他的上司抱怨，要求让他的部队参加战斗。评论家指出，在军队指挥系统中，下级军官质疑上级军官的才智是完全不适当的。一位评论家甚至说，不知道关连长的部队究竟是为了国家而战斗还是为了证明对关连长本人的忠诚而战斗。[53]评论家们还公开指责说，被关连长操纵着的那些愚昧散漫的山东农民，看起来与其说是国家军队的一个单位，不如说是旧式匪帮。

那个身处这些士兵之中的城市知识分子大学生不仅没有纠正这些农民士兵，反而“加入”了这群未开化的匪帮，顺应了这一环境。象《思想问题》这样的电影已经清楚地说明，中共的精英（例如垮裤子女干部）打击资产阶级的城市知识分子是恰当的，但是城市知识分子（像电影《关连长》中的大学生）丧失自己的个性与一群既无纪律又无教养的粗鲁文盲混在一起则是不恰当的。

和之前所扮演的角色一样，石挥极力使具有多面性的角色显得“人性化”。问题是他又一次成功了，他创造了一位富有同情心、和蔼可亲、同时又有缺点的真实人物，然而中共对于人性的定义却是同质化与纪律的统一。中共对石挥饰演的关连长这种角色之所以极度敏感，恰恰揭露了统治精英内部存在的极度不安全感。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内战胜利者讲话都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这是经常向大众隐瞒的事实。他们都来自地方，并与地方关系网和地方权力基础勾连在一起，但是他们想让普通的国民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些精英们虽然鼓吹革命领袖

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是生动而开放的，但是却特别强调对领袖的尊敬与服从——这是严格的列宁主义权力等级制度带来的产物。

九、石挥：美国资本家

在电影《关连长》受到非议之后的1951年年末，人们已经很明显地看到，文华影业已时日无多。当时中共政府正着手准备将所有私营电影公司合并成国有电影制片厂。文华最后一次尝试为新社会服务所推出的作品是一部不寻常的电影《美国之窗》，研究电影的中国学者经常故意忽略这部朝鲜战争时期的反美电影，许多人认为这部电影令人尴尬。这部电影在1951–1952年冬拍摄、1952年初发行，再次表达了电影界对中国战争行为的支持。

《美国之窗》由黄佐临根据同名苏联原著改编成剧本，黄佐临、石挥和叶明联合执导，黄绍芬摄影，这些人都是文华影业团队的重要成员。《美国之窗》是中国电影史上唯一一部完全以美国为背景、但由中国演员扮演美国白人和黑人的电影。[54] 戴着假鼻子的石挥扮演主角巴特勒先生（Mr. Butler），这位纽约资本家的公司在朝鲜战争引起的经济衰退中陷入困境。这部被历史遗忘的作品虽是一部战时宣传电影，但却令人非常难忘，部分原因在于影片的喜剧效果出人意料得好，而且石挥以出众的演技阐释了巴特勒这个富有挑战性的角色。

整部电影讲述的是在曼哈顿一座摩天大楼第四十二层上发生的故事，时间跨度只有两三个小时。巴特勒和他性感的秘书为股票市场的消息烦恼不已。由于美国经济转入战时体制，巴特勒公司的状况十分糟糕。这时身份低微的三十二岁洗窗工人查理·肯特（Charley Kent）突然从打开的窗户爬进了巴特勒的办公室，打断了他们的讨论。受惊的巴特勒递给年轻人一支高级香烟，倾听了他的故事。

因为战时经济调整而失去工厂工作的查理请求巴特勒帮一个忙。抑郁的查理在跳窗自杀之前想把他最后一份微薄的工资给他的母亲。石挥扮演的巴特勒这个让人捧腹的角色同意帮忙，他说既然“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查理当然有自杀的自由。但是他认为查理错失了一个赚大钱的

好机会。譬如，如果查理同意发表公开声明，说他跳楼前的最后愿望是吸一支某著名品牌的香烟，他就能赚到三百美元，把这笔钱给他可怜的妈妈。

当查理表示赞同这个计划时，巴特勒变得非常兴奋，并提议出任查理的经纪人。这名可怜的工人——他还有个哥哥被征兵去朝鲜打仗——被要求等几个小时再跳楼自杀。巴特勒解释说，查理自杀的原因完全没有市场价值，听起来很像“共党宣传”。他应该像好莱坞制片人那样思考，讲一个有关不幸的爱情的浪漫故事。困惑的查理同意了这个新计划后，巴特勒忙不迭地列出了自杀的赞助人：一名男装经销商想要查理穿一套他们生产的精致西装，一间著名的威士忌酒厂想要查理跳楼前灌一大口它的产品，一个“不易碎”的太阳镜生产商（看起来非常像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 [Harry Truman]）想要查理跳楼前戴上他们的眼镜。

巴特勒开始考虑进行一项“自杀代理人”的新生意。他为查理起草了一份正式合同，并安排在无线电台广播这件大事。查理发现巴特勒拿走了四分之三的收益，巴特勒则忿忿不平地回应说，查理所做的工作是最容易的部分。他的所有工作就是跳楼。

一组工作人员（包括一个“黑”人）来安装广播设备，闹剧继续发展。这组人都是工会成员。当这些工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后，他们和巴特勒吵了起来，并逐步说服查理他正遭到剥削。事实上查理很快就发现资本家需要他更甚于他需要资本家。他坚持要被称为“肯特先生”（Mr. Kent）并开始提出各种要求。最后，他取消了自杀计划，和工人们一起胜利离开。

这部影片以这样的场景结尾：巴特勒被他联系的所有赞助人追讨债务；而工人们则站在城郊一个山顶上，指着遥远的地平线，谈到美好的社会存在于遥远的“另一个国家”（苏联）。

把《美国之窗》当作低成本的宣传电影而对它置之不理是错误的。这部电影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成功的，而且是国有电影制片厂拍不出来的电影，因为他们既没有黄佐临这样的导演，也没有石挥这样多才多艺的演员，更没有黄绍芬这样顶级的摄影师。由于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一直在持续，石挥和黄佐临被要求根据苏联的原著拍摄一部反美电

影，他们也热情地投入了工作。确实，纵观文华在解放后时期的电影拍摄记录，人们会意识到这些电影摄制者为了服务新社会做了如此之多的工作。为了赢得新政治精英的好感，为了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石挥扮演了谦卑的警察、旧式的裁缝、爱国青年、残酷的皮条客、革命战士，最后是纽约的资本家。

但是他的努力一直达不到中共的标准。他饰演的包括巴特勒在内的角色，从来不像讽刺漫画里塑造的那样能以单纯的好与坏来区分。类似关连长这样的正面角色也一直表现出人物的缺点。像北京警察和浙江裁缝这样的“中庸角色”经常是糊涂而困惑的。马三和纽约资本家巴特勒这样的负面角色则一直显露出无可否认的人性。对共产党的评论家来说，石挥做的所有事儿都不对。

到《美国之窗》发行时，中共已经对石挥不抱希望了。中共最终没能把石挥本人和石挥在上海电影界的坏孩子形象区分开来，也没能认识到石挥和他所扮演的多姿多彩的角色之间存在的不同。最后共产党得出这样的结论，1952 年只有三十七岁的石挥既不可信，又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

十、石挥：右派分子

文华发行了《美国之窗》后，一直在上海活动的八个私营电影公司关闭了，其职员被并入不断扩大的国有电影制片厂中。石挥被官方划为导演和男演员，起初被安置在上海电影制片厂。[55] 但是在国有电影制片厂中，领导决定一切，导演和编剧再也不能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这是一种计划经济。从一开始，石挥就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被边缘化，他的个人事业迅速衰落。在拍摄完《美国之窗》后，他再也未曾受邀参与创作任何有关严肃革命题材的影片。

此时石挥从事的所有工作已使他脱离当代社会（从 1942 年起他一直是影响当代社会的主要力量之一），进入了幻想和隐退的世界。1952 年和 1953 年石挥根本没有任何工作。1954 年，他为上影执导了一部有趣的儿童影片《鸡毛信》，这部影片讲述了抗战期间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男

孩依靠机智帮助红军的故事。1954 年，他在一部平庸的讲述清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影片《宋景诗》中扮演了一个小配角。1955 年，他导演了由老朋友桑弧编剧的《天仙配》，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神话戏曲片。1955 年的石挥年仅四十岁，是那个时代最多才多艺的男演员。无疑，他感到未能得到充分的赏识，也不知道他大名鼎鼎的事业是否已经结束。订婚四年后，石挥和女演员童葆苓在 1955 年结婚。他们没有孩子。

1956 年开始的百花运动激起了石挥的希望。为了激活电影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被鼓励组成小型创作团体。石挥立即领导成立了一个小组，成员包括著名的年轻导演谢晋、资深导演徐昌霖和白沉、编剧沈寂。上影副厂长瞿白音戏称这个小组是“五花社”。这些人都隶属于上海一个比较小的国有电影制片厂——天马电影制片厂。

谢晋和白沉一起创作了电影剧本《女篮五号》。徐昌霖写了电影剧本《情深谊长》。为了支持老同事，石挥同意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一个小配角。他扮演了一位逐渐“失去视力”的工人。那时没有人知道，这位失明的工人将是石挥最后扮演的角色。

石挥自己的作品是一个颇为大胆的电影剧本，名为《雾海夜航》。多亏百花运动带来的文化开放，这部几乎没有任何遮掩的政治批判作品获得了拍摄的批准。故事讲述的是乘船从上海前往宁波的一群人的命运。这艘船被称为“民主三号”，它驶进浓雾后，船上的人必须通力合作以实现自救。这部电影的政治启示不难领会：要避免“沉船”，中国人民必须行动起来，越过无能的领导。

1957 年春末《雾海夜航》的拍摄工作刚刚完成，石挥、老导演吴永刚和女演员吴茵就被召至北京打成右派。“五花社”的另一位成员白沉也成了右派。极具毁灭性的反右运动开始了。

回到上海后，石挥被命令参加专门为他进行“思想检查”而召开的“批判大会”。石挥一直喜欢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但是以自己为焦点的斗争大会和他身为明星时习惯的那种关注绝非一回事。有人在批判大会上指出，可以明确地辨认出《雾海夜航》里的一个负面角色就是“党员”。这个角色被描述得自私自利、只为个人利益做事。攻击者说，这个角色的出现证明石挥是在批评贬损共产党。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辩护，特

别是他那些在1940年代末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或此时仍希望成为中共党员的朋友们。

石挥被命令参加第二次批判大会。但是他回家后第二天就消失了。在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最终表演里——这既可以被当作是“生活模仿艺术”、也可以被当作是“艺术模仿生活”，不过两者的区别至今仍不完全清楚——石挥登上了在他的“右派”电影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那艘船（“民主三号”），开始了从上海到宁波的航程。许多船员都认识石挥，他曾经为了更好地了解海上航行生活多次搭乘这艘船。在那个不祥的日子，轮船启航时，一名甲板水手认出了他。这名水手问他，“你又在体验生活吗？”石挥点点头。是的，他的确在体验1957年年中的中国生活。

这次偶遇后不久，四十三岁石挥跃出甲板，跳海自杀。

许多天以后，公安局的官员被叫到上海南部的吴淞口，检验一具冲到海滩上的成年男性尸体。尸体的面容已经毁坏得无法辨认，但随后的调查证明这就是石挥的尸体。

直到今天，中国公开出版的资料都没有承认石挥是自杀。[56] 石挥最后的表演是天才的表演。重要人物的自杀没有被报道，因为这一类自杀有损共产党的形象。石挥找到了让批评家闭嘴的方式，获得了最终的发言权。共产党很难解释为什么查理·肯特在资本主义美国选择生存，而石挥在社会主义中国选择死亡。

黄佐临和桑弧在反右运动中幸存下来，但是他们和许多解放前的电影大师一样，在其职业生涯的余年一直被排除在党外。有几位最后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1956年黄宗英被允许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赵丹入党，1958年白杨入党。[57]

郭又新译

注释

1 关于桑弧、黄佐临、黄绍芬的生平简介，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年，第 338、197、195 页。

2 见魏绍昌主编：《石挥谈艺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年。这本书收录了由叶明撰写的一篇十分有价值的文章《忆石挥》，第 527–538 页。

3 《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第 238 页。

4 Edward Gunn,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111–150.

5 对《夜店》的评论见 Paul G. Pickowicz, "Sinifying and Popularizing Foreign Culture: From Maxim Gorky's The Lower Depths to Huang Zuolin's Ye dia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7.2 (Fall 1993): 7–31。

6 《1949 年影坛简事纪》，《青青电影》，1950 年 1 月 15 日，第 18 卷第 1 期。

7 《青青电影》，1950 年 1 月 15 日，第 18 卷第 1 期。

8 对于伶的工作的评论见《中国电影家列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年，第 2 集，第 9 页。

9 《戏剧电影联合起来》，《青青电影》，1949 年 8 月 1 日，第 17 卷第 15 期。

10 《青青电影》，1950 年 1 月 15 日，第 18 卷第 1 期。

11 《青青电影》，1949 年 8 月 15 日，第 17 卷第 16 期。

12 《全上海电影院调查表》，《青青电影》，1949 年 10 月 1 日，第 17 卷第 19 期。

13 上海市档案馆，B172-1-35。

14 见 Zhiwei Xiao, "Purging China of Western Cultural Influence: The Case of the Anti-Hollywood Campaign in Shanghai, 1949–51," 即将出版。

15 Ibid.

16 《青青电影》，1950 年 1 月 15 日，第 18 卷第 1 期。

17 同上。

18 同上。

19 老舍：《火车记》，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41 年，第 101–195 页。

20 该电影剧本见老舍：《我这一辈子》，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第 120–199 页。

21 同上，第 199–200 页。

22 《中国艺术影片编目》，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 年，上册，第 55–56 页。

23 上海市档案馆，B172-1-35。

24 老舍：《我这一辈子》，第 200 页。

25 关于后毛泽东时代对这位重要艺术家的重新评估见魏湘涛：《一颗影星的沉浮：上官云珠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 年。被访问者坚持认为，上官云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杀与她在文化大革命前与毛泽东的亲密关系有关。魏湘涛（第 110–113 页）描述了 1956 年 1 月 10 日上海市长陈毅安排毛泽东与上官云珠进行的秘密会面，在这次会面中毛承认是这位著名女演员的影迷。

26 上海市档案馆，B172-1-35。

27 同上。

28 黎远冈：《对〈太平春〉的几点意见》，《文汇报》，1950 年 6 月 24 日。

29 梅朵：《评〈太平春〉》，《文汇报》，1950 年 6 月 24 日。

30 桑弧：《关于〈太平春〉》，《大众电影》，1950 年第 1 卷第 2 期，第 14 页。

31 石挥：《解放一年来的上海影剧界》，《青青电影》，1950 年 7 月 1 日，第 18 卷第 13 期。

32 对“翻身”一词含义的广泛讨论见，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33 上海市档案馆，B172-1-35。

34 Allyn Rickett and Adele Rickett, *Prisoners of Liberation*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1981).

35 Sigrid Schmalzer,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Paleoanthrop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4).

36 《思想问题》（《大众电影》），1950 年第 1 卷第 7 期。

37 同上。

38 上海市档案馆，B172-1-35。

39 茅盾：《腐蚀》，上海：华夏书店，1949 年。柯灵改编的剧本见《柯灵电影剧本选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 年，第 125–210 页。

40 石邦书：《〈腐蚀〉的“排后拍”制》，《大众电影》，1950 年第 1 卷第 13 期。

41 见陈西禾《〈姐姐妹妹站起来〉的筹备经过》以及苏春：《上海民族妇联同志谈〈姐姐妹妹站起来〉》，《大众电影》，1951 年 2 月，第 16 期，第 26–29 页。

42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43 See Emily Honig, "Pride and Prejudice: Subei People in Contemporary Shanghai," in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 People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142.

44 上海市档案馆，B172-1-35。

45 姚芳草：《李林云的仇恨》，《大众电影》，1951 年 2 月第 16 期，第 30 页。

46 典型的正面评论见田音：《祝福新生的姐妹们》，《新民报》，1951 年 2 月 17 日。

47 《青青电影》，1950 年 12 月 15 日，第 18 卷第 20 期。

48 关于《武训传》批评文章的合集见《关于影片〈武训传〉的批判》，第 2 卷，北京：中央电影局，1951 年。

49 对武训运动的讨论见 Jay Leyda, *Dianying: 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s Audie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2)，第 197–198 页；以及 Paul Clark, *Chinese Cinema: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ce 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45–50。

50 上海市档案馆，B172-1-35。

51 见 Jeremy Brown,"Staging Xiaojinzhuang: The City in the Countryside, 1974–1976," in 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3–184。

52 对这部电影各种批评的简短讨论见 Clark, 1。

53 赵汉:《评〈关连长〉》,《大众电影》,1951 年 4 月 10 日,第 20 期,第 24–25 页。

54 《中国艺术影片编目》,上册,第 97 页。

55 魏绍昌前揭书,第 536 页。

56 《中国电影家列传》,第 2 集,第 76–77 页,在魏绍昌一部有关石挥的著作中,叶明写了一篇故意淡化石挥之死的文章,根据官方的说法只是提到了石挥的死亡而避免使用"自杀"一词。1979 年,石挥的右派帽子被撤销,但官方资料一直没有确认石挥是《雾海夜航》的编剧。见《中国艺术影片编目》,上册,第 284–285 页。

57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第 24–25、196 页;以及《中国电影家列传》,第 2 集,第 245 页。

第十二章

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新式正规大学”：1949–1950 年

李滨（Douglas A. Stiffler）

1950 年 10 月 3 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年零两天后，为庆祝“新中国第一所新式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的正式成立，四千人齐聚北京聆听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与其他政要的讲话。[1] 刘少奇对参加该集会的政要、学校官员、苏联专家、教师与学生们说，他们不仅参加了这所“新式”大学的创建，更为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同志们，中国人民大学今天开学了。这个大学是我们新中国办的第一所新式大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2] 人大是根据政务院发布的一道命令于 1949 年 12 月创立的，担负着“将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任务。在中共统治的第一个十年中，人大将在建设苏联式国家与经济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3]

新的“红色”大学在新中国的建立，不禁让人回想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建立的“红色大学”。“红色”大学的目的是要解决革命政权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从旧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大学体系是发展现代化所必须的，但这些大学又在很大程度上被资产阶级所把持。新的共产党领导人想要改造这些大学，让它们对工农群众“打开大门”，但他们也知道

这些改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而同时又不对这些现存大学造成损害。[4]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立刻建立一所苏联模式的红色大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宜之计。

但在新中国创建一所红色大学远比原先设想的要难得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共干部的社会来源十分多样、而且其教育水平很低。中共领导人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如果以党龄与对党的忠诚程度作为这所新的红色大学的主要入学标准，那么绝大多数干部学生只有一年或两年的小学教育水平。这些学生虽然在政治上合格，但在教育上却不合格，无法完成大学学业。这样就会威胁到中共领导人的现代化目标。如果中共领导人将教育资历作为入学标准，那么这所新大学里将尽是国民党时期进入中学与大学学习、1942 年以后才加入共产党的干部。如此虽然能满足中共领导人的现代化目标，但是却有让该政权最为忠诚的干部（1942 年以前入党者）感到被疏远的危险。[5]

在人大这个例子中，最后达成了折中方案，既招收中共政权的忠诚者（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干部”），也招收拥有更好的教育背景但是缺乏革命经验（可能不那么忠诚）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意味着人民大学的学生根据年龄、身份背景与教育水平而被分成互相竞争的两派。人大的老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在 1950 年代新中国的权力与地位方面存在着矛盾冲突。如果其中一派获得了一次受教育与工作分配机会，就可能意味着另一派失去了权力与地位。但要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干部还需时日。在过渡时期，中共政权不得不就谁应当具有优先权作出选择。

对人大的研究表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阶段，青年知识分子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一个致力于在苏联援助下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政权里，青年知识分子最具条件利用苏联的新知识将自己转变成为又红又专的精英。而另一方面，老干部们在中国现代史的这一新阶段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他们面对的局势是，他们正在被一个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的社会抛在后面。

一、新大学的创办

1950 年 10 月中共创建新的红色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49 年到 1950 年中苏之间就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对新中国政权提供的援助范围问题所进行的谈判。该谈判过程始于 1949 年 2 月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对中共领导人所在地西柏坡的访问，并在 1949 年 7 月到 8 月刘少奇为解决建立中苏新关系的具体问题秘密出访莫斯科时得到继续。所有这些谈判最终促成 1949 年 12 月到 1950 年 2 月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访，此次访问的谈判成果便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以及双方关系的正式化。[6]

这些谈判中鲜为人知的一面是刘少奇在 1949 年夏向斯大林提议在苏联建立一个由苏联人任职的大学来教育中国的干部。刘少奇建议苏联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与前中国劳动大学相似”的学校，以此训练一千名左右“工业、贸易、银行、法律、师范”与其他行业的中共干部。[7]但斯大林不想将大学建立在莫斯科，这可能因为他不希望因为在苏联的首都训练上千名中共干部而激怒西方。相反，他提出将这个学校设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Alma Ata）。但是将大学地点定到如此偏远的省份对中共方面却没有吸引力。为了方便起见，很明显中国人决定将这所大学建在北京，并由苏联派教师去北京，这一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8]

在刘少奇的莫斯科夏季之行后，苏联派出了两位苏联教育顾问费森科（P. I. Fesenko）与菲利波夫（V. E. Filippov）来帮助中国人制定建立该新大学的计划。费森科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莫斯科的一位教育官员，但是由于健康状况很差，他在到达北京几个月后就返回苏联。会讲一些汉语的西伯利亚人菲利波夫或许是一位情报特工。[9]从 1949 年到 1950 年，大部分发回莫斯科的关于新大学创建过程的报告都是由菲利波夫撰写并签署的。

这两位苏联顾问是专门负责创办人民大学的筹备委员会（由中共负责宣传的领导人陆定一领导）的成员。[10]1949 年秋该筹备委员会访问了天津与北京已有的几所大学，着眼于接管其中的一所大学作为新的红色大学的基地。但由于陆定一告诫不应当引起资产阶级的对抗，因此接管

北京师范大学计划被放弃，决定以华北大学这所现有的干部培训学校为基础来建立新大学。而华北大学又恰恰是该筹备委员会中大多数中共中央级别的教育专家们毕业的学校。[11]

在为新大学寻找校址的过程中，苏联专家发现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许多事情都令他们感到困惑。顾问们报告说，中国大学里接受过外国教育的教员都是在欧美接受的教育，大学里的图书馆中很少有或几乎没有俄文书籍，学生主体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大资本家、地主与知识分子的子女，来自农民和贫困劳动阶层的学生极少。顾问们还注意到，许多大学财政经费的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美国或梵蒂冈。顾问们的确报告说，创建于 1898 年的北京大学“以其学生抗议活动的传统而闻名遐迩”，但是却对学生们近来的积极活动——这些活动在中国内战期间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力量——只字未提。[12] 对于中共在北京大学的党组织，苏联专家只是提到“在数量上极小”。[13] 在苏联顾问看来，北大与清华这样的大学是文化异己区。

苏联顾问们在报告中的结论部分详述了他们对美国影响的看法：

1. 总的来说，美国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由美国人资助的教育机构，比如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的教员与学生都深受美国影响。美国的影响不仅清楚地表现在这些大学的组织架构上，还表现在学生所使用的课程教材、学生和教授们的政治思想、甚至在他们的美式衣着打扮上。
2. 这些高等教育机构的教授与教师们都采取了观望态度，并对高等教育机构的重组以及他们是否能继续在大学与教育机构中任职感到忧心忡忡。一部分教职人员对新社会秩序持有敌对倾向，并对在大学与教育机构中引入必修的社会经济学课程与俄语课感到十分不快。
3. 高等教育机构里充斥着中国的地主、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的子女。高等教育机构对于工农子女来说基本上是遥不可及的，因为城乡群众一般都是文盲，情况好一些的也是半文盲。

为了处理这些问题，苏联顾问们建议应当在各种高等教育机构中加入工农班，以便劳动阶级的子女可以接受三到四年的课程教育。[14] 这一建议让人想起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高等教育机构中设置的工人学院（*rabfaks*）。

就在中共进入北京后不久，中共最高级别的干部教育专家们就四处为华北大学这个领头的干部训练（与政治思想改造）学校寻找校址。该校的新校长、年届七十岁的1911年大革命老战士吴玉章，利用他与中共领导人的深厚交情为华北大学谋得了一块上乘地产——靠近紫禁城的段祺瑞旧宅邸。[15] 新的红色大学的筹委会领导们决定将华北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因此华北大学的行政与教学职员以及一些学生仍然留在“新”大学里（实际上是旧的干部训练学校）。

虽然吴玉章是新大学的校长，但是人大的日常领导工作是由第一副校长兼学校党委书记胡锡奎负责，胡是北方“白区”地下工作一位强硬的领导者。[16] 老牌中共文学家成仿吾是第二副校长。[17] 该学校领导层由两个派系主导：由中共游击队领导人所构成的、胡锡奎领导下的“地下党”派；以及站在吴玉章与成仿吾一边的、在中共干部训练机构工作过多年的人组成的“干部学校派”。

在1959年为外国来访者准备的一份简介中，人大的领导人是这样描述该校的教员的：百分之十是“老干部”，百分之八十是在“半学半教”时期由苏联专家培训的青年教师，剩下的百分之十是“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8] 从1949到1952年这一阶段，人大各系的领导要么是胡锡奎在地下党斗争时期的同事，要么是吴玉章与成仿吾在华北各干部训练学校的同事。华北各干部训练学校一些有前途的学生现在也被任命为各系的培训教师。但这些人都没有苏联管理学方面的经验：许多人公开承认对如何运转自己的学术专业完全一窍不通，只能等待苏联专家的到来。[19]

人大最初只有八个系：经济计划、工厂管理、财政信用、合作、贸易、法律、外交与俄文。1950年到1954年间这些系变动很少。1952年8月增加了统计学系，1954年6月又建立了一个农业经济系。这些系相当于苏联的学院（*fakultety*），并不像美国的大学体系那样是最基本

的学术单位。在人大，最基本的学术单位是苏联大学体系中的次系一级的机构 *kafedra*——成仿吾将其翻译为“教研室”。[20]

最重要的教研室向所有学生或不同系的学生开设各种必修课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与政治思想有关的教研室，负责教授各种政治思想必修课程——马列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实际地位高于系的教研室在人大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在 50 年代初是除了俄语系之外苏联专家人数最多的机构：马列主义教研室（1950–1952 年有五位苏联专家），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0–1952 年有三名苏联专家），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1951–1956 年有一名苏联专家）。老的八个系每个系有两到五个教研室，这些教研室大多数只有一到两个苏联专家。例如财政信用系有四个教研室：1）财政、2）银行业、3）产品与货币流通及信用、4）会计。[21]

为了与刘少奇对这个学校的远景设计保持一致，人大在其初期着重培训经济、法律与外交人员。八个系中的六个都致力于经济管理，而且其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斯大林式的经济管理。可以这么看待初期的人大：她将斯大林式的哈佛大学商学院、耶鲁大学法学院与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集为一体。根据刘少奇的计划，人大的目标是让其成为中共干部学习管理苏联式国家与经济的重点教育机构，这一计划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一致赞同。虽然此时离毛泽东宣布向社会主义转变还有好几年，但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用刘少奇在人大开学典礼上的话来说，1949 年中共领导人已经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人才培养工作中，以便满足“与苏联现在的经济状况差不多”的经济体系运转对人才的需要。[22]

人大的学生绝大部分将会是至少有中学教育水平的党员干部，他们在本科班将进行两到四年的专业学习。大部分继而会将成为工厂管理者、统计人员、会计、教师与各类经济专家。人大在初期还曾设置过短期训练班，让那些在职干部——也就是在岗的教师与管理人员——可以到人大来接受为期最长六个月的专业训练。事实证明，短期训练班是人大对全国各地的学校与政府机构产生影响的一个关键方式。

这所“新式正规”大学是中国与苏联领导人及双方教育专家进行谈判与互动的产物。这一互动有一个方面极为讽刺：在场的苏联专家全力

主张通过招收政治思想上的忠诚者——例如工人与农民——以迅速改造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苏联自身却是花了十年多的时间来改造他们自身的高等教育体系。[23]1949 到 1950 年这一时期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温和路线令苏联专家们苦恼不已。由于刘少奇对工农是否能够在一夜之间成为大学生感到信心不足，因此折中的方案就是既招收具有红色背景但教育水平很低的老干部，也招收背景多样化但教育程度更高的青年知识分子，让他们一起进入这个新的红色大学的城市氛围。

二、新大学的社会多样性

1950 年来自中苏双方的报告显示，人大的领导者们努力想要从社会出身混杂的中共干部中建立一个合适的“苏联化”学生群体。在 1950 年好几处发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苏联专家抱怨说学生的社会背景很差，并报告说这些背景解释了学生中一些人为什么会持有反苏观点。[24] 而中方的管理者则报告说，很难与有工农背景的“老干部”相处，他们不习惯也不愿意学习。[25] 许多有“青年知识分子”背景的学生恰恰相反，他们看起来希望出人头地、但却不愿严肃对待政治思想学习。

中共教育者与苏联专家不得不与之首先打交道的学生是来自华北大学的“政治思想再培训学员”。在成仿吾的领导下，数千名“青年知识分子”与前国民党政府雇员在短期政治训练班中接受了再培训。但苏联顾问菲利波夫与费森科对他们 1949–1950 年间在中共的“思想改造”学校中所了解到的事情并不表示赞许：

> 当前中国同志十分关注对旧知识分子的重新教育，这些旧知识分子都在前国民党的政府机构、警察与地方保安部门工作。在北京，有三所大学参与了这种再教育：革命大学，政法大学与华北大学。华北大学是组建人大的基础，仅该校就在今年就改造了超过一万人。改造的过程：学生们对马列主义进行四个月的学习以形成新的世界观，并以此来批判自己过去不正确的观点与错误。他们宣布现在他们已经与过去决裂，完全接受新的观点并已经做好准备为革命奋斗终身。这些大学的共产

> 党领导人都十分相信这一再教育，作为证明他们举了许多例子——许多接受改造的学生好像是突然觉醒了一样，交出了秘密电台与武器。[26]

这些苏联顾问认为中共的“思想改造”充其量只能算是误导。苏联专家否定了中共对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府雇员的“温和”政策，他们所赞同的是一种更为典型的斯大林式的方式——对同情反革命的嫌疑分子进行逮捕、流放和枪毙，训练一群新的“红色”干部来取代“旧”专家的位置。[27]

随着来自华北大学最后一班接受再培训的学员毕业、华北大学剩下的职员被分配给人大，这一思想改造在 1949 年 12 月结束。[28] 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从进行再培训的学校毕业并被派往南方。数百名学生以俄文大队——1949 年 9 月中旬成立的一支大型俄文教育队伍——的形式被留在华北大学。也正是此时华北大学的领导们知道了将以该校为基础建立“新型正规大学”这一消息。[29] 而原本是要在中共中央工作的苏联籍俄文教师碰巧提前到达，因此也被分配到人大。1949–1950 年这个学术年度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俄文大队的学生与陆续抵校的新入学学生在苏联俄文教师的指导下学习俄语。

在这一过渡时期，苏联顾问仍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俄文大队 466 名学生的社会出身与政治可靠性，就像他们先前蔑视进行“政治思想”再培训的学校一样。事实上，俄文大队的学生中很大一部分是那些接受了“政治再培训”的人，因此苏联顾问认为他们有问题不足为奇。1950 年 2 月 27 日在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科瓦廖夫（E. F. Kovalev）的一份报告中，苏联顾问菲利波夫汇报了人大的俄文教学状况与学生的性质。[30] 菲利波夫报告说，俄文大队的目标是要通过两年的课程将学生们培养成为俄语翻译与教师。他观察到中国人对俄语有着极大的热情：“在上了一个月的课之后，学生们对学习俄语有极大兴趣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不仅仅是学生们，而且几乎所有大学雇员与服务人员——从校长到茶贩——都在抱着极高的热情学习俄语。”[31]

虽然菲利波夫对中国人学俄语的热情十分高兴，但是他对于学生的性质却感到不满。他写道：“这些学生的政治背景离期望值还很远。”[32]

各种数据显示学生们支持中共的“自然”倾向微乎其微。俄文大队的学生大多数在社会地位上与中共很少有联系，其家庭背景都是非革命的小商贩、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与地主家庭。[33] 在中共进入城市招收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这一特定背景下，这一点完全合乎情理，但对于苏联人来说，这离理想的“工农”状态遥不可及。菲利波夫最多只能说：人大招收的本科学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无论如何都应当（比目前情况）更好”。[34]

菲利波夫报告说，这些正在接受政治再培训的学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不佳，这也说明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这些学生中的许多都持反苏态度。菲利波夫 1950 年 2 月的报告中以下这些段落值得长篇引述，它们说明了苏联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深疑虑——而这些人正是中共在 1949 到 1950 年间极力争取的对象：

> 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上海与南京，许多人都是从教会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中的一部分人英语与日语十分流利。在 466 名学生中，100 名公开承认信教。一些学生说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并没有区别：“共产主义是以消除贫穷为目的，基督教也是如此。”“共产主义是要和平与共同繁荣，基督教也是如此。”一些学生还拥护反动观点，例如“美国在技术上比苏联强”，在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签订之前还说旅顺港与大连将交给苏联。在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他们还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长春铁路、大连与旅顺港要到 1952 年才归还给中国，而不是现在？”“为什么长春铁路可以免费交还（中国），但大连与旅顺港的设施就要偿付？”“为什么要承认外蒙古独立？”“1945 年苏联在东北的军队利用局势进行大肆抢掠。”“告诉我，苏联准备怎样具体帮助中国？”这些观点与问题不仅证明了政治上的无知，更证明了学生中一些人的反动态度。[35]

苏联专家认为这些“政治再培训”的学生是可疑的、令人讨厌的。在苏联专家看来，这些学生毫不掩饰的野心、蔑视政治教育课、关心自己身为地主的父辈等表现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苏联专家将自己面临的新中国首都的景象描写得一团糟。[36]

虽然苏联顾问很明显地认为中共应当招收拥有工农背景的学生，但是刘少奇却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刘少奇对于工厂工人受教育的潜力并不乐观，他告诉人大的计划者们，这些工人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可以应付大学课程学习的水平。吴玉章、成仿吾与教育部副部长张奚若都赞同刘少奇的看法，认为建立预科班或附属于人大的补习性质的“工人学院”这一问题是未来应该着手考虑的问题。[37] 这也就是告诉苏联顾问，鉴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对工农进行高等教育在近期内都不具有现实性。考虑到苏联专家对中共在政治再培训学校中进行“重新煅炼”的人选不满，中共这一看法肯定令苏联专家感到泄气。

人民大学招收学生的计划从 1949 年 11 月与 12 月开始有所进展。中共下令该大学将要招收三类学生：老革命干部，至少有中学教育水平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最后一类是当时在场的苏联人最讨厌的。[38] 老革命干部指的是那些在 1942 年之前入党的人。相关政策规定青年知识分子是年龄在 18 岁到 30 岁之间的高中毕业生，或者是有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并在中共革命工作与专门机构中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中共青年知识分子干部。[39] 这些学生将被招收进入本科部。而“经过改造的旧知识分子”这类学生并未得到大力招收，因为人大已经从华北大学、政法大学与俄文大队那里承接了许多这类学生。

1950 年 1 月，人大向中国五个大军事行政区派出了招生队，这些招生队与中共党组织、政府机关、工会、农民、妇女与青年组织、各人民解放军单位进行联系以寻找合适的候选人。[40] 到 1950 年 2 月底，已经有 965 名学生登记，超过原计划 10%。加上来自于华北大学和政法大学各 300 名政治再培训人员，人大的本科学生总数达到了 1,565 人。[41]

这 1,565 名学生的社会出身、社会地位与政治背景的数据资料说明他们比俄文大队的学生要有所“改善”。被定级为中农的学生占了学生总数的 29.1%，出身于贫农与产业工人的学生占了 20.3%。因此校领导可以宣布，从这些较好的社会阶层所招收的学生达到了学生总数的将近一半。尽管如此，仍有 428 名学生来自于政治上有嫌疑的社会阶层——地主、富农、小商人，这些人占了总数的 27.6%。[42]

但最让人震惊的是，在党员资历和教育水平上，新招收的965名学生与从华北大学和政法大学政治培训中心转过来的将近600名学生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别。招生数据显示，1950年1月新招收的965名学生中，几乎所有人都是党员或共青团员。这是因为新招收的学生都是各地党政军机构推荐的，就各个方面而言他们都是“中共自己人”，而1949年接受政治培训的学生则不是。就教育水平而言，绝大多数新招收的党员与共青团员学生只有初中或小学教育水平，而那些从华北大学与政法大学转过来的学生虽然很少是党员或团员，但构成了具有高中或大学教育水平学生的主要部分。[43] 相关数据所显示的是被带到地处北京的这所新大学的两个不同社会群体。其中一个社会群体由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的中共干部构成，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党员，绝大多数很可能都是农村出身。另一个群体则是由受过更高水平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许多人都是城市出身。

1950年春，随着新的学生到达北京、在新大学开始学业，苏联顾问与中方管理者都报告学生中出现了问题。1950年2月，菲利波夫警告说俄文专业的学生中间有反苏、追求名利与亲地主的情绪。[44] 苏联顾问继续汇报道，中国同志对他们重新训练学生的行为进行了辩护，其中特别引述了1950年2月9日人民大学行政会议上吴玉章的解释——那些态度令苏联顾问感到不安的学生只不过是“病了”，首先需要治疗，然后再进行教育。当然，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1942年到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式的惯用方式，但是苏联人似乎十分质疑这一“软”方法对持不同政见者是否有效：“中国同志，这所大学的领导们确信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输灌给每个学生，而不论其阶级倾向如何。”[45] 很明显，菲利波夫并不同意这一看法。

菲利波夫报告说，人大的管理者决定在本科部已有的400名学生中加强政治课教育，并在俄语课程中用政治课取代了许多语言课。[46] 从1950年2月13日开始的临时班则是为了在苏联教师抵达前不让学生闲着。临时班的课程包括了俄文、新人民民主主义、中国革命史、数学与体育。[47] 1,565名本科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都在1950年3月末到达了新大学。

对此前接受政治培训的学生群体表示极力反对的苏联专家们，对这些新学生又持何种看法？在日期注为 1950 年 12 月 18 日的最后一份工作报告中，[48] 菲利波夫声称，在预备班的学生中，在社会地位方面有 63% 的学生被归类为工人与农民，要比本科学生与短期训练班的学生“更好”，在后两者中真正的工人农民相对很少。[49] 在苏联人看来，这说明学生的社会构成并不令人满意。

事实上，新入学的学生到达后，对其中的一些学生重新进行了社会出身与地位分类，现实情况说明要比当年春天的乐观估计糟得多。例如在春天时曾报告贫农与中农出身的学生占了 44.5%，但是到 1950 年 12 月，这一人数的比重就下降到 31%。而被定为工人的学生不仅从一开始就比重很小，而且从春天统计的 14% 急剧下降到 12 月的 7%。具有像“地主”与“资本家”这样并不令人满意的社会背景的学生比重则有所上升。具有党员身份的学生所占比重也从原来的接近 55% 降到了将近 37%。最后，春天时原有更多学生被定为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而现在只有小学教育水平的学生比重从原来的 27.5% 增长到了 36.5%，超过全体本科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短期训练班，情况更加明显：党员占了 83%，但是 75% 的学生只有小学教育水平。

在苏联人看来，唯一的真正亮点在预备班，那里工农出身的学生占了绝大多数，而且 89% 的学生都是党员。但是，菲利波夫在他的报告中并未汇报这些人的教育水平，这说明这些人几乎或完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许近乎文盲水平。因此，这些学生被放在了补习性质的预备班。

在中国人看来，刘少奇要通过六个月的短期训练班制造出既有能力又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的专家这一目标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胎死腹中”）。短期训练班学生的招收计划已经要求招收具有等同于初中教育水平的、有经验的中共干部。同时这一招生计划要求至少招收一些接受过政治培训的知识分子。[50] 但在实际操作中，针对教育水平的招生要求条件都被抛在一边，党员资格与工作经历成了招生最重要的标准。因此，短期训练班被只有小学水平的党员所垄断，这些人可能在其来源地的党政机关身处要职，但在学术能力上十分有限。

三、老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摩擦

在人大的学生中，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在人大建校初期最为严重，那时短期训练班仍然招收大批在职的干部。胡锡奎在1960年撰写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史（初稿）》中这样描述了人大初期的学生状况："约占百分之七十二的干部及工人学生，政治质量好，文化条件较差；约占百分之二十八的青年学生，文化条件较好，但缺乏革命实际锻炼。这样，学生中政治、文化水平的参差不齐，无疑的，会给教学上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带来不少新的困难。"[51] 在一份1950年完成的报告中，胡锡奎描述了教育程度低下的老干部在新大学中面对的各种问题，并指出他们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矛盾。

在1950年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胡锡奎根据党龄将人大新招收的865名学生党员分为两组。有三到八年党龄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教育水平更高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多数很可能在国共内战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占到865名学生中的45%，人数大约有390。胡锡奎对这些干部做了如下记录：

> 已有三年革命经验的干部，其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或与知识分子有关。在政治思想上，这些人一点缺点也没有，在工作中也不自负。由于获得学习的机会，他们高兴而坚定地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但是，其中的一些人追求个人荣誉，想要被分配到外交部或工业管理部。他们想要被分配到他们认为不需要学习数学或经济学、而且工作不会太辛苦的学术研究机构。[52]

已经具有三年党龄的"青年知识分子"此刻在政治思想立场上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们因为突出的热情、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与能力而被指责追求名利。那些在适应新秩序方面有困难的人，指责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型的中共干部想要"出风头"、想出名。

胡锡奎并不担心这些素质较高的中共干部的野心与名利追求。胡锡奎认为，最严重的问题不是青年知识分子型的中共干部，而是数百名由

地区党委与军事委员会推荐入学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半文盲的“老干部”。在865名干部学生中，30%的人有八年或八年以上的革命经验，人数将近260。[53]他们都是1942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并可能是来自农村根据地的干部。胡锡奎是这样介绍他们的：

> 这一部分学生是有八年或者更长革命经验的干部，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学习。例如外交部学生于涛和有17年革命经验，工作谦虚、学习热情。另一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前是人民解放军的功臣。他们最近才开始独立工作。这些学生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经过了政治上的锻炼，并有极大的学习愿望。[54]

然而，在以相对肯定的词汇介绍了这些“老干部”之后，报告接着描述了这些老干部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抱怨的语气说明，于涛和的正面例子显然是用来介绍下面普遍存在的负面情况的先扬后抑：许多“老干部”学生似乎对他们长期从事革命的经历自负过头，看不起后来才加入革命队伍的人。[55]

揣度胡锡奎报告的字里行间，很明显从1949到1950年老干部的基本问题在于他们具有一种“胜利者的心态”，此外身为农村干部的他们在文化上与城市干部差距甚远、与置身于其中的新城市环境也存在巨大隔阂。老干部们在农村地区战斗了多年，经历了巨大的艰苦并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因此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进入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是艰苦奋斗带来的成果。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老干部发现清苦的生活仍在继续，而且城市环境带来的新的社会与心理压力使问题更加严重：

> 部分学生对大学的生活条件不满意。学生们说大学的伙食很糟糕：经常是高粱，有时饭菜都坏了还拿上来，开水也不够，喝的水就用煮饭的锅烧。学生中有不少在进入学校前享受着不错的食品定量分配与生活条件，他们抱怨现在什么都得不到，他们的津贴一直不能按期发放，他们想要真正的床，却只能睡上下铺。学生们不想打扫房间，也不想干各种杂活。他们不习惯在早晨进行体育锻炼，也不习惯遵守每日作息。[56]

这是一种因期望落空而产生的感觉。他们认为城市生活在最低程度上应当意味着吃像样的饭菜、睡在真正的床上。一些学生发现情况如此差劲以致于想要回去："一些学生想要回去，并已经要求学校提供回去的路费。有人说：'我已经参加革命十年了，现在我连路费都得不到。''如果大学不采取措施改善物质条件的话，我们就连一整年都学不下来，更不要说学习四年了。'"[57] 这些也许只是少数人的看法。考虑到胡锡奎是在给中共中央写报告、而且考虑到中央对其学校的物质支持，他有足够的动机将学校情况描写得特别灰暗。但是一些满怀希望的学生很可能的确因为 1949 到 1950 年人大的艰苦条件而失望。胡锡奎报告中的证据显示，最为失望的学生是那些从事革命时间最长的学生，比如那位想要路费回家的干部。

出身于城市背景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大学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多抱怨。[58] 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没有抱怨物质条件上的艰苦，是因为他们一直被提醒农村地区的情况要比城市困难得多。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享有相当的特权，而且城市里劣质的食物与住宿条件意味着他们与党和军队一起分担着艰苦。但对于已经有很多年艰苦经验的农村干部来说，感觉却是截然不同的：革命胜利、进入城市后他们应当得到物质生活上的改善作为回报。

胡锡奎报告说，老干部在学习上的困难极端严重，这使得他们士气低落。在这里胡锡奎所描述的群体的涉及面其实不止那些拥有八年或者更长革命经验的"老干部"。人们应当记得本科学生中有超过 36.5% 的学生——大约 470 人——只有小学教育水平。而学生总数中的整整一半都参加了补习性质的中文与数学课程，这说明学习困难这一问题不仅局限于那些只有小学水平的学生。[59] 短期训练班的教育水平在整体上要低于本科学生，一名进入短期班学习的学生描述了这部分学生面临的心理障碍："（一位）同学来自石家庄市，原来是一个物资供给部门的秘书，年龄三十二岁，只有小学教育水平。他说他被当地党委要求参加短期课程的学习，并听说还得学习俄文时，他心绪烦乱，还得了头疼，精神变得特别低落。"

很明显，不得不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学习、而且还得学习像俄文这样完全陌生的事物所引起的这种极端反应是相当普遍的："一般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在课程表上看到高等数学这样的课程时都吓坏了。他们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此项任务，也害怕学俄语，因此变得十分泄气。他们害怕测验、评估和考试，并开始说他们不能理解所学的课程。他们表示了不满并失去了学习的兴趣。"[60] 考虑到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学习，这也使教育水平较低、年纪较大的干部们想要争取转到工厂管理专业的两年本科课程。这些年纪较大的干部学生们已有家室，因此到一个陌生环境进行长期学习的前景自然令人畏缩。

他们对城市环境感到陌生，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学科的畏难情绪与家庭牵挂。某些情况下，具有农村背景、教育程度很低的调干生们对环境与同学采取了敌对态度："具有八年以上革命经验的学生对自己的过去十分自豪，但是他们担心自己的家庭，也为结束大学教育之后的未来而忧虑。物质上的困难、对学习外语和数学的恐惧使得这些学生变得消极。他们说'我在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我们为了谁进行的革命？真的是为了知识分子吗？'因此，他们没有了学习的愿望。"[61] 很明显这些学生士气低落，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似乎在轻而易举地创造一个陌生世界，这令他们十分苦恼。这些看法更进一步导致了他们普遍担心身处城市中的大学与——更进一步——党在文化秩序上已经道德沦丧："一些来自农村的学生反对跳舞，也反对男女学生手拉手地走路与交谈。他们看到这些时就会说：'这是什么大学！''这个大学不是共产党人建立的，已经变啦。'"[62] 所有这些不仅仅是人大农村干部的观点，也是 1949 年中共进入城市后随之产生的普遍现象。[63]

"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与"老干部"之间的差异带来了一个迫切的实际问题，就是两派间的合作问题。胡锡奎注意到，"青年知识分子"对老干部们的评价不太高：

> 在没遇见老干部之前，青年干部对他们都十分尊敬。因为（老干部）有着很长的革命工作资历，（青年干部）一开始对老干部评价很高。但在遇到了老干部之后，青年干部对老干部就十分失望，因为与他们想象

> 的相差太远。在他们看来，这些老干部看起来无组织，对工作并没有特别的愿望，傲慢自大，而且在理论上准备不足。[64]

对老干部们最普遍的抱怨是，这些人吹嘘自己长期进行革命的阅历，但事实上能力十分有限。而在老干部们看来，年轻的学生们“相当积极”但对年长者不尊重。老干部抱怨说年轻学生“对他们不够尊重”。[65] 老干部们渴望获得尊重，然而新时期更强调学术与技术能力而不是革命经历的长短，因此他们在新大学明显占下风。

中共政权在人大及其他地方都针对工人与农民开展了高等教育试验，但即使连刘少奇这样的权威也对试验是否能够成功表示质疑，因此1955年中共政权放弃了对工农的高等教育试验、转而选择学术“正规化”的道路是不足为奇的。[66] 到1956–1957年，由苏联人训练的“青年知识分子”学生们已经为成为新的精英阶层蓄势待发，斯大林式的经济管理专业领域、对马列理论教师的训练以及其他由政府主导的技术领域（如档案管理）都由他们主导。

但是，在1957年5月到6月的百花运动期间，人大受到“教条主义大蜂窝”这样的攻击批评。某种程度上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与崩溃，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人大及其精英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价值观将处于守势，毛泽东主义的老干部们转而赢得优势，曾短暂崛起的新政权的青年知识分子则落在了下风。

姚昱、杨京霞译

注释

1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3日，第2版。

2 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编：《刘少奇论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3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接管与改造，见 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4–191; Ruth Hayhoe, *Chinese Universities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6), 73–90; 以及 Immanuel C. Y. Hsu, "The Reorgan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49–61," *China Quarterly* 19 (July–September 1964): 128–160。

4 Michael David-Fox, *Revolution of the Mind: Higher Learning among the Bolsheviks, 1918–192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3–4; Sheila Fitzpatrick, *The Commissariat of Enlightenment: Soviet 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Arts under Lunacharsky, October 1917–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4–5, 49–51; and 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79–80.

5 李鸿永（Hong Yung Lee）就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中共政权就面临这样一个抉择：究竟是提拔革命干部，还是提拔教育程度良好的技术能手。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387–389.

6 关于该条约的谈判，见 Dieter Heinzi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0: 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 (Armonk, N. Y.: M. E. Sharpe, 2004), 263–284。

7 "Liu Shaoqi's letter to Joseph Stalin, July 6, 1949," Arkhiv Prezidenta Rossiiskoi Eferatsii (Archiv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ereafter cited as APRE) 45/1/328/51–55, trans. In Andrei Ledovsky, "The Moscow Visit of a Deleg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June to August 1949 (Part 2)," *Far Eastern Affairs* 5 (1996): 86–87.

8 徐泽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第 458–463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2 卷，第 650 页；"Mao Zedong's Telegram to Liu Shaoqi to Be Handed to Joseph Stalin," APRF 45/1/328/137–140, trans. In Andrei Ledovsky, "The Moscow Visit of a Deleg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June to August 1949 (Part I)," *Far Eastern Affairs* 4 (1996): 89–91; 李新：《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备》，未出版手稿，无日期。

9 中国人曾怀疑他是一个情报特工。一个被采访者回忆说，只要菲利波夫一进入房间，人大的苏联教师就会离开房间。采访徐斌，2000 年 10 月 17 日。

10 Douglas A. Stiffler, "Building Socialism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Chinese Cadres and Soviet Expe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57"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2), 50–62.

11 P. I. Fesenko and V. E. Filippov, "Doklad o khode rboty po organizatsii novogo universiteta v Pekine"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work on the organization of a new university in Beijing), October 13, 1949, Rossiiskii Tsentr Khraneniia I Izucheniia Dokumentov Noveishei Istorii (Russian Center for the Storage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Document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下引 RTsKhIDNI) 16/137/142, 304。

12 Ibid., 313–319. 就 1945–1949 年北京各个大学中学生运动，见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尤其是第 42–93 页；及 James Yick, *Making Urban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CP- GMD Struggle for Beiping-Tianjin, 1945–1949*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5), 80–136。

13 Fesenko and Filippov, 313.

14 Ibid., 311–312.

15 吴玉章（1878–1966）是四川人，曾为孙中山的助手，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五老”之一。在延安时期，他是鲁迅艺术学院院长与延安大学校长。在内战时期他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吴玉章还因为在中国语言改革中发挥的作用而闻名。见 Donald W. Klein and Anne B. Clark,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 959–965; 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校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3 年，第 1 卷，第 1–16 页。

16 胡锡奎（1896–1970）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1925 年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 12 月到 1928 年夏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胡锡奎是著名的华北地区地下党领袖。曾担任长城以北热河省省委书记，并因为主张暴力的土地改革而得到毛泽东的欣赏。1949 年春夏，胡锡奎与他的庇护人刘澜涛主持进行政治思想改造营，并夸张地将其命名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见《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第 1 卷，第 52–64 页；《胡锡奎传略》，中共湖北省孝感地委、孝感市委党史资料整编委员会办公室编：《胡锡奎纪念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67–220 页。

17 成仿吾（1897–1984），湖南人，五四文化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他于 1928 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前往德国，在那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从 1937 年到 1949 年，成仿吾在延安与华北主持了一系列作为人大前身的党员训练学校。见《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第 1 卷，第 17–31 页；余飘、李洪程：《成仿吾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年；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年。

18 《中国人民大学简况》（外宾参观介绍稿），人大档案馆，197A，第 9 页。

19 徐伟立：《怀念我们的国际朋友和老师》，《人民大学周刊》，第 61 期，1952 年 11 月 7 日，第 3 页。

20 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研室工作》，《人民教育》，1951 年 4 月，第 11 页。

21 关于人大的院系结构与苏联专家的分配，见 Stiffler 前揭书附录 A–C，第 482–491 页。

22 《刘少奇论教育》，第 91 页。

23 布尔什维克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控制是在 1928 年开始的文化革命阶段实现的。相关研究见 Sheila Fitzpatrick,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Class War” 与 George M. Enteen, “Marxist Historian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Professional Inflighting," in Sheila Fitzpatrick, 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1978)。

24 苏联顾问关于人大情况的报告可以在莫斯科的各个苏联档案馆中找到。见 Letter from V. Filippov to E. F. Kovalev (February 27, 1950), RTsKhIDNI 17/137/405, 49–53; "Otchet o rabote po organizatsii naro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 v g. Pekine" (Report on the work of organizing Renda in Beijing), (May 2, 1950), RTsKhIDNI 17/137/405, 62–64, and "Doklad o rabote gruppi Sovetskikh prepodavatelei v vyshikh uchebnikh zavedeniia g. Pekina"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roup of Soviet teacher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the city of Beijing), (December 18, 1950), RTsKhIDNI 17/137/723, 1–22。

25 人大校长的两份报告从汉语译成了俄语并收入苏联档案文件。见 "Doklad Rektora v TsKh KPK" (Report of the rector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CC]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Party [CCP]), (n.d., included with Filippov's letter of May 2, 1950), RTsKhIDNI 17/137/405, 65–72; 及 "Doklad Rektora naor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 TsKh KPK v Marte 1950 g," (March 1950 Report of the rector of Renda to the CC of the CCP), (March 28, 1950), 73–90。

26 Letter from V. Filippov to E. F. Kovalev (December 25, 1949), RTsKhIDNI 17/137/405, 4–5.

27 但在斯大林去世后这一情况已发生改变，当时苏联教育专家古德列佐夫（Kudriavtsev）采取了相反的作法，从 1949 年之前的知识分子中寻找利用"老"专家。见《本校苏联顾问古德列佐夫同志离校归国前去别讲话》，人大档案馆，141A，第 25 页。

28 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研室、校史编辑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大事记（1937 年 7 月 –1992 年 2 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92–94 页。

29 同上，第 91 页。

30 Letter from V. Filippov to E. F. Kovalev (February 27, 1950), 49–53.

31 Ibid., 49.

32 Ibid., 50.

33 "Table 4: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s of Students of the Russian Brigade, 1949–50," in Stiffler, 137–138.

34 Letter from V. Filippov to E. F. Kovalev (February 27, 1950), 51.

35 Ibid., 51–52.

36 Ibid., 52–53.

37 Letter from V. Filippov to E. F. Kovalev (December 15, 1949), RTsKhIDNI 17/137/405, 2–3.

38 Ibid.

39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第一学期及第一期训练班的教育方针和计划（草案）》，1949 年 11 月 12 日，人大档案馆，2A，第 39 页。

40 同上；"Plan organizatsii naro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 Uchebniie planny na pervyi semester dlia universitetov I kursov" (Plan of organization of Renda. Teaching Plans for the first semester of the regular course division and the short courses) (December 25, 1949), RTsKhIDNI 17/137/405, 9.

41 "Doklad Rektora naro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 TsKh KPK v Marte 1950 g," 74.

42 "Table 5: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s of First Group of 1,565 Students Recruited for Regular-Class Division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January-February, 1950," in Stiffler, 143–144.

43 "Table 6: Summary of the Students of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March 24, 1950)" and Tables 7–9, in ibid., 145–146, 153–154.

44 Letter from V. Filippov to E. F. Kovalev (February 27, 1950), 51–52.

45 Ibid., 53.

46 Ibid., 52.

47 "Otchet o rabote po organizatsii naro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 v g. Pekine," 62–64.

48 "Doklad o rabote gruppi Sovetskikh prepodavatelei v vyshikh uchebnikh zavedeniia g. Pekine," 1–22.

49 Ibid., 5.

50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第一学期及第一期训练班的教育方针和计划（草案）》，第39页。

51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初稿）》，人大档案馆，220A，第17页。

52 "Doklad Rektora v TsKh KPK," 65.

53 "Doklad Rektora naro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 TsKh KPK v Marte 1950 g," 74.

54 "Doklad Rectora v TsKh KPK," 66.

55 Ibid., 69–70.

56 Ibid., 66.

57 Ibid., 66–67.

58 来自哈尔滨的"青年知识分子"杨慧莲强调说，家庭背景较为富裕的学生对人大的生活条件与伙食很满意。采访杨慧莲，北京，2000年9月17日。

59 "Doklad Rektora naro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 TsKh KPK v Marte 1950 g.," 75.

60 "Doklad Rektora v TsKh KPK," 68.

61 Ibid., 70.

62 Ibid., 69.

63 有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与中期"青年知识分子"与老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纪实报告和文学描写，见 Rudolph Wagner, *Inside a Service Trad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inese Pro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4 "Doklad Rektora v TsKh KPK," 69.

65 Ibid.

66 关于放弃工农短期训练班、支持学术"正规化"，见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189–190。

四

家族策略
(Family Strategies)

第十三章

叶氏兄弟在新中国

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叶笃正并不是左派分子，然而，像高家龙在本书第 15 章所讨论的地位显赫的商人刘鸿生一样，他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不到一年回到了中国。内战最后一年，正当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之时，叶笃正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他的大气物理学博士学位。其时他密切关注美国报纸上有关共产党胜利的报道，经常和其他中国同学一起讨论内战的进程。如果共产党没有获胜，他也许不会回国：对他来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过于腐败和混乱。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和平与秩序，给未来带来了希望。对叶笃正来说，回国的时候到了。

叶笃正祖籍安庆，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家庭，行七。安庆是扬子江上的一个港口，清朝年间乃安徽省会。一份幸存下来的叶氏族谱将其祖先追溯到十四世纪。为了躲避元末明初的战乱，叶氏从江西移居安庆。咸同年间，太平天国打到安庆，叶笃正的高祖助淮军、设团练，又在镇压捻军时立了军功。其子叶伯英在仕途上走得更远，光绪年间出任陕西巡抚。光绪末年，安庆叶氏的这一支由保定移居到天津。辛亥革命时，叶笃正的父亲叶崇质任直隶巡警道道台，革命之后离开官场进入了银行与实业界。[1]

民国初期，叶家住在天津安徽会馆后面的一套大宅院里，叶崇质管家。他的妻子和两个姨太太为他生了十个儿子和五个女儿。除了最小的

女儿受过现代教育以外，其他的女儿接受的仅是家庭女红教育。男孩子们从小在家里念私塾，请来的教书先生是父子二人。私塾之后，所有的男孩子都考上了著名的南开中学；毕业后，又都在京津两地和南京的大学求学。年龄最大的三个儿子是包办婚姻，婚后在天津生活、工作。 年纪小一些的几个儿子——尤其在父亲（叶崇质）于 1930 年去世之后——开始在学生政治中十分活跃，抗议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进逼。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家庭疏散，兄长们留在日据地区，老六和老九加入了共产党，老五和老十二到了战时首都重庆，叶笃正在中国完成了大学教育之后获得了到美国继续深造的奖学金。（见表）

姓名	出生次序	生卒年代	母亲	结婚日期	职业 / 婚姻
未知	长女	1906？ –1909？	仓氏	—	夭折
笃诗	次女	1907？ –1929？	陈氏	？	家庭妇女 / 嫁给地主
笃仁	长子	1908–1980	刘氏	1931	银行家
笃智	次子	1909？ –1915	陈氏	—	夭折
笃雅	三女	1910？ –1979？	陈氏	？	家庭妇女 / 嫁给官员的儿子、一个海洛因上瘾者
笃义	三子	1912–2004	陈氏	1934	民盟干部
笃信	四子	1912–1981	刘氏	1935	商人
笃庄	五子	1914–2000	刘氏	1946	农学家、翻译家
笃廉（叶方）	六子	1914–	陈氏	1945	共产党干部
笃正	七子	1916–	陈氏	1942	科学家
笃颂	四女	1916？ –1979？	刘氏	？	家庭妇女 / 嫁给康奈尔毕业的商人
笃成（方实）	九子	1917-	陈氏	1939	共产党记者
笃全	十子	1919？ –1929？	刘氏	—	夭折
笃柔	五女	1921-	刘氏	？	教师 / 嫁给翻译家
笃慎	十二子	1924–1999	刘氏	1957	艺术家

资料来源：《叶氏族谱》，第 6 版（无出版社：1944 年），第 7 章 17a–b、42a–44a；叶笃庄 1991 年无标题手稿；对叶笃正、叶笃柔、陈澄的采访。

注：叶家并无第八子。叶家二子青年时罹患重病，故改称他为八子，希望以此能救他但终未成功。叶家第十一子其实是总统袁世凯的孙子，袁家之所以让叶家“收养”自己的孩子，是希望能够沾到叶家子孙旺盛的福气。

1949 年以后，叶家和整个中华民族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已经成人的八个兄弟和四个姐妹不再是居住在一起的大家庭了。1936 年分家之后，天津的大宅院、几十个仆人、寄住的亲戚都在这十几年里相继离去了。新中国结束了“封建”家长式的大家庭，随之而来的是核心小家庭的时代。叶家的兄弟姐妹都有了自己的家庭。[2] 这些新的家庭性质各异，包括了党员干部共住机关大院这样的划时代的生活方式。本章将要考察这些生活方式的异同，以及政治如何影响各个家庭的生活方式与家庭关系。

受过高等教育的叶氏兄弟是共产党统战的对象，代表了政府要吸收到新政权里的都市精英与专家阶层。为了恢复城市经济，共产党寻求“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而许多工商业资本家，为了试探共产党的诚意并得到“民族资本家”的称号，也准备留下来为新政权工作。1949 年春天党的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在天津召见工商界人士，向他们宣布党的工商政策，叶家的长子笃仁（刚候）作为一位留在天津的银行家参加了这次会见。刘少奇的目的是要说服工商界人士将他们的资本留在中国，帮助恢复城市经济。这些工商人士抱怨说，尽管他们拿钱办厂，养活了一大批工人，但是仍被当作“剥削者”对待。刘少奇并未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建立在对工人的剥削之上，但是他也承认资本家的“剥削有功”，“为国家制造了产品，壮大了工人队伍”（这句话让刘少奇在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批判），答应并且允许私人企业保持自己的利润，并且利用利润再行投资。[3] 刘少奇的讲话给叶笃仁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他妻子的富人朋友讨论去香港时，叶笃仁力劝他们留下和共产党一起共事。[4]

叶家兄弟中，曾在美国受教育的叶笃正回国是共产党吸引爱国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加入新中国建设队伍的最有力例证。 叶笃正在芝加哥大学师从世界气象学权威卡尔·G·罗西（Carl G. Rossy），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放弃了美国一份报酬相当高的工作，回到时局不定的中国。在归国途中，冷战局势在朝鲜半岛已大大升温。叶笃正和他的妻子冯慧回国所乘的轮船上尽是年轻的中国人。和他们一样，这些人返回祖国并不是为了共产主义，驱使他们回国的动力，是爱国热情和报效祖国、让中国

再次强大的愿望。这批归国学生在香港罗湖口岸入境时像英雄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面对政府组织的敲锣打鼓的人群，叶笃正热泪盈眶。

归国不久，叶笃正夫妇乘火车来到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的设施完善后，研究所迁至首都。叶笃正对新中国气象预报事业的建立作了奠基工作，对于以农业为主、饱受洪水与干旱困扰的中国来说，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事业。不久，叶笃正就升为研究员，并成为新建立的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领导人之一。[5]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叶氏兄弟正逢年富力强。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长子叶笃仁正好四十岁，留在四川从事文艺工作的叶家最小的孩子——笃慎（利中）刚刚二十五岁。其他的兄弟都是三十岁左右，热切地盼望参加工作。叶笃正、叶笃义是兄弟中完成大学教育的仅有的两人。笃义于1934年毕业于受到美方支持的燕京大学政治学系，战时和战后在民盟都非常活跃。民盟是由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日益感到不满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6]当叶笃义在政治上转向左倾，他与共产党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的接触越来越深。1949年9月，他被提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候补代表。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正是它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政协还通过了《建国纲领》，在建国初期具有宪法性质，赋予新政权革命性之外的合法权威。虽然叶笃义对他的候补代表身份不满，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目睹了新政府的建立。他向负责统战工作的李维汉抱怨了“候补”一事，李维汉对他说，“候补”和“正式”代表之差只在于表决权，表决仅是一个“形式”，“而会议的主要事项是事前的协商和反复讨论”，党在事先就对所有重要事项做了决定。这是新政权给叶笃义上的第一堂政治课。[7]

由于叶笃义的政治学学位和他在民盟的地位，他进入了成立不久的政务院政法委员会担任委员。由政治局委员董必武任主任的政法委员会，负责监管国内立法、司法，在稳定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8]叶笃义工作努力，是政法委员会里唯一的专职工作人员（其余均为兼职），不久就被任命为副秘书长。后来他受命于司法部，在高级地段分到一套老式庭院式住宅，有稳定的收入和舒适的工作条件。他还是民盟领袖，建国后人民共和国确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后，允许民盟继

续存在。和其他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他被共产党招收到新政权的工作中，与其建立了一种不简单的合作关系。[9] 这个群体对早期的人民共和国相当重要，新政府的二十四个部长中，有十一名来自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也包括无党派的“民主人士”。[10]

叶家的第五个儿子叶笃庄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业，在民盟中也相当活跃，但并不像三哥叶笃义那样在民盟中央担任职务。1949 年共产党包围北平时，他在北平西郊的华北农事试验场工作，曾积极劝说场内研究人员留下为新政府工作。他在农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政治上的进步倾向曾经使他抱有在新政府得到一官半职的想法——或许成为试验场的领导，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他的思想过于独立、性格放任不羁。抗战期间，叶笃庄曾短暂地加入过八路军，用日语审问过战俘，但军队的严酷生活和政治纪律让他感到厌烦，后因伤转到后方。1949 年，他对共产党派到场里的领导盛气凌人的态度颇为不满。在新领导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新领导身穿灰色军装在台上来回踱步，大皮鞋踩得地板咔咔响，讲话时语气强硬，目光从不与台下的听众接触。他讲话的意思只有一个：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底下一群农学家觉得他好像是对犯人训话。即便如此，叶笃庄在公开场合仍以共产党尊重知识分子、礼贤下士为理由说服场内高级研究人员留下，他对新政权一直抱支持的态度。1951 年春，他和民盟其他的领导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书面谈话，坚决支持新政府发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并赞扬这一条例的“威力”。[11]

尽管叶笃庄认为在新成立的华北农业研究所任编译委员会主任对他来说有些屈才，他还是编译了一份通讯和一份期刊。在“一切向苏联学习”的政策下，这两份刊物以编译刊登苏联农业科学的文章为主。当时重点学习的是苏联农民科学家米丘林（Ivan Michurin）的遗传学说，他的学说得到了受斯大林欣赏的科学家李森科 (Trofim Lysenko) 的支持。米丘林主张“获得性状”可以不受基因影响而得以遗传（今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虽然大力宣扬苏联农业科学的“先进发现”并没有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叶笃庄仍全力投入到米丘林著作英文版本的翻译工作中去，并一度感到新鲜和兴奋。 翻译出版后，《人民日报》曾发表报道，称赞这一翻译成果是“中国人民科学界的一个巨大的贡献”，强调

“我们不能坐待大自然的恩赐，我们应当向大自然争取”。[12] 毫无疑问，正是米丘林和李森科这种乐观的改造自然的思想，吸引了当时的农业工作者们。

战后叶笃义回到天津时，曾劝说他的大哥叶笃仁加入民盟。按理，叶家兄弟中，叶笃仁的地位在共产党政权之下所受的威胁最大。他住在天津租界，房子是曾经做过民国大总统的岳父徐世昌留给他和他太太的。[13] 兄弟之中，他最有钱。日据时期他留在了沦陷区，因而也极易被指控为与日伪有关系。但是叶笃仁处世极为谨慎，不露锋芒，像与天津之前的其他政权合作一样成功地与共产党展开合作。他从四十年代开始把大部分家产换成现金。建国初期，他辞去银行的工作，并在天津市的民盟支部谋到一份带薪职务。运动来时，他永远是站在党的一边。平日生活里，他常常教育儿女要生活俭朴、不要张扬。他的女儿曾经想要一块像朋友那样的外国手表，而他买给女儿的却是普通的国产表。他的生活准则相当奏效：和他的弟弟们相比，他家的生活相对平淡，没有大的成就也没有过多的损失。[14]

叶家的第四个儿子叶笃信曾在天津以买卖股票为生。1950 年以后，他在一所夜校教过一段时间的书，后以肺结核感染为由辞去工作，在家闲居。他的妻子性格外向，在街道委员会十分活跃，打扫街道卫生，维持邻里秩序，参加政府的宣传工作，给不识字的妇女义务读报（她很擅长把沉闷的官方材料转化为轻松的故事娱乐听众），还当上了人民协调员。她工作成绩突出，群众基础好，甚至敢于揭发小官僚滥用职权。和其他的街道干部不同，她不是个“包打听”，因而受到邻里的喜爱。夫妇俩没有孩子，公私合营以后，叶笃信每月固定的银行利息收入足以维持他们简单的生活。[15]

战时留在大后方的叶笃慎是叶家最小的儿子。他从小不喜欢念书，战时还没有成年，就违背天津大哥的意愿，执意下海学艺。[16] 对于叶家来说，作为精英家庭的后裔以娱乐事业为生可谓辱没门风。但六岁就失去父教的笃慎，已经反抗成性，他不顾家人阻拦，义无反顾地在天津拜师学了相声。抗战期间，他到了大后方，开始在一些茶馆里说相声，并在重庆扎下了根。1949 年年终，国民党军队前脚刚撤离，共产党军队便

紧跟着进入了重庆。对于叶笃慎来说，新中国结束了旧社会歧视曲艺演员的时代，不到一年，他就加入了大众艺术剧团，成了带薪演员。他学会了革命歌曲和新段子，并以他一贯的热情参加演出。他迈进新社会的步伐顺利通畅，并在 1957 年结了婚。对于被大哥赶出家门一事他一直耿耿于怀，却又心怀愧疚，没有跟家人联系。直到八十年代才借到北京巡回演出的机会，到京津两地见到了他断绝音信四十年的哥哥们。[17]

相比之下，1949 年给叶家第六个儿子叶方（叶笃廉）和第九个儿子方实（叶笃成）带来的变化最小。他们参加革命多年，对他们来说 1949 年只是进入了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叶方抗战期间加入了新四军，1945 年被派到东北新解放区做县长。最初一段时间，县里的工作以打土匪为主；省党校成立以后，他马上被调到党校任副校长。叶方 1933 年由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积极参加了 1935 年北平左翼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内极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1949 年 440 万党员中，只有四万名左右大学生，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18] 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叶方头脑清醒、举止谨慎的知识分子性格，让他十分适合做党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1948 年，共产党夺取沈阳后，叶方被调去参加筹建东北地区党校，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 1955 年。[19]

和六哥同时在北平念大学的九弟方实，也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到了山西的抗日根据地。战争期间，他和一位年轻的女同志白天结了婚，经历了战时岁月的千难万苦。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陕北冬天冰冷的窑洞里，当时正值日军再次突袭，白天产后高烧，昏迷不醒，孩子给活活饿死了，妻子的腿也在这次磨难中永久致残。延安整风期间，方实因受怀疑被关押了整整两年。直到释放后分配到新华社，他的才智才得以发挥。内战期间，他跟随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西柏坡新华社的“小编辑部”负责编写战报，并在 1949 年春天跟随党中央进驻北平。那时新华通讯社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社址，直到八月才决定将新华通讯社安在当时的法商学院，而这所大学正是方实在抗战开始时离开的母校。建国初期，方实负责国内部，参加了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报道工作，因而对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和领导层的变化有所了解。在一次报道活动中，他遇到了他在北平参加学生运动时的一位老

同学，此人当时已经是省级干部。热情寒暄之后，这位老同学发现方实既不是政协的会议代表，也不是高官，只不过是新华社派来采访会议的一个普通记者。他的面色一下子冷淡下去，转身寻找其他谈话对象。方实在西柏坡编辑稿件时，与中央领导包括周恩来、刘少奇、甚至是毛泽东都打过交道，这种上下级的轻松关系已成过去。等级、级别、官架子在新中国找到了滋生的土壤。

1949 年后幸存下来的叶家三姐妹中，只有三姐叶笃雅住在北京，她那里成了亲戚们保持联系的中心。她的丈夫曾在国民党政府的税务局工作，积攒了足够的钱给家里买房。战后，为了讨好上司，他出入妓院而且染上了毒瘾。三姐对丈夫的放荡行为感到十分痛苦，曾一度试图自杀。1949 年以后，她的丈夫躲过了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并参加了街道工厂的工作，但是最终因不堪的过去和过分自由的言论被捕，并于 1960 年死在监狱。此时三姐已经参加了街道工作，致力于维护街道的安全、清洁和政治秩序。她把三个儿子抚养成人，全都进了大学，这成为她不幸生活里的最大安慰。

抗战期间和丈夫一起逃难到云南的四姐叶笃颂，和三姐的生活经历有着不幸的相似。笃颂的丈夫是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对婚姻毫无忠诚。在云南的时候他曾把婚外恋对象带回家住，这种重婚生活造成了痛苦的家庭矛盾，直到外室离开。叶笃颂有三个孩子，两个成了颇有成就的工程师，其中一个后来做了高官。第五个女儿、也是最小的女儿叶笃柔住在上海，她和丈夫姚增虞自由恋爱，并在抗战期间结婚。姚增虞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视察，1949 年去了香港。由于叶笃柔丢不下抱恙住在天津的母亲，坚决拒绝离开大陆，姚增虞最终放弃了国民党许诺给他的台湾工作机会，回到上海。叶笃柔是叶家姐妹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解放后一直在上海担任中学的生物教师；她的丈夫因为担忧自己的过去可能会招致政治攻击，一直在家以翻译为生。[20] 这两姐妹和北京的兄弟相隔甚远，与其他家庭成员也甚少来往，关于她们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

除了没有子嗣、也没有正式工作的四子叶笃信，叶家所有的儿子都在新中国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归属，包括科学（七子叶笃正、五子叶笃庄）、

文艺（十二子叶笃慎）、政府（三子叶笃义）、共产党（六子叶方）、民盟（长子叶笃仁）、技术刊物编辑（五子叶笃庄）、新闻机构记者（九子方实）。他们都在供养自己的家人，此时的家庭组织方式和他们儿时的成长环境已截然不同。旧式“封建”大家庭里妻妾、仆人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时代已经过去；女儿们从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儿子们在家念私塾的生活和教育方式也成了陈年往事。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顶多加上活着的父母）长久以来一直是农民或小商人生活的标准模式，现在也普遍在精英家庭中流行起来。

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区分叶家八个兄弟的特征在新中国仍然继续着。三个年长的兄弟都是包办婚姻，他们在抗战前结婚的年龄在 22 或 23 岁之间，和传统中国男性的一般情况非常接近。从老五开始，婚姻都是自己选择，结婚的时间都是在抗战期间或抗战以后，结婚的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21] 两个兄长的七个子女，除去一人之外，都出生在抗战前或抗战期间，而其余五个弟弟的 18 个子女，除去两人之外，都是抗战以后出生的。如果考虑到老六叶方 1946 年就去了东北解放区的话，那么 18 个孩子之中有 15 个出生在新政权建立之后。他们的出生体现了新政权的和平与秩序带来的人口膨胀。

我们对五个弟弟的家庭生活最感兴趣，因为他们提供了新中国初期家庭抚养子女的新类型。当然这几个家庭并不完全相似。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老六叶方的大家庭。他是省里的高干，之所以说他们家特别，部分原因在于其规模之大。五十年代初共产党的政策明显鼓励生育，政府追随苏联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造成中国贫困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及阶级压迫。当时党和政府鼓励多生育，宣扬“英雄母亲”。叶笃信的妻子和三姐叶笃雅做街道工作，她们工作的职能之一就是鼓励年轻夫妇多生孩子。[22] 叶方与妻子显然听从了党的指令。他们共有八个孩子，其中六个是在他们搬到东北以后的前十年出生的。 国家不但给他们提供了宽敞的和式住宅，孩子从出生到两岁入读托儿所之前都有保姆和单独的卧室。

叶方家住在省委大院里。每个省都有这样的省委大院，高墙围绕，墙头往往配有铁丝或玻璃渣，大门还有警卫站岗。大院很大，树木成林，

有足够的空间让孩子们玩耍。孩子们的幼儿园就在大院里。幼儿园宿舍每个房间大概十张床，周一到周六孩子就住在幼儿园，只有周日回家，全家吃一顿热闹的午饭。因为孩子在家的时间极少，他们都认为小时候家庭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孩子们个性不一，假期更愿意和同学而不是兄弟姐妹呆在一起。这个群体的精英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男孩子在游戏中常常要当将军、部长和党委书记，显然和父辈的职务有关。

幼儿园里孩子们学习了许多革命歌曲和舞蹈。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的歌曲是当时普遍的教材。回到家里，叶方也常常教育孩子听党的话，培养革命精神，长大后为党和国家作贡献。幼儿园毕业以后，孩子们一律送到了育才小学，这个小学曾一度由东北地区党的重要领导人高岗的妻子负责。学校有不少东北高干子女，为了教育好革命先锋队的下一代，配备了一流的师资和设备。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学校的伙食仍然不错。 当时很多人只能吃玉米糊，但学校每顿饭除了馒头、面条以外，几乎顿顿有菜，每星期还有几次肉。那段时间，学校的伙食比家里还好。周末放假，校外总是停着一溜接孩子回家的、由单位派来的黑色小轿车。叶方家住得离学校很近，周末孩子们都自己走回家。

五十年代初期，单位沿袭革命时期创立的供给制，不发工资，但是提供住房、食物、衣服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每年过年都有两套新衣，孩子们的衣服是幼儿园发的。衣服都是一种颜色的简单样式，冬天是棉袄和棉裤，夏天是背心和裤衩。小孩子经常穿哥哥和姐姐留下的旧衣服。到 60 年代有球鞋之前，孩子穿的还是母亲和保姆做的布鞋。

每年春节是一年一度的节庆时刻。单位和学校都放一个星期的长假。节前，机关就会送来各种食品，特别是鱼和肉，像叶方这样的大家庭，有时会分到半头猪。因为没有冰箱（除非在北方的冬天），这些配给一般很快吃完。节日期间有免费的娱乐活动，通常是来自苏联集团的配音电影或国产革命电影。每年夏天，叶方都有机会去大连附近靠海的省委疗养院休养。因为地方小，每次他去总是带一两个最小的孩子，让妻子留在家里照顾其他孩子。一个小儿子追忆起美好的假期往事时，仍记得能吃上白面包的优待。上中学的孩子到了暑假一般去学校组织的夏令营，

吃、住、行，全是安排好了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常常会有依赖心理。叶方的一个儿子就曾经羞愧地回忆道，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坐公共汽车竟然不知道如何买票。

这个拥有特权的共产党干部家庭里充满了一种不寻常的、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精神。一方面，家里宽敞的住房、保姆、好学校以及各种供应，让孩子享受了与常人不同的特殊生活方式。他们的朋友都是干部子弟，这些孩子长大想要干的也是和他们父辈一样的党、政、军工作。在这个新的干部阶层里，享有特权被看成是理所应当的。另一方面，他们的父亲（以及学校老师）常常用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历史来教育他们，向他们灌输努力工作，生活俭朴等生活信条。这不能不是一个矛盾。因此，当一个女儿让保姆来洗她从学校带回来的脏衣服时，女儿挨了骂，被教育衣服得自己洗。叶方对自己子女的要求可能比其他干部严格，偶尔才用公家的车送孩子们看电影，有时宁愿让免费电影票或戏票作废（一个儿子回忆到，他曾经惊讶地在废纸篓里发现了两张戏票），并严格禁止孩子们看内部流通的敏感出版物，比如其他干部子女经常看的刊登了外刊新闻节选的《参考消息》。[23]

和叶方的家庭相比，住在北京的老五叶笃庄一家过着明显不同的生活，而他家的生活方式和北京其他兄弟较为相近。对叶笃庄和他在日本女子美术学校毕业的妻子孙竦来说，家庭生活和孩子要重要得多。把孩子送到公家的寄宿学校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想像的。他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想到婚后要在北京城外的西山买一个农场。叶笃庄可以作他的农业试验，孙竦可以一边养孩子，一边画画和（在她浪漫的想像中）养马。孙竦的梦想虽然在革命后没有实现，但是婚后能够从城里搬到西郊的农业研究所，孙竦仍然十分高兴。笃庄于 1948 年加入的华北农业研究所后来成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那儿有大片的土地，果园，花圃和暖房。孙竦喜欢新鲜空气和大自然，这里是她抚养孩子的理想环境。女儿小的时候，她常常在周末带她们出去野餐，让孩子把上衣脱了，光着膀子在玉米地里走路、晒太阳。

他们住的地方是日本人在战时盖的两层公寓，相连的几栋楼房共有 20 户人家。他们住在一楼，有厨房、厕所、一间客厅兼书房，一间卧室，

还有一个铺了日式榻榻米的房间，（为了满足孙竦的日式趣味花了不少钱铺设），是保姆睡觉和孩子嬉戏的地方。五十年代初，孙竦为了两个女儿和家庭，推却了到城里中央戏剧学院教书的机会，留在了西郊。很快她又重新燃起了职业热情，然而当时她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在丈夫的编辑委员会里给农业杂志免费画插图。叶笃庄仍然想要个男孩，但孙竦不愿意。孙竦在第三次怀孕时曾经要去做人工流产，但是五十年代初做人工流产要经过部一级的上级领导批准，一来二去，第三个女儿又出生了。

叶笃庄靠薪水和稿费再加上孙竦的工资（1954 年她去北京电影学校教书），家人生活舒适。房租极少，从叶笃庄的工资中扣除。据孙竦 1955 年的家庭日记，叶笃庄的月工资是 144 元，稿费 108 元。其中 20 元用于保姆工资，15 元寄给天津的母亲，12 元还欠款。以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月为例：上班和教育开支占收入的 21%，包括买书 16.4 元，交通 28 元；食物支出最大，为 81.63 元，占收入的 35%，剩下的用于衣物、暖气、玩具，以及奢侈品消费 3.8 元：香烟。[24] 因此这家人的生活习惯非常健康，桌上经常有鱼、肉，甚至虾。孙竦坚持健康和有营养的饮食，每天早饭是一成不变的牛奶，鸡蛋，和抹了黄油、果酱的烤馒头片。女儿对此早生厌烦。有一次老二没有吃早饭就偷偷上学去了，结果她的午饭里多了一个鸡蛋。孩子们定期去一个新来的小儿专科牙医处看牙，老二还作了牙齿矫正，这在当时非常少见。女儿们穿的花衣服都是母亲设计、裁缝定做的。书籍是家庭生活里一个重要的部分，笃庄给女儿买了不少书，家里成了整个大院子的图书馆。

大女儿一直是学校的三好学生。因为父母是知识分子，家里有很多书，学习成绩优秀。为了支持女儿的学校（就在农业研究所的院子里），叶笃庄将自己的稿费捐给学校，女儿因此得到了老师的欢心。二女儿上小学时，曾代表新生作入学发言，为此母亲专门给她做了一条白色的百褶裙。

孩子们对这段时间的回忆均很愉快。周末或假期，父亲会带女儿们去逛附近的公园，动物园，或者新建的苏联工业展览馆。女儿们跟父亲到城里听评书，逛书店，或是跟母亲一起看电影。女儿们记忆犹新的一次放映是范朋克 (Douglas Fairbanks)1924 年的经典电影《巴格达窃贼》

(*The Thief of Baghdad*)，电影中的飞毯、魔绳与苏联间谍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遇上特别的日子，比如生日，父母会带孩子去苏联展览馆附近一间宽敞的莫斯科餐厅品尝不总是美味但充满异国情调的俄国菜。笃庄有足够的钱买玩具——积木、拼图、红色消防车——还教女儿集邮和下棋。女儿们长大一点后，夏天就在院子里的游泳池游泳，二女儿后来成了游泳好手，歌喉出色的大女儿则参加了少年之家的合唱团。[25]

住在北京的其他几个兄弟——司法部的笃义、科学院的笃正、新华社的方实，尽管他们都住在市区、他们的妻子也没有孙竦那样的对田园的浪漫向往，但他们的生活都和叶笃庄相似。叶笃正和方实也都有三个孩子，笃正的两个小的和方实的两个大孩子，年龄与笃庄的女儿们相近，几家的孩子在大人见面时总是一起玩耍。作为党员，方实在教育孩子方面和叶方虽不尽相同，但有相似之处。因为他和妻子常常为发新闻稿上夜班，把孩子放在幼儿园让他们省了不少心。他希望孩子长大有正确的社会主义人生观，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和同学搞好关系。相比之下，叶笃义和叶笃庄的孩子从父母那里接触到了许多西方文化。有西式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叶笃义喜爱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每到傍晚或周末，他就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讲《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和《双城记》。叶笃庄的妻子则经常和孩子们一起看她从日本带回来的画册，让她们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和现代主义画家。在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的家里，科学则是最重要的。他的一个侄子曾经回忆起，笃正家里的一块黑板上写着“宇宙是无穷的”这样让他大惑不解的真理。虽然这几个家庭在文化倾向和价值观上相当不同，但是他们家庭生活舒适，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并都希望他们长大后为新中国作贡献。[26]

在新政权下，叶家兄弟姐妹在处理家庭关系时不得不持谨慎态度。他们一起在天津长大，大部分在南开读过书；小一点的几个孩子在读书期间都曾经积极投身政治。卢沟桥事件后，叶家兄妹天各一方，难得碰面。他们在漫长的战争岁月当中一直保持通信并偶尔见面。新中国建立之后，陆续回到北京后的弟兄姐妹们重新联系起来了。然而共产党对过分重视家庭观念的党员干部特别注意，因此叶家的党员在处理家庭联系方面尤其谨慎。方实 1937 年离开北平参加革命时，曾经把自己的一份

遗产交给三姐叶笃雅托管。他们之间偶有通信，战后延安和内地的邮路稍微畅通以后，笃雅曾经给方实寄过牙膏之类的生活紧缺必需品。但1949年方实回到北京后，等了几个月才去看他的姐姐。为了节省时间，他叫了一辆三轮车，结果回来后受到批评，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1950年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第一个孩子在陕北饿死），他的妻子没有奶。由于当时是供给制度，没有现金给孩子买奶粉。方实的姐姐得知后，马上从那笔遗产里给了他3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不小的现款。他的一个同事得知此事后，批评他使用剥削来的钱，把资产阶级的腐朽观念带进党内。为此，方实不但作了深刻检讨和自我批评，还把剩下的钱都交了党费，才算完事。[27]

随着时间推移和家庭成员的增长，兄弟之间的来往逐渐增多，很多时候带着妻小互相串门。没有政治运动的时候，这种交往轻松愉快，特别是孩子们可以在一起玩。但是由于方实在新华社工作，叶笃义在司法部工作，因此许多敏感的话题他们都不能谈。家庭聚会上有一些话题（特别是政治话题）必须小心翼翼地绕过，尽管这些问题常常是大家最关心的。

如果说兄弟关系时而很复杂，新中国早期的性别关系及其对夫妻生活的影响甚至更为复杂。党和政府的官方宣传是要把妇女从封建家长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批评重男轻女，提倡男女平等。但是共产党的机构以男性为主，大部分成员都是来自思想相对保守的农村，讲究性别平等的妇女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要让位于社会主义建设。[28]因此，建国初期的性别关系比较复杂，引发冲突与家庭不和的潜力很大。

叶家的媳妇都受过程度不一的教育，其中不少参加了革命，她们期望也相信能在新社会发挥作用。但是在权力和就业方面的男性主导常常使她们感到非常失望。当她们的丈夫（为了不被批评为搞裙带关系或者腐败）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帮助她们找到一份又顾家、又合适的工作时，婚姻生活出现矛盾就无法避免了。[29]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困难随着时间流逝得到了克服。例如，方实的妻子白天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方实还早，战时一直在根据地工作，1940、1941年相交的那个冬天在窑洞里的第一次怀孕和生产导致她终身残疾。1949年进城以后，因生产而致残的腿已

经恢复到可以走路了，但是没有给她分配任何工作，白天觉得丈夫拖了她的后腿。 这时在沈阳的朋友给她在当地的橡胶厂找了一份工作，她立即离开北京搬到了沈阳。这次追求独立的行动不久之后就有了结果。方实到沈阳把她接回北京，并在他工作的新华社编辑部给她找了一份工作，家庭的矛盾解决了，之后夫妻二人一直生活美满。[30]

叶笃庄和孙竦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孙竦希望和孩子呆在家里。但她很快就不耐烦了，特别是叶笃庄晚上常常开会，很晚才回家。孙竦对此非常不满。同时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们的夫妻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孙竦在叶笃庄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堆情书，是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女研究员写给他的。虽然叶笃庄向妻子声言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暧昧关系，但最终是叶笃庄为妻子在他主持的编委会里找了一份绘制插图的工作，事情才得到了解决。虽然她的薪水很低，但是在三反运动里，叶笃庄还是为此受到批评，当孙竦听到别人叫她“老板娘”时，简直怒不可遏。所幸她很快就在成立不久的北京电影学校动画系找到了教书的工作，比起给农业杂志画插图，教书的工作使她在日本接受的艺术教育得到了专业认可。[31] 叶笃正的妻子有美国的生物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很快就在科学院找到了和她专业相符的工作。他们的婚姻从未受到过工作问题的干扰。

这三个兄弟的妻子在新中国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类似家庭的职业妇女大都有机会找到工作，虽然她们的工作地位和丈夫相比要低得多。尽管女性要负责大部分的家务，但家里有保姆，从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到照顾孩子都帮了不少忙。院子里的全日制学校和校外活动、大院的各种设施包括小卖部等等，都在极大程度上帮助了父母，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无需担心孩子的安全。和上一代相比，父亲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参与程度也大得多。

建国初期，叶家几兄弟间属在司法部任职的叶笃义和在东北党校工作的叶方政治上最为成功，但恐怕部分出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婚姻中出现的问题也最大。叶方的妻子林莺是一个年轻、活泼、性格外向的演员，他们在新四军相识，在一起去东北新解放区的路上结了婚，她旋即便接二连三地怀上了孩子。虽然婚后她非常想重操旧业出去演戏，但不得不把孩子们的人身安全放在首位考虑。1950 年秋天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

她便逃往哈尔滨生下了第四个孩子。林莺坚持说她这一行动是得到组织部允许的，但是组织部对此断然否定，并指责林莺在美军威胁轰炸沈阳时临阵逃脱，动摇了军心，1951 年将她开除出党。她带着这个不公正的伤疤活了一辈子，不断向每一个愿意（和许多不愿意）聆听的人诉说自己是衷心为党工作的好党员，被开除出党实属冤枉。

后来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清白，无论找到什么工作她都去做了。开始是在幼儿园当阿姨，后来做资料员。但是她仍然不服“开除党籍”的处理，似乎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党纪处理，并埋怨叶方不能帮助她洗清罪名。作为演员，她的表演才能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发展。工作上的不顺使她在家里越显霸道。对于她无休止的抱怨，叶方只有以沉默来回答。尽管双方关系紧张，孩子还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生，这个大家庭也是天津奶奶最爱住的地方，因为人多、热闹。夫妻俩的拌嘴对她而言不是问题，老人家和党组织抱有相同的信念，认为大家庭是好事。[32]

兄弟当中，叶笃义的婚姻最为不幸，虽然家庭不和的原因和叶方完全不同。叶笃义包办的妻子来自天津的一户有钱人家，抗战期间她一直用自己的嫁妆来养活叶笃义和孩子们。那时叶笃义在重庆忙民盟的工作，留在北平的孩子们和太太生活相当困苦。四十年代中，年长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妻子给叶笃义写了一封信，询问孩子是否应该上学。那时叶笃义没有多余的钱寄给家里，于是回信说：“你的问题就像是问一个乞丐他想不想吃饭…… 如果你能支持孩子们上学，我会一辈子感激你。”他的太太把孩子们送入当地的学校，同时也把信保存起来让他记住他欠的债。1949 年以后，叶笃义认为他的妻子应该和其她同等身份的女性一样出去工作。虽然没有受过现代教育，但她的古文优秀，诗词写得漂亮。笃义认为她能当个不错的老师，并帮她找工作。她出去当过一段时间的夜校校长，工作成绩突出。但是不久就辞了工作。她的理由是战时她养家多年，现在该叶笃义养着她了。

退职回家后，她留在家里当了家庭妇女。叶笃义的工作晚上常常有应酬，包括五十年代初流行的舞会。笃义认为不能不去；然而妻子成长于一个保守的官僚家庭，不习惯这些摩登事物，拒绝参加舞会。但是她又担心丈夫在舞会上和别的女人跳舞，于是每次舞会，她都派大女儿代

替她去监察情况，回来后向她汇报。有时捕风捉影地听到什么，就要整夜地盘问叶笃义，使他本来就有的失眠症越来越坏，最后不得不搬到机关去住，在食堂吃饭。他的妻子越感到无助与沮丧，曾经三次吃药企图自杀。多年后她被送进精神病院，医院大量的用药使她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前她是个活跃、爱交际的人，出院后变得安静、经常情绪低落，而且异常节省。家庭生活平静了，但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和后来相比，建国初期的政治形势相对平静，但仍发生了一些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运动。对于民盟领导叶笃义来说，所有这些经验都是他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五十年代初，他曾经带领政协的一个视察小组去苏北检查灾情，随后又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在广东视察土改运动。[33] 这是叶笃义有生以来第一次下到农村，第一次看到了广泛实行地主所有制的地区农民生活是如何的困苦。同时，农民被动员起来斗争地主、反抗压迫的凶暴和残酷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地主被逼自杀。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位年轻的积极分子殴打自己有地主成份的父亲，这让他很是痛心。他知道使用暴力是违犯党的土改政策的，他的视察小组应该如实向中央汇报。但他也相当清楚，任何反对暴力的建议都会被说成是包庇地主阶级，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土改视察经验让他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运动可以非常残酷无情。[34]

回到北京后，共产党控制民主党派领袖的手段让他体会到了党的另一面。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 1949 年底，建国不久后民盟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批判罗隆基的“亲美观点”。叶笃义虽然没有被点名，但也是批判的对象，因此半途脱会，以有病为由，不想再干了。数天之后，周恩来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访苏之前，召见了叶笃义与其他一些受西方教育的民盟领导。共产党担忧这些人可能会反对与苏联结盟。会开了一个通宵。周恩来在会上说：“你们的团结问题解决不了，我出国都不放心。”周恩来这样备受尊敬的领导亲自出面呼吁，感人肺腑的发言起了极大的效应。叶笃义第一次公开作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中途脱会的行为。散会时总理称赞了叶笃义的发言，给了笃义极大的鼓励。[35]

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冷战期间必须表态他们站在正确的一边，这使他们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叶笃义看到民盟的领导一次次站错了

队。一次是一位民盟领导人公开揭露战后苏联军队在东北的违纪行为（见何凯思 [Christian A. Hess] 所著第七章）；一次是在朝鲜战争后，另一位领导要求毛泽东放弃亲苏外交“一边倒”的政策。叶笃义看到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共产党的眼里渐渐失宠，为此，他谨慎地紧跟党的路线。一九五一年民盟发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九十年如一日”的侵华野心，并认为美国的侵华战略是“循着日寇侵略的路线”，叶笃义的名字也列在这份刊登于《人民日报》的声明上。[36]

其时，九弟方实在新华社负责有关朝鲜战役的报道，说明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路线。1952 年的一则逸闻颇为有趣：新华社派他去朝鲜做有关细菌战的报道，指出美国向中国军队空投带有淋巴腺鼠疫的老鼠。虽然后来的研究证明这一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但是美国战后包庇日本 731 部队，而该部队战时曾对中国俘虏做过细菌实验，因此当时许多人出来为这一指控佐证。[37] 新华社发布了不少关于这项指控的报道，包括农民发现异常昆虫、农学家的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找到菌种。1952 年方实带领中朝记者代表团由丹东去朝鲜战俘营，采访两名承认投放过细菌弹的美国空军俘虏。代表团由专家和记者组成，在方实的带领下乘火车出发到东北，夜间再转乘卡车跨越朝鲜边境，抵达战俘营。在六天的采访中，他们发现这两名美国军人态度友好，愿意合作。方实并不记得这两个美国兵承认他们投放细菌弹，但新华社报道他们承认在低空投放了细菌弹，向美国军方的正式报告是投了“哑弹”。他们大概知道证词中有一个致命缺陷：中国官方正式报道的细菌袭击战开始在 1952 年 1 月 28 日，而这两名美国空军 1 月 13 号就已经被打下来。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方实的队伍就这次采访发表了长篇报道，并就访问过程摄制了新闻纪录片。记者代表团没有到飞机失事的地点参观，也没有做过实物化验（虽然中国科学家作过化验），但是人们坚定地相信美国使用了细菌战，这些报道被当作美军在朝鲜所犯的罪证之一。[38]

1955 年方实表现出色，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这往往是党员干部升迁的前兆。学习课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系统训练：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和国内外形势。学习期满，方实回到新华社北京总部

担任了国内部副主任。这时供给制取消了，开始发工资，他的级别为24级中的第11级（十三级已经是高级干部了），最高级一般留给高级领导人，部长也只不过是第8级，因此方实的级别算是相当高了，每月工资多达195元。[39]

叶家兄弟里，最不符合新中国政治生活中要求的“顺从、听党的话”的要数老五叶笃庄。他的经历为研究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如何利用可怕的逻辑陷害无辜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政治改造运动过程一开始相当简单（起码表面上如此）。1950–1951年的“忠诚老实运动”开始时，同事们组成学习小组，每人都要交待自己的历史背景，帮助彼此克服家庭出身问题，以便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叶笃庄坦白了他全部的生活历史：从儿时在天津家里念私塾开始到进入南开中学、赴日本留学、抗战加入八路军、后被民盟派到国民党工作、在美军工作、以及和美国新闻记者四十年代末在北平的交往。人们很自然地询问起他和美国人的关系，不过战时他在美国新闻处工作，当时美国是盟军；内战期间他的美国朋友也都是进步的左倾人士，同情革命。毫无疑问，在叶笃庄看来，他在四十年代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打倒日本、打倒国民党，为建立一个强大、进步和民主的中国作贡献。然而他的档案招致严厉的审查，特别是他和美国人的关系。审查的结论是“不虚心、清高、有优越感”。他自己也承认了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作怪。[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第一个大型政治运动就是为配合1950年10月中国加入朝鲜战争所发起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运动。[41] 叶笃庄丝毫没有犹豫就在民盟宣言上签了名，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威胁中国。[42] 无论他当年和美国进步的新闻记者有着怎样的友谊，都没有削弱他爱国的热情和本能。接下来是1952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次运动第一次影响了农业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工作。当时农业部派了一个代表来农研所主持运动，动员群众揭发批判领导。号召不见反响，于是他找到叶笃庄让他带头给领导提意见，因为叶笃庄说话直率在单位是有名的。叶笃庄给领导提了意见，说领导作风官僚，说话语气强硬，但是也表扬领导作风清廉、了解农业。农业部代表不满意叶笃庄不痛不痒的发言（叶笃庄认为这个代表觊觎那个领导的工作），就找了

编委会叶笃庄手下的一个人来批判叶笃庄的官僚主义。因为赌气，叶笃庄反驳说："你能查出来我的小官僚主义，但是绝对查不出来我贪污。"部里的代表认为叶笃庄是在向他挑战，回答说："好，我们就审查你的贪污问题。"他们先是发现编委会的会计有些账目不清，接着又发现了叶笃庄曾经给他的同事送过一套由编委会编译的《米丘林全集》。还有其它的小问题，包括一次有问题的工作餐，和一通打去上海的长途电话——叶笃庄谈完公事以后，让那位上海的同事给自己的女儿买些奶粉寄来。这么一来，这个长途电话就成了私人电话；再加上那顿说不清楚的午饭，叶笃庄挪用公款的总数为46.65元，到了"贪污犯罪的边缘"（当时规定的贪污标准是50元）。叶笃庄表示"从未把公家钱装进自己腰包"的话并未被当作有效辩驳。分不清私人和公家，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确切表现。发起批评的过程中，叶笃庄又犯了一个更大错误：为了躲避学习班，他把自己关在家看《儒林外史》，一部讽刺明代官场腐败、文人堕落的小说。最后他还是得低下头来，在农研所群众面前作了两次公开的自我批评，吞下了自己的"臭骄傲"，也开始"更加具体地认识到党和群众的巨大力量"。[43]

运动之后，叶笃庄继续回到编委会工作，但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明显的打击，工作热情也大大受到挫折。相反，他把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一个计划中：翻译达尔文著作。他每天翻译至深夜，第二天上班精神明显不如以前，他也清楚自己没有把编辑工作放在首位。达尔文著作翻译出版后，他拿到了几千元的稿费。对叶笃庄来说，如果工作环境一旦变得更糟糕，这笔稿费至少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家庭开支。

三年后1955年的肃反运动则更上一层楼，并且开始波及到知识分子。在农研所和其他文化教育机构，这场运动变成了反对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胡风曾经要求给予知识分子更多的写作自由，被打成反党反革命分子。运动很快扩大到整个知识分子界，要揪出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农研所也不例外，学习小组又成立了，叶笃庄开始和同事们一起学习反对胡风集团的文章。一开始，肃反运动并未波及到叶笃庄，他的名字还出现在《人民日报》登载的民盟成员反击胡风的文章里。[44]但是叶笃庄在"忠诚老实"运动中交代的和美国人的关系很快成了单位抓住不放的问题：裴

克 (Graham Peck) 是否为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过？这个机构不是美国的情报机关吗？叶笃庄难道没有向裴克提供过情报？他不是带了美国记者詹姆斯·柏克（James Burke）到根据地搜集情报吗？这不是帮助了美国情报机构刺探共产党内部情况吗？

对叶笃庄的审查进行了整整一个月。无论叶笃庄怎么解释，都不能消除单位对他的怀疑——既然曾经给美国人工作，那他肯定隐瞒谎报了一些事实，肯定不会完全承认。在一次会上，叶笃庄终于忍无可忍，大声叫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说完以后拂袖而去。和他谈话的人马上警告叶笃庄："你这是抗拒！"事情一下子变得严重了。共产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口号都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目的是要诱使所有受到审查的人坦白交待。结果是有人因为希望得到宽大处理，承认了没有犯过的罪行。

然而叶笃庄没有承认。审干委员会给他的结论是"历史问题，不予追究"。对此，叶笃庄不能接受。对他来说，"历史问题"是一个可以追究和处分的把柄，于是他向审干委员会询问他的历史问题到底是什么。审干委员会没有给他正面答复，只是把结论改成"一般性历史问题"。叶笃庄再次拒绝在结论上签字。他解释他去美国空军地面辅助部队（American Air Ground Aid Service）得到过共产党的肯定，而且抗战时美国是中国的盟国。他建议他的结论应该改成"一般性革命历史问题"。显然，单位不能同意。

最终事情挂了起来，他的"历史问题"并没有澄清。但是叶笃庄感到至少他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他坚决不承认他犯过任何"反革命罪行"。他的妻子孙竦对于他的固执和不理智非常担心，担心最后受罪的会是孩子。妻子对他说："你就是爱穿大红裙子（红裙子是正房太太穿的）。最后倒霉的准是你。孩子们还小，你就签名让他们满意吧！"叶笃庄还是不签。他的固执导致了人们早就警告过他的：你留下了一条随时可以被抓住的小辫子，等着下次运动吧！叶笃庄一家在建国初期曾经过得无比快乐和幸福，然而两年以后（1957–1958 年）反右运动发生的时候，政治的插足改变了一切。[45]

对于叶家兄弟来说，五十年代初是经过长期战乱后姗姗来迟的好时光。他们正值三十几岁、年富力强，现在终于建立了小家庭，生儿育女。他们有保姆帮忙照顾孩子，薪水足够让他们过上小康生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段充满快乐记忆的好时光。那几年核心家庭成为城市家庭的主导模式，虽然性别角色规范的混乱给一些婚姻关系带来紧张。各个家庭教育孩子的方法都不太一样，住在政府大院里的家庭可以更加依赖集体对孩子进行照顾和抚育。不过，政治已经开始渐渐涉足家庭生活，就像一团慢慢逼近的黑影，即将笼罩未来岁月。

姚昱译

注释

1 《叶氏族谱》，第六版，1944 年（未出版），卷 9–12。一本更完备地讲述叶氏家族历史的书为 Joseph W. Esherick, *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2 关于 20 世纪中国的核心家庭的研究，见 Susan L. Glosser, *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 1915–195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 William L. Parish and Martin King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131–138; 以及 Martin King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52–159。

3 Kenneth G. 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42–51; 及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八十回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 年，第 60–61 页。

4 2001 年采访叶筠。关于刘少奇在天津的研究，见 Lieberthal, 42–51。

5 1994 年 9 月与 1995 年 5 月采访叶笃正。

6 关于民盟的研究，见 Carsun Chang,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2); 及 Roger B. Jeans, ed., *Road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7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 61 页；关于政协会议的构成，见《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2 日。

8 关于这一委员会，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第 4 页。关于其成员，见《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22 日；关于其官员，见《人民日报》，1950 年 9 月 16 日。

9 叶笃义：《虽旧死其犹未悔》，第 69 页。

10 Frederick C. Teiwes,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77.

11 《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14 日。

12 《人民日报》，1951 年 10 月 13 日。

13 徐世昌是叶笃仁太太的伯父，也是养父。徐一生无子，在他的弟弟死后，收养了他弟弟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叶笃仁。

14 2001 年 8 月采访叶笃；1995 年 1 月采访叶笃义；叶笃庄手稿，1991 年，无标题，第 88–90 页。

15 叶笃庄手稿，1991 年，第 94–96 页。

16 关于相声的研究，见本书第 9 章林培瑞 (Perry Link) 的文章。

17 1995 年 2 月采访叶利中。见《一个相声演员的今与昔》，《人民政协报》1984 年 9 月 19 日。

18 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35, 49.

19 1995 年春采访叶方。

20 叶笃庄手稿，1991 年，第 107–116 页。

21 方实在抗战期间和女友结婚时是 23 岁。但他们第一个成活的孩子于 1950 年才出生，那时方实已经 33 岁了。

22 1995 年 2 月采访陈澄。

23 1995 年采访叶方；1997 年采访叶新新；1997 年采访叶林；2001 年 8 月采访叶宝；2001 年 8 月采访叶滨宾；2001 年 8 月采访叶阳阳。

24 孙竦日记（《美术日记》），1955 年，第 8–11、25–28、54、80 页。按照一些日记的纪录，这些款项按当时的货币单位以万元计——1940 年代通胀严重，一直持续到 1950 年代中期取消“万元”为止。

25 叶笃庄：《过眼云烟》，1992 年手稿，第 103–117 页；2002 年 7 月采访叶亮。

26 2001 年 9 月采访方实。

27 1995 年采访方实。

28 关于现代中国的妇女问题，见 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lisabeth Croll,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 Rhetoric, Experience, and Self-percep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Kay Ann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以及 Margery Wolf,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9 见 Jung Chang,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1), 138–159, 180–181, 197–201。

30 1995 年采访方实。

31 叶笃庄：《过眼云烟》，第 108–110 、112–113 页。

32 2001 年 8 月采访叶滨宾。林莺的回忆录充满了抱怨：《坎坷的道路》，北京：东方文化馆，无出版日期 [封面为 1994]。

33 《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15 日；《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18 日。

34 1995 年 1 月采访叶笃义。

35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 63–64 页。

36 同上，第 70–72 页；《人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12 日。

37 Seldon H. Harris,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关于这些指控的真实性，见 Katherine Weatherby, "Deceiving the Deceivers: Moscow, Beijing, Pyongyang, and the Allegations of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Use in Kore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1(1998): 176–184; 及 Milton Leitenberg, "New Russian Evidence on the Korean War Biological Warfare Allegations: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1 (1998): 185–199。并见 Ruth Rogaski, "Nature, Annihilation, and Modernity: China's Korean War Germ-Warfare Experience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 (May 2002): 381–415。

38 1995 年、2001 年 9 月采访方实。《人民日报》1952 年 5 月 17 日登载了新华社报道。又见 1952 年 5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布的两名美国飞行员的书面交代，成笔时间被注为 1952 年 4 月 8 日与 14 日。

39 1995 年、2001 年 9 月采访方实。

40 叶笃庄档案，日期为 1949 年 7 月 6 日；《历史自传》，无日期（1951？）；《叶笃庄在学习中补充材料之二》，1951 年 9 月。所有这些均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叶笃庄个人档案。

41 见本书周杰荣（Jeremy Brown）撰写的第五章。

42 《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12 日。

43 上述引文来自于叶笃庄个人档案中干部鉴定部分，无日期。

44 《人民日报》，1955 年 6 月 17 日。

45 叶笃庄回忆录《解放以后》，第 24、36–49 页，及《狱中记》，1993 年手稿，第 37 页。不幸的是，叶笃庄的档案中没有留下有关肃反运动的材料。

第十四章

接生的故事：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婆

贺萧（Gail Hershatter）

一、探询社会主义建设初期：1950年代和中国农村妇女

我于1996年开始和中国研究员高小贤[1]一起研究19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十年。这是一个令人充满好奇却被历史遗忘的年代。大多数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著作在论及五十年代时一般只关注这十年中的一系列运动及其影响。然而，对于五十年代权力中心以外的情况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遑论边缘题材的历史。国家论断与国家机构内外的人们对当时发生的一切的了解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回想起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他们都记得些什么？能够为以上问题提供答案的主要资源之一就是中国农民的个体和群体记忆；而这些资源正随着当事人的衰老和死亡而越来越难以搜集。

在这些迅速消失的农村记忆中，我们最关注的是妇女的记忆。如果说五十年代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那么农村妇女大约占百分之四十。[2]然而，尽管数量庞大，她们却因出生地（农村）和性别（女性）而被双重边缘化了。我们几乎无法从文字记载中得知这些妇女对国家动员的反应，她们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五十年代政策的影响，以及在

经济、社会、心理各层面她们有多大改变。要想了解农村妇女，我们必须超越国家论断。我们普遍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被 1949 年革命——也就是“解放”——一分为二。但是，当我们以性别为着眼点的时候，我们将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转折点？历史学家乔安·凯丽（Joan Kelly）曾经提出过这个著名的问题：“妇女也有文艺复兴吗？”如果她写的不是欧洲史而是中国史，她很可能会问：妇女也有中国革命吗？如果有，发生在什么时候？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我和高小贤重点采访了关中和陕南的四个村子，搜集了大约 70 个 60 岁以上妇女的生活史。[3]

本文介绍的是建国初期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这一变化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解放前的接生活动和解放后的国家动员是怎样交融在一起的，以及这二者对农村妇女生活和态度的影响。文献和档案资料对理解五十年代发生的变化至关重要，但是只有口述史的搜集整理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生育经历的记忆、家庭关系、以及接生婆和国家动员在改变个体记忆和家庭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

二、接生婆与国家

1950 年 6 月，一个年轻的妇联小组来到了西安以南的长安县西韦曲村。[4] 在两个新法接生员的陪同下，她们来调查农村妇幼卫生工作。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国家建设的初期便已将妇幼卫生当作工作重点，甚至比附近地区的土改开展得还要早，这一举动令人瞩目。[5]

她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并不顺利。当时村民们正忙着麦收和筑坝，大多数妇女在田里劳动，[6] 不能来开会。由于调查人员询问有关孩子的情况，还问是谁给接生的，有的村民担心她们是来抓孩子或者惩罚产婆的。工作组不得不将工作从西韦曲转移到东韦曲，因为一个组员正好在那儿有点私人关系。通过她的关系网，她们找到了六个产婆并一一进行了走访。[7]

最初产婆满心疑虑，害怕政府会禁止她们接生。当工作组解释说是来向她们学习接生的时候，她们才慢慢地放松了，并且全面而详细地描述了处理各种难产的方法以及四六风的防治方法。其中一些方法生动地体现了生育的危险和农村医疗设施的匮乏，比如在生产威胁母亲生命时

如何肢解胎儿。还有一些则显然是没有进行消毒的结果，比如新生儿破伤风十分普遍，死于破伤风的婴儿占死亡总数的将近一半。当地的新生儿死亡率为38%（195个婴儿死亡），[8]与中国其它地方农村新生儿死亡率大体接近。[9]

该村出生的522个婴儿中，只有8个没有用古法接生。[10]共有三个妇女接受了“新法接生”，其中一人的姐姐是新法接生员；[11]另外两个人的婆婆“太老了”没法接生，于是通过当地妇女代表听说了新法接生。[12]该报告指出，这8个孩子全部都健康地活了下来，所以村民们都夸新法接生好，但他们仍然顾虑重重。

此报告起草于共产党解放关中的最初几个月，在这份报告里我们看到整个合作化时期贯穿妇女卫生工作的不少主题。妇女卫生工作是国家当时的首要任务之一，生育安全是当时妇女健康的关键，而只有良好的接生技术才能使之成为可能。[13]接生改革是中国农民与新政府发生接触的最早事件之一。

很多研究接生问题的著作都为我们描绘了国家努力把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带进农村的直线式发展过程。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指出，培训新法接生员的运动是党和国家“使妇女生育行为从地方关系网与地方机构中脱离出来，以在新的国家体系中对其进行重构”的一种努力。[14]他认为，通过把封建与科学对立起来，“孕期保健工作者被动员起来去消解”旧的惯例。[15]的确，他从国家出版物《新中国妇女》上引用的许多五十年代的文章都把农村接生描绘成“封建、迷信、落后”，把旧式产婆描绘成“思想封建、自以为是、而且不愿意学习”。[16]

迪莉亚·达文（Delia Davin）对产婆给予了稍微肯定的评价，她认为国家提供了科学而旧产婆奉献了辛勤汗水。“许多‘学员’是乡村产婆。尽管她们的脏手和长指甲感染了无数的妇女，但她们有多年的实践经验；一旦她们的经验和一点理论知识相结合，她们就成了能干的卫生工作者。”[17]然而，何者占主导地位却一目了然：无知的产婆必须接受科学方法的训练，否则她们就是对妇女健康的威胁。

这两种讨论都很有价值，国家的确对旧产婆进行了批判，也的确对她们进行了重新培训和利用。然而，接生行业的改变并不仅仅是一场共

产主义国家与封建愚昧的一次性交锋，而是一种更为深广却又暧昧不明的互动，无法用政治运动的语汇和时间概念进行明确定义。共产党国家继承了国民党政府开始使用的语言和政策，但在农村的执行力度要广泛和投入得多。政府官员和接生婆的接触方式与土改（甚至婚姻改革）中的对抗性策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旧产婆没有被丑化，也没受到攻击和排挤；相反，她们的技术得到了全面的调查和汇报，她们还受到强化训练。她们是结合对象而不是讨伐对象，而且被当作重要资源。直到五十年代以后，大多数陕西农村妇女还习惯在家里生孩子，而且许多是由受过初级复训的旧产婆接生的。一些在解放前就开始接生的产婆甚至参与了解放后新一代接生员的培训工作。

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待接生活动和接生人员方面的延续性问题，这一延续性表现了国家各级政府的适应能力和实用主义，他们没有把产婆妖魔化，而是在充分利用她们的技术的同时提高她们的服务质量。然而我们也可能得出一个不那么乐观的结论：国家并没有始终如一地把妇女生育健康当作首要任务，它利用更多的资源来动员妇女参加劳动而非改变妇女的生育环境。高小贤注意到，新法接生直到七十年代才开始在陕西普及，远远落后于五十年代对促进合作化和动员妇女下田劳动所做的努力。生育上的革命比生产上的革命进行得慢得多。[18] 当时官方对迷信的接生活动和封建家庭关系一片谴责，当年轻妇女被号召下田劳动的时候，她们在生育问题上的身体经验与社会经验有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没有，这对我们在革命范畴问题上的理解有什么启示？

三、两个国家，一种政策

党和国家促进生育行为科学化和现代化的举措继承了始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努力。国民政府于 1928 年设立了卫生部，并立即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要求接生员接受为期两年的培训或类似训练，以便在政府登记注册。旧产婆要接受两个月的训练，而且也要登记注册。[19] 卫生部又设立了全国助产士协会，由其负责在北平和南京重组或开办助产士学校，以培训接生员、复训旧产婆。包括陕西在内的几个省也开办了助

产士学校。1935 年包括政府代表在内的卫生教育委员会建议扩大培训乡村助产士。[20] 像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的许多政令一样，关于助产士的规章制度也收效甚微，在农村尤甚。[21]

民国时期新法接生员和旧式产婆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前者大多来自中上阶层家庭，多在城市接生，而后者主要在乡村接生，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者。[22] 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指出："在 1930 年，二十世纪公共卫生改革家玛丽安·杨（Marion Yang）估计大约有 20 万旧产婆需要复训"。[23] 国民党的政策也表明，在今后的若干年里旧式产婆仍很重要，但她们的接生方法却遭到了公共卫生专家的强烈批判。有人报道了福建产婆用牛粪敷脐带导致的恶果；还有人"哀叹缺乏教育的旧产婆根本没法掌握现代医学的基本理论，培训班毕业之后就马上回到老办法上去了"。[24]1928 年玛丽安·杨在一篇关于接生培训的文章里用了一幅照片，照片上一个妇女坐在一个篮子里，一个抬篮子的男人站在她旁边，照片的说明让人一身冷汗："中国旧式产婆（坐在篮子里）。只能用双手和膝盖爬行。人们看到她从这个姿势直起身来，用衣襟擦擦手，没再做任何其他清洁，就把手指直接伸进了产道。"[25] 旧产婆是常常被诋毁的他者，而现代医学实践就是以这个他者作为反面来界定自己的。但是，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她们是唯一的接生资源。而且，正如李廷安在 1935 年的一份农村卫生研究里所指出的，大部分农民根本不相信新法接生。[26]

共产党完全继承了这一措施的两个方面，既批判和复训旧产婆又努力训练新法接生员。[27]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对待接生问题上存在的不是意识形态区别，而是实践上的区别。共产党在农村的渗透力要广泛而有效得多，其农村接生改革也相应地影响了更多的人。

1950 年 5 月由几个国家机构联合派出的三个工作组下乡调查妇幼卫生情况。这些工作组是农民与新政府的第一次接触，[28] 他们的工作中心是改造旧产婆，这也是此后类似运动的中心任务。工作组发现产妇死于生产的原因多为大出血和产褥热，而 50% 的新生儿死于破伤风。[29] 有两条陕西谚语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情况："只见婚嫁妇，不见生儿女"；"只见娘怀儿，不见儿走路。"[30]

在为期三个星期的调查中，工作组汇报说她们教育了十个产婆用开水洗手，消毒剪刀，在接生的时候把剪刀放在蒸锅里，这样剪脐带时剪刀可以保持干净。“改组的经验之一是对待旧产婆的态度，应是团结、教育、逐渐改造她们，不能嘲笑、讽刺、打击。”[31]

1950 年 8 月卫生部召开了全国妇幼卫生工作者大会，展开了一场消灭产褥热和破伤风的运动。[32] 此后十年里，中国农村新生儿死亡率从以前的 300‰有了大幅度下降，可能减少了一半。[33] 伊丽莎白·卡罗尔（Elisabeth Croll）注意到：“‘怀一个，生一个；生一个，活一个’这个家喻户晓的口号反映出了对婴幼儿健康的关注。”[34] 卫生部和妇联的复训旧产婆的方案是提高新生儿存活率的最主要因素。[35]1959 年，回顾十年来的卫生工作，有人指出，接生员的数量已经由 15,700 人增加到 35,290 人，而“助产士”（即复训的旧产婆和接受短期训练的接生员）的数量已经从 44,000 人增加到 774,983 人。[36]

四、旧法接生：困难与危险

1950 年政府工作人员走访了一些旧产婆，这些旧产婆描述了难产的种类及残酷的应对措施。“井圈生”是指产道太窄胎儿无法娩出，产婆要么用腿支撑产妇的后背，把她往后拉，同时挤按产妇的肚子把胎儿挤出来；要么就神神道道地“把井绳用斧头砍断，或用斧头在井口砍三下”。如果胎儿还生不下来，产婆就会问产妇的长辈是保母亲还是保孩子。如果保母亲，产婆就用一个钉子做成的钩子或者砍柴刀把胎儿拉出来，有时用刀或者镰刀把胎儿肢解在子宫里。[37]“饿痨生”（胎儿横产）是指一只手或者脚先出来而产婆无法把它送回去，这种情况下产婆就用针扎手脚或者用刀把它砍断，或者在上面抹盐（据调查报告，村民认为如果孕妇出门时手里有盐，她生产的时候胎儿就会伸手要盐）。[38]“西瓜生”是指胎儿下来的时候仍包在羊膜囊里，如果产婆不懂如何打开羊膜囊，就只能把胎儿活埋。[39] 孩子几天生不下来叫慢生，这种情况下产婆就要开骨缝（耻骨联合处），由其他两个人把产妇的两条腿尽力拉开，产婆在手上抹点油

把胎儿掏出来（开骨缝会导致产妇终生残疾）。“莲花生”指胎儿屁股先出来，这种情况下产婆会把屁股推进去再把双腿拉出来。如果羊水未破而胎儿头先出来就是“顶包生”，产婆会用手破开羊水，然后用双手往下推胎儿直到完全娩出。[40] 胎盘不能娩出的时候，产婆就用手把它拉出来，为了止血就熬些黄蒿水、墨水、童子尿让产妇喝，因为这三种东西性凉。[41]

如果是夏天生产，产婆会用火把脐带烧断，因为人们相信夏天的时候婴儿的肚子凉，用火烧可以防腹痛。冬天的时候小孩的肚子热，所以用剪刀在离肚子 8 寸左右的地方把脐带剪断。之后产婆把脐带里的血肉挤出来，把脐带打个结，穿过一张油纸，再盖一层棉花，最后用布包好。[42]

官方文献多批评产婆用不卫生的手段剪脐带，认为这会导致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43] 但在一些产婆看来，新生儿破伤风是因为母亲怀孕时受了惊吓或者生气，尤其是生闷气。[44] 这种病在出生几天之后发生（即“四六风”这个叫法的由来），伴随啼哭、呕吐（涌口）、抽搐。预防四六风有几种方法，可以在婴儿出生时往嘴上抹开口霰，用香烧婴儿嘴的两侧和脸颊，在肚脐上抹万应锭和清心丸或者口服，或者让婴儿口服用雄黄粉焙干的老鼠睾丸。[45]1950 年礼泉县的一份卫生调查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方法，产婆用一块碎陶片把出生才一天的婴儿的胸部皮肤划破，然后在一个铜钱上烧艾叶，再把铜钱放到婴儿眼睛、耳朵、嘴、鼻子的附近烧出豆大的水疱。[46] 如果婴儿最后还是得了四六风的话，有两种治疗方法：一种是抓一只活鸽子，撕掉胸部的皮，趁着热气放到婴儿脐带上。另一种办法是抓一个刚生下来还没长毛的小老鼠，把它焙干给婴儿喂下去。[47] 尽管有这么多防治措施，在韦曲出生的 522 个孩子中还是有 84 个死于新生儿破伤风，占死亡婴儿的 43%。[48]

对产妇来说，产后大出血和产褥热非常普遍。政府部门的报告常把妇女的健康问题归咎于产后恢复的恶劣条件。有些地区的产妇一天一夜不许睡觉，甚至更长。产后的最初几天大多数人只能吃得到粥，然后是面条或者干馒头片。山区的产妇只能吃到玉米，所以产妇和婴儿都很虚弱。[49]

早期官方报告除了对难产的危险、消毒程序的缺失以及贫困状况进行了生动描述以外，还详细记录了许多产婆的接生技巧。关于华阴

县一个村子的报告提到了产婆郝陈氏。她当时已经 70 岁，有 40 多年接生经验，处理难产的技巧在周围几个县家喻户晓。报告里说她有一个 S 形的钩子，一尺多长，但是从来没人见她用过。她都是用回转法和头颅穿刺法。该报告总结到，“但唯一缺点不知消毒，故妇婴常有致病之危险”。[50]

我们在九十年代采访的那些经历过五十年代的农村妇女也证实了这一点：大多数技艺娴熟的接生员基本都是 1949 年以前跟自己母亲学的，然后又受了点训练。渭南县王家村[51]一个姓党的妇女在解放前和解放后都有接生经验。她是跟她自己的母亲学的接生，接生多年以后在五十年代又在乡里上了培训班，在班上学了一首接生歌，歌词总结了新法接生的主要步骤。她儿媳妇庄小霞记得有一家来找党氏接生：

庄小霞：有时下大雪，下大雨，拄个棍，身上披个啥就走了。

高小贤：你妈解放后有没有参加培训？

庄小霞：学过。原来公社组织培训学习班，学那接生歌。

高小贤：你妈接生有没有难接的？

庄小霞：有哩。有坐胎。就那我妈把那都接下来了。我妈给人家接生都没有伤亡。有时医生给一接，也下不来，就叫我妈来了。我妈就把那取下来。[52]

五、新法接生

1951 年西北地区指导妇女卫生工作的口号是：“推广新法接生，改造旧产婆，训练新法接生员。”[53]国家开展妇女卫生工作的关键是介绍“新法”接生。新法接生员是新中国招募训练的新代言人，其任务是体现现代性带给农村妇女的好处。

除了强调洗手和消毒，新法接生还强调产前检查，让产妇躺下生产，帮产妇娩出脐带和胎盘而不是生拉硬拽导致大出血。以上各项都被用于与旧法接生相比较以突出其优点。[54]山东省政府的一本小册子较为详细地列出了为期十天的复训旧产婆的课程，内容包括：“孩子是从哪来的”

（包括女子生殖器生理解剖介绍），孕期注意事项，新法接生的好处，产前准备，如何接生，发生难产怎么办，怎么坐月子，最后一部分则是关于小儿疾病，打疫苗，怎样宣传新法接生，以及怎样写工作报告等。[55] 附录中的《接生员守则》分为“六要”、“六不许”。“六要”是：要躺着生孩子；要剪指甲并用肥皂或酒精洗手；剪子要用开水煮；要是孩子不能呼吸，立即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要给新生儿滴眼药；要打疫苗。“六不许”是：不许坐土炕、蹲着、站着、坐着生孩子；不许用高粱秆、瓦片、牙齿来弄断脐带；不许用脏盆子给新生儿洗澡；不许硬拉脐带及胎盘；如果流血过多，不许产妇起来活动，应该躺着；不许伸手入产道或将产道撕开；遇到难产不许乱动手。[56]

尽管五十年代极少数农村妇女做过产前检查，但只要当地有受过训练的接生员，其它措施就都有所实施。王友娜在家生了 5 个孩子，前两个生于合作化初期，由她婆婆接生，后几个由大队接生员接生。她婆婆的接生手法是接住胎儿，然后等着胎盘下来，然后再剪脐带。而接生员的步骤就复杂多了：她先检查产妇，用药签消毒阴部，接住胎儿，剪断脐带，包裹婴儿，然后才接胎盘。[57] 马丽是 1949 年以后训练的接生员，她记得旧法接生是这样的：“不敢拾婴儿，把婴儿撂到地上，等 ni（拼音，下同）包子下来，胎盘下来，这才敢拾娃。现在是把娃先拾的搁下，用钳子把大人的胎盘系系剪住，先拾娃，把娃拾过炕，再来管你这里。”[58] 何改珍解放前后都生过小孩，她记得新旧法的最主要区别是体位的变化：旧法接生让产妇“坐在地上”（也可能是蹲着），而新法接生让产妇躺着。[59] 她这样解释新法接生对产妇的好处：

> 那旧社会接生人家说，叫人坐地上，害怕把炕弄脏了，叫人坐地上，坐下人发晕，说是血迷心，眼看着鲜血流呀流几盆。那是旧社会坐地下，眼看着鲜血发晕，说是血迷心，只叫你坐下，不叫人睡，呀，到底是睡下来舒服呀，我生我这个娃子，人家叫我睡下，一会儿就生下了，人家那浑身都不痛。[60]

有的妇女在生孩子的时候不愿意有生人在场，连受过训练的接生员都不行。当马丽还是一个正在受训的年轻接生员的时候，有一天她姨妈

让人找她去救急。她表嫂前一年刚死了一个婴儿，这一次又遇上难产。马丽跑到她师傅家求助，她师傅就是已经不再接生的刘西罕，这两个人就一起跑到她表哥家。尽管这是她婆婆找来的接生员，她表嫂也不愿意见她们：

马丽：人家说："难受，生个娃叫你都来看一下。你是看把戏哩吧，"生娃的那人还说是看把戏啦？……把人坐到那儿都坐了几个小时了，人家不让看，我说你这不对呀，你这让人坐了几个小时了，到底是娃生下来没有，娃的一个胳膊在吊着哩。

高小贤：哎呀！那最后怎么办了？

马丽：往日那还不上炕，拿个板登坐到那儿，老婆刘西罕把她弄上炕，把胳膊慢慢送上去，送上去，又下来了，那老婆就说是这个娃成不了。你想我呆了大会子了，人家不叫看……。

高小贤：她不让看还是婆子不让看？

马丽：那媳子偏偏不让看。我问说那你没看娃头出来了没有。人家说："说的怪，说的怪，都过了半会了才说是不知是腿还是一个胳膊都冰凉了。"我说她哩，"你要不是我老表的媳子，我到你这来做啥来了？"……娃一个胳膊下来了，头在里头弯着哩，最后弄下来就死了。……跑的噔噔就去了，去就坐了几个小时。人家就说："看啥哩，难受不难受，"那老婆就说："厉害啥哩，给你办好事来了，都是妇女吆，看啥来了，这是新社会，若是旧社会你把我请都请不来。"[61]

对新法接生的了解不一定意味着妇女会继续采用新法接生，也不一定会继续按新法接生消毒剪刀。比如康杏芬，她从1963年到1973年生了五个孩子，第一个是在竹林关卫生站生的，其他的四个都是在她丈夫的帮助下在家生的（包括一例臀位生产）。她对新法接生的了解并没有改变她对消毒的态度：

高小贤：你生娃，剪脐带，你知道不，用啥剪的？

康杏芬：剪子么。

高小贤：那时剪子消毒不？

康杏芬：还消毒咧，消个屁，一剪，就一挽。

高小贤：娃脐带上啥也不包？

康杏芬：不包。[62]

就连婚前受过接生员培训的马丽也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第二个孩子死于败血症，因为孩子下来的太快了，当时水还没烧开，她哥哥就用没有消毒的剪刀剪断了脐带。[63]

六、培训与合作化

随着合作化在陕西农村的稳步发展，许多乡都建立了接生站。在妇联的协助下，地方卫生部门早在1951年就承担起这项工作。[64]比如，1952年的一份妇联工作报告指出，在这之前的一年里丹凤县卫生院为85个旧产婆办了两期训练班，[65]到1953年秋，全县有13个接生站。[66]与其说接生站是产妇生孩子的地方，倒不如说它是个监督和培训设施。比如，咸阳县渭滨乡三个接生站的40个接生员实际上分布在27个村子里。[67]复训过的旧产婆被派去协助新法接生员接生，并组成学习小组，按规定每周开一次会，每个月要与卫生工作者和妇联干部保持联系。[68]

关于妇女卫生的官方资料也展现了动员妇女下田劳动的农村合作化的大背景。例如，陕西妇联1954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指出，新法接生不仅能减轻妇女的痛苦，而且能让她们更好地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这个小册子介绍了五个模范，有模范接生员也有模范接生站，每个模范事例都表现了接生员是如何战胜人们的怀疑和各种困难的，其叙述方式与对其它领域的劳模事迹的描述如出一辙。有个接生员在庙会上宣传新法接生，对邻居的嘲讽不屑一顾。因为她拖着裸体妇女的图片到处走，她的邻居骂她辱没了祖宗。虽然因为缠足行动不便，这个模范接生员顶着暴风雨，爬过小山沟，到山对面去给人接生。当她在1953年1月西北地区卫生工作劳模大会上领奖的时候，她说："我高兴得流出眼泪，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我哪有今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种光荣。"[69]

这一事迹与小册子中的其它事迹一样，女劳模在党的领导下为集体利益积极工作的主旋律掩盖了接生的具体细节，早期官方报告中那些常常令人不安的接生细节都不见了。然而，还是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除一人例外，所有这些劳模都是在解放前就用旧法接生的经验丰富的产婆，她们只是后来接受了新法接生的短期培训。而且在这些事迹报导里，新法接生员和旧产婆是用相互学习、相互尊敬的语言进行交谈的。其次，每个事迹中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新法接生如何能使胎儿安全娩出，这些都被一笔带过，重要的是她们坚持不懈地向农民宣传新法接生的积极精神。早在 1951 年，妇联工作报告里就详尽展现了这一主题。妇女工作干部积极配合卫生干部，利用扫盲班、告示、快板书、街头剧、招贴画和墙报等形式宣传新法接生。陕南和关中各县还举办了妇女卫生展览，据说参观者达数千人。[70]

合作化还改变了接生工作的监管机制。渭滨乡卫生科于 1953 年开始宣传新法接生，第二年就扩大了宣传范围，把经期卫生和产后恢复也包含在内。1955 年合作化开始的时候，乡接生站和合作社订了合同，派代表到各合作社检查当地接生员的工作并提供适当帮助。胎位不正的产妇都被送到了医院。在半年时间内，该乡 11 个合作社中的 8 个采用了新法接生，新法使用率提高到 74%。接生员领工分，产妇有 50 天产假，并按产前三个月平均工分的一半领工分。[71]

然而，当合作社合并进入高级社的时候接生站就没人管了，合同也不执行了，接生员和产妇都一年左右没拿到工分。1956 年 10 月省妇联社会福利部在一篇报告里提出了以上问题并承诺予以解决。[72] 1957 年县卫生部门派人下乡到各接生站去统一各种接生工作规则，评估接生员的表现，并确定需要复训的人员。[73]

到 1956 年下半年，渭南县已经对接生实行了集中计划管理，收集各乡新法接生使用率的数据，并为下一年度制订了更高的使用率目标。1956 年就已经有几个乡汇报 95% 的新生儿用新法接生，尽管在其它乡还不到 50%。[74] 县政府 1957 年的文件中强调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妇幼卫生工作也应该像其它生产一样有相应的提高。[75] 大跃进时期又建

了一些新的产院，[76] 而且，一直到大跃进的时候妇女生育健康的进展都是以当时其它生产运动的时间进度来衡量的。

七、超越政治运动的时间：接生的故事

国家对训练有素的接生员的重视不应该被误解为农村接生的全部。[77] 直到五十年代后期，绝大多数陕西婴儿都是在家出生的，除了一部分由接生员接生以外，大部分由婆婆接生或者产妇自己接生。

1949 年前后的接生故事里婆婆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关这个角色的描述通常不是正面的。除了显而易见的痛苦和危险以外，生孩子还是新娘融入婆家的转折点。关中和陕南的妇女在婚后经常回娘家，有时一住就是几个星期，她们是逐渐过渡成婆家人的。但是在娘家生孩子却很让人忌讳。如果娘家妈觉得回娘家的女儿快要生孩子了，她就会急忙把女儿送回婆家去。[78] 当地人相信："亲妈生死都不见……死了人家不见那种瘟气，生了也不见。"[79] 无论是出于习俗还是出于现实考虑，通常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她就不能再经常回娘家了，这也通常是婆婆全面掌控儿媳幸福的开始。

许多妇女在回忆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首先提到的不仅仅是痛苦和恐惧，还有婆婆、丈夫，或者二者的冷漠和袖手旁观。杨安秀记得：

> 我生我们老二的时候，吃了早饭，下雨大，发现疼，我也没（吭气儿），婆子脾气大的很。究竟知道是不是要生了？感觉到下坠想上厕所。身上来了红带又不敢给说，你一说，她会说你不嫌羞人还说呢！生娃是自然现象，我一直都没敢开腔，就走到这走到那。[80]

杨安秀 1954 年被选送参加接生员培训。初产妇的痛苦、产后感染、冷漠的婆婆和好心却又懦弱的丈夫，所有这些使她下定决心去改变别人的生产环境：

> 我生我们娃娃时，那时都是坐到小凳子上生嘛。我都会引。拉通了的。过去上床，把黄篾席子一抽，坐到草上，铺点灰。上面铺个烂布，坐到上面，受了困苦了。（所以）我现在坐的时间长了都受不了。最后那

个灰一打，受不了，更恼火。一个月都肿到起。吃饭都肿到起。所以我接生，她们都说下（仔）细。因为是我亲身体验过的，很恼火。我说我自己吃苦不能叫你们受痛苦。我那40天都爬（扶）着墙走。所以产妇恼火的很！都认为我小意（心）。所以接一辈人又一辈人，（我）接过三辈人。原来这T村的大多数人都是我接的。除非有的到医院。[81]

而李六斤在四十年代后期和刚解放时的两次生产导致了她对她丈夫和婆婆的强烈不满：

我给你说，我生我们头一个女子时是十七岁，发作了那天黑了我们在一个床上睡到的，都没有人说，最后人家去割柴呀，我还起来给做饭，做饭时肚子呀都疼的没法呀！扒到锅头上搅锅的时候都疼的没法，最后硬几个三下把饭控（汤滤干）了，饭蒸上，起来吃饭时，我也没说，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要生了嘛，我也没说过。

最后他走了，（我）发作，到堂屋里转出转进的走。肚子疼的没法，那才十七岁嘛！所以转了一些，走了一些，到吃早饭的时候呢，都生过小孩的吗，这个浆包一破，都跟到喔个浆包。月娃都下来了，月娃下来了头一个奔了后了，肚子疼的不得了，憋到生不下来。老太婆吃斋呢，初一，十五敬神，吃斋。人家又不到你屋里来看，她叫你弄个裹脚，她那时缠了裹脚的。弄巴掌这么宽的白布，挺长，缠了脚的。

安到板凳上，把屁股嘛坐到抵，抵到别叫从后头，抵到起，不能睡！有个啥法呀，天老爷！一坐呀都要命。最后就喔个家转出转进走。疼的没法，一直疼到下午阵了没法。我那时当女子家时听到人家说，生月娃的时候了嘛。奔了后了睡哩。人家又说的睡不得，睡了趴到心上去了。想了想，说，死活管他去，我来睡，我呕气趴到我床上去，展展的睡到床上，睡到床上是，一下逼了两gang（二声）子（阵子），挣了两阵子，月娃到前头来了，奔到前头来是。叮叮咣咣挣了两阵子，月娃滚下来了。落下来之后，老婆婆弄了个木盆舀了点水来。给我搁到床边上，给了我个剪子，我自己一些把月娃子脐带一铰，挽了几个疙瘩，给了一坨套子（旧棉花）扒到高头，我提前也准备了。弄了些布布，袋

袋包到起，月娃一洗包到，弄了个裤子布。Yi子（胎盘）是自己落了的，就是喔。人家割柴的还没回来……。你说按这当乎这个夫妻噢。那都有了感觉得说一下子，夫妻感情就这个球势呢（样子）？我没说他也不知道。就这个样儿来！这是生头一个小孩这个样子。

生第二个娃儿时，到喔守谷子，我们到灶火门下（dia）ba（二声）了个铺，守谷子呢。那么的？肚子又疼开了。我跟他两个人睡到门下守里来。肚子又疼了，我就趴起来。人家说，木匠打那个凿子呵，kao（一声）的（打）那个拍拍，我也去铰了点毛毛提前装到那，最后把巴巴一（最后）来我就去弄了点火烧了一下，烧了点灰灰研了一下。起来烧了点开水，锅头跟前睡到的来，（灰灰）弄了点黑糖，弄开水冲了，两口喝了。喝了以后，肚子又疼开了。跟到那一样，水一破，又奔后了。我就进睡房里去。地下给了个一扫，展展睡到地下，睡到月娃落了都才爬起来。你还说！这个事情啦，睡到地下，最后娃儿落到地下了，才趴起来拣月娃，才抱到床上去。你说那当乎就这样儿！所以都根据这个情况来说，我还没法，看了一下，我才二十几嘛。最后宣传婚姻法，干脆，我就提出离婚！[82]

我们无法从官方资料和单个妇女的生育故事中知道这种家庭关系有多普遍，也无法知道这种关系是何时发生转变的。当这些妇女描述她们的儿媳妇的生育经历时，她们提到的是医院，昂贵的费用，还有干轻活的妇女第一次生产时要更困难。这些人中的接生员也提到她们最近接生的难产。现在农村妇女生育已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新娘通常也不跟婆婆住在一起，更不用说被婆婆掌控了。尽管李六斤几句话就概括了从独自接生到婚姻法到离婚的过程，但还是难以想象这类家庭关系的变化会像接生方法的变化那样快。生育行为不仅受国家运动的制约，还受整个社会关系的制约，因为接生员和产妇都无法脱离这种关系。[83]就像下面这个故事所表明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超越了有形的农村社会关系，进入了无形的灵异世界。

八、刘西罕和有关接生的魑魅魍魉

刘西罕大约在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东南角的西关。7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帮母亲做家务和接生。她14岁的时候嫁到竹林关，在家织布。1949年以前她就开始在竹林关接生。解放后她参加了培训，1952年2月成为竹林关接生站站长，该站是妇联在该县建立的13个接生站之一。她在三年里领导了8个人，到1955年为止她接生了41个孩子，其中无一例新生儿破伤风，也没有产后疾病。[84]她在乡亲中的威望很高。竹林关村民何改珍觉得她1953年生的孩子死于败血症就是因为不是由刘西罕接生的。她第二年生的二儿子是刘西罕接生的，就活了下来。刘接生从不收费，乡里给她发材料费。[85]

刘西罕积极宣传新法接生，[86]还唱歌介绍新法接生的好处。[87]她在其它方面也是个模范公民，1954年还说服她丈夫和邻居把余粮卖给国家。有个邻居因为她推广粮食统购而骂她（“刘西罕，你把我的锅提去，把我被子拿去，我要吊死你门上去”），但她还是继续耐心地劝导，让这个老太太想想旧社会挨饿的时候。从各方面来讲她都是党和国家塑造的新一代农村妇女的典范。[88]

然而，与官方出版物和内部资料对积极推广安全接生（及粮食统购）的白描不同，农村妇女对刘西罕的记忆要复杂得多。刘西罕死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农村妇女对其新法接生技巧表示称赞，但她们也认为刘西罕和所有给人接生的人一样，在婴儿出生时会遇到很大危险。在她们的叙述里，生产不仅威胁产妇，对接生的人也同样不祥，新法接生也无法驱除这种不祥。生产时的血污对接生的人和她所接触的人都不吉利。一个年轻的接生员记得她帮刘西罕接生之后带回家一些黄瓜，但谁都不肯吃，都说，“她脏的太太，你没看她做啥去了……。后来这个人笑话，那个人笑话，拿的东西都没人吃了，我就不喜欢了。”[89]另一个妇女想起来刘西罕的前任也是一个技术高明的旧产婆，因为经常接触生产的血污，眼睛瞎了。有个妇女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刘西罕要教她接生时她拒绝了：“不啊，我这眼睛不太好，我不学这，学这血气扑眼睛，我不学这。”[90]

即使在解放之后，即使在设立了接生站而且刘西罕当了站长之后，即使在普及消毒和新生儿破伤风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接生的不祥仍旧没有消失。人们都说刘西罕是“接生给死了”。有一次接生的时候，她发觉自己接下了一个奇形怪状又很难闻的东西：

> 接生，到那把那娃，看她掉下地以后，不知道是娃不是娃。她吓地那一晚就发高烧。第二天才给他屋里娃带信，这娃子去把他妈抬回来的，像这下午……。到下午四点，就没气了，就死了。哦，那个老婆呀，人家接生接的好太呀，谁要是一喊，那应声得很呀，人家说那人受罪着了么，一喊，她说我就走。[91]

这并不是刘西罕之死的完整版本。在她死前几个月的一天，她向同村的一个女人透露了一个闹鬼的故事，并让她发誓保密。这个人是这样回忆的：

> 还有那一年，她下来给我说，我到底都没敢给人说过，人家说，“风存呀，我都不敢说，你可不敢说哇，说了人家政府明儿斗我哩。”那黑上有个人，小伙子，在她窗底下喊她哩说，婶子，给我接生，就说这两句，她说哦，来了，她就穿衣起来，把那药箱子背上。
>
> 人家说那小伙子给它背上，就那……东坡坡那儿，回去后，没拿包包（药箱），上面写的有十字，划的那十字。老婆回去了后，老汉到第二天说，呀，你那包包咋没背呢？人家说，那娃人家这样说，人家说生了娃子，人家说，娃，你给我倒一点儿水叫我把手给洗下子。人家说，婶子，那没有水呀，人家说我还没有啥给你做点吃的，我不吃。你叫我给手洗一下子，我不吃你啥，你把我手洗一下子。人家说没有水她就到人家那石头上擦擦，摸摸后，就回来了。她一个人回来的，回来后，她说她给人家接了个娃子，到第二天，人家我那叔叔说，那你那药箱子咋没见呢？人家说，哎呀，我昨黑上没拿，说那怎么没见你药箱子。那你都走哪儿走的，她说了，老汉去寻了。
>
> 在人家那家坟头上。那血手摸到人家坟头上，那石头上，她吓的回来看数（只）给我说，她就不敢给别人说，给人家说，公家斗她哩，嘿，

公家斗哩。吓地不敢说，这是迷信，给人家……给人家阴间接生去了，某老婆没多长时间到那接生，就把命送了。[92]

在这个故事里几个世界交叉在一起，无法分清各自的界限。像她同时代的接生员一样，这个新法接生员带着充沛的服务精神出去接生。接生之后她害怕了，她给她丈夫的回答说明她不愿意说出她的恐惧，甚至不愿意承认她曾经出去过。但是，医药箱的确不见了，而她丈夫找到医药箱的地方说明有什么东西很不对劲。她不知道她带着医药箱到了鬼界，还接生了个鬼孩子。这本身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越界。尽管她是以个体来经历这种恐惧的，这里反映的却是一种古老而强烈的集体恐惧，许多中国神怪故事都有与此几乎完全一致的情节。[93]

然而她的恐惧不止这些。她已经接受了科学，而且还在村子里积极宣传科学，所以她还害怕她的恐惧会被当作迷信遭到批判。科学的世界和这个接生员的一套旧观念交叉在一起，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她想进步，想做贡献，不受谴责，她能讲的就只能是科学。所以她保持沉默，或者说基本沉默。不久以后，阴魂不散的鬼魅又来找她接生，这次就要了她的命。

关键不在于妖魔鬼怪是否真的要了她的命，也不在于再次出现的心理创伤是否加速了她的死亡。我们无法知道她自己是否把这两次给她带来创伤的接生联系了起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妇女记得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技术、她对新法接生的投入以及她的热情，还因为她死于接生。就像采访对象说的，她“接生给死了”，而这个采访对象本人在五十年代也是个积极分子。

对于建国初期的育龄妇女来说，生产的危险和不祥在五十年代就象消毒医疗器械一样真实，而且在九十年代的记忆里也一样真实。[94] 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们的确是按国家时间 (state temporality) 来生活的——她们在回顾五十年代的运动给生活带来的改变时充满激动。但国家时间与其它时间并行，或者说国家时间按照其它时间来反向定义自己，而后者并未因为新国家政权的降临而消失。知识、观念和行为以复杂的方式流动扩散，是“国家作为科学知识传播者”这一模式所无法捕捉的。这也表明，要真正历史地理解农村分娩和接生以及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既

需要借助国家运动的完整记录，也需要研究探索妇女的记忆，或者，至少是她们愿意讲也能够讲的记忆。

孙晓萍、姚昱译

注释

1 本研究于 1996 年开始、2006 年结束，主要经费由卢西基金会美中合作研究项目（Luce Foundation's U.S.-China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m）提供，加州大学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研究计划（Pacific Rim Research Program）也提供了部分经费。在此，我向我的研究伙伴，陕西省妇联研究室主任，妇女研究会秘书长高小贤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我还要感谢在两次艰难的访问行程中帮助过我的王国红和赵晨。我还要感谢我能干的研究助理姜进，琳恩·杰弗里 (Lyn Jeffery)，康文庆，孙晓萍和莫亚军，这部分经费由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学术理事会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Research of the Academic Senate）提供。我个人对此论文中发表的观点完全负责。此论文是我正在写作中的《记忆的性别》的一部分。除了刘西罕以外，所有被访者的名字均为化名。

2 这一估计极不严谨。相关城市人口数据见 Judith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29。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率逐年增加，从 1949 年的 10.6% 增加到 1959 年的 18.4%。班尼斯特 (Banister) 在第 25 页给出 1953 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全国人口性别比例是 107.6:100，而农村的男性比例很可能更高。

3 这些村子都远离作为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陕北：B 村位于关中的植棉带；T 村位于陕西西南，靠近四川，主要种茶和水稻；Z 村在陕西东南山区，接近河南和湖北；G 村在渭北山崖上。

4 陕西省档案馆把这份年代不详的材料和 1950 年的材料归为一档。《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陕西省档案馆妇联档案 178-106-002，日期不详（1950？）。1950 年四五月份的新闻报道可以证实调查妇女卫生条件的举措，见《群众日报》，1950 年 6 月 27 日，第二版。

5 这项妇婴卫生调查比土改还要早，1950 年 6 月才在全国范围内宣布土改。本书中周杰荣 (Jeremy Brown) 对中国西南的讨论和高峥 (James Z. Gao) 对于新疆的讨论都表明，新生国家政权的巩固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鉴于此，这项卫生工作这么早就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首要任务，实在令人惊讶。位于长安县东北的渭南专区直到 1950 年 10 月才开始大规模的土改。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7–8 页。然而渭南县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已于 1950 年 5 月召开并成立了县妇联。渭南县志编辑委员会编：《渭南县志》，陕西：三秦出版社，

1987 年，第 491 页。如果长安县也按照类似进度，如果调查人员是妇联的人，那么妇婴卫生和生育行为的调查就是这一新组织采取的第一次行动。

6 尽管有对户外劳动的种种限制，关中妇女在农忙季节都下田劳动。有关详细论述，见 Gail Hershatter, "Local Meanings of Gender and Work in Rural Shaanxi in the 1950s," in Gail Henderson and Barbara Entwisle, eds.,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 and Gender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79–96。

7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第 1–2、9 页。

8 该村出生的 522 个孩子中 62% 活了下来，死亡婴儿中 84 个（43%）死于新生儿破伤风，111 个死因不明。该调查未注明这 522 个孩子出生的时间范围。其中 521 个平产，包括 278 个男孩和 243 个女孩，还有一个男孩是难产。上述数据见《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同期的一份省级报告指出该村出生的 522 个婴儿中有 514 个用旧法接生，其中 314 个死亡。这一巨大差异说明同类报告的可靠性也很值得怀疑。《陕西省 1950 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陕西省档案馆民政厅档案 198–113，1950 年，第 29–34 页。

9 1928 年全国新生儿死亡率大约为 250‰，许多死于新生儿破伤风。Marion Yang, "Midwifery Training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42 (1928): 769, 另见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10。农村死亡率很可能更高。1951 年中央妇幼卫生小组的一份调查估计，在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每年有 83 万多个婴儿出生，死亡率为 285‰，大约为 23.8 万个。《群众日报》，1951 年 12 月 1 日，第 3 版。

10 这项调查中的婴儿出生数字有出入，一说 521 个，一说 522 个，其中 8 个用新法接生（6 个由同一妇女生产，另外两个分别由两个妇女生产）。

11 这个新法接生员肯定是在 1949 年共产党到来以前就受过训练的，因为到 1950 年为止她已经为她姐姐接生了 6 个孩子。

12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第 2 页。

13 例如见《群众日报》，1950 年 6 月 27 日，第 2 页。

14 Joshua Goldstein, "Scissors, Surveys, and Psycho-Prophylactics: Prenatal Health Care Campaigns and State Building in China, 1949–1954,"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1.2 (June 1998): 154.

15 Ibid., 156.

16 Ibid., 163, 162.

17 Delia Davin, "Women in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i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57; Delia Davin, *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31–132.

18 高小贤，私人谈话，2000 年 10 月。

19 Yip, 58–59; 另见 Yang, 774–75; 以及 "Editorial: Midwifery Training in Peking,"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42 (1928), 782–784。

20 Yip, 165–172. 陕西于 1934 年建立了一所助产士学校，招收 18 岁到 25 岁的未婚女性学习三年，包括一年实习。该校每年招收 30 人，对农村卫生习惯却没什么影响。秦燕、岳珑：《走出封闭：陕西妇女婚姻与生育，1900–1949》，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90 页。

21 Yip, 59.

22 Ibid., 167, 概括了江西南昌有关此情况一份调查。

23 Marion Yang, "Control of Practicing Midwives in China,"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44.5 (1930): 428–431, 引自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98, n. 68。在更早的一篇文章中估计需要复训的旧产婆为 40 万人。Yang, "Midwifery Training in China" (1928), 774。

24 Yip, 10, 167.

25 Yang, "Midwifery Training in China" (1928): illustration 768/769。杨在第 769 页引用的数字为：中国产妇死亡率为 15‰，新生儿死亡率为 250–300‰。

26 李廷安：《中国乡村卫生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25 页。李指出，尽管在定县有一个长期的农村卫生项目，该县 90.7% 的婴儿由旧式产婆接生，10% 由接生员接生，0.3% 自己接生。关于生育流行病的分类、产后感染的原因以及训练有素的接生员的不足，见第 65–68 页。

27 有关妇女卫生工作和改造旧式产婆的需要的早期文献，见《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陕西省妇联，1985 年，第 165–166、356 页；还见秦燕、岳珑前揭书，第 179–205 页。陕甘宁根据地 1944 年 4 月开始的妇女卫生运动的简述，见《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陕甘宁三省区妇联，1987 年，第 166–170 页。

28 这几个工作组走访了宝鸡、蓝田、以及西安郊区。《群众日报》，1950 年 6 月 27 日，第 2 版。

29 同上，1950 年 6 月 27 日，第 2 版。

30 同上，1951 年 12 月 1 日，第 3 版。

31 同上，1950 年 6 月 27 日，第 2 版。

32 Kahti Lim,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Past Ten Years,"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79.5 (November 1959): 375.

33 Banister, 82–83；她认为许多五十年代中期的农村调查结果都过于乐观，并对其持怀疑态度。

34 Elisabeth Croll, *From Heaven to Earth: Images and Experience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83.

35 Goldstein, 153.

36 Lim, 375；第二组数据见诸福棠：《建国十年来儿童保健事业的成就》，《中华儿科杂志》，第 10 卷第 5 期，1959 年 10 月 1 日，第 367 页。

37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第 3–4 页。类似事件见《陕西省 1950 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

38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第 4 页。

39 同上，第 4 页。

40 同上，第 5 页。

41 同上，第 5 页。更生动的描述见《陕西省 1950 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和《陕西省 1951 年妇幼卫生材料》，陕西省档案馆妇联档案 178-112-006，1951 年 3 月到 12 月。关于宋代和清代医学文本对接生婆的类似批评，见 Yi-Li Wu, *Reproducing Women: Constructions of Female Health and Illness in Qing China*, draft ms., chapter 6, 引用经作者同意。

42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第 5–6 页。

43 批评陕北产婆的概括，见秦燕、岳珑前揭书，第 191–194 页。类似批评见 1951 年妇联的一份调查，见《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

44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第 7 页。

45 同上，第 7 页。

46 《陕西省 1950 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第 29–34 页。

47 《妇婴卫生工作调查工作》，第 7 页。

48 同上，第 8 页。

49 《陕西省 1950 年妇婴卫生调查总结》，第 29–34 页。

50 同上。

51 王家村位于西安东北大约六十公里。

52 高小贤与贺萧，采访庄小霞，1996 年 8 月 5 日，第二盘录音带，记录第 16 页。儿媳都管婆婆叫“妈”。

53 《群众日报》，1951 年 12 月 1 日，第 3 版。

54 以陕北生育习惯为基础所做的这类比较的概括性论述，见秦燕、岳珑前揭书，第 191–194 页。1951 年的一份陕西调查显示，妇女生孩子没有固定地点，要么蹲在茅房，要么在牲口棚，要么在墙角。《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

55 鲁霞：《改造旧产婆经验介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1 年，第 8 页。

56 同上，第 18–19 页。

57 王国红、王友娜采访记录，1997 年 7 月 6 日，第 3–5 页。

58 高小贤与贺萧，采访马丽，1999 年 7 月 31 日，笔录第 23 页。

59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接生运动正好与此相反，该运动置疑医生的权威，推行产婆接生，把产妇从卧姿“解放”出来，指导产妇多走动，蹲着生产，这样地心引力会起到辅助作用。

60 高小贤与贺萧，采访何改珍，1999 年 7 月 28 日，第 5 部分，笔录第 20 页。

61 高小贤与贺萧，采访马丽，1999 年 7 月 31 日，笔录第 23 页。

62 高小贤与贺萧，采访康杏芬，1999 年 7 月 29 日，笔录第 9–10 页。

63 高小贤与贺萧，采访马丽，1999 年 7 月 31 日，笔录第 22 页。

64 《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

65 《丹凤县妇女工作一年来的总结》,1952 年 9 月 27 日,丹凤县档案馆(妇联报告)。

66 《丹凤县一年来的妇女工作总结报告》,1953 年 10 月 30 日,丹凤县档案馆(妇联报告)。

67 《咸阳县渭滨乡一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情况》,陕西省档案馆妇联档案 178-153-081,1956 年 10 月 22 日。早在 1951 年妇联干部就开始负责针对旧产婆的政治培训。《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

68 这些早期工作报告中雄心勃勃的计划很难反映出与政府机构实际接触的程度和复训的彻底性,比如见《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

69 陕西省妇联福利部,《妇婴卫生工作经验介绍》,1954 年 9 月,第 1–3 页.

70 《陕西省 51 年妇幼卫生材料》。

71 《咸阳县渭滨乡一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情况》。

72 同上。

73 《渭南县人民委员会 1957 年一到六月份妇幼卫生工作计划》(日期不详),渭南县档案馆,第 6 号(本文作者标号)。

74 同上。

75 同上。

76 关于泾阳县大跃进时期的陕西产院,见《陕西日报》,1958 年 4 月 1 日和 8 月 31 日;《在陕西省农村产院经验交流泾阳现场会议上的开幕词》,陕西省妇联档案 178-207-067(1958 年 8 月 8–23 日)。关于渭南县产院,见《渭南日报》,1960 年 5 月 21 日。

77 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葛以嘉 (Joshua Goldstein) 的看法。在葛以嘉〔Goldstein (177)〕的讨论中,国家显得过于一致,其影响也显得过于连贯;而且,"妇女"也好像是不受国家建构 (state-making) 和封建父权影响的自主主体。

78 高小贤与贺萧,采访 LZR,2001 年 3 月 26 日,笔录第 59 页。

79 那些住在娘家的招赘妇女也遵守同样禁忌,亲妈不能接生。高小贤与贺萧,何改珍采访笔录,1999 年 7 月 28 日,第 5 部分,第 22 页。

80 高小贤与贺萧,采访杨安秀,1997 年 7 月 7 日,笔录第 5 页。

81 同上,第 1 页。

82 高小贤与贺萧,采访李六斤,1997 年 7 月 6 日,笔录第 17 页。

83 关于改革时期中国农村生育文化,见李银河:《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与高小贤:《贫困地区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分析》,《妇女研究》,2002 年 4 月,第 59–62 页。

84 《丹凤县第四区竹林关乡刘西罕模范单行材料》,丹凤县档案馆,1955 年 2 月 21 日。该县接生站的数量见《丹凤县一年来的妇女工作总结报告》,丹凤县档案馆(妇联报告),1953 年 10 月 30 日。

85 高小贤与贺萧,何改珍采访记录,1999 年 7 月 28 日,第一部分,第 4 页。

86 《丹凤县第四区竹林关乡刘西罕模范单行材料》。

87 高小贤与贺萧,何改珍采访记录,1999 年 7 月 28 日,第 5 部分,第 20 页。

88 《丹凤县第四区竹林关乡刘西罕模范单行材料》。

89 高小贤与贺萧，采访马丽，1999 年 7 月 31 日，笔录第 22 页。关于生产不洁的禁忌，见 Emily Ahern [Martin],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193–214。

90 高小贤与贺萧，采访何改珍，1999 年 7 月 28 日，第 5 部分，第 20 页。吴一立 (Yi-Li Wu) 指出，中国关于鬼胎的经典医学话语里，一般认为假怀孕是人与鬼交媾或者女性性压抑的结果。Yi-Li Wu, "Ghost Fetuses, False Pregnancies, and the Parameters of Medical Uncertainty in Classical Chinese Gynecology," *Nan Nü* 4.2 (2002): 170–206, 尤其是第 188–195 页。

91 高小贤与贺萧，采访何改珍，1999 年 7 月 28 日，第 5 部分，笔录第 20 页。

92 同上，第 20–21 页。

93 余华的短篇小说《世事如烟》("World Like Mist") 也采用了这个主题：一个接生婆在接生了鬼孩子之后死了。见 Yu Hua, *The Past and the Punishments* (《往事与刑罚》), trans. Andrew F. Jon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6), 第 87–93, 104, 109–110。特别感谢安德鲁·琼斯 (Andrew Jones) 提醒我刘西罕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耳熟。17 世纪中国文学也经常出现"男人让女鬼受孕"这一主题，见 Judith Zeitlin, *The Phantom Heroine: Ghosts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Chap. 1。

94 我们的研究助理也有同感。她当时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她说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她无法入睡。

第十五章

选择共产党中国的资本家：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

高家龙（Sherman Cochran）

1949年共产党革命胜利后，中国精英阶层的绝大多数人虽有条件出走国外，却并没有离开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很多人还做出了从海外回归祖国的抉择。他们当中，有工程师、科学家（如周锡瑞在本书第十三章中所写到的叶氏家族第七子）、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如林培瑞在第九章中所提到的老舍）。甚至连很多服务于国民党政府外交使团的官员也回到了祖国。为什么这些人在有条件迁往海外的情况下，却做出了留在国内或从海外回国的选择？所有面对过这一问题的精英人物，在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都有着成为领导人物并接触到权力的机会和潜力，因此，他们移居海外或者回到国内的动机，是值得研究的。本章的研究对象是这些精英人物中的资本家这一部分，具体而言是一个在上海颇具影响力的家族刘鸿生家族。革命来临的时刻，身为资本家的刘氏家族为什么会选择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

关于中国资本家何以选择留在国内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学者们在研究中将他们的动机或者归之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考虑，或者归之于跨国性（transnationalism）发展的需求。在持民族主义动机论者中，讨论得最多的非毛泽东莫属。1947年12月25日，中国内战达到白热化

之际，毛泽东便设想，在共产党军队打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夺取政权后，“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应当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做出贡献。[1] 不足两年之后，从毛泽东 1949 年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政府的成立开始，中国共产党便开始采用毛泽东的术语将资本家划分为两类：“民族资本家”是爱国的，中共鼓励他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留在国内；“官僚买办资本家”则是卖国的，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腐朽的旧官僚沆瀣一气，因而没有成为公民的资格。从那时起，中国学者便一直沿袭采用这种划分方法，并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各个阶段，究竟应当将中国资本家当作民族主义者来加以赞扬，还是当作买办和官僚去予以谴责。[2]

在中国以外，学者们则将关注点从中国资本家身上的民族主义动机转向了他们身上的跨国主义倾向，对他们在 1949 年或走或留的决定作出解释。黄绍伦（Siu-lun Wong）在其所著的非常切题的《移民企业家》(*Emigrant Entrepreneurs*) 一书中，分析了 1949 年共产党革命期间中国实业家被迫放弃上海棉纺厂而迁往香港的复杂动机，他注意到，“当时，一个家族的成员各走各路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是一个或几个人留在中国，而其他人则迁往海外。[3] 柯博文（Parks Coble）在一本近著中对黄绍伦的观点表示赞同，并在历史细节上做了补充。在柯博文看来，中国资本家于 1949 年在去留问题上所做的决定与 1937–1945 年中日战争初期时做出的去留决定出于同样的原因（而这也正是柯著的主题）。他写道：“商人们在 1949 年的反应，与他们中很多人在 1937 年和 1938 年时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通过对家族和财产的疏散来分散风险。”也就是说，1949 年众多资本家在家族的一些成员留在国内的同时，又将家族的其他成员疏散到香港、东南亚或者西方国家，从而为自己的家族和家族企业编织起跨越国界的网络。[4]

在去留问题上，资本家作出决定时究竟是基于民族主义的考虑，还是出于跨国主义的动机？这两种看似相互对立的假设都未经实证研究的检验，支撑假设的基础不过是当事人在事后回顾中谈到的自己身上的民族主义倾向或超越国界的“海外关系”，尚未得到相关文献资料的证实。[5] 本章将以一部极有价值的家族档案为依据，试图对中国资本家留在中

国究竟是基于民族主义的考虑、或是出于跨国主义和其他的动机予以考察。[6] 这套档案中所包括的私人信件、回忆录和其他文件均出自于刘氏家族成员之手，为我们了解他们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共产主义革命期间何以作出或走或留、或离开后重返大陆的决定，提供了很能说明问题的线索。

一、离开中国大陆

1948 年和 1949 年间，刘氏家族大家长刘鸿生（1888–1956）在他本人及整个家族是否应当继续生活在中国大陆这一问题上，不止一次改变主意。当时，刘鸿生已年届花甲，早已是中国最有名望的实业家之一，主要投资于火柴、毛纺、水泥和煤饼等工厂行业。[7] 当刘鸿生在是否将家族及其庞大资产转移出国这一问题上冥思苦想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与毛泽东的共产党方面在 1946–1949 年内战中的殊死搏斗已近尾声，双方都对刘鸿生大加拉拢。直到内战的最后一年，刘鸿生一直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站在一起。

（一）对国民党大失所望

1948 年秋，共产党发起了决定性的攻势，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华南撤退，随后又逃往台湾。即便如此，刘鸿生似乎仍旧准备继续追随蒋介石。从 1930 年代起，刘鸿生便以宁波同乡的身份结识了蒋介石，并在国民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几个职务。1932–1934 年间，刘鸿生曾出任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1936–1937 年间，又担任过国家扶持的垄断企业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的理事长。抗日战争期间，刘鸿生从沿海城市上海迁居到位于西部的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并在那里开设了新的工厂企业，生产毛织品和火柴，并负责主持属财政部管辖的烟草火柴专卖局。[8] 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于 1945 年返回上海，担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既然刘鸿生在 1930 年代末和 1940 年代初跟随蒋介石前往重庆、随后又在 1940 年代中期返回上海，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在1948年和1949年追随蒋介石从上海跑到台湾去呢？

从刘鸿生在1948年采取的几个步骤来看，他和整个家族似乎已准备义无反顾地前往台湾发展了。刘鸿生首先访问了台湾和美国，随后又派出四子刘念智（抗战时期，他曾是刘鸿生在重庆的左右手）到台湾去打开“一条后路”。刘念智出行前收集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处的金银珠宝，通过属于中兴轮船公司的一艘船将这些值钱的东西运往台湾。抵达台湾后，他立即将家族的财富大量投资于房地产，并为开设两个新厂——一个是在台北的糖果厂、一个是在高雄的化工厂——从事前期准备工作。在返回上海之前，他将管理这些资产的责任留给了两个弟弟——受过美国教育的五弟刘念孝和受过日本教育的七弟刘念忠——两个弟弟此时也在台湾居住下来。[9]

刘鸿生刚在台湾从事了这些实质性投资，便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要迁移到台湾的问题。他的疑虑来自他在国民政府于1948年秋在上海推行的货币改革中的亲身经历。蒋介石推行此次改革，目的在于阻止已经失控的通货膨胀并增加税收。在上海，改革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负责推行。从1948年8月19日到10月31日，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蒋经国冻结了物价并向上海资本家发出呼吁，要他们交出手中的旧币和金银外币，来兑换新发行的金圆券。

一开始，蒋经国试图通过来软的获取刘鸿生对于金圆券改革的支持。他邀请刘鸿生到位于上海市中心南京路上的汇中饭店会晤，尊称刘鸿生为“老伯”，劝说他自愿交出金银外币，来帮助恢复经济稳定并资助国民党的反共战争。但在谈话后的一两天里，刘鸿生并未遵从蒋经国的劝说交出金银等物，蒋经国便开始转而采用硬的一手。他声称知道刘鸿生的财产有多少，并威胁道，如果刘不在三天之内将金银珠宝和外币交给中国银行，就要将刘军法处置。同时，蒋经国又公开攻击上海的所有大资本家，说他们是“奸商”。在对资本家展开讨伐的第三天，他说，“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在与刘鸿生和其他上海资本家会晤之后，蒋经国认为他们当着他的面显得很和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10]

蒋经国的威吓使得刘鸿生惊恐不已，特别是在国民党政府开始将这些威胁诉诸实行之后。在随后几周里，几个拒绝合作的资本家遭到逮捕，为每个人所定的赎金高达 30 万甚至于 100 万美金，其中一人还被判处死刑。根据刘鸿生四子刘念智的描述，刘鸿生战战兢兢地用 800 根金条、数千银元和 230 万美元兑换了中国银行的金圆券，以求苟安。短短几个星期后，刘鸿生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又都被金圆券改革的结果震惊得目瞪口呆——金圆券实际上已变得一文不值了。[11]

1948 年 10 月 31 日，国民政府承认金圆券改革失败，并取消了两个半月之前刚刚开始实行的物价管制。蒋经国向上海人民公开道歉，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忘给资本家一记回马枪，提醒人们“应用自己的力量不再让投机奸商、官僚、政客和地痞流氓来控制上海”。[12]

金圆券改革的失败以及蒋经国对待资本家的态度令刘鸿生深感不安，而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根据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研究，“自那以后，大多数人都放弃了经济恢复的希望；改革的失败看上去也说明国民政府已完全没有资源来控制通货膨胀了。”[13] 刘鸿生也持这种看法，他也不再幻想他和刘氏家族能在台湾发挥什么作用了。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刘鸿生严肃地对儿女们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台湾也不是好地方”。[14]

（二）对于共产党人的怀疑

如果刘家不追随蒋介石到台湾去，那么，他们会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吗？ 1949 年初，当解放军从东北向南方横扫天下，兵临上海之际，刘鸿生和家人开始收到来自共产党方面的保证：如果刘家愿意留在上海，解放军接管上海之后将会保障他们的安全并保护他们的工厂。刘家是在一次家庭会议上从六子刘公诚那里首次得知这个信息的。

刘公诚坚持刘家上下都应当留在上海，并拥护共产党的事业。早在十多年前的 1938 年，刘公诚就在延安根据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又秘密地以地下党员的身份与国民党作斗争（刘公诚的共产党员身份直到 1970 年代“四人帮”倒台时才公开）。[15] 一开始，刘公诚在家里显得势

单力薄，因为他是唯一提议整个家族留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上海的人。1949 年 3 月，他带了一位同学参加了一次家庭会议，并介绍道，这位同学是共产党员，可以就共产党的政策和计划作出权威性的讲解。

刘家以前只知道这个人姓王，而他的真名其实是戴德。在刘公诚道明了他的真实身份之后，戴德向刘家详细地解释了共产党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他敦促刘家全体成员都留在上海，并许诺说，解放军接管上海后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刘氏家族及其工厂的安全。这之后，他又三次拜访了刘鸿生的四子刘念智，要求他与共产党人合作，以保护刘氏工厂不致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遭到破坏。在解放军接管上海前的那几个月里，共产党人不断通过对上海地区的无线电广播呼吁刘家留在上海。[16]

除了六子刘公诚之外，刘家其他人对共产党的保证均持怀疑态度。抗战期间，刘鸿生曾经在重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面晤过两次。毛和周所体现出来的平易近人与从容自信的领袖风范，给刘鸿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他对共产党及其对资本家的政策仍然存有戒心。1949 年春，在听了六子刘公诚与戴德拥护共产党统治的介绍之后，刘鸿生告诉家人：“共产党决不会和我们真正交朋友。”[17]

（三）飞往香港

1949 年春，就在共产党接管上海前夕，刘鸿生权衡比较了几种选择。鉴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革的灾难性后果，他排除了迁往台湾的可能性。同时，尽管有六子刘公诚的保证，他对于将整个家族及其资产都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上海仍然心怀疑虑。作为第三种选择，他提议将一部分家人和生意迁往香港，其余的则留在上海。根据四子刘念智的说法，除了六子以外，其他的家人都支持刘鸿生的这一决定，因为他们都将父亲最喜爱的一句英语格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18]

当刘鸿生与家人们仔细权衡是走是留的时候，他们没有很快离开上海的举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官员的怀疑，受到了后者的严密监视。1949

年3月，蒋介石命令上海市政府建立“保卫上海委员会”，刘鸿生被任命为委员。根据四子刘念智的回忆，从那时起刘鸿生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上海社会局局长陈保泰的监控。1949年5月，就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前的最后几天里，刘鸿生每隔一小时都会接到陈宝泰的电话。1949年5月22日，即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接管上海的前三天，刘鸿生接到命令，要他前往广州同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在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陈保泰和三个武装人员将刘鸿生塞进汽车，开到机场后，又护送他登上了一架专为此行而租赁的飞往广州的私人飞机。据刘念智的事后叙述，这一系列事件就像国民党秘密警察的一次“绑票”行动。刘鸿生被强迫飞离上海并被强制留在广州之后，设法躲过国民党的监视，逃到了香港。[19]

如果我们考虑到刘鸿生在这之前已经做好了去香港的准备，那么，他从上海到广州再到香港这件事似乎不太可能像刘念智以上所叙述的那样是完全被迫的。早在1949年4月，也就是刘鸿生“被迫”从上海飞往广州的一个多月之前，他已经与中央航空公司联系，为自己从上海飞往广州做了安排。同时，他在家族以外的两位高级生意伙伴——程年彭和华尔康这两位表兄弟——已经向香港偷运去了价值高达500万美元的外汇、工业制成品和原料。5月初，程和华从上海登机，准备飞往香港。当刘鸿生的章华毛纺织厂的工人试图阻止程、华二人离开上海时，刘鸿生亲自出面安抚聚众的工人，许诺说程和华将不会在香港长期停留。但结果是，几个星期之后的1949年5月24日，刘鸿生就与这两位生意伙伴在香港见面了，而程和华再也没有返回上海。[20]不过，不管刘鸿生是否是在蒋介石的胁持下离开上海的，看起来他已经切断了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系，而且一直没有再去过台湾。

（四）各种可能性

1949年5月，刘鸿生作出了既不前往由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也不留在由共产党统治的上海的决定，这反映了当时他所面临选择的范围以及他所处境遇的变化无常。正如温奈良（Nara Dillon）在本书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其他中国资本家当时也已经或正在考虑从上海出走。与他们

相比较，刘鸿生无论是待在亚洲还是前往西方国家，他所拥有的为保证本人及家族的未来所需的金融及文化资源都不会比他们少，甚至比他们更多。1949 年前，他花了二十年时间让子女在海外接受教育。1929 年，他将三个儿子送到了英国，他们都在 20 世纪 30 年代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学位。之后，在其余九个孩子中，除了一个有严重学习障碍的儿子之外，其余八个也都被他送往海外去接受教育。他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送往英国接受教育，让另外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去美国上大学，而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则上了日本的大学。然而，刘鸿生即便拥有资金、技术、受过西方和日本教育的子女以及其他动产，在 1949 年这一当口，他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依然举棋不定。他于 5 月 24 日抵达香港，但这一问题并未随之而告结束，他仍在苦苦思索，究竟是应该留在香港还是返回大陆。

二、返回中国大陆

1949 年 11 月，刘鸿生被家人和共产党高层领导人说服，返回上海。从 1949 年 5 月到 11 月，在刘鸿生生活在香港的六个月里，他一直为是应该返回上海还是留在香港而苦苦挣扎——按计划，八子刘念信将于 11 月中旬从美国抵达香港。当刘鸿生陷于一场拉锯战之中时，上海和香港两边的家族成员都在“拉他的后腿”，直到他最后做出了决定。[21]

（一）家族压力

尽管处于内战、革命和动乱的环境下，但在刘鸿生逗留香港的六个月间，上海的家人从未与他失去过联系。四子刘念智一直向他汇报生意状况，而早在刘鸿生离开上海仅仅两个星期后的 1949 年 6 月 4 日，次子刘念义就写信劝说他立刻返回上海。在寄往香港的家信中，刘念义说：“父亲，听到您已决定与广东的（国民党）政客们决绝，我感到高兴。你的家乡肯定是在这里（指上海）。”刘念义承认，上海在被共产党接管之后经历了一场危机，但是他认为“上海总算未经受多大损害而度过了危机”。他指称，损失完全是由国民党造成的，“想起国民党军队总溃退

前对财产的肆意破坏，真令人痛心。我们的胶厂就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但根据刘念义的说法，野蛮而破坏成性的国民党部队业已被纪律严明的共产党部队所取代，后者为上海带来的好处和前者对上海的坏处一样明显。“拿这批军队来与解放军对比，简直是不公平的。他们是全然不同的两类人。”[22]

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的短短两周之内，新政府已经赢得了城里“老百姓”的人心。刘念义在给刘鸿生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以下的结论是市内老百姓所一致公认的：新政府宽大、讲道理、十分廉洁、埋头苦干、讲求实际、爱国、朴素，因而肯定是好的……他们是十全十美的。”[23]在报告了老百姓关于新政府十全十美的看法的同时，刘念义又以几乎同样积极乐观的笔调，表达了自己对共产党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他们完全有成功的机会。有一个时期，我对抗战胜利后所发生的事情极感悲观，但现在我已经改变了我的看法。从人民政府获得的新希望将给我勇气去克服未来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艰苦。”[24]除了谈到老百姓和他本人的看法外，刘念义还强调说，即便是上海反共分子中对共产党最抱怀疑态度的那批人现在也改变了立场，看好新政府：“即使是过去对共产党严加指摘的人，现在也承认：我们国家的命运再也没有象今天这样被有效地掌握着。现在的人民政府带来了使中国变成一个强盛国家的希望。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并将带来各种个人的困难和艰苦。然而，这是正确的方向。”[25]

刘念义告诉父亲，既然新政府已经给老百姓、刘家成员、甚至是以前反对共产党的人都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现在是他回家的时候了。“你的家乡肯定是在这里，在这里您才有可能做出更大的事情，而您的才能将受到更好的尊重。”刘念义还表示，如果自己的信还不足以说服父亲，他一旦得到新政府的批准，就会立即亲自前往香港。他写道，到时候“最恳切地希望您做好准备，和我一起回上海”。[26]

但刘念义直到5个月后才得以前往香港。1949年10月（即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上海市政府委派刘念义前往香港，陪伴父亲回上海，但刘念义此行未能达到目的。根据并未去香港的四子刘念智的说法，香港“到处进行反动宣传。有一个朋友对他（刘鸿生）说：

共产党什么都有办法，只是经济没办法。他认为这话颇有道理。面对这种宣传，我父亲不免受到了影响。……主张等一等，看一看，再作决定。”[27] 刘念义颇为父亲的决定感到沮丧，他不得不独自回到上海。

1949 年 10 月末，已定都北京的新政府总理周恩来派遣特使到香港，试图说服在那里的中国资本家返回大陆。周恩来的特使向刘鸿生和其他在香港的资本家强调说，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新政府；只要他们是爱国的，他们回国就会受到欢迎，他们的家庭和财产会受到保护，他们还会获得以领导人身份为国家服务的机会。[28]

周恩来的特使显然让刘鸿生相信，他在上海可以找到比香港更多也更具前途的商业机会。刘鸿生在香港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从中国西北购买羊毛，再出售给美国的地毯制造商。在这笔生意失败后，刘鸿生告诉儿子们，他已经做好了从香港返回上海的准备。[29] 在此情况下，刘念义再度启程前往香港。他一到香港，刘鸿生就向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回国（他在回国后又对家人们重复了同样的说法）：“我已经是六十出头的老人了！我的事业都在国内，不想留在海外做白华（即当时与俄国革命时期的白俄流亡者相似的中国人——高家龙注）。现在你们都盼望我回去，我一个人流落在海外，有什么意思呢！我决定回去。”[30] 为了避免国民党政府特务的骚扰，刘鸿生和刘念义偷偷登上了英国太古公司的一艘轮船，乘船从香港前往北方港口天津。[31]11 月 3 日，刘鸿生在天津码头对闻风而来的新闻记者谈到了他和其他资本家从香港返回大陆的三个理由：他们所有的企业都在上海，他们带往香港的所有资金很快就会用尽，他们对于财产被新政府没收的所有恐惧也已不复存在。他还预测道，像他那样的其他资本家也会很快从香港回归大陆，并举了“味精大王”吴蕴初为例，而事实上吴真的很快就回国了。[32]

（二）被推上领导岗位

从 1949 年 11 月 3 日刘鸿生乘坐的船只抵达天津港的那一刻起，他便发现，新政府的官员们言而有信，给了他很多成为领导人的机会。刘鸿生刚刚从太古商行轮船登岸，便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一份电报，邀请

他和次子到北京去。于是，刘鸿生径直前往北京，当天便同周恩来共进午餐，历时两个半钟头。周恩来向刘鸿生保证，他的工厂和私人财产将会获得保护，他也可以保留过去的生活方式。周恩来要求刘鸿生同新政府密切合作，以便为其他实业家和商人树立榜样。

周恩来称刘鸿生为“民族工商业者”，而不是“官僚买办资本家”，刘鸿生听到后不敢相信，便问周恩来，这一称呼是否适用于自己。他表示，自己过去曾在英国人的开滦煤矿管理局中担任过买办，还曾以官员身份管理过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轮船招商局。周恩来向他解释说，共产党使用这个词语，旨在说明赞同资本家中的一个群体（民族资产阶级）而反对另一个群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之后，刘鸿生才接受了周恩来的说法，并松了一口气。他随后又问周恩来，自己所有的华东煤矿和其他企业能否一并得到归还，但他却发现“民族工商业”的新身份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资产便会自然而然地回到他手中来。周恩来解释说，刘鸿生可以拿回所有属于轻工业的其他企业，但为重工业提供煤炭的华东煤矿不在其列，这是因为，根据新政府的政策，这些企业一律要归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管理。周恩来至多能保证的，是刘鸿生因华东煤矿而受到的损失最终将会得到补偿。[33]

第二天，即 1949 年 11 月 4 日，刘鸿生在返回上海时受到了上海新市长陈毅的正式欢迎。陈毅在家中设宴热情款待刘鸿生，并鼓励他在遇到问题或困难时直接找市长解决。几乎在一夜之间，刘鸿生发现自己已被任命为好几个重要委员会的成员，同共产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平起平坐。1949 年 12 月 18 日，距刘鸿生返回大陆还不到六个星期，他就当上了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政协由市长陈毅亲自挂帅，成员中还包括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此人是上海的新政治领导与资本家之间的主要联络人（见本书第二章，著者魏斐德）。除了在政协和其他委员会中任职外，刘鸿生还在诸如华东军政委员会这样的管辖范围超出上海的机构中任职，并就各种地方性、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问题发表演讲。[34]

刘鸿生在演讲中（这些演讲随后都会在报纸上发表）对新政府的领导表示鼎力支持，并提出像他这样的企业家应当遵守共产党的各项政策。1949 年 12 月 17 日，他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成员的身份发表演讲。他

回忆道，上海曾是“半殖民地的都市”，像他这样的中国人在工业和商业中都“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挣扎得透不过气来”；但现在“上海的解放，给产业界开创了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使产业界转入于一个完全摆脱桎梏的新环境”。他承认，即使在这个新世界里，中国企业家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他因而要求工商业界同人做好准备，效法共产党“百折不挠、刻苦奋斗”的精神，“吃苦在先，享乐在后”。[35]

刘鸿生在要求企业界同人从共产党那里汲取前进力量的同时，还就改革中国工业以发展出口贸易提出了具体建议，其中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后来为1950和1960年代的香港和台湾、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所采纳并最终创造出了“经济奇迹”的发展战略。在勾勒他的设想时，刘鸿生以自己的毛纺厂为例子，隐隐地向政府表达了在这一个案上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的希望。他提议，作为第一步应当从西北地区采购羊毛，他几个月前就曾在香港进行过这一尝试但是失败了。但与过去不同，他现在计划利用他的上海章化毛纺厂将这些羊毛加工成呢料，而不是向海外出售原羊毛。在第二阶段，他要将羊毛制成产品出口到国外去，主要的出口对象是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等较易进入的市场，其次才是欧洲和美国这些较难进入的市场，以此换取外汇。在第三阶段，他将利用外汇来购买外国制造的生产物资，尤其是他在上海的大中华火柴厂为制造火柴所需的化学原料，从而完成从出口到进口、再到出口的整个循环过程。[36]

在发表这些公开演讲的同时，刘鸿生私下里告诉四子刘念智说，他预计政府计划部门会通过向国营企业——而不是像他这样的私营工厂——提供政府合同的方式来实行他的想法。结果，当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向他的毛纺厂而不是国营厂家订购政府官员的呢制服时，刘鸿生真是喜出望外。在他看来，这一决定意味着政府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中都把他当作是共产党统治下的可资信赖的资本家了。[37]

（三）返乡的实用主义理由

正如上文所揭示，刘鸿生选择在大陆生活的理由在返乡后发生了变化。在他离开香港前，甚至在他返回大陆后的最初日子里，他返乡的突出原因仍然是实用主义的考虑，而并非民族主义的理由。他从香港返回上海前夕曾表示，自己这么做是由于年纪大了，希望能靠近自己的工厂企业，同时还因为上海的家人们也盼望他回去。在那个时候，当很多中国资本家考虑是在上海还是在香港生活时，这些想法似乎也是他们内心的主要考虑。[38] 刘鸿生回到大陆时，对新闻记者诉说了略有不同、但同样是非政治性的返乡原因：他的工厂坐落在上海，他在香港的资源存在着用尽枯竭的危险，以及新政府允许他保留在国内的财产的保证，等等。他在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中，对于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身份界定仍然感到疑惑，因而询问周恩来用“民族工商业者”一词来形容自己是否妥当。周恩来耐心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用这个词语来表示对一部分资本家的嘉许并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用意，直到这之后，刘鸿生才消除了疑虑。

上述例子说明，刘鸿生之所以离开香港并返回中国大陆，并不是因为他有不同于买办官僚资本家的那种民族资本家的意识形态倾向，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不讲究实用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直到他返回上海并全身心投入人民共和国的生活和工作之后，才在促使所有资本家——特别是自己的儿子们——返回中国大陆这一重要问题上，开始采纳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立场。

三、召唤海外家人返乡

如果说，刘鸿生在返回中国大陆后开始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事业，那么，这种新定位是不是也导致了他对于家族生存战略的修正？刘鸿生返回上海后发表了一系列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演讲及其他公开声明，号召所有中国企业家下定决心同人民共和国站在一起，并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和力量。然而，他是否能言行一致地把自己的家人从香港和台湾

召唤回大陆生活和工作呢？其实，就在他刚刚返回上海后不久，他就开始联系在海外的儿子们，要求他们返乡。

（一）指示儿子们返乡

1949 年末和 1950 年初，刘鸿生不仅在演讲中公开拥护共产党新政府，给当时正在香港的八子刘念信的家信也如出一辙。刘念信最近才从麻省理工学院（1947 级）和哈佛大学商学院（1949 级）毕业，于 1949 年 11 月中旬从美国坐船抵达香港。他原本希望看到的是父亲——有可能甚至是整个刘家——都已经逃到了香港。但他却发现，父亲已经离开香港前往上海，并留下了口信，要他也这么做。

除了召唤刘念信返回上海外，刘鸿生还指示他将 20 世纪 40 年代末前往台湾的五哥刘念孝和七哥刘念忠也带回来，这是刘鸿生当时仍在海外的另两个儿子。刘鸿生一定要这兄弟俩立刻从台湾启程前往香港，然后再与刘念信一起返回上海，“同作归计，乐叙天伦。”[39]

尽管有父亲的这番指示，但刘念信并未将五哥和七哥带回上海，不过，他自己的确于 1950 年初返回上海，并得以与母亲团聚。母亲向来十分宠爱他，并一直同他保持着通信联络，自从他于 1945 年赴美之后，已近五年未见到过他了。但刘念信与父兄的关系——尤其是在他是否应当永久返回大陆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和工作这一问题上——却没有这般融洽。父亲为他提供了一个到西北地区担任羊毛专家的工作机会，而长兄则试图吸引他到华中的一个蛋粉厂工作。但是，二哥和六哥却对他所受过的教育有些不屑，事实上，他们甚至怀疑刘念信所受的教育是否让他做好了就业的准备。他们告诉刘念信，他在哈佛商学院所受的教育是“非常反动的”，所以，他应该通过接受“再教育”来开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生活。只有四哥认为他应当遵从刘家在解放前“不要将所有鸡蛋（我们这些兄弟）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战略，劝说他返回香港。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之后，刘念信接受了四哥的建议，乘火车从上海回到了香港。

（二）中国是一个拥有自由的国家

在刘念信返回香港后，刘鸿生继续坚持认为，他和五子刘念孝和七子刘念忠都应当永久性地返回中国大陆，同时，也对他们不肯这么做表示出了与日俱增的失望。在刘念信看来，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是不可忍受的，因为他的自由会被剥夺。刘鸿生根本听不进刘念信的这番争辩。1950 年 3 月 28 日，他写信给在香港的刘念信说：

> “接读二十日来信，借悉汝畏惧国内思想不自由，以为逗留国外比较妥善，此系重视个人本位主义兼受国际歪曲宣传之影响，遂致真相不明，疑而不决。汝已达自立之年，与余六旬以外之人观点容有不同，但就事实研究，必可获得一致之意见。”[40]

为了让刘念信在自由问题上与自己达成“一致意见”，刘鸿生反驳了他关于自由存在于美国、香港和解放前的上海的看法。他说，“但究其实际，则（这些地方的）所谓自由，完全虚假。”

刘鸿生还认为，刘念信在美国时受到了当地特殊环境的影响，已为关于自由的错误理念所浸染。对于在 1937 年就让只有 16 岁的刘念信首途赴美求学，刘鸿生颇有些后悔：“汝出国太早，在美无年长者之商量，凡事全凭自己个人意见处理，渐至对父、兄之劝导亦发生怀疑……。汝留美日久，受美国宣传之影响，成见已深，一时不易改变。”[41] 如果刘念信能够批判性地看待美国的宣传并摆脱美国式的偏见，那么他就会看到美国缺乏自由，对于华人与黑人而言尤其如此。刘鸿生对这位受过美式教育的儿子谆谆言道：“又如在美华侨与黑人居住地区均有限制，不得自由选择，而华人进入美境时所受种种不合理之虐待，更令人疾首痛心。”[42]

刘鸿生还写道，对比之下，香港“虽较美国自由”，但对华人而言，任何自由均为英国殖民统治所削弱。根据自己最近的切身体验，他观察到：“至国人留居香港，虽觉嫖、赌、吃、喝，无不自由，但若经营正当事业，如国际贸易之轮船公司等，其董事长或总经理非英国人或其他国籍人士不可……”[43] 他向儿子解释说，即使是自负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其实也并未给香港的华人带来自由，因为“法庭上所援用之英国法

律，暗中包庇坏人，以达其繁荣香港之目的。故目下华人以香港为安乐窝，实与余未出国前不觉丧失自由之同样可怜也。”[44]

刘鸿生承认，他生活在解放前的上海，曾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是在笃信自己拥有自由的信念中长大的。直到1927年，当他已经快40岁时，他才意识到这一信念无非是海市蜃楼而已。他回忆说，在旧上海：

> “……在租界内之高等华人，其言论行动亦受外国巡捕之管制，仅身受者不自觉耳。余生长租界内，对于丧失自由，初亦未觉。迨一九二七年游历欧美，见彼邦公园人人可以入内游览，反顾上海租界内之公园，却高挂‘狗与华人不得入内’之告示，始恍然于欧美人对待华人之不合理。”[45]

刘鸿生又指出，在上海和香港，享有特权的西方人与国内的贪官污吏剥夺了人民的自由。他告诉八子：

> “须知沪、港两埠之发达，全由于欧、美人占据后靠不平等条约之保护，享受种种特别权利，兼以中国官吏贪污无能，人民知识浅薄，无世界眼光，但求舒适享乐，造成港、沪两埠之畸形繁荣。对于国内之普遍穷困，民生憔瘁，漠不关心，此乃无可否认之事实，谅汝亦甚明了。”[46]

刘鸿生强调，凡是对中国人民的贫困和生活每况愈下的状况视而不见的领导人，都永远不会为他们带来体验真正自由的机会。他的结论是，新中国领导人正在成功地从事着对于中国的改造，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视野中不存在这一盲点。

刘鸿生在1950年3月给八子的一封信中说：“余返沪已五月有余，眼见上海解放后与前大不相同。”根据他的观察，革命者只是剥夺了那些罪有应得的人的自由，而并没有剥夺其他人的自由。“共党办事谨慎小心，处处着重实际，务求彻底明了，不贪污，不循情，人民不得隐瞒，不敢犯法，故除逃税或犯法不自由外，凡守法人士，并不觉得所谓‘不自由’。”[47]

在谈了自己的亲身体会之后，刘鸿生再次对刘念信许诺道，只要他愿意接受父亲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和看法，便会为他在中国毛纺工业中谋

得一个称心的职位。“若汝以余上述各点为然，肯改变观念，毅然返国，为生产事业服务，余当负责在西北之私营或公私合营之企业中，觅一适当位置。汝在美曾至毛毯厂学习试验毛样，必可大展所长，则有厚望焉。”[48]

然而，父亲这番不动感情的论述以及对八子的殷切期望，却未能说服他（也未能说服五子和七子）返回上海。但父亲的立场却显示，他已经放弃了通过将家族成员分散到海外来减少生意和个人风险的家族生存战略。刘鸿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及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间——一直教育儿子们不要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现在，他却一定要他们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并投身于同一个事业。

刘鸿生写给刘念信家书中所用措辞表明，他对于意识形态的信奉并不仅仅局限于演讲和其他公开声明。1949年11月，他为自己返回上海之举所列举的理由还几乎都是纯粹非政治性的。然而，返沪仅仅五个月后，在以上引用的这封写于1950年3月28日的信中，他要求刘念信返乡的理由却有着高度的政治色彩。仅仅就这件事判断我们还难以断定刘鸿生言辞的政治化究竟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信仰发生了转变，还是由于他返回大陆后受到了审查或自我审查制度的制约。不管刘鸿生身上的这种意识形态变化是出于什么原因，在这之后他又经历了更大的转变。在要求家人们留在大陆或从海外返乡时，他所列举的理由带上了越来越浓的意识形态色彩。

（三）在朝鲜战争中走上民族主义之路

尽管以上所引用的刘鸿生家书和演讲都包括了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批判，但直到1950年末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并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相对抗时，刘鸿生才开始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并以此为理由要求儿子返回大陆。刘鸿生曾就读于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立的），自学生时代起，他便对美国的力量充满着敬畏之感。即使是在朝鲜战争打响之后，他起初仍对抗美援朝运动持怀疑态度。1950年9月、10月，美国人将北朝鲜部

队赶出南朝鲜并占领了北朝鲜首都平壤之后，刘鸿生还担心美国人会在他的家乡上海投掷原子弹。[49] 然而，到 1950 年 12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北朝鲜并将联合国部队逐回到三八线以南地区时，他因爱国主义而产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并开始热情地投入到抗美援朝运动中去。

刘鸿生并不是在抗美援朝中捐献财物的唯一资本家（参见本书第四章温奈良的论述），但他在上海企业家中起到了领头人物的作用。他的企业为购买飞机和大炮捐款，而他本人也亲自发表演讲，鼓励员工和其他企业家捐献财物。刘鸿生向前线部队捐赠了一千套毛呢制服，并亲自给一千名负伤的志愿军战士写信，这些行动既有着实际内容，也富有象征性意义。上海的《文汇报》专门就刘鸿生的爱国行动发表了社论，称颂他为所有中国人的楷模。[50]

以父亲为榜样，次子刘念义亲身参与了朝鲜战争。1951 年春，他作为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的成员访问了朝鲜。在朝鲜期间，他探访了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并用他 1930 年代就读剑桥大学时所学到的英语同美国战俘交谈。1952 年，他以第二届慰问团团员的身份再次访问了朝鲜。在听了刘念义关于朝鲜之行的介绍后，刘鸿生表示，他为志愿军战士的勇敢而深深感动。1952 年，他对家人说："我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51]

（四）在五反运动中出任国家领导人

如果说，朝鲜战争为刘鸿生将整个家族留在大陆带来了民族主义的新理由，那么，五反运动又为此而加上了政治上的原因——这是因为，刘鸿生在这场运动后被抬升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先是成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之后又被任命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然而，他是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才获得这些高位的。

在 1952 年的头几个月里，刘氏家族和上海以及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的资本家一样，都成了党所发动的五反运动的目标。这一运动之所以被称为五反运动，是因为它旨在消除五种不法行为：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窃取国家经济情报。从 1952 年 1 月到 5 月，上

海有数以千计的资本家受到了工人、其他资本家、乃至于自己家人的批判和清算。当人们上街游行，并用高音喇叭喊出不法资本家的名字时，资本家们必须让五反工作队进厂查账，而在多数情况下，也不能不招认自己的罪行。在五反运动中，资本家们所经历的磨难有多有少，但即便对那些没有招认出任何罪行的工商业者来说，他们也会因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而感到在社会上受到了羞辱，地位下降了。[52]

若与其他资本家相比较，刘鸿生似乎更处于一种不致于受到五反运动冲击的地位。早在五反运动开展的两年前，当政府首次颁布反对偷税漏税和其他经济犯罪行为的法律时，刘鸿生便立即对这些新法律公开表示赞同。1950 年，他在上海市政协的一次会议上代表工商业者发言时说："商人讲究信实，逃税者不信不实，是工商界败类，应停止和他往来。"可以说，刘鸿生早就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五反运动，他因而主张对违反新法律者"应予严厉制裁，不必顾及情面"。[53]

尽管刘鸿生在五反运动前就已摆出了道德上的高姿态，并要求其他资本家遵守针对经济犯罪的新法律，但他并没有因此便逃过这场运动。1952 年初，当刘鸿生被党的干部当作运动的对象时，他生病了。他已经六十四岁，心脏出了问题，病倒后呆在家里康复。当运动达到高潮时，他向家人担心地表示，这场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末日来临了。四子刘念智后来回忆说，刘鸿生在病榻上告诉儿子们："如今国家有了前途，共产党在经济上也很有一套办法，可以不要资产阶级这个朋友了。你们各走各的路，各想各的办法去罢！"[54]

然而，五反运动的调查结果公布后，刘鸿生和家人们发现他们不仅在运动中生存了下来，而且还获得了大量好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是清白的，被宣布为"守法户"。事实上，他们被当作民族资本家的楷模而受到了表扬，并得到了 250 万元的特别财政资助，另外还得到了自其他一些不那么守法的资本家处没收而来的 280 万元物资。刘鸿生还应邀到北京与毛泽东一起用餐。回到上海后，他给了家人们一颗定心丸：共产党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他对一位日本记者表示，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他会抱着比以往更大的热情，"走社会主义道路"。[55]

刘鸿生在五反运动结束时获得解脱，这使得他和刘氏家族在国内获得了政治上清白无疵的记录，然而，他仍然面临着因几个儿子们逗留海外而带来的一系列有待解答的问题：如果刘家真是一个模范家族，为什么家里却有几个儿子没有回到上海和他们一起生活呢？在海外的这几个儿子是否持有刘家从中国偷运出去、本来应当拿回到上海来的资金？刘鸿生既然是民族工商业者的模范，那他难道不应该保证让整个家族及其所拥有的资源都用来为国家利益服务吗？

如前所述，自 1949 年末以来，刘鸿生便一再指令身在香港的八子刘念信同五子和七子一起返回上海，试图通过这种做法来打消人们对于刘家是否忠于新中国的任何怀疑。直到 1952 年刘鸿生仍无法联系到生活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的刘念孝和刘念忠，但他却有能力采取激烈措施迫使刘念信从香港返回上海，而他确实也这么做了。

（五）不由自主地将所有鸡蛋放到了一个篮子里

1952 年 7 月，当五反运动结束之后，六子刘公诚从上海出发前往香港，劝说八子刘念信与他一起返沪。表面上，刘公诚和妻子此行的目的是出席妻弟在香港的婚礼。刘公诚从 1930 年代起便是一名共产党员了，1949 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对新政府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忠诚，因此，他们夫妇毫无困难地便得到了离开大陆前往香港的许可。

奢华的婚礼在香港豪华的半岛酒店举行，此后，刘公诚与刘念信会面讨论家中事务。他们两人年龄相仿，一个 36 岁，一个 31 岁。1945 年到 1947 年间，他们还只有二十来岁，都在美国公司实习，相互间因而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到过对方了，互相谈起了各自的现状。刘念信在一家瑞士海外贸易公司任销售工程师，他不无骄傲地描述了自己的工作，以证明上海的兄长们当年关于他在香港永远也找不到工作的警告是错误的。而刘公诚也讲述了刘氏家族在大陆的生活。

刘公诚介绍家族情况的高潮部分，是煞有介事地透露了他此行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消息：64 岁的母亲病重，并希望能在病榻之侧见到刘念信。他们两人都知道，这个消息会令刘念信极为痛苦，因为母亲打他小时候

起就十分宠爱他，并在他 1937–1941 年、1945–1949 年两次长期留美期间一直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

刘念信为母亲的健康深感焦虑，立刻收拾行囊，与兄嫂一起北返上海。但是，他们刚刚越过香港和大陆的分界线，刘公诚便承认他撒了谎。在深圳的罗湖火车站，当兄弟两人从香港来的列车上取下行李并准备换乘去上海的火车时，刘公诚向弟弟保证说，母亲身体无恙，还承认他说母亲患病只是为了要引诱弟弟返回大陆。刘念信知道了真相后震惊万分，将行李摔烂在了站台上。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拼命地想要离开大陆，但在此后的 27 年间，他的要求一直未能得到批准。直到 1979 年，他才最终得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久移居美国。[56]

结　论

随着八子刘念信的返回，刘鸿生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九个儿子中又多了一个在上海陪伴他的人。1953 年到 1956 年间，刘鸿生和他在大陆的儿子们拥护并执行了政府将私人工商业国有化的政策。早在 1953 年 10 月，在中华全国工商联的第一次会议上，刘鸿生便听到了党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号召。根据四子刘念智的说法，刘鸿生立即便对将刘家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的想法表示赞同。后来，刘家企业于 1956 年初完成了这一改造过程。[57]

当刘鸿生被问及对于失去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有何感想时，他表示自己并不后悔。正如他对四子刘念智所解释的那样，他非常感谢党将他的企业国有化，因为这解除了他的两个最大的担忧：企业在他有生之年遭遇破产，以及家族内部在他死后发生抢夺财产的争斗。刘鸿生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表示，因为国家按照他企业的价值（1956 年的估价为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百分之五向他支付定息，他生活得舒适安逸。弥留之际，刘鸿生嘱咐刘念智说，他死后，在大陆的子女们应当平分定息，之后则应当自愿将定息的一部分上缴国家，以表达他对于党的感激之情。在留下了这些遗言后不久，刘鸿生于 1956 年 10 月 1 日因心力衰竭而与

世长辞，享年 68 岁。这一天，正好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 周年的日子。[58]

1956 年，刘鸿生的心情似乎不太可能会像刘念智所描述的那样乐观、那样平静，尤其是在他和家人经历过一系列事件之后：发生于革命时期的动乱、在五反运动中受到的羞辱、社会主义过渡进程中家族对事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丧失。尽管如此，已经披露的证据确凿地表明，刘鸿生希望所有的家人都生活在人民共和国，而且对这么多家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陪伴着他感到由衷地欣慰。他在革命后返回大陆的决定，他劝说儿子们从海外返乡的努力、他将一个并非心甘情愿的儿子成功地带回上海的行动，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一结论的印证。

刘鸿生为家族生存所奉行的战略，同现存的关于 1949 年共产党革命期间中国资本家何以会作出留在国内或返回大陆的各种解释不太吻合。正如本文所揭示，刘鸿生从香港返回大陆的动机同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定义并不契合。1949 年 11 月 3 日，亦即刘鸿生返回大陆的那一天，当周恩来称他为“民族工商业者”时，他起初还对这一说法是否适用于自己抱怀疑态度。只有在周恩来告诉他这个说法表明了党对于他的认可之后，他才接受了这一说法，并以此来称呼自己。更关键的是，他在返回大陆之前并不信奉民族主义。直到回到大陆后，他才以民族主义为理由，促使儿子们也返回大陆；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之后，他才平生第一次宣布，他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如果说民族主义的动机解释不了刘鸿生返回中国大陆的决定，那么，跨国主义的理由也无法说明他何以会召唤家人回国。革命前，他便已打破了国界观念的限制，将儿女送到海外，让他们在美国、英国和日本接受教育。他反复鼓吹，家族成员应当散居到海外，不应当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就是说，不应当都留在中国）。迟至 1949 年年中，当刘鸿生在客居香港的六个月中反复权衡是否应当返回大陆时，他无疑也在考虑是否应当疏散家族成员和分散家族生意的风险（就像他曾在抗日战争期间做过的那样）。但是，在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后不久，刘鸿生显然已经得出结论：上述战略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行之

有效了。1949 年 11 月他回到上海后，马上想尽办法让刘家的所有成员都返回大陆。他在家信中恳求他们返乡，甚至还将一个儿子骗回国内。

刘家既缺乏民族主义方面的动机，又放弃了跨越国界的生意网络，这就说明，他们之所以留在或返回大陆，归根结底是为了作为一个家族去追逐新的机会。到 1949 年，父亲和母亲都已年过花甲，希望在晚年子孙绕膝，乐享天伦。刘鸿生和儿子们都认为，自己虽是资本家，但在共产主义之下仍然可以保持显赫的地位。1952 年初，他们在五反运动中对自己是否重要到不可或缺的地步产生了疑问。但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们仍然坚持整个家族应当在人民共和国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信念——他们在 1952 年夏五反运动结束后成功迫使八子刘念义回国的举动便说明了这一点。之后，特别是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刘家一些成员开始后悔当初留在大陆的决定。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二子自杀身亡。但在共和国初年，除了八子以外的所有人都相信，他们身上的资本家标签是可以与共产主义并存的。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刘家和其他资本家在革命后或者留在大陆、或者从海外返回大陆。从长远来看，这是否为资本主义在共产主义下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一种先例？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后期，毛泽东时代的各种运动似乎已在当时清除了中国所有资本家（尽管并未清除中国的所有走资派）。然而，随着 70 年代末改革的兴起、2001 年和 2002 年间吸收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出台，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刘家关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可以在中国并存的信念似乎是有其合理性的。

姚昱、王元崇译，陈兼校订

注释

1 Mao Zedong, *The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969), 4:167–169.

2 最近有关这方面的历史研究的例子，可以参见 Tim Wright, ed.,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Recent Studie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2); 及 Tim Wright, "The Spiritual Heritage of Chinese Capit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 205–238.

3 Siu-lun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8.

4 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213.

5 关于荣氏与郭氏家族例子的简短介绍，见 Wong, 28–31; 及 Lynn T. White III, "Leadership in Shanghai, 1955–69," in Robert A. Scalapino, ed.,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306。

6 刘氏家族档案，保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心。1958年，也就是刘鸿生逝世两年之后，刘鸿生四子刘念智将这些档案作为《刘鸿生文集》的一部分存放到了那里。一些刘氏家族的信件已经出版，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本文注释所引用的刘氏家族已公开的信件，均来自于《刘鸿生企业史料》，而未公开的信件，则来自于《刘鸿生文集》。

7 Sherman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chapter 7; Coble, 182–194.

8 《一九四五年父亲刘鸿生致妻子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刘鸿生致刘吉生函》，《刘鸿生文集》；Cochran, 167–174; Coble, 187–189; 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C. Howard,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2:399.

9 《一九四八年二月九日八子刘念信致父母函》、《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八子刘念信致兄长函》、《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六日八子刘念信致长子刘念仁函》，《刘鸿生文集》；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回忆我的父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

10 本段中的引文引自 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82–183。

11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08–109页。

12 引自 Eastman, 192。

13 Ibid., 196–197.

14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0–111页。

15 同上，第98页。

16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2–113页。

17 同上，第111页。

18 同上，第112–113页。

19 同上，第114–115页。

20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章德化（音）致父亲》，《刘鸿生文集》；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 111–112 页。

21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 116 页。

22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刘鸿生次子刘念义致香港刘鸿生函》，《刘鸿生企业史料》第 3 卷，第 455–456 页。

23 《刘鸿生企业史料》第 3 卷，第 455–456 页。

24 同上。

25 同上。

26 同上。

27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 115–116 页。

28 同上。在这一部分，刘念智并未提到周恩来的特使们的名字。他们可能是潘宗尧与张惠农，这两个人是 1950 年周恩来派往香港的特使，劝说银行家陈光甫和其他金融家、资本家返回中国。见陈光甫：《陈光甫日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第 249–251 页。感谢李培德博士向我引荐这一材料。

29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六日八子刘念信致长子刘念仁函》，《刘鸿生文集》；《一九四八年七月四日、十九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刘鸿生自香港致胡逸耕函》，《刘鸿生企业史料》第 3 卷，第 368–372 页；《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刘鸿生五子刘念孝、七子刘念忠自台湾致刘鸿生函》，《刘鸿生企业史料》第 3 卷，第 454 页。

30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 116 页。

31 同上，第 115–116 页。

32 《文汇报》，1949 年 11 月 5 日。

33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 116–117 页。

34 《文汇报》，1949 年 12 月 18 日。

35 同上，1949 年 12 月 17 日。

36 同上，1949 年 12 月 17 日、1950 年 2 月 8 日。

37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 118–123 页。

38 其他例子见 Wong, 31–32。

39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刘鸿生致留美八子刘念信函》，《刘鸿生企业史料》第 3 卷，第 456–457 页。

40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刘鸿生致留美八子刘念信函》，《刘鸿生企业史料》第 3 卷，第 457–458 页。

41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刘鸿生致留美八子刘念信函》，《刘鸿生企业史料》第 3 卷，第 457–458 页。

42 同上。

43 同上。

44 同上。

45 同上。关于这一引述中所提到的这一引发争议的告示，见 Robert A. Bickers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China Quarterly* 142 (June 1995): 444–466。

46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刘鸿生复刘念信函》，《刘鸿生企业史料》第 3 卷，第 457–458 页。

47 同上。

48 同上。

49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 120 页。

50 《文汇报》，1951 年 1 月 16 日。

51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 120–121 页。

52 John Gardner, "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 A Study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Urban Control," in A.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477–539.

53 《文汇报》，1950 年 9 月 5 日、12 月 2 日。引述部分来自后者。

54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 120 页。

55 渡边卓郎：《资本家的自我改造》，日本法律家访中代表团、国际法律家联络协会著：《中国的法与社会：访中法律家代表团之报告》，东京：新读书社，1960 年，第 164–166 页。

56 刘鸿生于 1949 年和 1950 年初召唤八子回国的联合行动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有关一位年届花甲的父亲在 1949 年与 1950 年初召唤儿子从香港回上海管理家族企业的例子，请参见 Wong, 34。

57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 123–125 页。

58 同上，第 125–126 页。

撰稿人简介

周杰荣（Jeremy Brown），西蒙弗雷泽大学历史学助教授，他的新书稿关注的是毛泽东时期的城乡关系。他写的关于江青树立小靳庄为典型的一章，收入《作为历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2006 年）。

陈兼（Chen Jian），康乃尔大学中美关系史迈克尔·查克讲座教授（Michael Zak Professor of History），中国和亚太研究项目主任。有多部著作，包括《中国通往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的形成》（1994 年）、《中共对外政策与亚洲的冷战》（1996 年，合编）、《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2001 年）。

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康乃尔大学中国史胡适讲座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商业史。最近出版的著作是《中国药商：中国和东南亚的消费文化》（2006 年）。

温奈良（Nara Dillon），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讲师。与戴慕珍（Jean Oi）合编《诸帝国的十字路口：民国时期上海的中间人、社会网络和国家建设》（即将出版）。她正在写一本题为《福利国家的悖论：革命上海的特权政治》的书。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教授，中国研究魏枝和朱丽叶·秀讲座教授（Hwei-chih and Julia Hsiu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音译）。著有《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1976 年）；《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6 年）。他最近在写一本有关叶氏家族和现代中国的书。

高铮（James Z. Gao），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历史学副教授。著有《共产党接管杭州：城市和干部的转变，1949–1954》（2004 年），另有若干

以现代中国为主题的论文。高最近在研究“上海的市场：米粮、商人和国家，1866–1955”。

贺萧（Gail Hershatter），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学教授。著有《天津的工人，1900–1949》（1986 年）、《个人的声音：1980 年代的中国妇女》（与韩起澜 [Emily Honig] 合著，1988 年）、《危险的愉悦：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1997 年）、《中国漫长 20 世纪中的妇女》（2007 年）。他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为“性别记忆：乡村妇女与中国的集体记忆”。

何凯思（Christian A. Hess），华威大学亚洲史助教授、英国研究学会理事。最近刚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完成现代中国史博士学位课程。他正在修改博士论文，主题是在把大连这个城市重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过程中，战时的日本统治和随后的苏联占领之影响。

林培瑞（Perry Link），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荣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Chancellorial Chair for Innovation in Teaching Across Disciplines）。论著涵盖现代中国语言、文学、通俗文化和政治价值等诸领域。著有《文学的用处：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体制》（2000 年）。现在正研究当代中国语言中的节奏韵律、概念隐喻和政治程序是如何影响人们怎样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的。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亨利·罗索夫斯基讲座教授（Henry Rosovsky Professor of Government），东亚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近来正在研究中共初期的劳工运动及其政治影响，初步拟定的题目为《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

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和中国研究杰出教授。著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1981 年），合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1991 年）和《乡村中国的革命、抵抗与改革》（2005 年）。与人合编《民间中国》（1989 年）、《新中国电影》（1994 年）、《流行中国》（2002 年）、《作为历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2006 年）和《从地下到独立：当代中国的另类电影文化》（2006 年）。现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现代中国史荣誉主席。

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马萨诸塞大学艾姆赫斯特校区历史学副教授。研究兴趣集中在20世纪中国科学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发表论文有《培育一个更好的中国》（载《地理学评论》）、《台湾澎湖的渔业和渔夫》（载《东亚历史》）。她的第一本书即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人民的北京人：20世纪中国的科普和认同》。

李滨（Douglas A. Stiffler），宾夕法尼亚州杰亨廷顿地区朱尼亚塔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中苏关系和冷战时期的中国。他正在写一本有关19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时期”的书。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洲研究哈斯讲座教授。最近出版的著作是《间谍王：戴笠和中国特工》（2003年）。在他2006年9月去世前，他完成了一部书稿：《红星照耀上海》，研究的是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上海的安保工作。

索引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l Kerim Abasoff)195
艾沙·优素福·阿布泰金(Isa Yusuf Alptekin)194—195
阿卜杜拉希姆·阿敏(Abdurahim Amin)200—201
阿沛·阿旺晋美152, 155—156, 159
S. N. 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53
马里亚诺·埃斯佩拉塔(Mariano Ezpeleta)35
艾思奇247
赛福鼎·艾则孜(Saifudin Azizi)193, 201, 208
安德列·布尼臣(André Bonnichon)46—47
安全委员会40
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353

《巴格达窃贼》(*The Thief of Baghdad*)(电影)338—339
巴基斯坦144
八项规定30, 37—38
白沉286
百花运动77, 100, 255, 298, 319
白色恐怖71
白杨277, 292, 299
班禅喇嘛：
  承认问题156
  与达赖喇嘛146, 156
  与《十七点协议》158
  与西藏解放146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谈判156
帮会114, 116, 117, 130
鲍大可(A. Doak Barnett)236, 255
包尔汉(Burhan Shahidi)193, 195, 197, 198, 201, 207
保密局49
保卫上海委员会381
保育员205
北京法商学院333
北京市曲艺工作团224
北京师范大学306
北京猿人化石14, 245, 258—259
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14—15, 208, 271—299
边疆地区政策192—196；见“新疆地区”
边慎斋(又名边章五)177
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347
薄一波33, 94—95
步达生(Davidson Black)256

曹阿金68
曹荻秋140
曹漫之89
曹禺273
《参考消息》与家庭生活337
拆屋重建政策37—38
产假205, 362
产后护理357, 362, 363
产前护理357—358
产褥热355, 356, 357
昌都战役152—153
常宝堃225, 231, 232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经济影响92
朝鲜战争战俘110, 111, 115
与抵抗占领129－130
与共产主义的控制5
与相声段子229－230
与消灭西南地区的抵抗124
长征113, 121, 139
《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西南军区）152
陈保泰381
陈大同49
陈赓26
陈兼（Chen Jian）12, 137－160
陈金福74, 75
陈鲤庭275
陈良31
陈绵273
陈少景170
陈西禾289
陈毅：
与上海接管26, 27, 31, 32－34
与上海警察37
上海市长39, 95, 385
外表37
陈毓庆49
城市治理169, 185
迟子祥169, 175, 180
处决：
处决西南地区的反革命分子124
与示众126
通过群众运动进行处决90
慈善家：见“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83－102
慈善组织登记89－90
与反腐败运动98, 100－101
解散慈善组织89, 100
与抗美援朝运动392
统合慈善组织87－90
与新民主主义时期11, 84, 87－88
《从猿到人》（恩格斯著）244, 246
《从猿到人》（方且著）250, 261
《从猿到人发展史》（刘咸著）353－354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247, 249, 250－251, 346
达赖喇嘛：
与班禅喇嘛146, 156
地位与权力153, 155－156, 157
返回拉萨157
与《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156－157
与西藏精英149
掌权153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155
达扎153
打虎队93－94
大东烟厂68－70
《大改行》（相声段子）231
《大公报》关于北京猿人化石的报道259
大江健三郎217
大进军199－202
大连：
当地干部造反172－176
共产党接管12－13
民事政府166, 169
中苏文化关系181－185
中苏政治关系168－180
大连工业展览会（1949年）180
《大连人民日报》关于苏联军队的报道183
大上海青年服务队49
大跃进262－263
大中华火柴厂386
《大众电影》杂志与桑弧284

大众艺术剧团333
大专院校：
创建“新式”大学303—319
与对西南地区的占领113
接管44
与美国的影响306
与苏联顾问305—307, 308
卫生教育委员会355
与政治思想课程308
戴德380
道路建设153
邓力群201
邓小平：
与反革命118
与少数民族121
与西藏143
与消灭西南的抵抗124, 130
与占领西南地区113—114
关于征税114—115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339
迪化城的建立192
迪化商会198
尼尔·迪亚芒特(Neil Diamant)129
第二残老院98
地方官员与抵抗占领117—118
第十人民医院97
第一届上海人民代表大会86
第一军政干校202
地主117—118, 343
垫话(相声段子)220, 227, 230—231
电影：见“电影工业”
电影工业：
与反美运动295—297
与国民党人275
与国有化297
与家庭生活339—340
与中国共产党15, 275
电影管理局278
丁文291
定量票证42
东北抗日联军168
东北民主联军176
冬防委员会91—92
董必武88, 330
董崇斌168
杜鹏程196
杜平176
段祺瑞307
《对对联》(相声段子)226, 230
俄文大队310—311, 312
饿痨生(胎儿横产)356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
244, 246, 247—248, 249, 250—
251, 252, 254, 258, 263, 264

儿童：
与抚养子女的性别角色340—341
教养儿童335—336
1950年“二·六”大轰炸73—74

法国与上海警察29
法理47—49
反对逃税的运动92—99
反腐败运动93—99；也见三反运动，五反运动
反革命(也见镇压反革命运动)：
创世故事249, 250
与工人民兵75
在贵州116—122
在浦东50—51
消灭西南地区的反革命122—127
镇压49—50, 52—53
与征召加入人民解放军110
反官僚主义运动70

反美运动 91, 125
1957 年反右运动 218, 255, 298 －299, 347, 397
反左倾运动 177
泛突厥主义 194, 207
泛伊斯兰主义 194, 207
犯罪（也见“土匪”）：
　管制小型犯罪 44 －45
　武装抢劫 45 －48
　性侵犯 168 －169, 198
方成 218 －219
方旦 261
方实 328, 333 －334, 335, 339 －341, 344 －345
《访问杜勒斯》（相声段子）227
菲利波夫（V. E. Filippov）9, 305, 309, 310 －311, 313 －314
《飞油壶》（相声段子）228, 235 －236
费穆 273
费森科（P. I. Fesenko）305, 309
费侠莉（Charlotte Furth）355
分娩：见生育
讽刺与相声 7, 229 －231, 232, 233, 235, 236 －237, 240
伏羲 258
《腐蚀》（茅盾）288
复旦大学 255
傅高义（Ezra Vogel）4
妇联 352, 356, 361, 362, 366
妇女：
　分娩和接生 351 －369
　与家庭生活 340 －341
　苏联军队对妇女的恶行 168 －169
　与相声 221, 230
　新疆的妇女 206
　为新疆招募妇女 202 －206
　职业 205, 341
改造训练：见“思想改造学校”
干部（也见老革命干部）：
　与城市治理 169
　在大连的干部 168, 169 －172
　大连（干部）的反抗 172 －176
　与反腐败运动 95
　对干部进行教育的挑战 317 －318
　干部家庭 337
　干部训练 24 －26
　在人民大学的干部 304, 308, 309, 315 －319
　与上海警察的颠覆 28 －31
　少数民族干部 201
高岗 174
高家龙（Sherman Cochran）17, 86, 375 －397
高小贤 351, 352, 354
高峥（James Z. Gao）13, 111, 115, 191 －209
梅尔文·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147
格达喇嘛 147
噶厦：
　与《十七点协议》157
　与外交努力 147, 151, 153 －154
　与西藏解放 147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谈判 155 －156
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353
罗伯特·吉兰（Robert Guillain）38
公安局：
　与逮捕国民党秘密特工 51
　与定量票证 42
　公安局的成立 39 －40
　与工会 76 －77
　与管制小型犯罪 45 －46
工厂关闭 66

工潮64－71
工会：
工会的角色77－79
与群众运动90－91
与新民主主义时期11, 72
工人民兵71－77
民兵解散77
《工人日报》关于工会的报道78
工商局68－69
工业发展：
与大连185－186
与国有化93, 99, 385
与生产增长政策171－178, 179－180
转向工业发展77
工业破坏28, 49, 68, 72
工资等级345
共产党：
城市政策24, 166
与达赖喇嘛153
与抵抗组织109
与电影业275
与反左倾运动177
与工人民兵71
与国共联合战线85
与接生服务351－356
与刘鸿生379－380
与群众运动92
人民大学学生党员313
与桑弧383－384
与社会主义改造100－101
与统合资本家86－87
与吸收少数民族入党20
与西藏解放137－160
与西藏谈判指导方针149－1501
与相声217－243
在新疆安排婚姻204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83－84
与伊犁政权195
与在大连的工资纠纷174
与占领抵抗118
与中苏文化关系181－185
与中苏政治关系3, 167, 168－180
与资本家397
与资产阶级329
与宗教镇压243
共产主义青年团76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傅高义著）4
《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弗朗兹·舒尔曼著）4
《共同纲领》第十条37
孤儿院89, 91, 94, 97
古人类学244－245, 255－256, 262, 263
谷正伦116
关东行政公署172, 174, 175, 180
关东州租界地166
官僚买办资本家376, 385
《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156
管制流民45－46
《光明日报》和刘咸255
光中印染厂76
贵州省（也见“西南地区”）：
与抵抗占领12, 116－122
与反共抵抗109－130
郭琳爽86
《国恨家仇》（电影剧本）259
国际妇女节180
国立交通大学44
国民党：
被逮捕的国民党特工42, 44, 49, 50
与边远地区138
抵抗国民党116
与电影工业274

与工人民兵71
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85
与贵州的反革命分子116, 117
与货币改革378－379
与接生服务354－355
与劳工关系65－66, 70, 71, 72－75
作为列宁式政党国家78
与刘鸿生377－379
与丧失支持2
与上海26－27
与身份证41
与苏联关系166
与西藏12
与消灭西南地区的抵抗126
在新疆的国民党人193－194
与占领西南地区114, 118－119
与资本家85－86
国民党国防部49, 51
国民党民政局41
国民党革命军195
国泰电影公司274

哈佛商学院388
哈萨克人193, 194, 201
“海北民众反共纵队”与“东南国民救亡军”51
《海军上将乌萨科夫》(*Admiral Usakof*)(苏联电影)194
海外贸易公司394
迪特·海茵茨格(Dieter Heinzig)196
韩光169, 171, 172, 176, 177－178, 179－180
韩文焕116
韩文理254－255, 256
汉族12－13, 121, 191, 192, 193, 196, 200, 201, 203, 208－209
好莱坞电影8, 276
何迟14, 228, 233－234, 235－236, 237, 238, 239
合法权利77
何凯思(Christian A. Hess)12－13, 165－185, 344
《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156－159
核心家庭335, 348
何应钦31
合作化和接生站361－363
贺龙129
约翰·赫西(John Hersey)217
贺萧(Gail Hershatter)16, 290, 351－369
《黑人野兽》(*The Negro a Beast*)(Carroll著)260
侯宝林223, 227, 232－233
侯一尘223
欧内斯特·A. 胡顿(Earnest A. Hooton)260
胡风346
胡少梅51
胡锡奎307, 315－316, 317
胡正明118－119, 121, 123, 125－126
胡宗南23
护工队67, 68, 71, 72, 75, 76
沪杭铁路27
户口登记体系41－42
华北大学306, 307, 309, 310, 312－313
(中共)华东局25, 26
华东军政委员会385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286
华明烟厂75
华尔康381
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264
艾伦·怀廷(Allen Whiting)3, 195
黄绍芬271, 281, 283, 287, 295, 296
黄绍伦376
黄宗江271－272

黄宗英275, 299
回族140
荤(相声)段子221—222
婚姻5, 202—206, 335
《婚姻与迷信》(相声段子)233
货币改革：
　货币改革管制44
　与刘鸿生378—379
　苏联货币改革175
　在新疆198
　与占领抵抗120

阿瑟·基思(Arthur Keith)253, 256
暨南大学44, 253
嘉洛顿珠150
家庭：
　核心家庭的发展329, 335
　家庭规模335
　家长式的家族体系329
　家族企业376
　在建立家庭中党的帮助203—207
　在恐怖运动中逮捕家人126
　迁居大连170
　中苏友好故事中的家庭183
家长式大家庭329
家长制恐怖111
《贾博士》(相声段子)224
假币制造44
贾兰坡246, 248, 250, 251, 257, 261
假期205, 336, 338—339
假日与家庭生活338—339
简汉雄49
《建国纲领》330
健康护理：见"医疗护理"
剑桥大学382, 392
江浙皖特别敢死队49
讲故事与文化演变183—184, 339, 367—368
蒋介石：
　与撤离到台湾31
　与货币改革378
　与刘鸿生377—378
　与新疆193
蒋经国44, 49, 85, 378, 379
焦建和49
剿匪司令部55
教师203, 205, 249, 305, 307, 308, 310, 313, 319, 334
教研室308
教育(也见"大专院校")：
　俄语教学队伍310
　对干部进行城市管理教育24—26
　工农教育319
　护士学校205
　接生训练354—355
　"思想改造"学校309—310
　幼儿园336
接生服务351—369
　产后护理357—358
　产前护理357—358
　与分娩类型356—357
　与共产党352—354
　接生的卫生状况358—359
　接生服务组织登记97
　接生训练361—363
　接生员报酬362
　旧式接生法的挑战356—358
　新式接生法的引入16, 352—354, 358—361, 362
　助产士学校353—354
《解放昌都有关政策指示》(西藏工作委员会)152
《解放的囚犯》(李克和李又安著)3, 286
《解放日报》：
　出版读者的抱怨43

关于逮捕国民党秘密特工的报道 42
关于上海解放的报道39－40
金县170
金焰277
进化论：
与北京猿人255－259
与电影工业287
进化论的教授243－249
与人种257, 260, 261－262
与消灭唯心主义252－255
与古人类学246－249
经济问题：
与五反运动94, 393
与资产阶级329
警察：
警察训练26
上海警察的颠覆28－31
警察局员警消费合作社29
井圈生356
纠察：见“工人民兵”
纠察部72
救济服务与慈善组织96
居民委员会（居委会）42, 52－53
居民证41
《剧本》杂志关于相声的文章237
军队－警察－人民（政府）联合办公室 40
军管会32, 44, 50, 72
军垦13, 115, 202, 205, 207, 208
军事审讯112

伊利莎白·卡罗尔（Elisabeth Croll）356
《开会迷》（相声段子）228, 233, 235, 237
乔安·凯丽（Joan Kelly）252
康艺均49
抗美援朝运动：
与控制西南地区127－128
与刘鸿生391－392
与民盟的支持344
作为群众运动52
与私人慈善业91
与相声225
与叶笃庄345
与志愿军109
与对宗教的镇压253
抗日战争23, 29, 85, 88, 113, 116, 169, 173, 192, 328, 333, 377, 387
柯博文（Coble Parks）376
柯灵273, 288
喀什葛尔201
科瓦廖夫（E. F. Kovalev）310
柯伟林（William Kirby）6
科学：
与接生服务16
与唯物主义243－244
与意识形态14, 263－265
作为政治工具263－264
《科学通报》与刘咸255
恐怖运动（也见“家长制恐怖”）：
处决124－125
逮捕家庭成员111, 126
与消灭西南地区的抵抗124
苦干剧团273
赁延芳87, 88
昆仑影业公司274

蓝马275
劳保76
劳动部71, 76
《劳动创造了人》（贾兰坡）248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恩格斯著）244, 246
劳改营231, 238

劳工抗议64－71
劳教所46
老革命干部312, 314－319
老舍223－224, 226－228, 229, 236, 239
黎玉93
李滨（Douglas A. Stiffler）15, 303－319
李大钊254
李德生：见“毛泽东”
《礼记》258, 262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5
李克和李又安（Allyn and Adele Rickett）
3, 286
李丽华271
李立三70, 71, 76－77, 78
李森科（Trofim Lysenko）331, 332
李士英39, 44
李维汉155－156, 330
李廷安355
李宗仁26
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3, 247,
264
联合国：
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154
与善后救济署85
与西藏12, 147, 153－154
联合战线85
梁客浔197
良民证41
列宁（Vladimir Lenin）260
列宁主义4, 138, 295
林培瑞（Perry Link）7, 14, 217－240
临时救济委员会96
刘伯承113, 121, 143
流产338
刘昌义36
刘长胜90, 92, 93, 94
刘峰29
刘鸿生：
被共产党招募86
与出口贸易战略386
与反共宣传383－384
返回中国382－387
与各种可能性计划381－382
与共产党379－380
与货币改革378－379
家族从中国移居出去377－382
与家族企业的国有化395
与抗美援朝运动391－392
刘鸿生的领导人地位384－386
刘鸿生之死395－396
作为民族资本家17, 385, 387
与上海人民救济代表大会88
与台湾378－379
与五反运动392－394
与香港380－381, 387, 389－390
在中国家族重聚387－397
对子女的教育381－382
刘金发（电影人物）281－284
刘少奇：
与邓小平115
关于干部训练问题24
关于工业社会主义化问题99
管理风格5
与刘顺元177
与人民大学303, 308
与西藏141－142
与中苏关系195, 305
与资本家329
刘守礼46
刘顺元172, 174, 175, 176, 177, 178
刘思湘204
刘西罕360, 366－368
刘咸246, 253, 254－255
刘吟秋48

刘玉泉168
刘占魁51
柳运光171
六届七中全会23
卢劲挺46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53
卢于道253
鲁康娃(Lukhang Tashi)157
鲁中南区党委25
陆大公29－30, 31, 33－34, 37
陆德生(Justin Jon Rudelson)192
陆定一305
旅大事件168－180
吕淑湘223
绿洲城市202－206
轮船招商局377, 385
《论持久战》(毛泽东著)29
罗常培223
罗恕人197, 198
罗学谦274
洛桑扎西(Lobsang Tashi)157
《骆驼祥子》(老舍著)223

麻省理工学院308
马步芳195, 198
马呈祥197, 198
马大哈(虚构人物)233－235, 237, 239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251,
335
马鸿逵198
马克思(Karl Marx)244, 250－251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的教育问题313
与民族自决138
唯物主义宣传244, 253
马三(虚构人物)290－291, 297
马三立234
《买猴》(相声段子)228, 233－235, 237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130
麦斯武德(Masud Sabri)194, 201
满族138, 191, 192
茅盾288, 289
毛人凤31
毛森30, 31, 33, 34
毛鑫51
毛泽东：
与班禅喇嘛145
与朝鲜战争的经济影响92
与城市政府战略23
与处决反革命分子125
与电影工业292
与工业社会主义化99
与汉族的优越性12
与劳工抗议69
关于历史、诗歌和文学作家的问题
220
与刘鸿生17, 380, 393
与蒙古195
与民族资本家375－376
与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的对立24
与群众动员5
关于上海接管问题25, 28
与《十七点协议》157
与苏联关系305
外交与武力146
与西藏139, 142－144, 149, 151,
152－153, 159
与相声223
与消灭西南抵抗124－125
与新疆196, 197, 208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看法78
与新民主主义时期1, 85, 252
与伊犁政权198－199
与印度的外交154

与《约法八章》30
与占领西南地区 113, 114
与镇压反革命 111
对中国的定性 138, 140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成 138
贸易与出口战略 179, 386
梅朵 154
梅农（K. P. S. Menon）154
美国：
与北京猿人化石 259
与对中国的电影出口 274, 276－277
与红色恐慌 3
与刘鸿生 378, 389
与上海陷落 28
与西藏 12, 147, 153
与细菌战 344
作为相声的对象 225－227
与中国慈善业 91
美国的红色恐慌 3
美国空军地面辅助部队 347
美国圣公会 391
蒙古地区与人民 8, 137, 138－139
迷信与唯心主义 250－251
米高扬（Anastas Mikoyan）139, 141, 305
米丘林（Ivan Michurin）331－332
秘密会社 5, 7
《妙手成患》（相声段子）227－228
民政局 41, 45, 87, 91, 92, 96－97, 98, 100
民主同盟（民盟）328, 330, 331, 332, 335, 343,
民族资本家 17, 329, 376, 387, 393
民族自决 137－139, 140－141
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258
莫斯科餐厅 339
穆斯林 13, 194－195, 196, 198, 201；也见“少数民族”
南开中学 328, 333
难民 48－49, 85, 88－89, 92, 96, 285
尼安德特人 256, 257
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47－148, 154－155
农场与农耕：
与抵抗占领 119－120
与妇女 351
军事垦殖 115
与征税 111
农业：见农场与耕种
女子劳动训练所 289

欧克澜（Cuthbert O' Gara）243, 246

扒手 45
潘汉年 38, 39, 47, 52, 92, 385
潘尼迦（P. M. Panikkar）151, 154
潘焱 117
裴克（Graham Peck）347
裴文中 246, 251, 253, 257, 259, 261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11, 63－79
彭德怀 142－143, 196, 198－199
彭真 46, 99, 124
批判《武训传》运动 292－293, 296－297
皮尔当人化石 247－248
普列雪茨基（M. S. Plisetskii）250
普善山庄 87

七届二中全会 26
钱大钧 27
乾隆 192, 200
强奸 35, 168, 198, 279
青帮 90
清华大学 333
青年反共军 51
（国民党）青年国民救亡军 51

青年知识分子：
与老革命干部的对立315－319
在人大的青年知识分子312, 313
《青青电影》关于电影工业的报道276
瞿白音298
《曲艺》杂志和何迟239
全国工商联99, 395
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全国政协）392
全国助产士协会354
群众处决：见“处决”

《人类起源问题》（天主教教育联合委员会出版）14, 252
《人类如何生产与发展的》（普列雪茨基著）250
《人类是怎样长成的》（古列夫著）249
人类学244, 245
人力车夫46
人力车工会46
人民保安队71－72
人民大学：
本科班308, 312, 313
补习预备班314
短期训练班308, 314, 317
建立303－314
人大的组织308
人大学生教育水平15, 313－314
社会多样性309－314
与苏联顾问15
学生不满生活条件313－314
学生的党员成分313
招生312
人民大学学生的“政治再培训”311
人民法庭46, 47
人民解放军：
与昌都冲突152
与大进军199－200
与进入上海32－36
与劳工关系72, 76
与浦东反革命50－51
与西藏问题142, 146, 148－149, 156
与消灭西南地区的抵抗122
在新疆194, 195, 196－198
占领城市27
与征召反革命分子110
与征召妇女202－206
征召士匪12, 127－128
《人民日报》：
关于北京猿人化石259
关于电影工业的报道292
关于公共安全工作43
关于胡风的报道346
关于刘咸254
关于相声223
关于叶笃义334
关于叶笃庄331－332
日本：
与刘鸿生378, 382
与细菌战344
与殖民地165
与中日战争192
荣鸿庆65－66
荣鸿元65
荣毅仁66, 86, 92
《如此美国》（相声段子）227

“三八式”干部38
三反运动（也见“新三反运动”）：
与共产党5
与工潮68－69
与居委会52－53
与农业科学院341

关于其中不公正的抱怨100－101
“三勤”29
与私人慈善业92－99
三区革命194－195
桑弧271, 273－274, 281, 283－284, 287, 298, 299
色情业289－291
沙龙剧团273
上官云珠281, 292
上海：
防御性栅栏31－32
共产党的治理战略23－53
共产党人对上海的接管36－40
在国家防御和疏散期间27－28
国民党轰炸73
警察颠覆28－31
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32－36
上海工人63－79
社会秩序40－44
上海的社会秩序40－44
上海电力公司73, 74
上海电影制片厂（上影）275, 297
《上海调查材料》26
上海公共卫生局97
1926－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64
上海警备司令部48, 49, 68
上海剧艺社273
上海军管委员会50
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89
上海临时难民救济协会48－49
上海民兵71, 77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87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286
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49, 87, 91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100
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大会86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86, 87, 92, 93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86
上海市警察局28－29
上海市警察局政治调查部30
上海市救济组织调查委员会92
上海市劳动局69－70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385
上海市人民法院48
上海社会局381
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385, 393
上海市总工会64－65, 66, 67－68, 69, 70, 72－74, 77
上海市总工会（民国时期）70
上海市总商会87
上海文艺处277
上海戏剧电影协会275, 276, 285
上海职业剧团273
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88
上海宗教事务委员会98
少数民族：
边远地区的干部140
少数民族干部201
新疆干部197, 208－209
与占领区的抵抗120－122
邵健29, 30
社会部（中共华东局）25, 26
《社会发展史》（Müller-Lyer著）247
社会主义：
与借助苏联模式185
与进化论教育246, 260－262
向社会主义转变99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99
《申报》43, 50
申健151
申新纺织公司65
神农258
审查与电影工业276
沈寂298
《沈阳日报》与相声234

《生活》杂志关于中国电影业的报道 274－275
生育351－374；也见接生
盛丕华87, 92
盛世才193, 194, 195, 197, 198
圣约翰大学391
圣约翰中学391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115, 123
石挥277－299
　扮演刘金发（虚构人物）280－284
　扮演马三（虚构人物）289－291
　扮演资本家角色295－297
　作为上海解放的庆祝者274－277
　死亡299
　作为文化革命者284－288
　与相声277
　作为右派份子297－299
　传记272－274
识字班224
食物短缺：
　与西藏解放145
　新疆的食物短缺202
　与消灭西南地区的抵抗123－124
　与占领西南地区113
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4, 264
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14, 243－265, 287
《说说唱唱》杂志关于相声段子的文章 225, 238
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8－9, 13, 141－142, 195－196, 208, 220, 228, 239
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249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39
私人慈善业：见慈善组织。
思想改造学校46, 127－128, 284, 286, 309－310
《思想改造与集权主义的心理学》（*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利夫顿著）3
《思想问题》（电影）285－287
四六风352－353, 357
四明公所89, 97
四人帮77
宋峰筹183
宋庆龄85, 88, 99
宋任穷115
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116
苏嘉铁路27
苏联（也见“中苏关系”）：
　与大连165－186
　与东北195
　与干部在大连的行动169－170
　与国民党人的同盟166
　与货币改革175
　与军事劣行168
　与虐待中国平民168
　与土地改革170
　与西藏141－142
　与新疆13, 194, 195
　与援助人大15, 305, 307－309
　增加生产政策178
　支持汉族政府194
　与中国共产党8－9, 167
苏联民政局175
苏南公安局51
苏振华113－114
素（相声）段子221－222
肃反运动346
燧人氏258
孙竦337－338
孙瑜292
孙玉奎232
索菲娅·所罗君（Sophie Souroujon）35

塔克拉玛干沙漠199－200
台湾377－378, 387－388
摊贩40
汤恩伯27, 31－32
唐韵超172, 173－175, 176, 177, 178, 180
陶峙岳195, 197－198, 205, 207
天宝145
天主教创世故事249, 250
天主教与新民主主义时期91, 252
天主教组织和私人慈善业领袖92
田栋云119, 121
通货膨胀：见“货币改革”
童葆苓298
同仁辅元堂87
同乡会89, 94
同业公会86
《统一病》（相声段子）237
土登晋美诺布147, 148, 150
土地改革：
　大连土地改革170－171
　与抵抗占领118, 123
　新疆土地改革201
　与新民主主义时期2
　与叶笃义343
土耳其与新疆193－194, 195
土匪：
　改造与再教育117－118, 127－128
　贵州111
　剿匪112, 126, 127

外交与西藏的解放141－157
万人29
王国祥228, 233, 235－236
王立志170
王其人170
王晓籁87, 88
王震196, 199, 201－202, 203－204, 205, 207, 208
《维他命》（相声段子）221－222
维吾尔人192, 193, 194, 195, 197－198, 200, 201, 205
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中的教育313
　与唯心主义的对立244, 248－252
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249－251
　消灭唯心主义的运动243－244, 252－255
唯意志论与马克思主义254
魏德茂114, 118, 125, 127
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256, 257, 259, 260, 261, 262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6, 10, 15, 23－53, 79, 90, 111
卫生部98, 354, 356
温奈良（Nara Dillon）11, 78, 83－102, 381－382, 392
文华影业公司271－299
文化部228, 236, 288
文化大革命4, 5, 218, 239, 397
《文汇报》：
　关于刘鸿生的报道392
　关于桑弧的报道284－285
《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238
《我们五十万年前的祖先》（贾兰坡著）246
吴国桢31
吴仞之273
吴晓铃223, 228, 233
吴性裁278
吴耀宗88, 89
吴茵298
吴永刚275, 298
吴玉章307, 312, 313
吴子宾49

五反运动：
与工会78
与居委会52－53
与刘鸿生392－394
与私人慈善业92－93
五反的经济影响94
对五反运动中不公正的抱怨 100－101
与资本家17
与中国共产党5
五花社298
伍嘉谟127
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99
与新民主主义1
与招募妇女206
1912年五卅运动64, 72
1919年五四运动64, 279
《武训传》（电影）238, 292, 293, 296
《物种起源》（达尔文著）251

西北局（中共）：
与西藏142－143, 145, 147, 148, 149
与剿匪124
西北问题研究会199
西瓜生356
西瓜政策172
西南地区113－116, 122－127
西南服务团113, 114
西南军区144－145, 151－152, 153
《西行漫记》（相声段子）229, 232
西藏137－160
驱汉事件142
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合并156
与苏联142
西藏的战略重要性144, 154－155
西藏解放8
西藏工作委员会145, 149, 152
席香远229
细菌战344
夏格巴148, 150－151, 152, 153
夏衍275, 276, 277
香港：
与出口贸易战略386
与刘鸿生380－381, 387, 389－390
与西藏148
湘黔边区反共救国军118
相声217－240
表演者和创作者218－219, 224
与讽刺14, 230－231
改革的努力223－228
改革的挑战228－236
共产党的镇压236－240
与抗美援朝运动225
内容221
与石挥277
素段子与荤段子221
相声垫话段子220, 231
相声的定义218－219
相声历史220－222
与叶笃慎332－333
相声大会224
相声改进小组223－228
相声广播225, 237
相声中的贯口224, 226, 228
肖大成30, 33
谢晋298
《新灯谜》（相声段子）231－232
《新湖南报》关于为新疆招募妇女的报道203
新华社142, 333－334, 341, 344
新疆地区：
与大进军199－202
共产党的接管13, 141

汉族对新疆的主导207－209
解放新疆191－209
绿洲城市202－206
民族构成192, 208
新疆和平起义198
新疆女兵招募工作团204－205
新疆起义196－199
新疆学院194
新教徒与新民主主义时期252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252
新民主主义时期：
与工会11, 72
与国家统合主义85－90
与国民党政权的连续性83－84
与群众运动88－102
与私人慈善业84, 87－88
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
244－245, 252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转变1, 76, 99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城市精英84, 88, 95, 99－102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家统合主义85－90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群众运动90－92
新普育堂98, 100
《新黔日报》关于剿匪和朝鲜战争的报道127
新青团67, 68
新三反运动97－99
(共产党)新四军29
《新中国妇女》关于接生的报道353
兴中学会30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377
性别角色205, 348；也见“妇女”
徐昌霖298
徐世昌332
徐同49
徐运北113, 114
宣传(也见“宣传部”)：
与电影工业292－294, 295
与对西南地区的占领113
对反腐败运动的宣传93
与科学264
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244
与消灭西南的抵抗123
宣传部236
薛宝琨233
学生：
不满人大生活条件316－317
与老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对抗315－319
人大招收学生311－312
人民解放军征召学生197
学生社会背景309－311
学生士气317－318
与占领西南地区113
与政治背景309－310
训练：见“教育、思想改造学校”

鸦片贸易120
牙齿矫正338
雅尔塔协定关于大连问题的规定166－167
雅各宾主义53
颜福庆88
演员218
玛丽安·杨(Marion Yang)183
杨长庆43
杨帆25, 39
杨凤池114, 117－118, 125
杨虎30
杨柳青278, 292
杨守明183
杨勇113－114, 116, 118, 121
杨增新192

姚增旗334
叶伯英327
叶成197, 198
叶崇质16, 327—328
叶笃仁329, 330, 332, 335
叶笃柔334
叶笃慎332—333
叶笃颂334
叶笃信332, 334
叶笃雅334, 335, 340
叶笃义330, 332, 339, 340, 341—343
叶笃正327—328, 329—330, 339
叶笃庄331, 337, 338, 339, 341, 345—347
叶方333, 335—337, 341—342
叶明295
《夜行记》(相声段子)233
1935年一二·九运动333
伊犁政权195, 197, 199, 208
医疗护理(也见"接生服务"):
卫生部门361
与卫生局100
牙齿医疗338
医疗保险76
米凯尔·伊林(Mikhail Ilin)249
伊斯兰商会198
伊斯兰主义194, 197
医院97—99, 100
《移民企业家》(黄绍伦著)376
彝族头人与抵抗占领195, 197, 199, 208
以工代赈运动49
"以苏为主"176—180
易劳逸(Lloyd Eastman)379
婴儿死亡353, 355—356
印度:
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44
与西藏153—154
在印度建立大使馆148
英国: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44
与刘鸿生385
与上海占领28
与西藏12, 147, 148, 152, 153—154
与新疆193—194
与香港389—390
英国对华电影出口276—277
应云卫2752
《拥护和平》(相声段子)225
有巢氏252
友好故事与中苏文化关系182—184
《友谊》(中苏友好协会出版)182
幼儿园205, 336, 339, 34
于伶275, 277
于世德223, 225
于涛和316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339
语言:
俄语教学队伍310, 313
作为劳工和平的障碍67
与相声段子224, 225
在新疆的语言培训计划201
育才小学336
育婴堂98
袁仲贤152—153, 155

曾震武198—199
战俘109, 110, 112
张爱玲273
张本政169, 173
张达突31
张国华143, 145
张国焘139
章华毛纺织厂381
张经武157
张骏祥277
张庆森234

张闻天178
张奚若312
张毅民231
张治中194, 196, 197, 207
赵丹275, 277, 292, 299
赵佩茹231, 232
赵朴初88, 91, 92－93, 96
赵祖康31, 33
震旦大学46
镇压反革命运动：
　与朝鲜战争127
　与慈善组织11
　与工潮68
　与工人民兵75
　与居委会52－53
　目标90
　对其中不公正的抱怨101－102
　与私人慈善业91－92
　政治目的52
真光电影院273
征税：
　抵抗征税116
　与反革命领袖117, 119
　与农民111
　与苏联在大连的控制179
　与五反运动393
　在新疆征税192
　与占领西南地区113, 114－115, 122－123
整风运动92, 178, 292, 313, 333
政法大学312
政法委员会330
郑君里275
正泰胶厂66－67
政治协商会议（政协）330, 334, 343, 385, 392, 393
支前委员会114
《纸老虎》（相声段子）225－226
志清法师146, 147
志愿军109, 111, 128, 392
中法校友联谊会29
中共地下军33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干部训练问题的决定25
中国电影戏剧工作者协会277
中国福利会85, 88, 99, 100
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85
中国科学院255，330
中国旅行剧团273
中国农业科学院337
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392
中国人民救济代表大会88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88, 89, 91, 94－97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88, 89, 91, 92, 93－97
《中国猿人》（贾兰坡著）257
“中华联邦”计划137－138, 139
《中华民族的儿女》（方旦）261
中华全国工商联395
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377
中华全国总工会69, 71, 78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计划委员会386
钟民94
中日战争（1937－1945）192
中苏关系：
　在大连13, 165－186
　合资企业175
　文化方面181－186
　政治方面8－9, 168－180
中苏合资企业175
中苏文化关系181－186
中苏友好故事中的母亲主题183
中苏友好协会13, 181－186
中苏在工资问题上的冲突174

中央党校344
中央广播电台与相声237
中央航空公司381
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145, 206
种族与进化论教育249, 260－262；也见“少数民族”
仲曦东37
周恩来：
关于边远地区的民族问题140
关于反革命问题52
关于接管上海问题26
与刘鸿生17, 380, 385, 387
与民族资本家396
与天主教组织252
关于西藏解放151
与叶笃义343
与在香港资本家384
周杰荣(Jeremy Brown)1－17, 109－130, 293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16, 110, 327－348, 375
朱代权124
朱德18, 30, 146, 150
朱定远292
朱莉(Julia Strauss)111, 124, 130
朱石山50
朱寿光150－151
竹林关接生站360
爪哇人256
资本家(也见民族资本家)：
与反腐败运动95
共产党的吸引85
共产党中国的资本家16－17, 375－397
官僚买办资本家376
进化论教育与资本主义260
天主教教育联合委员会252
统合资本家86－87
消灭资本家运动397
新民主主义时期1, 7
资产阶级：
与反腐败运动93－99
与共产党329
与经济恢复329
与群众运动90－91
在人民大学的资产阶级309
与私人慈善业85
与新民主义时期1
与镇压反革命运动11
资产阶级被消灭99－102
《自然辩证法》(恩格斯)244
自杀：
慈善工作者自杀94
地主自杀343
与反腐败运动93
老舍自杀239
石挥自杀15, 299
无权获得国家福利的工人自杀76
自我批评43, 46, 96, 236, 238, 255, 285, 287, 340, 343, 346
宗教组织(团体)：
作为被禁组织90
与反腐败运动98
共产党的镇压253
与私人慈善业领袖91
与唯心主义249
与新民主主义时期252
与中苏关系18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是一个既充满了希望与热情、又充斥着恐惧与疑虑的阶段；与其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的时段相比，共和国的最初几年，又是一个容易为人忽视的时期。这本论文集关注的焦点，正是 1949–1953 年新政权这段早期的历史。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城市接管”，关注新政权对城市的接管过程与策略；第二部分“占领外围”，讨论中共对西藏、新疆、大连等地的占领过程；第三部分“适应环境变迁的文化”，探讨文化工作者对新政权的反应与调适；第四部分“家族策略”，观察几个家族在新政权的命运变迁。

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共产党的政策是怎样被制定和执行的，而本书则主要关注这些政策是怎样为人们所感受的。不同于其他研究精英政治和决策过程的著作，本书更加关注不同背景的人在与政权互动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关注新政权的建立怎样影响和改变了普通人的工作与生活，这些人包括工厂主、电影工作者、少数民族群体、相声演员、接生婆、人类学家……本文集的作者既有魏斐德、斐宜理、周锡瑞、毕克伟、陈兼等中国研究领域内的知名学者，也有周杰荣和何凯思这样的学术新秀。他们出色的论文展现了建国史异乎寻常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周杰荣 (Jeremy Brown)，西蒙弗雷泽大学历史学助教授，他的新书稿关注的是毛泽东时期的城乡关系。他写的关于江青树立小靳庄为典型的一章，收入《作为历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2006 年)。

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与中国研究系杰出教授。著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1981年)，合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1991年)，《中国新电影：形式、身份与政治》(2002年) 和《乡村中国的革命、抵抗与改革》(2005年) 等。现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现代中国史荣誉主席。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ww.chineseupress.com
HONG KONG, CHINA

ISBN 978-962-996-470-2
9 789629 964702